

中国
古代

储道立 熊剑平 / 著

情报史

论稿

根据《左传·哀公

元年》记载，我国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情报专家就是夏朝少康时代的女艾：「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但事实上，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各部落、氏族在相互交战过程中，情报就已成为为了双方进攻和防御的重要谋略和手段，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情报学实践至少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中国
古代
情报史

论稿

储道立 熊剑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情报史论稿/储道立,熊剑平著——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227-04642-0

I. ①中… II. ①储…②熊… III. ①军事-情报学
-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E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1109号

中国古代情报史论稿

储道立 熊剑平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毕彦华

封面设计 赵 倩

责任印刷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www.nxcbn.com

网上书店: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0951-5044614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375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6071

字数:220千

版次:2010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27-04642-0/E·34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呼吁重视各种专史的研究工作。在他看来：“若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是一部顶好的通史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其后，梁启超超凡卓绝的识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时至今日，各种专门史层出不穷，似乎正沿着梁启超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显然，在社会分工越来越具体、学科门类越来越趋于专门化的大趋势之下，专门史确实更能满足社会及相关教学工作之急需，同时也不失为通史和史学建设的重要内容，或是必要之补充。

任何一门学科在建设过程中，都免不了需要对既往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和阐发，以求得扬弃。可惜的是，据我们了解，在相关情报学学科之中，一直没有一部专史面世，甚至在教学科研中也缺少史学之应有地位。可以说，相比其他学科而言，建设一部满足基本教学之需的情报史实已显得刻不容缓。

本书主要部分是我的老师储道立先生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工作所撰文稿。其中有一些虽由我执笔写就，实则也与储师耳提面命直接相关。其中的大部分都已发表，少数未经发表的文字（多为人物论稿），则是我沿着储师指示方向涂鸦而成。之所以攒集在一起，是希望对相关研究领域有兴趣的同志能从多个方向进行努力，既研究思想理论，又关注人物事件，以尽快推出一部完整而成熟的情报史专著。拙著倘能起到某种抛砖引玉之功效，对相关学科建设起到一点推动或启示意义，则幸莫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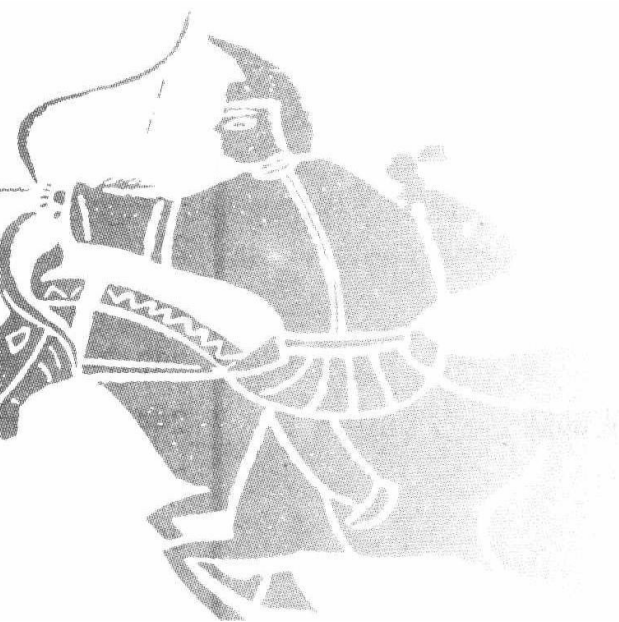
需要说明的是，既是多年积累，时间跨度也长，故而不可避免

地会在文章体例上稍有不同。比如就注释来说，有的文章是因为当初所刊载杂志不强调注释，大量删减作者原有注释所致，这次编订过程中曾想一一补齐，但终因查检不便，只得保留旧貌。这是需要对读者诸君说一声抱歉的。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其中有的篇章因为与相关学科有密切的姻亲关系，多少对情报史编撰工作具有启示意义，故此也一并收入进来，望能察之。

本书能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庆安公司刘亚苏先生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同时也感谢出版社和编辑同志的辛劳。我的同学马彦为此书出版不倦奔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熊剑平于品园

2009年10月5日



目 录

contents

- 序
- 001 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通览
- 017 论《周易》情报思想
- 030 孙子的战略情报分析理论
- 052 《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述评
- 066 《管子·八观》的军事情报思想
- 074 《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及启示
- 081 《六韬》军事情报思想
- 093 《吕氏春秋》军事情报思想
- 107 《吕氏春秋》情报思想的产生
- 115 《李卫公问对》在军事情报思想史上的意义
- 124 戚继光的军事情报思想
- 135 曾国藩的军事情报思想
- 144 《间书》述评
- 158 日本对《孙子·用间》的研究和运用
- 165 《三十六计》发微
- 188 唇语判读
- 197 女艾行间考

伊尹行间考	208
吕尚行间考	218
武官溯源	227
向戌弭兵述评	232
我国最早的特种作战部队	244
外交家子贡	247
勾践情报活动述略	269
苏秦间谍案述评	280
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间谍活动	292
汉丞相陈平的情报活动	299
北齐名将韦孝宽的情报活动	308
善于利用商贸获取情报的裴矩	316



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通览

军事情报思想是军事情报实践的理性认识。在中国，一定历史阶段的军事情报思想，既是对当时军政外交等实践中情报活动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前人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形成了中国军事情报思想史。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军事情报思想产生、发展及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涉及到情报哲学、地位作用、手段方法、分析处理、组织分工、政策纪律、人员素质等领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史隶属军事历史科学范畴，是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军事思想的历史遗产之一，又对当代及今后的军事情报实践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远在商代时，伴随人们预知未来的渴望，军事情报意识即已萌生于宗教神学活动之中。甲骨卜辞中已有侦察敌情和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记录。周代则是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的发轫期。《周易》中有许多直接叙述战争和情报预测的卦爻辞，反映了作者古朴的军事情报思想。“观”卦就掌握各部族邦国情况的问题，否定了幼稚简单的“童观”和局部片面的“窥观”，主张既要“观我生”，又要“观其生”，还要考察大国的政绩（“观国之光”），以此决定自己的进退方针和内政外交方略。这一思想实则是孙子“知彼知己”情报观的渊源。在“师”卦中，作者提出了“师出以律，否臧凶”的命题，认为掌握一支部队出征时的状况是否良好这一情报，可以预见战争的吉凶。在“同人”卦中，作者指出“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预言在隐蔽行动中如果暴露了目标，不仅要打

败仗，而且该部队将多年不能恢复战斗力。在“复”卦中，作者认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某种敌对势力的崛起而贸然用兵，将导致“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的恶果。这些朴素的认识，反映了《周易》注重预见的军事情报意识。

其后，《易传》在《周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知几”说。《易传》认为，战争胜负、宫廷政变、人事吉凶等社会现象的变化是事物刚柔阴阳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并把导致这种变化的初始迹象和征兆称为“几”。为此，《易传》强调“早辨”、“知几”，要求人们“见机而作”、“极深而研几”。“知几”说，不仅是《易传》认识论的核心，也是关于情报获取和预警思想的精髓。在《易传》看来，情报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原始要终”，“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意即：察其始而求其终，在复杂隐晦的现象中探索真相，获取机密，推断未来趋势，从而判定事物的吉凶，促成人事的努力。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军事思想成为百家争鸣的论题之一。《老子》在哲学上主张柔弱胜刚强，初步认识到事物的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的规律，进而提出“知常曰明”、“未兆易谋”、“知雄守雌”、“大巧若拙”等观点，对后代的情报与谋略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墨子》政治上主张非攻，军事上专讲防御，并在守城术的研究中叙述了侦察和防谍措施，具体实用，操作性强。《荀子》提倡仁人之兵。在情报保障方面，认为“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只有如此，才能做到“聪明警戒”。在情报获取与分析方面，要求“观敌窥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强调搜集动向情况，采用秘密深入的手段，注重反复分析验证。在作战指挥方面，提出了“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的情报使用原则，并将其视之为将帅的“六术”之一。

先秦诸子中，以《管子》、《鬼谷子》、《吕氏春秋》的情报思想较为丰富。《管子》把情报分为“形”、“能”、“意”三大范畴，

认为“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见解独特。它把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归纳为经济财力、武器装备、军队建设、掌握敌情和捕捉战机等八种因素，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之间存在一种逐级追加的关系，并把“遍知天下”、“明于机数”的情报工作视为战争准备和决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道出了情报工作与其他各项军事工作的关系及其重要地位。在战略情报和基本情况的侦察和搜集方面，《管子·八观》提出了八大任务，既有军事方面的内容，又包括自然资源、农业生产、民风教化、统治集团和国君意志、外交结盟诸方面，不仅在情报工作指导方面具有任务明确、要求具体的特点，而且在分析和预测方面贯穿着古朴的方法论。这种全方位的情报调研思想，是战国时代对情报任务的纲领性的表述。在防奸保密方面，作者以别开生面的叙述，揭示了唇语判读法的语言学原理。

《鬼谷子》以外交和游说工作中洞察君主的内心世界为核心，显示了独特的情报工作思路。基于“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的认识，以及言语为思想情感的门户这一基本观点，主张通过言谈技巧叩问对方的心理活动和思想状况，以达到“测深探情”的目的。为此作者细致论述了一套旁敲侧击、分析判断、引诱说服的揣摩术，开启了情报心理研究的先河。此外，《鬼谷子》的理论还与纵横家有密切的联系。《鬼谷子》善于雄辩，独立应对，力求把握他国最高机密，谋求以外交战线配合军事斗争，是其所长，但也由此蒙上了崇尚诈谗、追求游说者个人功利的弊端。

《吕氏春秋》探讨了不少情报基础理论。关于情报的性质地位，作者用“智”揭示了情报工作的本质特征，并认为“义”、“智”、“勇”是赢得战争的三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它视情报为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必须凭借的“因”，从而主张“贵因”，认为“因则无敌”。关于情报工作的任务，它继承了《易传》的“知几论”，着眼于“先识”、“知化”、“长见”，把高度的预见性和有效的预警视为形势分析和判断的根本要求，并以此作为区分明君和

惑主的界限。在此基础上，《吕氏春秋》进而探讨了情报工作的规律——“知道”。认为有效的情报工作必须“察微”、“审征表”、“明倒顺”；国君和统帅在听取情报时，主观上必须“去囿”、“防壅塞”，客观上必须“察传”、“察疑”；要做好保密工作，必须“重言”。

春秋以降，兵家蜂起，军事情报思想走向成熟，其标志是《孙子兵法》。宋朝时期，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被定为“武经”，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情报理论。

《孙子兵法》以“知”为核心，以预见战争胜负为根本目的，建立了系统的军事情报理论。在情报哲学方面，孙子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既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又反对狭隘经验主义和机械的数量推理方法，而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作战指导原则上，他主张“先为不可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认为作战必须以对敌我双方情况的透彻分析为基础。为此，他赋予战略情报分析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建立起实质是战略情报分析的“庙算”理论，同时，将“庙算”与“诡道用兵”视为百战不殆的两大基本保证，从而奠定了传统兵学先计后战、谋略用兵的特点。孙子的情报观是“彼己”、“天地”一体化的大情报观。在这两对基本范畴之下，又以“道”、“天”、“地”、“将”、“法”为主要内容，按性质和类别划分了不同层级的情报分析项目，既有战略层次的情报，也有战场、战术层次的情报，涉及政治经济、君将关系、军队建设、国防力量、后勤保障、法令法规、兵器装备、战场环境、战术地形诸方面。在工作流程上，他把“庙算”分为逐项分析、对比研究、综合评估三个阶段，并认为情报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战争胜负，而且取决于情报工作者能否多算细算。在方法论上，他建立了“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逻辑分析模式，且已具有定量的成分。在“用间”方面，孙子全面论述了谍报工作，举凡地位作用、招募派遣、任务纪律、政策待

遇、性质类别、经营指导、人员素质、历史经验，均有讨论。孙子的“用间”思想奠定了谍报学的理论框架，既是上古人力情报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反映了古代兵学思想由“仁本”向“尚智”的巨大变革。在战场侦察方面，他认为“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重视细微现象的观察和分析，试图揭示现象与本质的联系。为此，他总结了三十多种“相敌”之法，注重对敌情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和判断，反映了军事思维的某些特征。

《孙臆兵法》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主张针对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战法。认为“王者之将”必备的条件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则战，弗见则净。”它把“不用间”列为五种“恒不胜”之一。这些都反映了对情报工作的重视。

《吴子》的情报思想特色，首先重视对宏观态势和各诸侯国作战特点的调研。《料敌》篇对魏国周边环境所做的分析，是一篇开启国际战略环境研究和周边安全形势分析的示范之作，与《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纵横家的风格。其次，在认识论上，它看到了事物显与隐、内与外、进与止的关系，主张“以见占隐，以往察来”，做到“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再次，它创立了“四机”说，认为作战需要掌握敌将的能力气质、战场的军事地形、敌国的君臣人事、敌军的作战力量，四者之中，尤以“占其将而察其才”为要。最后，在情报的应用上，它强调“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并为此规定了依据敌情决定是否与敌作战的十四条战术原则。

《司马法》是军事思想由“以仁为本”向“兵以诈立”过渡的转型期的代表作，有关军事情报的论述多为格言式观点，未能展开论述。在战争观上，它在强调“仁见亲”、“义见说”的同时，又认为“智见恃”，看到了战争对识见的依赖。在情报思想方面，它提出“方虑极物”的观点，认为“顺天、阜财、怗众、利地、右兵”是作战需要同时考虑的五件事。在情报运用上，它指出：

“凡战，间远、观迹。”并着眼于“因敌令阵”、“视敌而举”，提出了一些属于战场监视范围的“刃上察”的要求。

《尉缭子》基于人事重于天命的观念，在战争决策上重视人的思考能力，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强调“兵胜于朝廷”，要求做到“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在作战指导上，重视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以确保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它认为：“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也。”

《六韬》提出了一条独特的情报工作思想路线。与《孙子兵法》侧重于秘密战线通过“用间”了解敌情不同，它主张“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使全部情报及分析结果辐辏于君主一人之身，从而做到对外部世界的所有情况了如指掌。在诸侯各自为政、侦察通讯手段落后的时代，虽然无法实际做到“无所不知”，但是这种“以天下之耳目视听”的情报路线反映了情报工作的理想境界，并成为历代情报部门的奋斗目标。《六韬》认为情报工作的任务包括“三观”、“六见”。“三观”是对他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了解。“六见”要求透过表象分析真实意图，掌握他国军政首脑的实际战争意图和作战策略。《六韬》还首次阐述了司令部机构的参谋人员组成，其中对“游士”、“耳目”等情报类参谋人员的组织建制和职掌分工做了明确的规定，较之《周礼》中的情报官员设置，人员类别和职责任务完备得多。在《文伐》和《三疑》两篇，作者又专门论列了种种收买利诱、要挟控制敌方官吏将帅的手法，意在借此达到离间君臣、收买内奸、获取情报的目的。这些间谍阴谋手段，被后人称为“阴刻陷人”的伎俩。在情报传递方面，《六韬》介绍了阴符和阴书。这是原始的通信联络方法，前者是秘密传达军令的凭证，后者相当于机密文件，用于“其事繁，符不能明”之时，可以传递较多的信息。为了情报的准确理解和安全保密，《六韬》还对阴符、阴书的规格、

形制、功用和发送方法做了规定。

秦统一中国之后，在统一与分裂局面更迭出现的漫长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基本处于农耕水平，致使军事科技直至明朝末期也未能实现从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的彻底变革，虽然战争的规模逐步扩大，军队的构成也有所改观，但并未带来战略战术的质的飞跃，古典军事思想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军事情报思想已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绚烂多彩，而是趋于平淡，继承多而创新少。虽然情报实践的内容和范围更加广泛，却缺乏进一步的理论建树。汉代，为了加强边防，拓展疆域，朝廷曾先后派遣张骞和班超等人出使西域开展军政外交工作，同时借以了解匈奴等游牧部族的情况及山川道里形势，虽然他们取得了重要成就，却未能在情报理论上留下著述。三国鼎立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地缘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对联合与打击的对象、内外政策提出了建议，准确地预见了尔后的天下三分的局面，是战略形势分析和判断的杰作。从战略情报文件整理的发展演变看，《隆中对》与《吴子》中对战国七雄的分析模式和《战国策》中有关战略态势分析的大量篇章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隆中对》虽然分析较《吴子》深刻，也克服了战国时期策士们的夸张铺陈之弊，但毕竟是一篇对策研究，而非战略情报整编的理论文字。其后，虽然历代均有类似《隆中对》的文献，可惜终未总结出有关战略情报分析整理的系统的理论成果。东汉末年，王符的《潜夫论》对“救边”、“实边”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主要是谈政治而不是军事。唐代以后，边防乃至海防情报工作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相应出现了若干论述，但也大抵归于具体情况分析和措施对策的探讨，而没有上升到有关边防情报工作和周边环境的情报理论上。宋代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虽然设有“料敌”、“用间”、“审察”等门类，但也仅限于史实的排比爬疏，而无理论的归纳。明代特务统治猖獗，组织机构庞大，虽则不足为训，但是除了道德尺度的评价之外，也未见有专就政治情报和对内侦控问题本身进行

总结的专业论述。

随着军事思想的缓慢发展，“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成为传统兵学的基本特征。军事情报思想也基本沿着祖述孙子的轨迹前进。汉代末年，曹操阅读了大量的兵书战策，认为孙子的著作最为深刻，撰写了《孙子注》，从而开启了后代诠释、研究《孙子兵法》的学术风气。宋代汇辑并刊行了《十一家注孙子》，集中反映了《孙子兵法》诠释派的研究心得。在情报思想方面，诸家具有的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不注重字词的考释，而着重于军事斗争、思想意义以及具体问题的探讨；二是联系实际，每每援引战例和间谍案例加以印证；三是在《孙子兵法》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引申发挥，深化认识。他们或论证情报工作的性质意义、地位作用，或界定情报术语、揭示概念内涵，或扩展手段、充实做法，或增加类别、补充细则，或探讨旧案例、引出新问题。虽然彼此之间观点不完全一致，总体上也没有超越《孙子兵法》的情报范畴，却反映了众多兵家乃至政论家对军事情报理论和实践的重视甚至是重新审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古典军事情报思想，并使之更趋具体实用。

诠释派之外，也有论者对《孙子兵法》的情报思想提出质疑，其中集中反映在谍报工作方面。除了儒家出于“道德立场”的迂腐之见，以宋代苏洵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苏洵认为：“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谋，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智于此，不足恃也。”质疑者的这一观点，指出了孙子谍报思想的“知用间之利而不知其害”的缺陷。

汉代的《三略》是“武经七书”之一，《四库提要》说该书“务在沉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在情报侦察方向上，首先，《三略》注重从“粮食”判断敌情。它说：“用兵之要，

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虑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敌。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其次，《三略》提出了“因敌转化”、“动辄随敌”的情报与战术应用相结合的思想：“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再次，要求将帅“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除此之外，还要做到“能受谏”、“能采言”，举凡“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都应听取，实际上已经将“知情”和“采言”作为衡量将帅情报工作水平的两个标准。

《将苑》系托名诸葛亮之作，专论将领应具有的品质，内容多复述《孙子兵法》，也有一定创意。它以“将器”的大小区分带兵能力，认为“天下之将”应当“上知天文，中知人事，下知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为此，身边“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同时要分析间谍和侦察人员的报告，“先探敌情而后图之”。值得一提的是，《将苑》专门叙述了四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作战特点及地理环境，是对周边民族基本情况及作战特点进行专题调研的雏形。

唐代将领李靖著有《李卫公问对》和《李卫公兵法》，前者为“武经七书”之一，后者今有辑佚本。李靖谍报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用间最为下策”，而更加倚重从公开渠道搜集“蕃情”。他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反映了慎用间谍的思想，与宋代苏洵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在间谍的招募上，他主张“因邑人”、“因仕子”、“因敌使”、“择贤能”、“缓罪戾”，与《孙子兵法》的“五间”相表里。在经营对象上，他总结历史经验，归纳为“间君”、“间亲”、“间能”、“间助”、“间邻好”、“间左右”、“间纵横”数种，比前人有所发展。他在

辩驳自己是否以出使突厥的大臣唐俭为死间的问题时，提出“去大恶不顾小义”的观点，这与谍报史中经常论及的“郑武公杀大臣以伐胡”的案例有共同之处，触及到了谍报伦理问题。在军事情报基础理论方面，李靖既重视“知敌”，更强调“误敌”，与唐太宗“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的认识相一致，进入了谋略欺骗和情报战的领域。关于情报应用，李靖侧重强调情报对于奇正用兵和掌握作战主动权的保障作用。此外，李靖还谈到以驿站作为情报传递和联络据点的问题。

唐代李筌曾注释《孙子兵法》，并积十年心血撰成《太白阴经》，篇帙宏大，秋毫必录。其中《将有智谋》、《术有阴谋》、《数有探心》、《庙算》、《沉谋》、《行人》、《鉴才》诸篇，详细论述了有关军事情报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对孙子的情报思想作了全面的引申发挥，在古典军事情报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李筌情报思想的特色在于人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探心之术”。他主张“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根据人性仁义忠信、智勇贪愚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交谈方式套取情报。其核心思想是“伺人之情有所爱恶去就，从欲而攻之”，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鬼谷子》的揣摩术，而且在情报心理学方面也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李筌的思想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确认战守全在人为，与天时阴阳无关，另一方面，却又在其著作中充斥了大量的占星望气、遁甲六壬等内容，认为通过天象灾变的考察可以推断战争与人事吉凶。这是对《六韬》中“观云望气”以测敌军的唯心主义情报观的恶性发展，反映了传统兵学受到阴阳术数严重侵蚀的一面。

北宋时期，许洞推崇孙子和李筌，著《虎铃经》20卷。许洞认为：“用兵之要，先谋为本。”基于此，书中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情报问题，大体上是“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在谍报工作方面，他综合孙子和李靖的用间理论，提出“用间八术”，增设了“使者”、“内嬖”、“谗人”等经营对象，有所创新。但是，

如同《太白阴经》一样，许洞一方面认为：“奇谋诡道，或不合于六经，既为兵家要用，故必贯穿条缕以备载之。”另一方面又认为：“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这些舍人事而言天命的迷信内容，荒诞不经，是古典情报理论的糟粕。

《武经总要》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军事百科全书。该书载有“符契”、“传信牌”、“字验”等，其中“字验”是宋代出现的密码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何去非是我国第一位“武学博士”，著有“何博士备论”，详论历代战略得失。他认为战略决策应以对全局形势和总体利害得失的分析为基础，并以历史经验教训为例，强调用兵与否，关键须视“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反映了他对战略情报的重视。

南宋时期，华岳的《翠微北征录》包括“平戎十策”和“治安药石”两大部分。作者针对当时军事和国防工作的弊端，论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耳。”为此，他专列一卷，从“采探”、“候望”、“紧探”、“关递”、“密辨”五个方面论述了“采探之法”。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军事情报网的主张，不仅论述了谍员的招募和用间术，还具体叙述了情报传递方法，既切合实用，又利于保密。

明代出现了大量兵书，且多文人之作。随着郑和出使西洋、倭寇骚扰沿海和郑成功收复台湾等事件的发生，以及海防战略观念的逐渐浮出水面，出现了专事汇辑沿海和海洋防务资料的著述。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为了知彼知己，抗御倭寇，采用“图以志形胜，编以记经略”的体例，详细记载中日两国的有关情况，申述其海防战略思想。书中绘图 174 幅，其中明代沿海地形和郡县图 112 幅，战船、兵器图 59 幅，日本国图 2 幅，倭寇入侵图 1 幅，不仅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地理资料，而且标志着军事地理的研究和兵要地志的编辑成为军事情报搜集和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

“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知经略。”认为海防设置“必因地定策”，反映了早期的海防情报思想。

魏禧是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学者，所著《兵迹》不仅分析中国境内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地情况及作战特点，而且分卷记载了亚洲海岛诸国、我国周边诸国、欧美远邦诸国的资料，虽然不尽准确，但已表明世界军事地理情报资料的研究已经进入世人的视野。边防方面，《九边图说》以大量精细的绘图，配以文字解说，分述九个军事防区的地理位置、战略要地、军事设施、兵马钱粮以及敌情形势，被称为“边防者所不废之书”。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更是一部详尽考释历代军事地理的巨著。顾祖禹认为军事斗争必须洞悉地理：“从来有事于一方者，必常审天下之大势。不审天下之大势而漫应之，战与守虽异，而其至于败亡则一也。”为此，他采用地理区域与军事历史横纵结合的方式，详述各地“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客观上揭示了地理情报的地位和作用。

茅元仪以个人之力纂辑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提出了边防、海防、江防并重的战略思想，并在《占度载》中以多卷的篇幅详细记载了明代地理形势、关塞险要、海陆敌情、卫所部署、督抚监司、将领兵额、兵源财富等，实际是关于己方情况的系统全面的情报资料。

在军事科技方面，徐光启基于“器胜”的军事思想，力主引进西洋的火炮技术，变革部队的武器装备，并将“技艺”列为练兵的标准之一。他既是明代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先驱，也开启了军事科技情报研究之风。

《百战奇略》的作者不详。他把谋略用兵置于战争指导的首位，认为：“凡与敌战，必先料敌，详审而后出兵。”一是“料将之贤愚”，二是“料敌之强弱”，三是“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四是“料粮之虚实”。在侦察与情报方面，作者提出了“凡欲征伐，先用间谍”，“行兵之法，斥候为先”，“凡与敌战，必用乡人引而

导之”三项原则。

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戚继光在中国军事情报史上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在抗击倭寇的作战实践中提出了海防情报观念，并总结了海上侦察的“相敌之法”。他的若干理念，不仅可视为海上安全思想的先驱，而且对于当今的打击海盗和保障海上战略资源交通要道畅通的情报工作都富有启示意义。在作战指导上，他主张“算定战”，反对“舍命战”和“糊涂战”。认为：“敌情不得，耳目聋聩，亡身败家，可立而待也。”要求战前“件件算个全胜”；每到一处，“遍察军情虏状”。在日常活动中，规定禀报和押送公文的人员，须经审实，方可进见；可疑之人，须送军中研审发落，不许擅放擅问。他还将潮汐时刻和物候现象编成歌谣，以供下级应用。在行军驻扎时，坚持派出明哨、暗哨，及时掌握敌军动向；注意设立烽堠，有效传递警报。在具体战斗之前，强调对敌情、地形要周密调查，做到对敌军的“分合、出入、多寡、向往、进兵路径，举皆洞然”；对作战地形，“了然如素履”。在战术原则上，他主张“临机应变”、“因情措法”、“因地布阵”。他的情报思想和实际做法，具有战役、战术情报的特点，不尚空谈，具体实用。

《投笔肤谈》疑为何守法所作，该书《谍间》、《敌情》两篇专论情报。关于敌情，作者认为：将领不知敌情，如同木偶，便不能利用战机取得胜利；敌情是动态的，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使用间谍和观察“战形”，是掌握敌情的两条基本途径；对于敌情，必须详察，善于识疑，辩证分析，掌握敌之企图；敌情不明，要采用“示形”之法，探知敌情；敌情既得，不可贻误战机。关于间谍任务，分为情报搜集和秘密斗争两方面。前者包括“采物价之腾平，察风俗之好尚，覘人事之喜怒，矚上下之乖和”，重在经济、政治情报，比前人有突破。后者包括利用敌方的内部矛盾使其互相猜忌斗争，废黜忠良，拆散同盟等，不再将谍报工作仅限于搜集情报的领域。对于谍报工作，认为间谍固然重要，但也存在

“传伪于我”和“泄情于彼”两种可能，主张间谍“可用而不可恃”，这与李靖的观点一致。

《草庐经略》作者不详，书中反映的情报思想切实具体，较前人有所发展。作者重人事轻鬼神，认为“天官时日”只可用于迷惑敌人或激励士气，是其情报思想不同于《虎铃经》、《等坛必究》等兵书之处。敌情判断方面，认为智者千虑，难免有失，强调集思广益，听取善言。谍报工作方面，主张一事多间，间谍彼此之间各不相识，各述所闻，“为间之人不一，而知间之人惟我”，以便察其真伪，分析异同，相互印证。“御倭之法”，主张“出洋远哨”，于风汛之期“时时警守，时时侦望”。战术侦察方面，强调广侦察，度险要，诳敌将，严斥堠，用向导。

明清之际，揭暄著《兵经》，以一字概括一条用兵原则。其中“智部”对情报理论多有阐述，在认识论上有一定价值。“谋”条认为：“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已有“智囊团”思想。“误”条论及“误人不为人误”，具有情报思维和谋略意义。“知”条总论察明敌情的四种手段，“识”、“测”两条论述实战中对敌将企图和战场情况的判断，“间”条论述间谍手段方法，有新的归纳。“秘”条强调“谋成于密，败于泄”，叙述泄密的种种原因和可能，富于警示和教育意义。

清代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军事情报思想出现了重大发展。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鉴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提出了“知夷情”、“筹夷事”的口号，不仅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情报工作，而且实现了情报思想由传统的“知敌情”观念向新兴的“知夷情”观念的重大变革。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筹备战守，上任伊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并将所搜集的资料编为《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成为公开情报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先驱。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林则徐提供的《四洲志》及大量口述情况的基础上，又参照其他中外史地资料，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辑成《海国图志》50

卷。该书是近代以来从军事角度看世界的标志，表明军事情报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他在“叙言”中说，该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认为以夷攻夷，必先知“夷形”、“夷情”，即了解世界形势、各国经济往来以及彼此利害冲突等情况。他在介绍各国地理环境时，分析了英国从新加坡、印度战略方向对中国的威胁，预见俄罗斯兼并我国西北地区的可能，并十分重视缅甸、安南、美利坚抵抗英国侵略的历史经验。“知夷情”是为了“筹夷事”，在外交战线上利用矛盾，折冲樽俎，以夷制夷。“师夷长技”则要了解、学习西方战舰、火器技术，以及新式养兵练兵之法。其内容已涉及国际形势分析、军政外交谋划、军事科技、战役战术四项领域。魏源还主张设置翻译馆翻译西洋书籍，延聘西洋工匠技师和军事教练人员，以使中国水师“战洋夷于海中”。

曾国藩是清末重臣，湘军首领。对抗太平军，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军事生涯。在军事情报思想方面，他主张“以亲看地势、亲探贼情为第一要义”，延续了孙子的“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的大情报观。对于敌情，强调“第一贵审力”，认为“审机审势，犹在其后”，表明他十分重视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考量。曾国藩的军事情报思想的独特之处是在情报整编和情报报告方面，其核心观点是“不妄奏”。由于下级军官上报的军情不免有谣传之辞，对于战局的趋势预测也难免判断失误，因而他主张“不凭报入奏”，反对把下级军官上报的情报直接呈达朝廷，以免混淆朝廷视听。他根据自己的作战经历和当时战争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军情报告的两条原则：一是“不轻奏未定之事”，二是“不轻奏预计之说”。在战争中，他向朝廷上报奏折时，实际上也奉行宁少勿滥的原则。对于撰写军情奏折，他认为“一言之是非”，关系到“他人之荣辱予夺”，“不宜发之太骤”，一定要“存敬慎之怀”，慎之又慎，下足功夫。除了反对“欺饰”和“文过”之外，既要研究观点主张，也要斟酌遣词造句。这些思想，除去反映了曾国藩忧虑满族朝廷猜

忌自己之外，确实是他在军事情报文件撰写与报告方面的甘苦之谈。

朱逢甲是古典间谍思想的殿军。他处于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而满清政府又无力镇压的时期，在看到清廷财政枯竭、官兵惧战，而招募来的乡勇又不愿与起义军作战的情况下，认为只要间谍手段运用得法，打入起义军上层领导，采取暗杀手段，就可以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这种“用间解决一切”的思想，把自孙子以来的谍报理论推向了极端。基于“勘平”起义的目的，朱逢甲撰写了《间书》。该书为间谍史话性质，在情报学术上具有一定价值。首先，拓展了间谍的内涵，把外交谋略运用、侦察活动等也视为“用间”，但未能廓清概念。其次，以儒驳儒，认为圣人也不免为间。再次，有述有作，强调巧于用间。最后，溯源辨流，广征博引，不仅考证了间谍名称沿革，而且基本达到了“用间之法，略备于斯”的目的。



论《周易》情报思想

《周易》是一部特殊的智慧之书，它借助八卦、六爻等符号形式，表达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在《周易》博大的思想中，也蕴涵着丰富的情报思想，而且其中相当部分充满了认识论色彩，对于今天的军政情报理论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周易》具有丰富的认识论内容

“情报”，说到底，是人们对客观外在事物和现象的准确认识和把握。情报产品不仅是对现成的事物和现象进行充分了解的结果，也是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结果。在情报工作中始终贯串着一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求真、观化、知远的要求。情报哲学实际是认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故此，谈到情报，无论是情报哲学的基础理论建设，还是情报分析判断的实践，乃至情报的收集整理的工作等，都离不开相关认识论的指导。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中丰富的情报认识论的内容，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情报哲学乃至情报基础理论的建设，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周易》给予我们认识论方面的主要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事物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乾·大象传》说：“天行健。”《乾·彖传》说：“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系辞传》说：“周流六虚，变动不居。”这些都是说明万物永远处在生生不

息的变化过程的道理，为此，人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

第二，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否极泰来”^①和“物极必反”，“既济矣又终之以未济”^②，意在说明事物的变化无穷和向对立面转化的可能，一个过程的结束往往意味着另一个过程的开始，为此，人的认识也要跟上事物发展变化的新阶段。

第三，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对立统一在于阴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③和“易以道阴阳”^④，牟宗三说：“阴阳是气的相反的作用，一阴一阳是阳了又阴，阴了又阳，连续下去成个变化，道就在变化的过程中呈现。”^⑤因此，人在对客观事物进行认识时，必须深入事物内部，把握导致变化的原因。

第四，人的认识过程有其特点。在《周易》看来，万事万物都具有“其初难知，其上易知”的特点。在事物发生的初始阶段，事物通常都是难以窥测和把握的，但在经历了一个过程之后，事物日益显现、发展壮大、特征明显了，这时才容易认识和把握。为了促成事物健康发展或防患于未然，人们必须在事物初始阶段即能察知苗头，发现动向，从而因势利导。为此，《周易》提出了“知几”这一重要的认识论。所谓“几”，《系辞下》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也就是事物发生初始时的萌芽状态，以及客观形势变化的最初征兆。“知几”，就是要善于发现苗头，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未来将会出现的事态作出判断，提出预警，早做准备。

第五，人的认识任务在于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结果。

① 今本《周易》，《否》在《泰》卦后面。《序卦传》：“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姑受之以否。”否极泰来盖反其意而成语。

② 《序卦传》：“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③ 《周易·系辞下》。

④ 《庄子·天下篇》。

⑤ 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6页。

这就是所谓的“原始要终”（察其始而求其终），“逆以知来”和“见微知著”。《系辞》说：“顺以藏往，逆以知来，是故，以逆数也。”这些说的都是预见性方面的要求，无疑反映了人们在掌握事物发展趋势上的愿望。

二、《周易》情报意识举例

首先要提到的是“观”卦。该卦下坤上巽，排在六十四卦的第二十位，一般被视为政治专卦，专论对社会民情和政治情况的观察内容和观察方法。

何谓观？就是观察、了解。《彖传》说：“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观。”这里的“大观”，不是一般的泛泛的了解，而是指的遍观、洞察，是高级的“观”。而“在上”，一般指九五，也就是包括君主在内的上层统治集团，君主处于尊位而下观群臣万民、邦内邦外，所以叫“大观”。又因为“坤”卦的卦德是顺，“巽”卦的卦德是逊，所以作者借卦德说辞，认为观者在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时应该不含偏见，不先入为主，而要具有柔顺谦逊的品德。在《彖传》作者看来，观者要守中正之道，客观而实事求是地了解天下的情况。《大象传》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巽”卦是风，“坤”卦是地，故而有“风行地上”之象。风行地上实则也是比喻“大观”和“遍观”，要求观者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观察了解如同风吹大地一样的无所不到、无所不知，巨细无遗，无不掌握。所谓“省方”，就是省察方邦，了解各部族和诸侯国的情况，所谓“观民”，就是就是掌握民风、民情和民心。只有经过“省方”和“观民”，治国者才能有针对性地“设教”，也就是制订政策，施行教化。由此可知，在《易》作者看来，观察社会，必须要全面地掌握各国诸侯和民众的思想情绪，使之无所遁隐，同时还必须要遵循客观原则，不能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成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行政治。

“观”卦六爻还从“观”的形式和内容出发，揭示了不同的人对外部世界不同的认识程度。第一种是初六的“童观”，指的是如同小孩子一样的幼稚简单的观察和认识，这种认识当然不可能准确深入到事物的内部。第二种是六二的“窥观”，指的是如同妇女们从门缝中看外界，所见极小，只能看到局部和片面的情况，而不能把握全局和整体。由于这两种认识不能准确全面地了解外部世界，所以作者又将其称之为“小人之观”，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作者所否定的。

与“小人之观”相对的是“君子之观”。“君子之观”指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范围说，这种认识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己方的了解，这就是六三爻辞所说的“观我生，进退”。“观我生”，说的是首先要充分考察我方我族的状态^①；“进退”，说的是根据所掌握的我方我族的情形采取针对性的政治措施。通过考察己方的百官庶民，考察部族首领的动向，然后作出决策，对人有进用有斥退，对事有进行有退止。“观我生”对于统治者的施政具有重要意义，故而作者对居于九五尊位的君主强调为政者必须“观我生”，只有对己方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合理施政。

“君子之观”的第二个方面是“观其生”。从统治集团的角度说，“观我生”只是第一步的，要想使政权立于不败之地，除了“知己”，还要“知彼”，这就是“观其生”，即对别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包括吏治和民众情况，也要有充分了解。在《周易》作者看来，通过“观我生”和“观其生”，就能做到对本国本族和外国外族的情况有全面的掌握。

了解外部世界并不是最终目的，“观其生”的目的是为了根据所掌握的外界情况制订相应的对外政策。六四爻辞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意即对别国的政绩和所取得的成就要有充分的

^① “生”，一说庶民为生，一说生为“姓”，指我部族首领。

了解，发现可以与之结交的就及时与其结交，引以为盟，从而增强己方在国际社会的力量。上九则进一步强调对于别国情况的掌握和了解。该爻辞说：“观其生，君子无咎。”意思是，如果对别国的情形能充分掌握，就可及时做好防备以消除可能造成的危害。

由此可知，“观”卦的核心思想是君主和上层统治集团必须全面掌握国内和国外的情况，对于国内外情况的认识和判断，切不可流于简单幼稚和局部片面。在《易》作者看来，为政者一定要杜绝自以为是和鼠目寸光，以防造成片面乃至错误的认识，必须在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之上进行政治决策，以搞好本国的内政和外交。

“观”卦既强调了知己，又强调了知彼。这一思想，可视为孙子军事情报思想的渊源。《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① 孙子主张，决策者要具有大情报观，只有对涉及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全面把握，方能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处于主动，预见胜负。孙子此论在中国古代军事情报史上，乃至今天的情报理论界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打量《易经》，我们可以发现，孙子的这种情报观无疑是受到了《易经》的影响。“观”卦的“观我生”这一观点，从军事情报哲学的来源说，实际是《孙子兵法》“知己”思想的源头。“观”卦的“观其生”这一观点，从军事情报哲学的来源说，实际也是《孙子兵法》“知彼”思想的源头。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看，如果说《周易·观卦》揭示了政治情报和政治决策的关系，那么，《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揭示的则是军事斗争方面的军事情报与战争决策的关系。显而易见，《周易·观卦》所倡导的认识论，无疑地给予了当时的军事理论乃至军事哲学以深刻影响，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的军事情报哲学思想是前者的认识论的逻辑结果。可以说，《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军事情报思想是和《周易·观卦》的政治认识论一脉相承的。

^① 《孙子·地形》。

此外，《周易》情报思想还可以参看“同人”卦。该卦上卦为乾，下卦为离。“乾”卦是天，象征君主；“离”卦是火，象征洞明。“同人”卦借天、火发挥，指明“君子以类族辨物”。作为一国之君，应该洞悉天下，知晓臣民是非善恶之情，进而“类族辨物”，亦即分析人群之类别阶层状况，从而辨明事物实情，“通天下之志。”^①

三、《易传》的知几论

《周易》在表述哲学思想时有一个特点：“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它所称说的是个别的、具体的事例，而意在表达的却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和规律。这是《周易》独特的哲学语言表达方式。我们在探寻《周易》情报哲学思想时，也应当由它所说的具体事例，由点及面地把握其所揭示的道理。下面拟举一二例加以说明。

“坤”卦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意思是，踏上秋天的微霜，就要意识到寒冬的坚冰将要到来。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秋霜和坚冰的关系，实质上论说的是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人们应当具有的预见能力。《小象传》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坚冰也。”《小象传》很好地解释了爻辞的意思，告诫人们在事物刚刚萌发的初始阶段，就要预见到事物发展壮大或者矛盾即将激化的必然性。这一点，在认识论上含有重要的意义，提示人们应当及早处理矛盾，不要待矛盾激化乃至不可收拾的时候才着手处理。就情报而言，这句爻辞提示我们要有情报意识，要对事物最初的征兆保持敏感，及早作出判断。

《坤·文言》则通过论述和举例，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文言传》说：“坤至柔而动也刚……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① 《周易·同人·彖传》。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可以看出，《文言传》主要通过论述由量变到质变的事物发展的因果联系，论证了事物发展的“其所由来渐矣”的普遍规律，并进而通过宫廷政变、政权更迭的例子，提出“早辩”这一命题。这一命题无疑是古典军政情报思想的重要内容。

再看“解”卦。“解”卦下坎上震。该卦六三爻辞说：“负且乘，致寇至。”意思是，一个人背着东西乘车而不肯把东西放下来，这实际上等于告诉别人自己所携带的是珍贵物品。这样一来，势必会招致盗寇劫夺。《小象传》由此而发挥说：“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在作者看来，一个人持有珍贵物品，却因为自己的行为方式让大家觉察到了这是珍贵之物，结果引来盗贼劫夺，究其原因，这属于自己的责任，怪不了别人。因此《系辞传》这样说到：“作《易》者其知道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由此可见，《系辞传》已由“负且乘，致寇至”这一特定的个案出发，转而展开论述了社会生活中类似的各种现象，并涉及到外来侵略和军事斗争的领域，提炼出了“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行为现象必然导致某种后果”这一规律性认识。

我们再看“复”卦。“复”卦下震上坤，从时令上说表示冬至之时。冬至是进入严寒的开始，因而“复”卦的六爻除了初爻是阳爻之外，其他五爻都是阴爻。对于常人来说，只看到天气越来越冷，阴气越来越重，但是“复”卦却认为“冬至一阳生”，恰恰在严寒开始之际，潜伏的阳气已经开始滋生。所谓“复”，就是回归的意思，指的是进入隆冬之际，阳气已经复生。这时，君子应当及早知觉，有所准备，否则将有凶险。“复”卦认为，如果对于潜在的敌对势力缺乏预见，就会遭致凶险。其中最危险的是处于最上位

的阴爻，因为它与初生而潜在的力量距离最远，因“迷”于省察而消息失灵。由此，“复”卦从人们是否迷于省察潜在的敌对势力转而论述了用兵作战。作者说：如果面对新情况而不知道回应，这种对于新情况缺失灵敏、反应迟钝的人必将迷入歧途，导致灾祸。这种人如果对外宣战，终将惨遭大败，甚至十年都不能重建武装力量。^①

以上所论秋霜、负且乘、慢藏、治容、积善之家、臣弑君等等，都是具体的个别的现象。在《易传》作者看来，这些都是“称名也小”的表达方式。他们共同所举的类叫作“几”。由秋霜而知坚冰将至，由上慢下暴而知十年不克征，在《易传》则视作“知几”。由此，从经到传，因“几”的概念的提出，《易传》作者已经完成了由个别现象上升到哲学上的规律性认识上来了。

《易传》的“知几”论无疑可视为其情报思想的核心。这可以用《系辞传》中的一句话集中概括：“《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对于这一句话，晋人韩康伯的注释是：“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②抽象的道理叫未形之理，细微的运动叫动微之会。所谓“极深而研几”，就是指极其深入地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并进而仔细地研究事物的最初征兆。在《易传》看来，这就是圣人认识世界的根本任务。

此外，关于情报工作的最高境界也可以用《系辞传》中的一句话来概括：“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如果说孙子是用不战而屈人之兵表达了对于战争之理想境界的追求的话，《易传》则用“神”表达了对于情报工作最高境界的追求。这里的“神”当然不是鬼神的意思，其意思相当于“了不起”，可视为是情报工作所能达到的那种高妙境界。

① 原文是：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② 《周易注》。

“几”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历代研究《周易》的学者都非常重视。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有较多称引和发挥。对于“几”这一独特的哲学概念，钱钟书列出了历代文献中的重要阐述：

《系辞传下》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韩康伯这样注道：“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于微兆。”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几者，离无入有，是有初之微。”又说：“几，微也……事物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后，则心事显露，不得为几；若未动之前，又寂然顿无，兼亦不得称几也。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周濂溪说：“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由上可知，在哲学上，“几”是“有”（存在），不是无，因而属于唯物主义。并且，《易传》言“知几其神乎”的“神”，特指一种高妙和微妙的境界，不是神灵鬼怪之意，因此在认识论上，“知几”是充满唯物精神的，而不是先验论。《易经》本属占卜之辞，占卜最重要的就是占“几”，求得对某事件发生之前的预测。《易传》则从此角度出发，进一步探求“几”的实质，其所强调的“知几”，实质是强调一种超强的敏感性和预见能力，从军事情报的角度说，就是预警能力，为的是防患于未然。“知几”强调抓住苗头，强调对于未然而将然事件的预见，而不是事态已经明显之后的“知”，因为事后诸葛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牟宗三说，“几是采取最开始最具体最动态的观点看事件”，^①可说是深得“知几论”的三昧。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求《易传》对于知几乃至对于情报

^① 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8页。

工作有如下的要求。第一，“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①，强调的是情报工作的敏锐和及时。第二，“原始要终”^②，强调的是察始求终，一开始便能判明结局。第三，“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③，强调透过事物纷繁复杂的表象，探索到事物的内部和隐秘之处，由此推致事物发展变化的前景，从而判定天下事之吉凶，促成天下人之奋勉前进。第四，“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④ 要求透彻了解天下人的思想动机，以促成天下大业。第五，子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⑤ 强调要揭开事物的真相，确定事务的处理办法，以及明确涵盖天下的道理，乃至彻底了解天下人的企图。

四、《易传》知几论对于情报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易传》“知几论”除了在哲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外，显然还对情报工作具有重要启示，并对今天的情报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知几论”是古典军事情报理论的核心和精髓

我国古典兵学中蕴涵了丰富的情报内容，然而，如果细细打量，便不难发现，《孙子》的“庙算”、“先知”、“相敌”及“用间”，《吴子》的“料敌”、“先机”，《六韬》的“以天下之耳目视听”，《吕氏春秋》的“察微”、“先识”、“知化”，《管

① 《周易·系辞下》。

② 《周易·系辞下》。

③ 《周易·系辞上》。

④ 《周易·系辞上》。

⑤ 《周易·系辞上》。

子》的“八观”等等，其实都可以集中到一点：“知几”。只有把握《易传》“知几论”，才能贯通并深刻理解历代兵家的情报思想。

试看《吕氏春秋》的相关论述。

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轻，国恶得不危？身恶得不困？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也！（《吕氏春秋·知化》）

智所以相过者，以其长见与短见也。（《吕氏春秋·长见》）

凡持固，太上知始，其次知终（结局），其次知中。（《吕氏春秋·察微》）

故治乱存亡，其始如秋毫，则大物不过矣。（《吕氏春秋·察微》）

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吕氏春秋·知化》）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对于“知化”、“先知”和“长见”等的追求，几乎与《周易》的“知几论”没有什么差别，由此可见“知几论”对于我国古典情报思想的深刻影响。《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每一事件的发生，其开始阶段皆如“秋毫”。作为情报工作者，必须要“先知”和“知始”，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力求对事件作更深了解，把握其发展变化乃至预见到久远的未来，即所谓“知化”、“长见”。这样，其论述便立即可以从“知几论”寻出渊源了。应该说，战国末期出现的《吕氏春秋》受到《周易》的深刻影响是不奇怪的，其中反映了我国古典情报思想的发展脉络。而相近时期相继出现的大量兵书，其情报思想与《易传》的“知几论”互相影响，交相辉映，又反映出我国古典兵

学和情报思想的发达和成熟。

2. 从情报哲学的角度说，“知几论”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知几论”是立足于物质性的哲学观点。金景芳、吕绍刚指出，“几讲的是辩证法的质变”^①，“几”的一开始表现为“微”，再往下发展则成“势”，乃至成“著”，这便为一般人所能察觉了。第二，“知几论”是以预见为核心的情报哲学。叶落知秋。从一片掉下的叶子，人们觉察到秋天来临。这便是所谓“知几”。几是将动未动，或者动之微，但事物将来的结果却往往可以包含在内，所以《易》之“知几论”虽从占卜来，但完全适用于我们对情报哲学作相关之探求。第三，“知几论”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强调人的认识的能动作用。“知几”非特圣人能做到，愚夫愚妇于春种秋收、吃穿住行等处，如果能遵从事物发展规律，安排得合理，也可谓“知几”。就战争来说，敌之攻我，一定先隐蔽其事，秘密其旨，故情报工作者必须善于从一些细微处审慎考察仔细研究，既知其始，更知其化，从一些被常人忽视的表征中窥得玄机，从而为己方战略决策赢得先机。这样的情报工作才富于价值，也即所谓“知几”。第四，“知几论”反映了情报工作的最基本特征，也包括了诸如获取情况、分析判断等情报工作的基本流程。

3. 从军事情报学的学科建设来说，研究《周易》的情报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研究《周易》的情报思想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情报史，尤其是古代军事情报理论不可或缺的一环。《周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兵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一本经典。《周易》的论兵之道使人甚至以其为兵书，^②其中的论兵谋略等一直是兵家取法的宝库。如前所述，《周易》也对我国古典情报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

① 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533页。

② 如魏源曾说：“易其言兵书乎！元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所以动而有悔也。吾于斯见兵之情。”见《魏源集》上册，《孙子集注序》。

的影响。孙子的“知彼知己”，《管子》的“知形”、“知能”和“知意”，《吕氏春秋》的“知始”和“知化”等，均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研究《周易》兵学及情报思想，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知几论”，便对研究整个情报史有着重要的价值。第二，研究《周易》的情报思想和“知几论”，有助于填补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的某些重大空白。今天，情报学的建设正在取得飞速的进步，很多专著相继问世。但显而易见的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情报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仍然显出很大不足。比如，有关情报哲学尤其是情报认识论的探讨显得非常不足，几乎是一片空白。正因为如此，《周易》情报思想及“知几论”所反映出的深刻内容无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以充实和丰富今天相关的理论。第三，批判地继承《周易》的情报思想，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情报学。毋庸置疑的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东方特色。以《周易》、《孙子》、《老子》等为支撑的中国古典兵学，也显示出独特的面貌。对《周易》情报思想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个性和哲学色彩非常明显。这与整个古代兵学文化的土壤密不可分。今天，军事情报学的建设已经日见发展，而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情报学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想像空间的任務。我们不能总是沿袭国外的东西，不能照搬套用。可以说，《周易》情报思想及知几论所透露出来的浓厚的中国特色，无疑可以为我们建设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军事情报学提供借鉴意义。



《孙子》战略情报分析理论

军事情报思想是孙子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孙子兵法》所阐述的理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孙子的军事情报思想，粗略地说，可以用孙子自己使用的四个词来概括：“庙算”、“称胜”、“相敌”和“用间”。“庙算”一词出自《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篇》，有的版本又叫《始计》，论述的是战略情报分析。“称胜”一词出自《孙子兵法》的第四篇《形篇》，揭示的是衡量战争胜负的若干基本环节及其逻辑关系，涉及到基本国力和军事实力、战场环境和兵力投放等要素，提出了情报分析的“度”、“量”、“数”、“称”等概念，已经具有古朴的定量分析法。“相敌”一词出自《孙子兵法》的第九篇《行军篇》，阐述的是战场上对敌情的观察和判断，属于古代部队侦察的经验总结，也可以视之为战场侦察或战场监视，其中贯穿着情报思维和情报认识论。“用间”一词则是《孙子兵法》最后一篇《用间篇》的篇名，该篇专论谍报工作的方方面面，奠定了情报搜集尤其是人力情报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原则，是中外间谍理论的开山之作。其所论述的基本政策，诸如保密纪律，拉出打入等，至今世界各国的情报部门依旧遵循。

《孙子兵法》的军事情报思想内容丰富，涉及侦察和情报，搜集和分析，手段和方法，作战和外交，且极富情报意识，并显示出浓厚的哲学色彩。孙子的情报哲学思想，具有显著的特点。一是特别强调“知”。在《孙子兵法》中，“知”是一个高频词，计出现79次。“知”的对象涉及军事斗争和“诸侯之谋”的方方面面。

二是注重“先知”，讲究为军事行动提供情报保障，预见战争胜负。《形篇》中说：“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实际上揭示了情报工作的善于捕捉征兆、及时提出预警的功能。三是为了确保“形人而我无形”（《虚实篇》），在敌情侦察中强调谋略性的战术运用，在敌情分析中显示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古朴的辩证思维和天然的逻辑方法。四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化情报获取的手段和途径。五是在哲学思想上贯穿着一根情报认识论的红线，认为情报分析和判断“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用间篇》），既坚持唯物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和机械推理。

本文主要分析孙子的“庙算”理论，亦即战略情报分析理论。

一、《孙子兵法》与先秦兵四家

为了把握孙子的战略情报分析思想，有必要先简要介绍一下先秦时代的军事学术流派，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孙子兵法》在传统兵学中的地位，并深入了解我国古典兵学因慎战而重视军事情报分析的优良传统。

春秋战国时代有两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诸侯争霸，战乱频仍；另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战争实践呼唤并催生了各种军事思想，这些纷呈的军事思想，汉代人按其特点归纳为“兵四家”。所谓兵四家，就是四个军事学术流派，传统上分别称之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四家之中，兵权谋是“将帅之学”，略相当于战略学，以《孙子兵法》为代表。兵形势侧重于作战指挥，注重用兵的阵法和部队机动，讲究精兵锐卒，快速出击。与兵权谋相较，兵形势似乎可算是战役学。兵阴阳关注天时地利，重视战机和治军，其论注入当时的阴阳五行哲学观念，喜欢“假鬼神而为助”，似有唯心一面，但其推演胜负诸

因素之生克关系，似亦有辩证思维。汉代以后，一些兵书中充斥着很多荒诞不经的内容，比如望气遁甲之类，便是兵阴阳中糟粕一面的恶性发展。相比之下，兵技巧一派则非常实在，他们不尚空谈，注重士卒的军事素质、部队的训练教范、战斗的队列行阵及器械装备的操练。如果说兵权谋是“将帅之学”，那么兵技巧则是“士兵之学”。

兵四家之中，兵权谋成就最高，影响也最深远，《孙子兵法》体现了兵权谋一派的最高成就。《汉书·艺文志》是这样评介兵权谋的：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由此可见，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权谋，从内容上说，它不仅层次高，兼赅了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诸家的学说和思想，而且在军事斗争问题上非常强调战前的战略分析和预测。这里所说的“正”与“奇”、“计”与“战”，是两组互相对待的概念，这四个概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正，这里指的是守国，而不是治国，这是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不同之处。政治家的治国，研究的是治国安邦之策；军事家的守国，关心的是国家安全、不受侵犯。为此，兵权谋不仅关注军队和国防力量的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更注重战略形势的客观分析和理性的军事决策，在筹划战争与决定是否开战之时，首先要考量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这就是以孙子为代表的兵权谋家的“正”。反之，待到实际作战的时候，则强调“奇”，亦即强调诡道用兵，注重谋略的运用。正，需要的是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奇，需要的是变异思维和打破常规。正与奇，反映了兵家在军事斗争的两个不同方面的特质：一是在战前的战略分析和战争决策阶段，强调“正”；二是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的战场指挥和实施作战的阶段，强调“奇”。这两种不同，又

叫“先计而后战”，有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计”，是计算、计数的意思，而非计谋、计策的意思，不可误解。

二、《孙子兵法·计篇》的“察”和“为”

《孙子兵法》是先秦兵家中兵权谋一派的典范，从《计篇》中可以鲜明地看出孙子主张“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兵学特点。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与其说是《孙子兵法》典型地体现了《汉书·艺文志》所揭示的兵权谋一派的军事思想特点，毋宁说是《汉书·艺文志》从《孙子兵法》抓住了先秦兵学的最突出最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并借以对同时代的一类兵家的共同点作了相应的概括。

从《计篇》的内容和结构分析入手，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战略情报分析在孙子军事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计篇》全文300余字，开篇便强调战争是“大事”：

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大事”一词，人们每每容易忽略。实际上，这不是普通词语，而是先秦时代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术语。今天，举凡比较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叫大事，大事也经常变更，但在先秦，大事是固定的，特指的。《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就是说，古代的国家大事只有两件：祭祀和战争。君主在宗庙祭祀先祖，看起来似乎是迷信，实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它等于告诉祖先，政权依然在手，国家仍然存在。除了祭祀，另一件大事便是战争，因为它关系到君主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所以孙子说“不可不察”。一个“察”字，既反映了对待战争问题的慎重态度，也引出了《孙子兵法》的战略分析的情报

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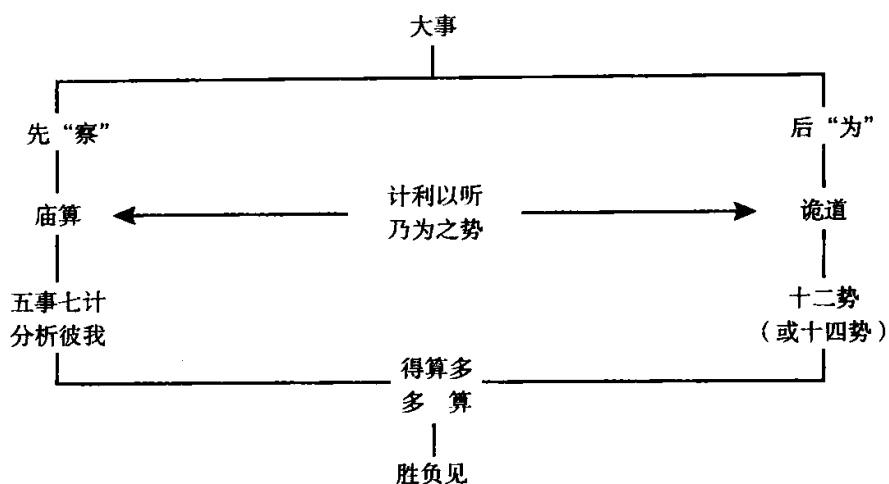
从内容和篇章结构看，本篇主体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的是孙子的“庙算”理论。用孙子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用一个“察”字概括，也可以用一个计算的“计”字来概括，中心内容是“五事”和“七计”，即分析敌我双方的影响战争胜负的基本方面，论述在开战之前最高统治集团应该怎样进行战略情报评估并作出决策，实际上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以正守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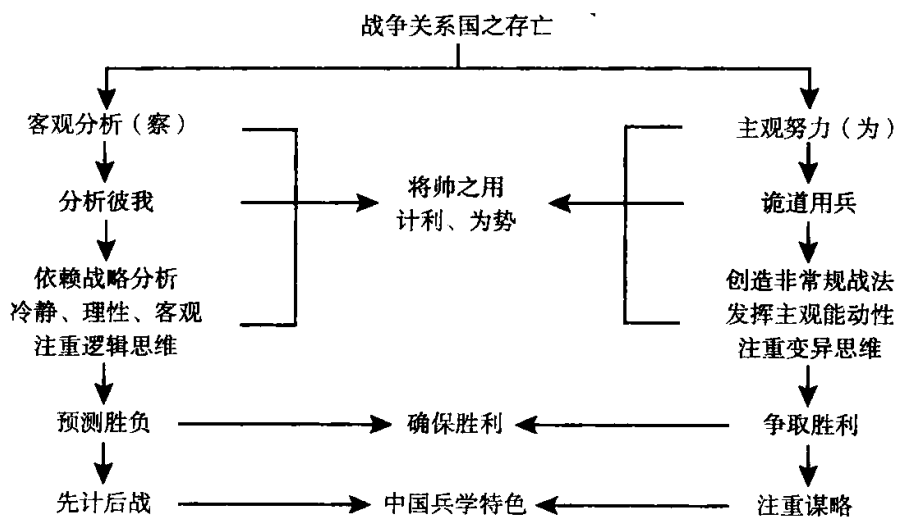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论述的是孙子的“诡道”思想。《计篇》中说：“兵者，诡道也。”这是孙子自己对战争的特质所下的定义。所谓“诡道”，绝非单单指欺骗或欺诈。诚然，孙子说过“兵以诈立”，但是，这里的“诡道”含义更深更广。把诡道狭窄地解释为欺骗和欺诈，恐怕是文人论兵式的浅层见解。从军事上说，举凡非常规之战法，一切与野战教范、作战条例、常规战术不相吻合，不合常理而出人意料的军事思维与创造性的作战指挥，方为“诡道”之内涵。这一部分的内容，用孙子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用一个“为”字概括，也可以用一个“战”字来概括。中心内容是诡道十二势（也有人认为是十四势），论述指挥员在战场上必须因利制权，造势胜敌，实际上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以奇用兵”。

连接“庙算”和“诡道”两部分的过渡句是“计利以听，乃为之势”，在全篇的结构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但我们不可小视这句话，因为它反映了孙子军事思想中关于筹划战争的不可逾越的程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经过战前的战略情报分析和综合评估，如果作战对我有利且君主采纳了所得出的意见，那么，下一步的工作才是把会议上经过分析所得出的胜算通过战场上的谋略用兵使之成为现实。这句话实际上也可以视作《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先计而后战”的出处。

《计篇》全文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如下：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孙子从总体上筹划战争的两个基本理念，上面的表解，还可以换为下面这种形式：



从上列的两个结构图可以看出，在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中，从总体上筹划战争，首先要把握战略分析（庙算）和作战指导（诡道）这两大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要素。孙子规定的“庙算”，即战略分析，依赖的是冷静、客观、理性的逻辑分析（“计利”），目的是预测胜负。孙子揭示的“诡道”，即作战指导，需要的是主观努

力和创造性的谋略用兵（“为势”），目的是争取胜利。而且，两大要素之间，还有个先后顺序，必须先“计利”，后“为势”，才能把战前的分析预测转化为战场上的谋略用兵，而不能边打边算，摸着石头过河。用孙子自己在《形篇》中的话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所谓“先胜”，就是战前即能预见胜利，胜券在握，不打无把握之战。所谓“先战”，就是先打起来再说，盲目作战。程序的先后是思想的反映，先战还是先算，或者边战边算，不分先后，其间有着本质的差异。从孙子的先“察”后“为”，可以看出孙子对于战略情报分析的高度重视。

三、孙子的庙算理论

《孙子兵法·计篇》集中论述了庙算理论，这是孙子所说的“察”的具体内容，也是战略情报分析理论的核心。

什么叫庙算？庙是古代祭先祖、议国事之处。算为筹算、计算、计数之义。上层统治集团于庙堂计议国是、预测战争，谓之庙算。大陆学者一般把庙算解释为战前最高统治集团举行的战略分析会议。从情报的角度说，庙算实际是在战略情报分析的基础上预测战争胜负。按笔者的理解，庙算是孙子为君臣于庙堂进行战略分析所建立的军事情报术语。军事情报类的古军语很多，庙算用于战略分析，可说是最高层次的术语。台湾学者钮先钟套用现代西方的术语，在其《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新论》中写道：“庙算，用现代术语来说，即为‘纯净评估’（net assessment）。”^①这种对应性的解释，实际也是视庙算为客观分析。

如果要对庙算这一术语进行界定，那么其中当包含如下基本内容：

^① 钮先钟：《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9页。

计算之人，为文武高官；
计算之地，在庙堂；
计算之物，为筹码；
计算内容，为五事；
计算之法，为比较；
计算步骤，先分析，再比较，后综合评估；
计算要求，多算细算；
计算结果，为数量质量关系；
计算目的，在预见胜负。

情报分析实质是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进行科学决策，它有一个工作程序。美军曾认为军事情报工作是一个流程。孙子的庙算理论也有一个分析程序，或者叫分析步骤。第一步是逐项分析，第二步是对比分析，第三步是综合评估。

1. 逐项分析

孙子庙算步骤的第一步是按照既定的分析项逐项分析，也就是“经之以五”。“经”，本为纺织品的纵丝，可训为测度、根本，即首先要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方面进行分析测算。“五”，又叫五事，指按照性质划分的五个方面的情报内容，也可以叫五大分析项，这是孙子给出的五大军事情报范畴，分别称为“道”、“天”、“地”、“将”、“法”。五大范畴之中，又各有具体的纲目，这是每类范畴需要逐一分析计算的具体项目。

下面我们把孙子所规定的情报类别和逐项分析法简要介绍一下。

五事——情报类别和逐项分析法。

(1) 道——“令民与上同意也”。

“道”的范畴所要考察的是民众对于战争的态度。民众是否愿意为君主参战乃至付出生命，这是预测战争的第一个分析项。很多《孙子兵法》的研究者指出，孙子在进行战略情报分析时首先关注的是影响战争的政治因素，也就是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孙子是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在战争与政治的问题上，

孙子并没有涉及到战争性质问题，孙子的立场在“上”而不在“民”。我们不可离开孙子自己的界定去发挥或拔高他的政治思想。作为军事家，他所关心的是个“令”字，即为了战争胜利，要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保持一致。

(2) 天——阴阳、寒暑、时制。

(3) 地——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

这两个范畴很好理解，分析的是战场的自然环境以及军事地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情况。天与地，无疑是军事情报分析和战争预测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结合《孙子兵法》十三篇考察天与地的具体分析内容，将会发现其中涉及很多复杂的情形，既有自然地形地貌，又有军事地形，既有战场环境，更有战略地理。

另外，这里所说的“高下、远近、广狭”，从分析方法说，显然已经具有定量分析的成分。

(4) 将——智、信、仁、勇、严。

战争是将帅指挥的。对于将帅，孙子提出了五个分析项，习惯上称之为“五德”。“五德”考察的是指挥官的基本素质，涉及到智谋水平，部队管理能力、个人品格和精神意志诸方面。

在将领的考察分析方面，孙子不仅提出了“将之五德”，而且列出了“将之五危”。《九变篇》说：

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玩味孙子对于将帅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作为军事情报分析，孙子对于将帅的考察和研究，并非斤斤计较于个人品德的善恶优劣，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孤立的单个人的德才学识、性格气质的等级评判，而是始终立足于将帅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与战争的关系，注意分析将帅个人素质对战争胜

负产生的影响。孙子着眼的是军事素质，即所谓“武德”的方面。如果孤立地看，孙子所列的“将之五危”中，某些品德实际是美德，比如爱民，这是正义之师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正如张预所注：“民虽可爱，当审利害。若无微不救，无远不援，则出其所必趋，使烦而困也。”也就是说，从战争的全局上看，有时不能为了保护或救援局部的民众而使部队疲惫被动乃至中敌之计。从军事上说，孙子的这种识见至少有局部的真理。

其次，这种分析和评判体现了军事辩证法。比如“仁”和“爱民”，在孙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仁者爱人”是主流观点，二者是相通的，甚而可以说是一回事。但是前者孙子放在“将之五德”里，后者却被认为是“五危”之一。因为仁义之师虽是决定民心和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但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却又不可一味爱民而因小失大。这里就体现了孙子在战略分析时对将帅考察的辩证思维。又如，“勇”与“必死”，也有相同之处，将领是否勇敢不怕死，不仅对士气有影响，也直接关系到作战决心和战局结果。但是，不怕死不等于一味拼杀。正如刘寅《孙子直解》所说：“必死者，将愚而勇者也。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顾其死。言不避险易强弱之势，不计众寡胜败之情，但欲轻生决战，以图侥幸者也。可布奇设伏以杀之。”“勇”与“必死”，表面上很相似，但在军事指挥和作战上却会带来大不一样的结果，这就需要对敌军将领的军事素质作出精细入微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

（5）法——曲制、官道、主用。

孙子所定的“法”，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法，而是一个军事情报的范畴，含义甚广，不可想当然。举凡军队的体制建制，裨将校官的设置以及各级军官的职责权限，部队的约束管理，行进与战斗中的信号节制，军费的保障，粮秣辎重的运输路线，车马器械等军用物资的供应，均在这个需要分析的情报范畴中。消极地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法”这个范畴的内涵有点杂乱；积极地说，它涵盖了影响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的两大方面——军队建设和后勤保障，

而这一点无疑属于战略情报中的基本情况，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在对敌军评估时都不会忽略。

对第一步的分析工作，孙子总结说：“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里强调了决策层尤其是将帅必须对五大情报范畴全面掌握。

2. 对比分析

孙子庙算分析的第二步是“校之以计”，相对于第一步的“五事”而言，又叫“七计”，即七个方面的分析评估。七计内容如下。

(1) 主孰有道？

这是从政治上考察两国君主的贤明程度和治国方略，其核心当为考察在战争问题上统治集团得到民众拥护和支持的情况。

(2) 将孰有能？

这是对交战双方将领的军事才干进行分析，其核心当为考察将帅在实战中“诡道用兵”的能力，具体内容还包括将之五德与五危，简言之即看谁更会打仗。

(3) 天地孰得？

这是对天时地利方面的自然环境和军事地理的情况进行考察。从《孙子兵法》全书所述内容来看，其核心当在野战、攻城和行军路线的山川险阻，以及运用火攻之类特殊作战手段时的天气的干湿和雨雪（包括气象预测）诸方面，甚至已经涉及到大纵深作战的战区环境和古朴的地缘战略环境研究方面，简言之，即战场和战区环境的考察。

(4) 法令孰行？

这是考察两军在部队管理方面的效能，谁能严守纪律，做到令行禁止。

(5) 兵众孰强？

这是考察车马弓矢等兵器装备的数量和精良程度。

(6) 士卒孰练？

这是考察士兵是否训练有素。

春秋时代，车战为主要作战样式。一辆兵车叫做一乘，包括一车、驷马、甲士和步卒。“乘”既是兵力的计算单位，又是一个作战单元，所以历史上常常用“万乘之国”、“千乘之国”来称说一国的军事实力。车战的战术动作有其特定要求，既有射箭击刺之类的单兵军事技能，又有旅进旅退之类的士卒之间的战术协同。这里的“练”，指的是娴习而熟练。《孙子直解》解释说：“辨旌旗，审金鼓，明开合，知进退，闲驰逐，便弓矢，习击刺，谓之练。”可见内容涉及到单兵技能、战术动作和实战能力等。

“兵众孰强”和“士卒孰练”这两项，针对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进行分析比较，是最切实际的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分析，无论战争怎样变化，千载而下，至今依然是战略分析家必然关注的重点。

(7) 赏罚孰明？

奖惩制度的实施关系到军心和士气，可以起到激励和警示作用。所谓“明”，就是考察奖惩制度能否做到赏功罚过，贵贱如一，罚必当罪，赏不逾时。

上述“七计”，从表面上看跟第一步的“五事”很多是雷同的。比如，五事的“道”和七计的“道”，内涵是相同的；五事中的“天”与“地”，与七计中“天地”的内容也相同。那么，素来被认为语言极其精炼、行文极有章法的《孙子兵法》是否犯有重复其词的弊病呢？回答是否定的。比如对于“将”，前者侧重考察“五德”、“五危”方面的个人素质，后者侧重考察用兵作战能力，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孙子把“五事”和“七计”加以区别，决不仅仅是因为五事和七计毕竟内容不完全相同，各有其侧重点，而是因为在情报理论和作业程序上引入了新的范畴和方法。从情报范畴说，这里引入了新的内容和侧重点，即己方和彼方，也就是“彼”与“己”这一对很大的情报范畴。这一对范畴在逐项分析“五事”的阶段并没有涉及。从作业方法说，第二个阶段采用的不再是逐项分析法而是对比分析法，处处考虑的是“孰”。从目的和要求

说，不再是给出“是怎样的”答案，而是要回答“是哪一方”，必须得出“谁占优势”的判断。从情报分析的工作流程说，二者是不可混淆的。比如敌方作战部队的组织建制，武器装备，战术特点，这是需要单独考察的。第一阶段只是单纯地对彼方这方面的情况从事搜集、分析和评估，而暂时不管己方的相关情形。在军事工作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这项工作只由专门的部门承担。而在第二阶段，则是对比彼己双方这方面的情况，专门负责搜集研究彼方之情的业务部门并无此责，而是把彼方之情上呈更高层次的统帅部门供对比分析和研究。这种流程，在现代社会是通过部门的分工和职掌不同来体现的。古代机构简省，分工简单，这种情报分析的流程，是在庙算中集中进行的，很可能在实际战争中不会如此程序分明，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了《孙子兵法》所揭示“经之以五”和“校之以计”这样两个分析程序在理论建树上的意义。

对第二步的分析工作，孙子总结说：“吾以此知胜负矣。”如果说孙子对第一步的逐项分析工作的总结是强调“知五事”的话，那么对第二步的对比分析工作的总结则合乎逻辑地强调了“知胜负”。

3. 综合评估

孙子没有对综合评估的情形进行具体的描述，但是对于综合评估可能得出的结果作了明确说明。这种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得算多”，一种是“得算少”。也就是说，经过前两步的单项分析和对比分析，最后还需将所得的筹码综合起来，并从总体上评估出敌我双方的胜算几率。孙子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由此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庙算的最后阶段需要得出敌我双方总体得算多少的客观结论；二是须由这一结论来预见战争的胜负。显然这里有一个综合评估的阶段。

从分析方法看，孙子的庙算极可能还有一个想定作业模式。想定作业是军事工作的一种参谋业务和研究方式，也是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训练途径之一，具有很强的实战性。从《孙子兵法》全书看，孙子经常提及战争规模，并且喜欢将这种作战方案的模式定在

“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的规格上。这在当时是比较大的战略决战行动。在《作战篇》和《用间篇》中，作者曾两次论述了进行如此规模的战争所受到的种种制约因素，其中包括财政支出（“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军费开支（“内外之费，宾客之用”），武器装备等军用物资的供应保障（“驰车千驷，革车千乘”、“胶漆之材，车甲之奉”、“千里馈粮”），以及战争对国内经济生产的影响（“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这些论述，实际是司令部的想定作业，也显示了战略情报的综合评估。研究《孙子兵法》中的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孙子的战略情报分析理论以及包括定量分析在内的具体操作过程。

《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情报分析理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情报分析人员的专业素质问题。在孙子看来，情报分析的准确性如何，由此所得出的关于战争胜负的预测是否可靠，不仅取决于所收集的情报资料是否完整翔实，还取决于分析者自身的能力和责任心。在《计篇》的结尾，孙子说：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多算胜，
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这段话，过去人们通常囫圇吞枣地认为是一个意思，说的都是客观条件的优劣将制约战争胜负。不过，钮先钟在《孙子三论》里对此提出了新认识。他认为，从语文的角度说，如果前四句是一个意思，那么行文不免有点繁冗；从语法的角度说，“多算”与“得算多”，“少算”与“得算少”，二者结构不同，语义也有区别。钮氏的理解应当说是符合孙子的原意的。得算的多少是针对客观情况而言的，指的是敌我双方各自占有有利条件的多寡；而多算

与少算则是针对军事情报专业干部的主观因素而言的，指的是情报分析人员进行分析判断时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情报分析，必须多多地算，反复地算，深入地算，只能精算细算，决不能粗算略算，更不能不算。因为情报分析关系到战争胜负，国之存亡。例如上文中所说的将之“五德”与“五危”，如果不多算细算，就难免误将“危”当作“德”或反之以“德”为“危”，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情报失误存在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情报研判的失误。中外军事情报史上很多情报失误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计篇》在全文结束时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四、几点申论

《孙子兵法》的战略情报分析理论是春秋时代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时至今日，虽然战争的规模和样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古老的理论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对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深入探索军事情报工作的基本规律，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借鉴。

1. 情报是否包含己方之情

评价孙子的情报思想，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军事情报是否应当包括己方的情况。孙子没有使用“情报”一词，更无情报定义，但从上文所介绍的庙算理论中，可知孙子的情报概念无疑地包括“彼”与“己”两大范畴。

孙子的这一情报观与我军目前对情报概念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以及有关的军事情报理论著作中，大都把军事情报界定为“彼方情况”或“专为彼军一方”，认为军事情报的内容不包括己方军事、政治集团的情况，情报产品只是对所获取的敌方和与之相关方面的军事情况进行研究判断的成果。

我们不妨看看美军的论述。

在美国《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中，“军事情报分析·当

前的实践·目的”条目里说：

军事情报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任何一级决策者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本国（或部队）有何弱点？敌人有何弱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补充的。

敌方的弱点或强势，总是对应于己方的强弱而言的，没有对比方的情况，孤立地看待一方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法判定其强弱优劣的程度的，甚或可以说是无意义的。美军把情报分析的最终目的界定为判断本国与敌人的弱点，用美军的话说，这是“两个基本问题”；用孙子的语言表达，就是：“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美军的论述几乎可以说是《孙子兵法》的翻版，与孙子“七计”的内容和提法几乎雷同。

在美国兰德公司“战略评估”丛书《战争中正在变化的情报角色》一文中，作者也这样谈到战争中的情报需求：

关于己方部队的能力、局限和位置的准确情报的需要，和“知敌”同样重要。^①

这一观点，不仅明确表达了己方情况属于重要情报的意见，同样也几乎是《孙子兵法·谋攻》中所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同义语。

从美军和兰德公司对于情报的认识中，似乎可以说，现代战争的发展变化以及外军对情报工作的新的感知，给人一种情报概念将出现历史回归之感。

^① 原文是：As important as knowing the enemy is the need for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e capabilities, limitations, and location of one's own forces. 转引自张晓军《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6页。

2. “天地”与“彼己”的关系

孙子在情报分析的第一步给出的五大分析项中包含“天”与“地”这一对范畴，在第二步中又规定要对“天地孰得”作出判断。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天”与“地”这一对范畴与“彼”与“己”这一对范畴有无区别？或者说，能否认为“彼己”这一对范畴可以包括“天地”的内容？

通常的军事著作往往只把交战双方的情况区分为一方与另一方两方面，即便是认为情报应当包含彼与己双方情况的论著，也认为情报似乎只有敌情与我情之分，一切情报，要么属于敌情，要么属于我情。其实，这种说法存在很大的理论漏洞。事实上，在敌情和我情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类情报，这就是既不属于敌情也不属于我情的天情和地情。例如，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在其他诸侯国进行的战争，也出现过长途跋涉，跨越诸多小国进行的战争。这里便有一个了解和分析战场环境乃至战略地理环境方面的任务，而这些情报，并不能归于敌情或我情。同理，假设今天或未来的战争中，出现交战双方在第三国或者公海乃至太空作战的情形，那里的地理、水文、气象乃至太空资料当然是交战双方都需要收集的，当然也是情报，但是这些情报无疑只能隶属于彼情与己情之外的情报范畴。试想，如果将这些区域的情况都归为敌情，则至少在理论上将会产生这样的逻辑结果：该区域属于彼方的领土、领海或领空。那样一来，岂不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荒谬？

饶有趣味的是，美国《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一书的“军事情报”条目是这样下的定义：

军事情报是针对外国、外国军事组织和可能成长为军事作战地区的地理而进行的所有上述情报活动。

看来，至少在该书作者的心目中，“作战地区的地理”情报是有别于外国、外军情报的。这一定义和孙子的理论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孙子在《地形篇》中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由此可知，他把“彼己”和“天地”视为两对并列而不可互相替代的情报范畴，并认为必须做到四知，才能确保战争胜利。孙子把天与地作为独立的情报范畴进行分析，不仅是战略战术分析的必需，而且也显示了理论上的周密。孙子的大情报观，除了他建立的“彼”与“己”这一对范畴之外，也表现在他又建立了“天”与“地”这一对不可被“彼己”替代的范畴。

3. 关于情报范畴、情报分析项和情报诸元

任何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都非常注重建立范畴体系，通常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比如哲学的范畴就有物质与精神，真理与谬误，时间和空间，必然与偶然，对立与统一，理论与实践等等。同样，包括情报哲学在内的军事哲学也不例外，也有一系列特有的范畴。在《孙子兵法》中，我们可以发现孙子建立了很多范畴，这些范畴都是一对一对地互相对待地出现的，每一对范畴都关系到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的有关领域。例如，指挥关系方面，有“君”与“将”；军事实力方面，有“强”与“弱”；兵力投放和部署方面，有“虚”与“实”；作战样式方面，有“攻”与“守”；用兵谋略方面，有“奇”与“正”；战局态势方面，有“形”与“势”；战争进程的总体预期方面，有“速”与“久”，等等。这些范畴的建立，不仅是对军事斗争实践的概括，而且形成了科学的军事理论体系，体现了军事辩证法。

在情报分析领域，孙子按照情报的内容和性质，把情报划分为两大范畴和五大分析项，这是对当时战争实践所作的概括。从今人的眼光看，联系《孙子兵法》全书，其中既有战略层面的情报，也有战场层面乃至战术层面的情报。而内容则涉及军事政治、军事经济、军队建设，君将关系、战场环境、后勤保障等方面，同样足证孙子的情报观是大情报观。

孙子军事情报理论的最精彩之处，在于他在提出情报范畴的同时还更进一步地建立起适应当时战争需要的情报分析系统。在孙子

的情报理论体系中，有许多层次不同的范畴和分析项。例如，“彼己”和“天地”是最上位的范畴，“道、天、地、将、法”是战略分析的五大分析项，“七计”是对比分析的七大分析项。而在每个大类之下又明确具体地列出了该分析项的分析子目。例如“地”，通观《孙子兵法》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还有许多具体的分析子目。在《九变篇》，有“圯地”等五种地形；在《行军篇》，针对部队的机动和宿营，列出了“山”、“水”地等四种地形；在《地形篇》中，又有“通形”、“挂形”等六种地形需要考察；在《九地篇》中，更有“散地”、“轻地”等九种属于大纵深作战的战略地理类型。

在每一个子目之下，甚至还有更为细致的分析单元。比如，“天”的分析子目是“阴阳”、“寒暑”、“时制”，其分析单元则包括月亮运行的位置、空气的干湿程度、风起之日、风力方向，以及昼风夜风等。又如“地”，所列的“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则是各种不同地理地形类别的分析单元。孙子的这种由范畴而分析项，由分析项而分析子目乃至分析单元的纲目系统和作业方法，可谓是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情报理论，在思维方法上，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由孙子的情报分析项和分析子目，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借鉴兵器分析的“诸元”概念，引入“情报诸元”的新概念。我们知道，评估兵器的战斗能力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性能诸元”。比如一种战斗机，它的爬高指数、空中续航时间、作战半径、携带弹药的品种数量等，即是该兵器的性能诸元，兵器的性能诸元决定了兵器的作战能力。那么，一个情报类别或情报分析项，也应当具有一个可供作出定性和定量描述的客观的情报诸元。在孙子的情报理论中，有些分析项和分析子目就是情报诸元，例如“五德”和“五危”，即可视为“将”的情报诸元；“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则可视为“地”的情报诸元。

孙子由建立范畴到明确分析项，再到列出分析子目，反映出他的情报理论中实际上存在一个情报分析的纲目系统。从军事情报学

基础理论说，这里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即某一时代的常规战争必有其基本的战略情报范畴，而范畴之下又有不同的情报类别和情报分析诸元。这些范畴、类别和诸元，是相对明确和固定的，也是可以给出的。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地面战争，孙子给出了一系列决定战争胜负的层次分明的情报分析纲目系统；那么，对于现代战争，今天是否也应给出一个新型的情报分析纲目呢？我们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是非常必要的。诚然，今天的作战样式和战争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涉及的领域也为过去无法比拟，情报分析内容也必然更加复杂多变，给出这个纲目系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越是复杂，越需要去探索并建立一个基础性的情报纲目和诸元系统。这个系统，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定性地给出，并且在实践中是应当遵循的。相对于孙子时代的筹码而言，在计算机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更是可以完善并可供操作的。

对照今天我军情报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现代战争的情报类别划分，目前尚停留在划分大类的简单层面上，大体是比照军事学上的分类，把情报分为战略情报、战役情报（或称为“战场情报”）和战术情报三类；或者划分为为军事政治、军事经济和军事科技情报三类^①；或者划分为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这些划分，可以增强人们对情报性质的理解，虽然有可取的一面，但是还远远不够。既不能从军事哲学的高度提炼出适应并符合现代战争实际的基本情报范畴，更没有依据现代战争的实践归纳出科学严谨而又具体的情报分析项目。所谓的分类，既在理论上显得单薄空洞，也对实际工作缺乏指导意义，更谈不上在实际情报处理和分析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孙子的情报观，借鉴他的范畴思想和情报分析纲目系统，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情报分析纲目体系和情报诸元，或许是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① 这种将军事情报划分为军事政治情报、军事经济情报、军事科技情报的三分法，从逻辑上说是不周延的，因为它恰恰遗漏了军事情报。

此外，孙子把情报分析依次分为逐项分析、对比研究、综合评估三个阶段，他的三阶段（步骤）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情报分析这一工程所应遵循的工作流程，不仅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由浅入深这一客观规律，而且也是他的情报分析纲目系统在工作程序上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4. 情报分析方法是可传的

对于兵家秘诀，前人曾有可传与不可传之说。这里涉及到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中的“常”与“变”两个方面。所谓“常”，又叫常法，指的是战争中相对固定、可以拿来直接施用并且应当遵循的具体做法和方法。所谓“变”，又叫变法，指的是只有原理、原则而无法直接采用或不可套用的用兵之法。一般来说，常法是可传的，也就是可以直接运用的，而且是应当遵守的；变法是不可传的，也就是不可生搬硬套，需要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孙子的兵学思想，也有这两个方面。如上文所说，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两大层面，一是“庙算”，也就是战略情报分析，二是“诡道”，也就是谋略用兵。“庙算”与“诡道”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五事”、“七计”内容明确、项目清晰、方法俱在、程序井然，属于常法，实际运用时，重在遵循贯彻。“诡道”之法则属于变法，孙子虽然列出了“十二势”，不过是举例而已，并非认为作战仅此12势，12势也不是必须照办。变法强调灵活运用，切忌胶柱鼓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灵魂在变，在构思出其不意的打法。赵括用兵，败在机械照搬，使军事辩证法反而变成了形而上学。宋代郑友贤曾这样评说孙子：“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不能尽变之意。五事七计者，常法之利也。诡道不可先传者，权势之变也。”郑友贤的理解是正确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传的常法，就是在情报需求和搜集指导工作方面，必须具有军事法规性的指令性质；在分析整理方面，必须具有规定性和程序化的性质。孙子的“庙算”理论便是可传的常法，不仅具有规范性和操作性，而且似乎已经相当于古代军事情报

工作的条例条令或情报工作教范。尽管这种运作系统和规范还比较古朴、原始、粗糙，但它不仅为后世的军事情报理论建设和情报分析实践提供了启示，而且也似乎应当使我们在建设今天的具有我党我军特色的情报工作规范时加以借鉴。

5. 传统兵学并非只重综合和谋略

人们往往喜欢对东方和西方的哲学进行比较。在思维方式方面，往往认为西方是分析型的，东方是综合型的。在军事思想方面，往往认为西方重实力，东方重谋略。这话并不完全正确。

在思维方式方面，由《孙子兵法·计篇》可以看出，孙子的“察”，就是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进行分别的考察、计算和分析。这种考察，虽然最终目标指向胜负几率的综合判断，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但是正如本文所介绍的那样，在得出综合评估之前，他的分析过程是分项逐条进行的，极富层次性和条理性，所列的大纲小目，对象类别，程序步骤，显示出很强的逻辑层次和阶段性。孙子的总体评估是在精细入微的逐项计算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而绝不是模糊笼统的总体估算。应当说，至少在《孙子兵法》里，孙子的思维方式和特点不是单纯的综合型，而是十分重视分析的。

在军事思想方面，正如《汉书·艺文志》所总结的那样，以孙子为代表的兵权谋既强调战场上的“以奇用兵”，也强调战前的“以正守国”，既强调“诡道”，也强调“庙算”。诚然，孙子的“为”或“战”，核心是“诡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谋略用兵，确实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但是，孙子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军事实力的作用。他的“以正守国”，重视实力，完全可以从“察”或“计”看出。“庙算”的核心即是考察决定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换言之，即评估双方的军事实力。“庙算”与“诡道”，不仅体现了军事思维的辩证法，也显示了孙子军事思想的两手。总之，孙子既强调主观努力，也决不忽视客观条件，在他看来，战前的实力考察和战场的谋略用兵是赢得战争的不可或缺、同时并重的两手，而且是先计后战的两手。两手并重，才是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



《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述评

《周礼》又称《周官》，是我国古代一部官职资料汇编，是中国儒家经典“十三经”中所谓“三礼”^①之一。通过《周礼》，我们既可以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成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窥见当时军政外交斗争的一般情形。本文拟分专门官职和相关官职列表梳理其外交和情报官制的概况，并作简要的分析和评述。

一、专门官职

《周礼》中关于外交和情报的专门职官，均见《夏官》和《秋官》。主要有：侯人、环人、怀方氏、匡人、掸人、小司寇、邦沟、邦谍、朝士、司盟、大行人、小行人、司仪、行夫、环人、象胥、掌客、掌讶、掌交、掌察、掌货贿等。现依照原著，将各自职责简述如下：

夏官	侯人	负责本方之“道治”与“禁令”，派遣部属在道路中探听消息与宾客。如有诸侯国派来使臣，引导而致于朝。等他们回去时，也送其出境。
	环人	掌“致师”，主要职责是“察军匿，环四方之故、巡邦国，捕谍贼，讼敌国”等，即负责查处军中和国内的奸细、特务等，及向敌国提起相关诉讼等。
	怀方氏	负责招徕“远方之民”，命令和敦促他们，包括诸侯、藩国及时的进贡，负责他们的迎送，并发给旌节、玺节，保障他们的通行，办理供给馆舍及饮食等事宜。

^① 所谓“三礼”：一曰《周礼》，二曰《仪礼》，三曰《礼记》。

续表

夏官	匡人	掌“达法则，匡邦国，而观其匿”，看他们有无为奸作恶的事情，使其不敢违背法度，以听从王命。
	掸人	掌“讼王志道国之政事”，向诸侯宣告国君的意志，使万民“和悦而正王面”。
秋官	小司寇	秋官的副职，分管外交和情报工作。负责外朝的政事，召集人民而垂询意见。在国家危难、迁都以及订立国君等重大事情上，考察他们的态度，吸纳他们的意见。
	邦沟	(负责盗取国家机密。)
	邦谍	(潜伏以作间谍。)
	朝士	掌理建立外朝之法。
	司盟	掌“盟载之法”。邦国之间盟约时负责订立约书及行盟的礼仪等。
	大行人	负责诸侯来朝时的礼仪，以亲睦诸侯。当国君与诸侯商议天下之事、决定是非之时，即有关“发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示诸侯之好”、“除邦国之匿”等等事宜时，行使相关职责。
	小行人	在诸侯有使臣来访时，行相关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在诸侯“春入贡，秋献功”时，各以相关级别和风俗进行招待。
	司仪	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诏告国君仪容、辞令、揖让的节度等。
	行夫	在邦国有福庆、灾荒等小事需传达王命时，完成出使任务。
	环人	负责迎送邦国来朝的宾客。
	象胥	负责蛮夷、闽貉、戎狄等国的外交事宜。
	掌客	在四方宾客来朝时，负责牢礼、饮食等。
	掌讶	掌邦国之等籍，以待宾客。
	掌交	掌理携带持节与货币等物，巡行各邦国，觐见诸侯。
掌察	(原文缺。《周礼传》：主督察邦国之事。)	
掌货贿	(原文缺。贾公彦疏：掌邦国所致货贿。)	

*《周礼》所载“宾客”分大小。“大宾客”指诸侯来朝，“小宾客”指诸侯派使臣来朝。分见林尹《周礼今注今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106、114页。

需要说明的是，《周礼》中未单列“邦沟”和“邦谍”的专门职责，只将其列为“士师”所属“八成”之中。据郑玄注，邦

沟、邦谍分别为刺探和异国反间。^① 此二者相关外交和情报工作尤多，故此特别予以单列，并加括弧以示区别。而掌察、掌货贿二职，《周礼》原文皆缺。二官既属大行人，蒋伯潜说：“以理度之，这二者属于外交官职当无疑问。”^② 故此依据前人疏证予以补阙，^③ 也加括弧以示区别。

二、相关官职

外交和情报工作牵扯很多，除了需要一些专门人员孜孜努力之外，还需要多个部门多位官员的通力合作，形成协力，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先秦时期的军政外交斗争就已经呈现出这个面目，并在《周礼》书中有充分反映。故此，《周礼》既有“官常”之法，又有“官联”之法。（此点将在下文做进一步论述）《周礼》在分述天、地、春、夏、秋、冬六部门长官和属官的职责时，也对他们在外交和情报活动中相应的权限和职责予以明确。六部之中，因冬官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所以牵涉到外交和情报的实际只有五部。现遵从原著，将其中相关外交和情报的官职及职责表释如下：

天官	冢 宰	天官的长官，掌邦治。以“八统诏王取万民”，“八统”的对象当然包含“礼宾”；以“九式均财节用”，其中第二式即“礼宾之式”；在大朝觐和会同时，帮助国君接受各诸侯献来的礼品；国君因政务不能顾及招待四方宾客时，需冢宰出面完成。
	小 宰	天官的副官。既是副官，则“大事从其长，小事专其达”。事关朝觐、会同、宾客之时，也照此法。

- ① 详见《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1版，第237页。
 ② 详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314页。
 ③ 据《周礼传》卷五下，掌察主督察邦国之事。而“掌货贿”，诸家解说不一。贾公彦疏曰：“掌邦国所致货贿”。详见《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1版，第232页。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六十九曰：掌所以供交通诸国之币帛。二者相较，似以前说更为合理。

续表

天官	宰夫	在朝觐、会同时，供给宾客所需之物并负责膳献、饮食等。
	掌舍	在会同时，掌国君居息之所，包括会同所居行宫之门禁及警卫事宜。
	幕人	在相关场合负责供给所需帷幕等事。
	掌次	在国君出行时，负责居息处所的规制，包括床、屏风等物品的陈设等。
	内府	四方所献之“金玉齿革兵器”，检验出品质好的留存。有到四方出使者，则供奉相关礼品。
	外府	相当于财务大臣。在有宾客、会同时，供其“耐用之币”。
地官	大司徒	地官的长官，掌邦教。诸侯来朝时，遣人修治四郊及道路，并于沿途准备丰富的粮食和柴草等。
	小司徒	地官的副官。诸侯有使臣来朝时，遣人修治四郊及道路，准备粮食柴草等。
	乡师	在国君会同时，负责管理随行的民徒、使役以及各种车辆。
	比长	各掌其比之治。在有民众出行时发给通行证。当发现行人没有佩带相关的通行证明时，将其关押，进行审讯。
	封人	在有宾客、大盟会时，洗刷所用的牛牲。
	牛人	会同、行役等，负责供给牛。
	遗人	在有宾客、会同时，负责所辖地区道路两旁的货物等。
	师氏	负责将善道诏告国君。在有宾客、会同时时，要跟随着国君的身后做好保障。
	保氏	负责规劝国君的过失。在有宾客、会同时时，要跟随着国君身后。
	贾师	负责所辖区域货物的整治。在有会同时的处所，也是如此。
	司门	掌管国门，检查过往行人的装束等，如见四方之宾客，则赶紧上报。
	司关	负责检验进出国门的货物。遇有四方宾客叩关，则立即禀告，以便国君做好相应的准备。
	遂人	属基层的一般长官。遇有宾客造访，负责所辖区域的道路整治和粮草筹备等。
	遂师	有宾客造访时，做好所辖区域的道路整治、粮草筹备等工作。
	川衡	当有宾客时，要供给川中所产物品。
泽虞	当有宾客时，要供给泽中所产物品。	
圉人	在有会同、宾客时，提供生兽死兽。	
场人	在宾客造访时，供其瓜果等物。	
廩人	有会同之事，提供粮食。	

续表

春官	大宗伯	春官的长官，掌邦礼。大宗伯所掌典礼包括五项，其中第三项是“宾礼”，负责订立会、同、朝、宗、覲、遇、问、视等外交礼仪。通过这些外交礼仪达到以“宾礼”亲邦国的目的。
	小宗伯	春官的副官。凡有大宾客会盟时，负责接受诸侯所觐献的财物。四师佐大小宗伯，为掌礼之官的负责人。
	鸡人	负责供给鸡牲。在有诸侯来朝时，也是如此。
	典瑞	掌玉瑞玉器，以提供国君朝覲、宗遇、会同所需。
	旄人	掌“教舞散乐”及“舞夷乐”。在有宾客时，提供歌舞。
	大祝	掌六祝之辞。在有大会同时，造祭祖庙。
	小祝	在小会同时，造祭祖庙。
	大史	在大会同、大朝覲时，按照礼书的规定，预先做好预习。
	小史	在大会同时，佐大史。
	诅祝	作盟诅之载辞，即负责盟会时书写辞书。
	外史	掌管书写国君下达的诸臣及诸侯的命令等。如果国君有相关书籍的事外派使者，则“书其令以交使者”。
	典路	掌“王及后之五路”。在国君有会同和吊四方诸侯之丧礼时随行。车仆掌戎路车队。在会同时，供给革车。
司常	掌九旗之事物名称。在有会同、宾客时，也是如此。	
夏官	大司马	夏官的长官，掌邦政。在大会同时，率领随行的士庶子，并执掌政令。
	小司马	夏官的副官。在有大会同时，辅助大司马。
	司险	掌“九州之图”。在国家有丧、兵、灾等变故时，派部属守住要地，只放行那些持节者。
	射人	在有诸侯来朝时，任命有爵位的大夫作副使。
	诸子	在有会同、宾客时，选派群子跟随国君。
	司右	在会同时，组合车队，编订车乘等。
	虎贲氏	在会同时充当国君的护卫。
	旅贲氏	执掌戈盾，“夹王车而趋”。在会同、宾客时，齐服随行。
	司兵	掌五兵五盾，以品质优劣辨其等级，以备军事、会同等事。
	司戈盾	管理和颁发戈盾。在会同时，授予戈盾。
	司弓矢	在会同时，颁发弓弩。
	齐右	在会同、宾客时，扶持国君车乘的马匹，以保持车子的平稳。
校人	在朝覲、会同时，调配同色的马匹，颁给当乘马的人。	

秋官	大司寇	秋官的长官，掌邦禁。外交的许多专门之职设在秋官，可知大司寇当为外交的最重要的头目。在朝觐、会同时，要在国君面前作引导。诸如交通管制及盟书、誓词等都要负责。
	士 师	掌“国之五禁”及“士之八成”，负责大司寇府中的政令等。但也分管外交和情报工作，当属大、小司寇之外，外交和情报工作的重要头目。举凡“邦沟”、“邦谍”等的管理乃至盟约的签订等都归其管理。

三、略论外交和情报活动的 “官常”与“官联”

《周礼》在《天官·大宰》中谈到了“官常”和“官联”问题，并将其列为治理官府的“八法”之一。^①所谓“官常”，指一官之常职。就外交和情报来说，前文所举专门官职，如侯人、环人、怀方氏及大、小行人等，要负责履行“官常”的职责，担当起这两个方面最主要的工作。而“官联”，是指一官不能独专之事，需要会同众多官员共同来完成。“联”，据郑玄注，是“联事通职，相佐助”的意思。《天官·小宰》中说：“以官府之六联邦治，一曰祭祀之联事，二曰宾客之联事，三曰丧荒之联事，四曰军旅之联事，五曰田役之联事，六曰敛驰之联事。”在《周礼》作者看来，举凡“祭祀”、“宾客”、“军旅”等等，皆属于“国之大事”，需要众多官员通力合作方能完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周礼》中见出相关“宾客”之事有如此丰富的相关官职。

通过对外交、情报专门之职和相关官职的打量，我们可以看出《周礼》“官联”制度的成熟。《周礼》的官联有“同官联事”

^① 据《天官·大宰》，这“八法”分别为：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和官计。

和“异官联事”的区别。同官联事其实是同行，也即“官常”的联系。就外交和情报活动来说，显然有些属于能在同一业务部门或“官常”范围内就能解决的。这种协同，我们可以称之为“同官联事”。当遇有重大活动，或此项活动一定牵涉多个部门时，就需要实行“异官联事”。比如就一次重大外交活动来说，和外交、情报活动直接相关联的属于“官常”的众多官员自是不免，其他各部为数众多的官员也难免要涉及。如果有像诸侯这样的大宾客来朝，上面表列专门和相关官员共计七十余位，均需参与进来。正是因为有如此整齐的人马出动和如此周密的保障工作，宾客之事中诸如饮食、警卫、引导、马匹、盟书、礼仪等大小事务，才能安排妥当。

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官联”制度实际操作起来的繁琐和复杂。一官与一官相联，一官与数官相联，数官与数官相联等，属于寻常情形。通常情况下，为完成一项工作，其中某个部门难免要向多个部门或多个领导递交报告或申请。宾客来朝，举凡五部官员尽皆牵涉，于是如何做好五部之间的协调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尽管繁琐，《周礼》所设计的官联制度还是有着很强的实际作用和很大的存在价值。概括地说，主要有这两条：第一，可以有效防止各个部门和各级官员各自为政；第二，可以有效地做好各级别、各部门官员之间的互相监督和约束。可以说，搞好内部监控，实现权力部门之间的很好制约，一直是统治者的重要御人术。对于情报和外交这样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要部门而言，实现官常、官联的这种分工合作，对保护国家核心机密、保护国家安全更具特别意义。孙子曾这样总结情报战线的重要性：“三军之事，莫亲于间”；“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①可以说，《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中官联的繁琐，也多少折射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激烈和残酷。

^① 均见《孙子·用间》。

四、《周礼》折射出先秦时期外交和情报活动的一些实际情形

《周礼》具有丰富的军政外交和情报官制不是偶然的。作为一部官职汇编，它所依据的是成书当时以及成书之前丰富的军政外交斗争实践。故此，从《周礼》中，我们无疑可以管窥先秦时期外交和情报活动的一些实际情形。

透过系统而完备的外交和情报官制，我们可以不难想见其中政治家们的运筹帷幄、外交家们的疲于奔命以及军事家们的刀光剑影。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乐崩坏和周王室的式微，各诸侯国之间或而争霸，或而争雄，中原大地动荡不安并绵延数百年之久。与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相应而生的是，外交和情报战线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景象，这便给了外交家和战略间谍提供了广阔的表演舞台。这种情形到战国后期发展得尤为剧烈。著名的合纵、连横两大战略即应运而生于此时。在当时诸多学派之中，纵横家派在外交和情报战线尤其惹人瞩目。他们以“客卿制度”为依托，公开出使，悄悄行间，既做外交家，又充当超级间谍，举手投足均对当时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态势产生非凡影响。^①正是这些大战略家和大外交家充满传奇色彩的外交和情报活动实绩，给《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的成熟提供了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周礼》这种官常、官联章法，先秦另一重要典籍——《管子》，在若干篇章也有涉及。《管子·霸言》说：“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国家的安危与邻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面貌休戚相关，一项外交政策的推

^① 其中尤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相关问题可参阅储道立、熊剑平：《苏秦间谍案述评》，载《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行乃至列国行人聘问的得失都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从《周礼·春官》中可以看出，当时各诸侯国间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以下八种：1. 会；2. 同；3. 朝；4. 宗；5. 覲；6. 遇；7. 问；8. 视。所谓“会”，即诸侯因时而受天子诏见。所谓“同”，即天下诸侯每隔12年共同朝见天子。^① 诸侯春天朝覲天子的曰朝，夏天朝见曰宗，秋天朝见曰覲，冬天朝见曰遇。所谓“问”，即天子有事时，诸侯可以派遣臣子前来聘问。而所谓“视”，即各方诸侯都派遣臣子前来聘问。《周礼》之姓“周”，反映出强烈的周王室色彩。而从作者列举的这八种外交活动，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还自命为真命天子的周王室为与日益强盛的诸侯竭尽周旋，在外交礼仪设计上可谓动足了脑筋，下足了力气。

晋代学者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设官定职都有很现实的政治考量。考察先秦史，我们可以发现，自“周郑交质”之后，周王室与诸侯之间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外交和情报领域，一直纠纷不断，争夺不已。各诸侯国之间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可以推想，如果当时诸侯之间没有多姿多彩的外交和情报斗争实际情形，或没有实际施行过相关礼仪的话，无论作者如何善于冥想，他也很难考虑得如此周全，建构得如此系统。

五、研究《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的意义

显然，通过设置官制和强化外交礼仪的做法来实现自保，对于一个堕落的王室来说，无疑只是杯水车薪，一定不能挽救什么。所以，王室的这些努力最终只能随桃花而伴流水。然而，这本透着浓

^① 12年王如不巡守，则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也。详见林尹《周礼今注今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16页。

重的时代气息的官制著作，却意外的历经艰难而留存下来，甚至一步步荣列儒家经典。这部古籍以其顽强的生存能力，既为一段时期的政治外交活动起着生动的证明作用，同时也持久而深远地影响着其后的政治思想史。

就外交和情报史而言，包括《周礼》在内的先秦典籍，是一座积淀丰厚而又亟待挖掘的宝库。《周礼》书中所载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和所折射出的活动实迹，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

首先，研究《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是对相关史学的一项极大极重要的补充和完善工作。如前所述，《周礼》所载外交和情报官制，向我们展示了先秦时代，尤其是列国纷争时代，外交和情报战线的一个组织机构侧面。书中所折射出来的这些丰富的军政外交斗争实际情形，无疑能进一步丰富中国外交和情报史的某些层面。而且，自西汉刘歆的着力发掘后，再经东汉郑玄的精心注释和极力传播，《周礼》终于跻身儒家经典行列，并一举成为“三礼”中首要的一部传布下去。其后，《周礼》得益于其特殊的儒家经典的地位，所载官制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曾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隋、唐、宋、元、明、清历代政府组织的构成，都可寻见《周礼》的部分痕迹。外交和情报官制自然也要深受浸染。在几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王莽政权、西魏政权、王安石改革时期的北宋政权以及太平天国政权，《周礼》对于执政当局的影响显得尤为显著。这几个政权虽然都为时不长，人们却都非常关注。其实，在旧势力转衰或新势力崛起的特定时期，当政者都会想起这部儒家经典，抓来做药方，甚至仿照其书建立六官之制，试图借《周礼》来建立完善的政府机构，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其中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当然也要被借鉴、消化和吸收。

其次，研究《周礼》相关官制对于我们今天外交和情报的实际工作以及相关理论建设也不失启示价值。毋庸置疑的是，《周礼》作者对外交和情报这两个领域有着全面和深刻的把握。建立在军政外交斗争实践基础之上的如此系统的官制，对今天的外交和

情报体制构建以及实际工作都有借鉴价值。尤其是其书中对官常和官联的探讨，可以启示我们更好地做好部门之间的协同和配合，建立健全更加成熟有效的办事和监督机制。这对协同工作、减少扯皮、杜绝腐败和增加透明度、保证国家核心机密的安全等都有益处。此外，《周礼》还对官员的考核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也包括对外交和情报官员的考核。比如“宰夫”这个官职就担当着考核官吏的职责。可以说，对官员一直不断的考核和管理是促使他们勤勉其事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外交和情报这两个重要部门而言，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实现对官员们的全程监管，无疑显得更加重要。

六、申论《周礼》作者及成书年代

《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一直聚讼不已。应该承认，《周礼》的一经发现和受到重视，便立即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西汉时期著名学者刘歆在王莽篡政前后力拾古文经，其中主要便是《周礼》和《左传》。后人据此便将《周礼》与刘歆、王莽共系荣辱。一部薄薄的经书从此承担太多无关的是非。20世纪以来，随着经学门户之见的逐渐被摒弃和考古学的迅猛发展，《周礼》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客观。但在《周礼》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

较早跳出经学藩篱来研究《周礼》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当数钱穆。当然，钱穆从祀典、刑法、田制等方面考察《周礼》，所证明的仍是东汉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的“近情”。^①较早利用考古对《周礼》进行研究的则是郭沫若。他对金文做系统考

① 何休曾说《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见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以此反驳周公著书说。钱穆考证的结果：“与其谓《周官》乃周公所著，或刘歆伪造，均不如何氏之说遥为近情”。见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载《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7月第1版，第322页。

察后，认为：“《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周公著书说”。^①可以说，近世以来，“六国成书说”是相对占据主流的观点。研究《周礼》的诸多学者中，只少数人将著作年限推到战国早中期，比如杨向奎^②，大多数则是将著书年代设为战国末期，比如顾颉刚^③、齐思和^④、刘起釞^⑤等。

郭沫若利用金文研究周代官制的方法在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但不少学者据此得出的结论却与郭氏相左。比如张亚初、刘雨就批评郭氏“对《周礼》持过分的否定态度，未免有偏激之嫌。”^⑥张、刘二学者将西周金文官制与《周礼》六官进行比较发现：“总计《周礼》三百六十五官，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找到根据。”^⑦因此，他们主张对《周礼》官制资料应予以足够重视。陈汉平比较《周礼》与西周金文所见册命制度，认为：“《周官》一书有相当成分为西周实录，保存有相当成分西周史料。”^⑧这种肯定趋势渐而导致部分学者对于《周礼》成书年代过于乐观，甚至放弃原

① 郭沫若：《周官质疑》，载《金文丛考》，1932年初版。

② 杨向奎说：“《周礼》应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这一部书中大部分篇章著作的年代，应当是战国中叶以前的作品。”详参杨向奎：《论〈周礼〉》，载《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 顾颉刚考察《周礼》与《管子》的关系后认为《周礼》当为稷下学派所作。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六辑，1979年。

④ 齐思和认为，《周官》乃战国末年之书。参见齐思和：《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年8月。

⑤ 刘起釞认为，《周礼》的成书有一个发展过程，作为一部官职汇编，它所依据的是西周以来逐渐完备的周、鲁、卫、郑等姬周系统的官制，后来逐渐修订详细，写上了各国官职，包括一些战国时的资料。详参刘起釞：《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650页。

⑥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5月第1版，第2页。

⑦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5月第1版，第140页。

⑧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218页。

有立场，转而认为“《周官》当是西周厉、宣或稍晚的某位史官，纠集周初以来的典制文件汇编而成。”^①

对于乐观派有力的反驳之作出自沈长云、李晶。他们在考察《周礼》官制并与春秋官制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周礼》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或当在这之后不久的战国时期。^②显然，这种说法等于又回到了民国时期，承认“六国成书说”的相对合理性。但是，这种回归未尝不是一种前进。

通过对《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的研究，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周礼》作者及成书年代做进一步的思考。从上文可以看出，《周礼》作者对于外交和情报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甚至也得到那些认为其书出自歆、莽伪造的学者的认同。即便认为《周礼》属刘歆伪造的学者徐复观也指出，《周礼》的特点之一便是“全书对于宾客的重视”。^③遗憾的是，这一信息没有引起徐复观的足够重视，故而他得出《周礼》为歆、莽伪造的结论。当然，这种观点很难站住脚，也已基本被学术界所放弃。

笔者认为《周礼》中丰富的外交和情报官制，不是出自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时代使然，堪为“当时实录”^④。官制作为政权的组织制度，“关系到这个政权的盛衰，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安定和

① 葛志毅：《〈周官〉与西周制度》，载《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6期。葛志毅早年则认为“《周官》是战国时所写成”。参见葛志毅：《〈周官〉与战国制度》，收入其论文集《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② 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③ 详见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载《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39页。刘歆伪造说实则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首先提出（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六，《周礼总论》），后来则为今文学家，尤其是康有为所力倡。见《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

④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90页。杨向奎是书进一步肯定地认为《周礼》一书是战国时期齐人所作。

动荡，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① 故此，官制的产生与发展总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就《周礼》来说，如果没有丰富的外交和情报活动实际，则无论作者如何冥思苦想，也设计不出这一套系统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周礼》丰富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向我们散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其成书年时代，外交和情报活动一定高度发达，而且对于国家安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已引起执政当局的高度关注，方于设官定职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其付诸实践与否，能够给《周礼》以如此独特成书背景的，只有春秋战国时期。

总之，《周礼》丰富而系统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具有明显的列国纷争的时代背景。正是诸侯争霸的这种复杂国际背景和严酷斗争形势，催生了《周礼》这一套系统的官制。《周礼》的成书只能是在这当中或者稍后，而一定不会是在这之前。故此，“西周末期成书”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

^① 臧云浦、朱崇业、王云度：《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1页。



《管子·八观》的军事情报思想

管子名夷吾，字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子一生，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①，终于使齐桓公成为雄视诸侯各国的第一个霸主。

《管子》一书虽非完全出自管仲之手，但从其托名管子，可见管子对后世影响之大。该书内容丰富，不仅在治国方略、军事理论的领域广有论述，而且具有独到的军事情报思想。本文试图重点围绕《八观》一篇，对其所反映的情报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七法》所赋予的军事情报工作的重要地位

要了解《八观》一文所阐述的情报思想，有必要先了解《管子》对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在军事斗争问题上，《管子》曾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条件进行分析，并在《七法》一文中列出了八种因素。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八种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国家的财力、经济状况，即“存乎聚财”；二是武器装备状况，即“存乎论工”和“存乎制器”；三是军队自身建设，包括兵员的选拔、军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即“存乎选士”、“存乎政教”和“存乎服习”；四是对敌情的了解和对战机的把握，即“存乎遍知天下”和“存乎

^① 见《史记·管晏列传》。

明于机数”。这里，对敌情的了解和对战机的把握，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情报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七法》所列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四大方面的条件，既不是相互独立的，也不是相互平列的，而是一种逐级追加、连锁递进的关系。作者认为，一方对外用兵，如果有了超过敌国的财力，并不能预期战争的胜利，还需要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和一支管理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战胜天下，如果不能在战前做到“遍知天下”，不能“明于机数”，依然不能达到“正天下”即征服天下的目的。由此，作者进一步认为：“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则独行而无敌矣。”^①由此可见，《管子》是把遍知天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把握作战时机作为战争准备和战争决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来看待的。在它看来，当一个国家的财力、武器装备和兵员都作好了准备之后，大军出境还依然有待于全面的、完备的情报保障，而一旦满足了这一条件，就可以确保所向无敌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七法》实际上是把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情报保障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对外用兵并确保战争胜利的三大要素来对待的。首先，它把情报保障视为战争决策的最后一项决定性的条件。其次，它赋予了情报工作的总任务或者说是根本要求，即“遍知天下”、“审御机数”。最后，它认为全面而充分的情报保障可以使一支军队“独行而无敌”。这些论述，都充分显示了情报工作在《管子》军事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八观》提出的战略情报侦察和搜集的八大任务及其特点

《管子》一书不仅在《七法》中强调了情报工作的地位，对

^① 以上均见《管子·七法》。

情报保障提出了总的要求，而且在《八观》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战略情报侦察和搜集的具体内容，并将其归纳为“八观”，即八大任务。

“一观”的内容是“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目的是知敌国的“饥饱”状况。

“二观”的内容是“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目的是知敌国的“贫富”状况。

“三观”的内容是“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目的是知敌国的“侈俭”状况。

“四观”的内容是“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目的是知敌国的“实虚”状况。

“五观”的内容是“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目的是知敌国的“治乱”状况。

“六观”的内容是“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目的是知敌国的“强弱”状况。

“七观”的内容是观其“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目的是预测敌国的“兴废”状况。

“八观”的内容是“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目的是预测敌国的“存亡”趋势。

即便是今天看来，作者提出的对敌国进行的这八个方面情况的掌握，内容也是非常全面的。在经济方面，既有作为基础经济的决定饥饱的农事，也有影响贫富的经济开发和副业生产。既有财政赋税的调研，也有财政开支和建设项目的考察。在政治方面，既有政策法规的宽严和执行情况，又有民风社情的内容，更有上层社会的意向、喜恶，以及外交结盟的路线方针乃至战略意图的分析。

综合“八观”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在情报侦察和搜集方面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从情报工作指导上看，《八观》具有任务明确、要求具体的特点。对每一项情报工作，作者都规定了应当搜集哪些内容，

并要求据此得出哪一方面的相应结论。例如“八观”，其内容包括国际和国内情况两方面。国际上，通过分析君主的意志，考察其在外交路线和军事结盟方面的立场，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与谁为敌，有哪些盟国，以及这些敌国或盟友各持何种态度。在国内，考察臣子的态度和动向，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心态，部队的斗志，社会治安状况，以及国家的实力基础等。通过这些具体内容，作者认为可以预测出该国的存亡趋势。

其次，从情报侦察和搜集的方向上看，“八观”涉及多方面的领域，强调进行全方位的情报调研，反映了战国时期军事斗争对情报内容的广泛需求。从《八观》全文，我们不难看出，文中所涉及的情报内容，绝非仅仅停留在军事方面，而是包括了自然资源、农副业生产、经济实力、民风教化、法制建设及社会治安、统治集团及国君意志、兵役制度及士气、外交路线及国际结盟等各方面的情况，几乎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社情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八观”提出了全面、系统而又充分的情报侦察和搜集任务，也是战国时代对情报工作所能提出的较好的纲领性表述。

再次，从情报内容的性质上看，“八观”所要搜集的情报，具有基本情况和战略情报的特点。今天，我们通常把情报区分为基本情况和动向情况两类，对照《八观》可以看出，它所规定的情报搜集内容，除了少量像一时之间发生的水旱灾害这些动向情况之外，绝大多数都属于基本情况。比如自然资源方面的情报，涉及到田地的肥瘠，山泽的多少，城市与乡村的相对面积，人口与耕地的比例等。这些无疑都是最基本的情报资料。此外，像“四观”中提出的了解服兵役和服劳役的人数（“计师役”），统计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建设项目（“量国费”）乃至粮食储备和外流的情况等，无疑也是重要的基本情况。而所有这些基本情况，孤立地看，也许并没有多少军事色彩，也并不跟具体的战斗行动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是从战略上看，却是绝对不可不知的情报资料。如果说《八观》中没有多少论及战役战术层次的情报以及直接与作战行动有关的微

观军事情报的话，那么，这恰恰表明《八观》更注意的是宏观方面的战略情报。

最后，《八观》所反映的情报思想，是《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孙子兵法》在《计篇》中也提出了情报搜集分析的任务和要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事”、“七计”。两相对照，可以发现《管子》的“八观”与《孙子兵法》的“五事”、“七计”有两个显著的不同。一是《孙子兵法》的“五事”、“七计”较为原则，而《管子》的“八观”则充实具体得多。对于每一项情报任务，《八观》均有较丰富的内容说明。不仅如此，它还对为什么要搜集这些情报作了具体论证。例如在“三观”中，情报搜集范围包括都邑和田野的相对面积大小，人口的数量，国家用于宫室台榭建设和用于粮仓建设的耗费，乃至官吏民众在车马衣饰上的侈俭情况，都纳入了情报搜集的视野。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对搜集这些情报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他说：“夫国域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困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费。”这些都可以见出，比起《孙子兵法》的原则性说明来，《管子》的论述要丰富细致得多。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孙子的“五事”（道、天、地、将、法）和“七计”（主、将、天地、法令、民众、士卒、赏罚）所讲的情报，主要是针对敌我双方用兵作战而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尚具有较多的纯军事情报色彩；而《管子》的“八观”则广泛涉及到经济、政治、社情诸方面的领域。比如同样讲“天地”，孙子讲的是用兵作战时影响部队行军、驻扎、布阵和攻守等军事行动的方面，属于时令、天气以及道路、地形等军事地理方面的情况，而《八观》则指水旱、山泽、耕耘、养殖、城乡布局、人口分布等情况，这就远远不只是纯军事意义上的情报了。《八观》认为：“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由此可见，《管子》的“知彼”，其内涵不仅比孙子的“五事”、“七计”更为丰富具体，而且也更为宏观。如果说“五事”、“七计”

是军事家的情报观的话，那么，《八观》则是政治家的情报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子》确实丰富并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情报思想。

三、《八观》所体现的军事情报分析和预测的方法论

细读《八观》全文，可以发现其中处处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文中无一句谈及天命鬼神，无一处依据主观臆测。它要求人们准确把握敌国的“饥饱”、“贫富”等情况，而这一切都是依据社会、人事的现实基础得出的；它要求人们努力预见敌国的“兴废”、“存亡”的可能性，而这一切也同样是依据敌国现实实行的内政外交政策以及朝野臣民的动向得出的。它的一切推断，都来自切实掌握的可靠事实，来自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情形的考查，来自经济实力的估算、政策法规的推行及其所产生的结果，来自国际上敌国与该国的力量对比、盟国与该国的亲疏程度，来自国内民众、士兵、大臣的拥戴和尽力程度。由于通过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因而所得出的“贫富”、“虚实”、“治乱”、“存亡”等种种结论都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它的情报分析和预测的科学基础，也是我国古典情报思想优良传统的体现。

细读《八观》全文，我们不难看出它还使用了不少情报术语，例如“行”、“视”、“观”、“课”、“计”、“量”、“求”等。这些术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侦察类术语，如“行”（巡视）、“观”（观察）、“课”（考察），其中又有概括了解（如“行”）和深入了解之别（如“课”）。一类是分析类术语，如“计”、“量”，反映了根据已知现象进行计算和估量这一情报分析的过程。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古典情报分析理论中，定性分析法谈得较多，定量分析法则谈得不多，这里的“计”和“量”却透露了古人的量化分析情形。例如“四观”中，作者指出，不仅要“课凶饥”、


“观台榭”，而且要“计师役”（计算服兵役和服劳役的人数），“量国费”（估算国家的财政开支）。依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作者认为，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去当兵，就要有十分之二的人为其提供军费和辅助劳役，实际上就有十分之三的人不务农，这样全国的粮食收成就要减产三分之一。这些都是量化分析的原始情形，而且是现代军事经济学中定量分析的最初萌芽。

细读《八观》全文，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不仅处处强调实地观察和调查研究，而且在八个情报侦察范畴里都始终如一的贯串着“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归纳过程。它的目的是要得出“饥饱”、“存亡”等等结论，而它的人手处都是“田野”、“耕耘”、“敌与”（敌国和盟国）、“上意”（君主的意志），其间便始终存在一个分析、综合和推导的过程。以“一观”为例，需要搜集的情报资料包括：是否深耕细作，是否根据土壤性质进行合理种植，荒地和熟地各有多少，人口数和耕地数的关系，水旱情况，国君是否大力鼓励耕作。作者认为，掌握这些情报资料，就可以推导出这个国家的饥饱状况。显然，这里具有一个对情报资料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分析从而得出正确判断的过程。这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基本分析模式，今天来看仍然是合乎逻辑的，因而也是能令人信服的。

从《八观》所提出的情报侦察和搜集的八大任务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制约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中，作者特别重视经济与战争的关系，因而把“军事经济情报”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八观》战略情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作者把农业生产视为“国本”，可谓抓住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抓住了综合国力中最具决定性的根本因素和影响国家强弱与存亡的主要方面。在《权修》中，也有对这一思想的叙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这种观点，同样也是采用了层层递进、连锁推理和逐级追加的论证方式，从而强调了“粟”与“守”

亦即经济基础与国家安全的重大关系。而《八观》提出的八大任务，更几乎无不同农业生产有关，也几乎都是从“耕”与“战”的关系来看问题的。例如在“四观”中，作者详细讨论了要以充分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农业，强调要保证足够的耕地，国费开支和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有度”，从军的人数要适当，这样才能使国家有足够的粮食来应付战争。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将导致“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的后果。所有这些，不仅反映了经济因素在其战略情报思想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在分析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时，作者切切实实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八观》所提出的情报侦察和搜集的八大任务中，贯穿着一条情报分析和预测的思想线索，初步体现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分析综合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虽然还比较朴素，却是科学的，因为它不仅基本上合乎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些方法既是当时军事斗争和情报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给今人以启示。



《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及启示

托名春秋名相管仲而成书的《管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其成书年代学术界已大致确定为战国时期，被认为是田齐时期统治者所尊奉的管仲学派的集体智慧的结晶。^① 其中的《七法》、《兵法》、《地图》等篇目属于先秦时期重要的军事作品，被人们认为是齐兵家的集大成之作。在这些兵学论文中，也蕴涵有较为系统的情报思想。比如《地图》中就有这样一段警句：“人之众寡，士之精粗，气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这段话极其光彩夺目。尤其“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一句，是构成《管子》情报思想体系的纲目，并仍对今天的情报工作富有启示意义。

一、“知形”、“知能”和“知意”的理论内涵

我们知道《孙子》是高度重视情报工作的，其兵法十三篇从《计》篇开始便大谈“知彼知己”和“庙算”，最后又以《用间》作为终结，所谓“知彼知己”的情报思想俨然成为贯彻十三篇的

^① 关于《管子》一书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其论大致可划分为三种：全部为管仲遗著、部分为管仲遗著、管仲学派作品汇编。全部遗著说现已基本无人坚持。部分遗著说是认为“经言”部分为管子遗著，但也经常受到很大的质疑。学术界现基本倾向于最后一种观点，即“管仲学派”托名管仲所作。

一根红线。^① 与《孙子》强调“庙算”和“先知”相类似，《管子》反复强调“早知”，所谓“早知敌则独行”^②，认为主帅必须先机掌握重要情报，才能在战场上扬长避短，克敌制胜。进一步的，《管子》在《七法》中详细论述了情报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竭力主张将“遍知天下”和“四明”，即明于“敌人之政”、“敌人之情”、“敌人之将”和“敌人之士”，作为战争准备和战争决策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来对待。

在《地图》篇中，《管子》对此观念再次进行了强调，并且据此继续深入，对情报工作做出了诸如“知形”、“知能”和“知意”的归纳和总结，也分别对其中的内涵一一进行了揭示，最后指出“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从而一举将《管子》情报理论引向深入。

从《管子·地图》中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知形”，就是知道“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等，熟悉包括经济条件、武器装备情况、军队规模乃至训练质量等情况。而所谓“知能”，就是知道“然后可以行军袭邑”。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道可不可以作战、可以在哪里作战、可以进行多大规模的作战等等。至于“知意”，就是指知道“将出令发士，期有日数”。意思就是，要知道战争会不会即将打起来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在哪，会在哪儿打，

① 这一说法似乎先有日本学者提出。详见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31页。据佐藤坚司介绍，日本学者山鹿素行认为《孙子》13篇都是在讲情报：《始计》讲的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作战》、《谋攻》讲的也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军形》、《兵势》、《虚实》讲的是知己，《军争》、《九变》、《行军》讲的是知彼，《九地》、《地形》讲的是知地，《火攻》讲的是知天，《用间》再次回到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山鹿素行这种说法很新颖，似乎发现了《孙子》13篇的内在联系，也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但《孙子》其书在本质上是论述行军作战的，并不是通篇都在讲情报和“知彼知己”。所以，山鹿素行的这种分析其实是对《孙子》的严重误读，值得商榷。

② 分见《七法》、《兵法》、《修权》等篇章。

会在什么时候打，会打成多大规模等等。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管子》的“三知”对情报工作中的几个关键步骤做了出高度概括，非常发人深省，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典情报理论。在《管子》看来，从“知形”到“知能”再到“知意”应该是一个逐级层进的境界追求，而“知意”应该是情报工作的终极追求。

很显然，《管子·地图》所提出的“知意”，可说是一语点破了情报活动的目标性或原则性的内容，充分体现出其对于情报产品质量的追求。在他们看来，只有完成了“知意”，一个完整的情报研判工作或整编工作才算是最终完成，才能对己方的战略决策起到作用。而那些“形”和“能”的内容，都属于相对低层次，即便被悉数掌握也未必能对战略决策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知意”也对情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求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情报分析能力，也要求情报人员具备一定的鉴别真伪的能力，一定不能被对手所制造的一些假象所迷惑。《管子》在另外一篇重要的情报学论著《八观》中，曾就情报人员的“观”之道做出了非常详细的示例。所谓“八观”，即从“耕耘”、“桑麻”、“车马衣服”、“台榭”、“习俗”、“左右”、“置法出令，临众用民”和“国本”等八个方面观察了解敌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做到对敌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并一举战胜敌人。这些其实也是对所谓的“知形”作了详尽的阐释工作。《八观》同时告诉我们，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除了要学会“观”之外，还必须学会“计”和“量”，这和《管子·地图》“知意”的情报思想是极其吻合的。所谓“计”和“量”，正是实现从“知形”到“知能”再到“知意”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只有学会了“计”和“量”的情报人员才具备从“知形”到“知能”再到“知意”情报研判能力，才是一名合格的情报人员。

二、《管子》“知意”情报思想是对 《孙子》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孙子》“庙算”的情报思想，便会不难发现，《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其实是对《孙子》情报思想实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学术界一般认为，《管子》成书较《孙子》为晚^①，二者同为齐兵学的典范作品，故此他们在情报思想上表现出某种趋同性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由于晚出，《管子》立足于《孙子》，对其情报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知意”的情报思想也很容易地可在《孙子》十三篇中找到其理论渊源。

我们知道，在六千言的《孙子》中，“知”字共出现七十余次，频率非常之高。^②其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无穷”^③一句更是广泛流传的名言。研究古代情报理论的专家们经常引用这句名言，并据此指出中国古代所谓“情报”的范畴应包括“己”、“彼”、“天”和“地”这四项内容，即秉持所谓大情报观，以此来提醒今天的人们拓展其情报理论研究视野，尤其是正确理解“情报”二字应有之内涵。相比之下，《管子》则不止一次地明确强调“遍知天下”，从而将情报工作中的“知”的范围充分地放大，涵盖如“聚财”、“制器”乃至“风雨之行”和“飞鸟之举”等诸多内容。这种大情报观无疑就是完成了对《孙子》的继承和发展。

《孙子》虽重视“知”，但是还未能意识到情报活动过程中应当有“知能”和“知意”这样一个工作流程。熟悉《孙子》的人

① 有关《孙子》成书年代，笔者认为还是应当依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界定为春秋晚期。

② 根据清平津馆刊顾千里摹本《魏武帝注孙子》统计，其中“知”字共出现79次之多。

③ 《孙子·地形》。

都知道，其十三篇更多强调的是“五事”、“七计”等。笔者认为，所谓“五事”、“七计”，连同“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统统只能算作是“知形”。

《孙子》虽然已经意识到“庙算”对于情报研判和战略决策的重要作用，但对于情报研判工作未能如《管子》这般深入，尚未从深度上对“知”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的挖掘。考察《孙子》军事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孙子》在论述“诡道”之法时，曾极力主张“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①。但令人遗憾的是，《孙子》仅仅将其作为战法而提出，未能在情报思想上做进一步的思考，故此，《孙子》七十多个“知”字不曾与“能”和“用”发生密切联系。

可能正是《孙子》在“能”和“用”上的示伪，触动了《管子》作者对于情报辨伪工作的思考，才能从“知形”出发，进一步强调“知能”和“知意”，最终形成“知意”的情报理念。所以，《孙子》所谓“诡道之法”加上其“知彼知己”的情报思想，或许可视作《管子》“知意”情报思想的源头。正因为对手可能存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诡道”，所以《管子》才更强调情报人员必须要完成从“知形”到“知能”和“知意”的过程。

显然，较诸《孙子》，《管子》在情报理论体系建设上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孙子》的七十余个“知”字虽然包罗万象，但与《管子》相比，在思考深度上尚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管子》的“遍知天下”加上“知形”、“知能”以及“知意”这四个“知”字，尤其是“知意”，立即使得《管子》情报思想显示出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是一套非常系统和堪称完美的古典情报理论。由“遍知天下”我们可以得知其“大情报观”的理念；由“知形”、“知能”和“知意”，我们可看出其执着于情报产品的品质以及对

① 《孙子·计篇》。

情报人员基本素质的强调。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管子》关于情报理论的这些精彩论述，尤其是“知意”的情报思想，可视为是对《孙子》“先知”情报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为齐兵学的发展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三、《管子》“知意”情报思想的启示意义

《管子》“遍知天下”和“知形”、“知能”、“知意”的情报思想，尤其是“知意”的情报思想，对于今天的情报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管子》对于“知意”的终极追求，要求情报人员对所获得的基本情报信息必须要完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加工工作，以此来提高情报产品的质量。在情报活动中，情报人员经常会遇到对方“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示伪”，故此，情报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辨伪能力，通过去粗存精和去伪存真，来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乃至必然和最终的企图，而不能轻率地将假情报报告给本部，从而给己方的战略决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要求情报人员必须认真分析手中所掌握的各种情报信息，并进而分析这些情报信息对于敌我双方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第一步就是基于敌方能力来分析敌我双方的能力对比。第二步就是基于这种能力对比，客观地分析双方能否构成作战，对手的作战意图，以及战争中可能出现的状况等。这其中，对敌方作战能力和作战意图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敌人的能力在某种作战条件下是提高还是下降，是否会对敌方指挥官的决心构成影响，乃至此种作战条件下敌方会暴露出什么样的弱点和不足等，都需要情报人员或情报机关进行及时的、科学的、客观的分析和判断，然后才向己方的战略决策部门报告。只有完成了“知意”的情报产品才是决策部门最需要的，也才能为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提供可资借鉴的信息。

《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也能引发我们对于情报人员基本素质训练的相关思考。显然，具备一定的“知形”能力是对情报人员最起码的素质要求，但这显然不能满足作战所需。与“知形”能力相比较，我们应该更重视“知能”和“知意”的能力训练。《孙子·用间》曾明示了“以上智为间”的原则，而《管子》“知意”的情报思想对情报人员三种能力分出了高下，明确指出：“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放诸今天仍不过时。可以说，重视情报人员“知意”的能力训练，对于情报产品的质量而言，对于识别情报素材的感觉而言，或仅仅对于捕捉敌情的嗅觉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韬》军事情报思想

一、伪书不可尽弃

《六韬》六篇，旧本题为周吕望撰，吕望即周初辅助文武的功臣太公望吕尚（姜太公）。武王伐纣灭商，多得太公之力。唐颜师古注《汉书》，尚未对《六韬》的著者有所怀疑。宋代以降，此书一直被疑为伪书。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学者以历代著录、语言辞气、思想内容、军事历史、学术文化五个方面的依据断为后人伪托太公之名所撰。今人根据汉墓出土残简，认为该书在西汉前期已广泛流传。至于具体成书年代，大致当在战国末期，不得早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时。^①

历来评论典籍，对于伪书往往贬斥居多。不过辨伪是辨伪，评价自评价。二者虽有联系，也应加以区别。张舜徽先生的《伪书不可尽弃》指出：“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得失利弊，虽晚出贗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②《六韬》虽系伪书，但成书久远，已为历代兵家所宝。北宋时期，军官将领普遍缺乏军事理论修养，历代兵书，“武人将佐多不通其意”，^③宋神宗有鉴于此，遂下令建立武学（好比现在的军事学院）。元丰年

① 台湾三军大学所编《中国历代战争史》认为《六韬》“殆真为太公所传授之秘籍”。见该书第一册121页。

② 张舜徽：《伪书不可尽弃》，载《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4月增订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③ 参见《宋史·兵志》。

间，定《六韬》等七部兵书为“武经七书”，以此选拔武士。从此，《六韬》成为军事家必读的经典之一，“谈兵之家恒相称述”而不能废。^①《六韬》的地位和影响于此可见，值得重视，我们绝不能因为伪书贗品而忽视它在军事学术史上的价值。

二、以天下之耳目视听

要了解《六韬》的情报思想，《六韬·大礼》中的一段话不可等闲视之：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蔽矣。”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自孙子揭示了战争的这一普遍规律之后，强调洞明情况一直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优良传统。《六韬》认为君主要想情况明了，无所不知，就必须以天下之耳目去视去听。试想，以天下为耳目，己之耳目遍天下，天下人之耳目尽为己之耳目，还有什么情况不能了解的呢？君主居于中，好似蜘蛛蹲踞在所编织的巨大的情报网络的中心一样，天下四方的情报源源不绝地奔涌而来，聚于一身，再经过从全局的角度通盘分析考虑，试问，还有什么真实的情况不能掌握的呢？以天下为耳目，全部情报辐辏于权力最高者一人之身，这就是《六韬》的情报思想的核心。

《六韬》的情报思想有着直接的历史根源。周初，天子是诸侯封国的共主，王室为了掌握天下公室的情况，建立了一套制度。天子按时巡狩四方，所谓巡狩，就是巡视察看诸侯封国的政治经济民

^①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兵家类·六韬》。

情等情况。诸侯定期朝觐天子，所谓朝觐，就是述职，汇报各项工作。行人不时相互聘问，所谓行人，就是外交官，这是天子诸侯之间派遣外交人员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沟通情况。王室公室，均设史官。史官记言记事，文献资料、公文档案得以整理保存。采诗之官深入民间搜集民歌民谣，使王者得以观风俗，知得失。从这一整套的情报保障制度中，似乎可以看出它衍化为《六韬》的情报思想的痕迹。

情报思想是战争渴求情报的客观事实在军事理论上的反映。用这一原理，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军事著作要论及间谍情报工作。但是，不同的兵书，他们的情报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对比《孙子》的间谍情报思想，应该肯定《六韬》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孙子的情报思想除了“庙算”（战前的战略情报分析）、“相敌”（略相当于今天的战场监视）和“称胜之法”之外，从情报搜集手段而言，主要就是广泛使用各类间谍人员进行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相比之下，《六韬》以天下为耳目的情报路线，在军事哲学思想上似乎要来得更为深刻而富有哲理。当然，在诸侯星罗棋布各自为政、王室衰微的春秋时代以及七雄逐鹿、纵横家驰烟驿路的战国时代，由于山川险阻，交通不便，通讯方法简单，侦察手段落后，情报搜集的基本做法大体不过耳闻目睹外加推理判断，加上诸侯列国各据一方，政客士人各事其主，因此，所谓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无所不知，实际上是无法完全做到的，“以天下之目视”与“以天下之耳闻”只能是情报工作的一种理想。而且，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六韬》的这种情报思想也不及孙子的“五间俱起”^①来得具体实在。但是，这种理想尽管在当时并不能真正实现，两千多年来，却在客观上成了阶级社会中情报部门不断为之奋斗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六韬》的“以天下之耳目视听”的情报观，也是作者心目中的关于情报工作的理想境界。这种思想除了上文所

^① 见《孙子·用间篇》。

说的实践来源，就其思想承传来说，实际上是源自《周易》哲学中的认识论。具体地说，与《周易·观卦》有着直接联系。“观”卦由“巽”卦和“坤”卦组成，上为风，下为地，象征风吹遍大地。风无处不到，无孔不入，犹如人对天地、社会的无所不知，这也是《周易》关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理想境界。《周易》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君子之观和小人之观，要求君子应当像风吹遍大地一样的了解客观世界，做到知彼知己，并据此作出正确的决策。我们讨论《六韬》的情报思想，应当认识到它的情报观和《周易》哲学及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

三、三观六见

春秋之际，诸侯兼并。烽火几无一日不燃，干戈未尝一时安息。王室衰微，大国互相争夺霸主的地位，小国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行人奔走于阡陌，战车厮杀于郊野，“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武韬·发启》）。为此，《六韬》认为，要想战胜敌国外患，必须等待对方“亡国之征”的到来，强调“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这就是说，策划军事行动，举兵宣战，要待敌方殃灾齐至、恶贯满盈时刻的到来，从而获得“大兵发而万物皆服”的全面胜利。这样，情报工作的任务就是要调查那些敌方必然灭亡的征兆，判断作战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在此基础上，《六韬》提出了情报工作的具体内容。

《六韬》认为情报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三观。一是“观其野”，如果敌国“草菅胜谷”，这是亡国之时，可以宣战。在农业生产为经济支柱的古代，收集敌国粮食作物生长的情况，可以直接估计对方的基本国力和战争潜力。田野杂草丛生则五谷不登，五谷不登则饥馑荐臻，饥馑荐臻则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如此，则战争能维持多久可以想见。二是“观其众”（众，指臣僚），如果敌国臣子

“邪曲胜直”，这也是亡国之时，可以宣战。臣子邪曲，则下上离心，不能精诚团结，将在外也必遭疑忌。谋私有人，救国无心，上层统治集团如此，指挥作战可以想见。三是“观其吏”，如果官吏“暴虐残疾”，也是亡国之时，可以宣战。官吏残暴，滥施酷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日益紧张。吏治如此，民心可以想见。在《六韬》看来，田野荒芜，奸臣当道，刑法滥施，整个国家“败法乱刑，上下不觉”，天殃人灾毕集，种种征兆足以表明亡国之时已到，就可以倡大兵去征服它了。上述三观，就是《六韬》情报工作的最基本的内容。

三观之外，又有六见。《六韬》说：“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应该说明的是，这里的阴阳、内外、亲疏，包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如正常的政令为阳，秘密的指令为阴；外部佯动为阳，隐蔽行动为阴。公开活动为阳，私人生活为阴，外交宣传为阳，秘密部署为阴。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情报工作应该面面观，既知其正，又知其反，从而洞察敌人的真实企图和战争预谋。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心”和“意”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战略企图，也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心和意，有时可以从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上推导出来，有时也跟这个国家的强弱程度亦即战争能力有密切的联系。对于武装力量的强弱和物质财富的贫富情况，古人往往将其称之为“形”。因为这是可见的有形的物质，它直接关系到该国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也就是直接关系到古人所说的“能”。换言之，由一国的综合实力的“形”，可以推算出该国用兵作战的“能”。但是，由“形”常常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该国的“意”。“意”在更大的程度上常常是由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和战略意图决定的。强国不一定愿意发动战争，弱小的君主却可能不顾后果对外宣战甚至企图征服天下。因此，了解敌方的“心”和“意”，相对于了解敌国的基本情况，既特别重要又特别困难。如果说《六韬》的“三观”是对于彼方有形情况的观察了

解，那么“六见”则是对于彼方战略企图的分析。它通过“阴阳”、“内外”、“亲疏”的分析来洞察彼方核心机密的思想，应当视为具有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科学方法的真知灼见。

概括起来，《六韬》的三观六见，具有战略情报的特点。“三观”是对敌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的了解，“六见”是对敌国军政首脑人物真实的军事图谋和作战策略的了解。三观六见，应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这就是王者的情报工作之道。

四、十二间术

《孙子兵法》以《用间》篇收束全书，专论使用间谍的重要性的方法，《六韬》也不例外，《文伐》与《三疑》两章专论间谍阴谋活动。所谓文伐，意与武攻相对，是指采用非军事武力手段从内部瓦解征服敌人。因为种种分化瓦解、挑拨离间、腐蚀拉拢的行为都是属于文事方面的活动，所以又叫文伐。《三疑》一章则是论述为了击溃敌人、建立功业而需要采用的三种手段。对强大的敌人要因其强而养之，使之太强必折；对其心腹亲信要施展谋略，使之众叛亲离，对其人民要惠施以财，使之归心于我。

孙子把各种间谍分为五类，每类间谍各有特定的活动对象，其中一类叫“内间”。《用间》篇说：“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内间的任务就是诱使并利用敌国的官员，以获取己方所需的军事情报。《六韬·文伐》一章则叙述了12种运用间谍、外交等手腕征服敌人的方法。这12种方法基本上是孙子间谍思想的发挥和具体化，大致属于孙子所说的用间的工作范围，因此，12种文伐之法，可以认为是12种间谍术。

《六韬》所述12间术，内容多重交叉。从文伐阴谋活动的对象看，上至国君，下至智勇豪杰之士，以官员为重点，凡忠臣乱臣、内臣外臣、心腹亲信，无不包括在内。从文伐阴谋活动的手段看，注意因人而异、对症制宜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大致不外乎打击

疏远、挑拨离间、奉承逢迎、收买利诱、拉拢腐蚀、要挟控制之类。如对敌方的忠臣，宜用打击的方法，示之以威，多方刁难。在外事往来上故意拖延时间，不予合作。一旦敌国改派他人替代其职，则以诚相待继任者，从而使敌国君主不相信那个忠臣，达到疏远其君臣关系的目的。又如奉承的方法，“因所喜，以顺其志”，用圣人的美德、无上尊贵的名号去曲意逢迎，从而使之骄满自得，麻痹懈怠。又如获取情报，采用以金钱财货收买君王左右亲信的办法，可以获得核心机密。采用卑身事之，礼贤下士的办法努力与对方人员建立情同手足的关系，可以搞到情报。在获得情报之后，再以此要挟控制对方，可以使之不断为我所用。又如腐蚀，方法是“淫之以色，啗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三疑》），不断以此浇灌其淫乐之心，不愁其不糜烂。这种种方法，概括起来就是“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六韬》认为，文伐方面的工作具备了，就可以进行武力讨伐了。

前人曾抨击《六韬》的阴谋手段，斥之曰：“《文伐》十二节，皆阴刻陷人之语”。^① 这话虽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看待军事斗争中的间谍阴谋活动，并不可取，但是，毋庸讳言，12间术是打上了剥削阶级尔虞我诈的思想烙印的。《六韬》甚至主张采用这些阴谋手段来考验自己内部的军事将领。《选将》一章所述的君王考验将领的八种方法中，就有以间谍手段察其是否忠诚，以钱财观其是否廉正，以女色试其是否坚贞，以醉酒辨其是否失态等内容。这些都是军事历史中剥削阶级内部上下相猜、互相戒备的表现。就这一点说，12间术确实是些“阴刻陷人”的伎俩，应当批判。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腐朽没落势力无不企图用此种糖衣炮弹征服革命军队中的意志薄弱、立场动摇不定分子，这是我们今天读《六韬》应该引起警惕的地方。

^① 见黄震：《日钞·黄石公三略六韬》。

五、五分王翼有其二

思想路线、内容方法明确之后，就是组织落实的问题了。《六韬》中《王翼》一章专门讲述司令部的机构组成、人员编制和所掌职守。从“腹心”一人（犹如参谋长）到“法算”二人（犹如军需财会军官），各部门总计72人。这些人实际是司令部的业务参谋，是将帅的股肱羽翼，靠着他们，将帅得以成其神威。72人之中，有如下多种参谋人员与情报战线的斗争有关。

1. 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

2. 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洄山阻，不失地利。

3. 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暗忽往来，出入若神。

4. 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士、军中之情。

5. 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动四境，以弱敌心。

6. 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7.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这些参谋人员，除了主管水文和地利的参谋基本上负责气象和地理情报外，其他人或伪造证件，制造假情报；或充当侦探，专事搜集情报；或进行间谍活动，掌握动态，等待事变；或负责对外宣传，制造舆论；或造谣惑众，涣散敌军之心。在整个司令部全体人员之中，这些人大都可归为情报战线的专职人员，共计竟达30人，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二。所有这些间谍情报、舆论宣传人员，与主司其他军事工作的人员一样，最高将领对他们要“因能授职，各取

所长”。从情报人员的组织建制和职责分工中，可以看出《六韬》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尽管这种组织建制还仅仅是落实在兵书之中。

六、阴符和阴书

情报传递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情报安全传递，《六韬》叙述了两种通信联系的方法。这就是阴符和阴书。

所谓阴符，在《六韬》中是指一种秘密传达军令的凭证。符可用金、玉、铜、竹、木等材料制成，上刻文字或图案，剖分为二，朝廷或主帅执其右半，外官或守将执其左半。朝廷或主帅有事，遣使者持半符至，外官或守将将左半与之勘合，以验真伪。战争中，兵符就是主帅的军令。《史记》中记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兵符具有调兵遣将的重大作用。今天还能见到的战国时代秦国的虎符提供了兵符的实物证据。该虎符上有错金铭文三十九字，规定用兵超过五十人必须以虎符为依据才能有所行动，只有烽火警报一类紧急情况将领才有权机动部队。历代典籍之中，论及用符的不算少，先秦两汉的例子，也可以举出一些。

1. 《墨子·号令》：无符节而横行军中者，斩。
2. 《吕氏春秋》：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
3. 《管子·君臣上》：又有符节、印玺、典法、策籍以相揆也。
4. 《周礼·地官》：掌节：门关用符节。
5. 《史记·吕不韦列传》：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
6. 《说文解字》：符，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
7.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魏勃给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

8. 《汉书·文帝纪》：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

《六韬》重视兵符的作用，它认为，率领部队深入敌国，难免有紧急情况发生，为了沟通指挥中心与出征部队的联系，就要用阴符进行秘密联络。为此，《六韬》规定了兵符的规格和情报内容：

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杀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誓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

这八等兵符虽然具有报道战况、请求增援等方面的情报内容，但是使用范围和交代细节仍有局限性，“其事繁，符不能明”。为此，《六韬》主张一些重大的军事秘密，具体的批示或请示事项，应当用阴书进行联系，而不用阴符。特别在军队深入敌境，最高统帅与前线将领之间就重大的军事行动进行的通信，需要用阴书。所谓阴书，就是秘密文件。为了防止泄密，一编阴书要拆开为三份，分别派三人发送，每人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不能掌握全部机密内容。接受阴书的一方只要把前后三人所传送的三个部分合起来，就可以知道全部情况。在传送的过程中，即使其中某人被捕，阴书被缴获，敌人也无法掌握整个文件内容。这种通信方法，用现在的眼光看，自然是十分原始落后的，而且一编阴书分三人传递，也影响情报传送的时间，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尚不失为一种安全可靠通信手段。

《六韬》中说：“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知其情也。”所谓“相参”，估计可能是一种错简的方法。古代的书信是用竹简写成的，假设一编阴书计有九枚竹简，至少可有三种三分法。一种是第一、二、三枚为一份，第四、五、六枚为一份，余为一份，分别由

三人传送。另一种是九枚竹简参互交错，以第一、四、七枚为一份，第二、五、八枚为一份，余为一份，分别由三人传送。显然，后一种方法（错简）更有利于保密。笔者认为，这种错简的三分法或许更符合“相参而不知情”的原意。

为了确保安全保密，《六韬》还对传递情报的信使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指出传达兵符的信使不得随意停留，如果符事泄露出去，“闻者告者皆诛之”。这一条纪律与《孙子兵法》中对间谍人员的纪律要求是完全一样的。总之，在《六韬》看来，阴符阴书是用来“阴通言语”，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秘闻的谍报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过于夸大了阴符和阴书的保密功能。

七、《六韬》情报思想的糟粕

《六韬·五音》论述五音（宫、商、角、徵、羽）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作为判断敌情和用兵的依据，《兵征》论述望气而知战争胜负的先兆，都是伪科学。例如《五音》篇说：

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

太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

其法：以天清静，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之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遍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徵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北极星）。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

又如《兵征》篇说：

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气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气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气出而东，城不可攻。城之气出而复入，城主（守城将领）逃北。城之气出而覆我军之上，军必病。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用兵长久。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辅。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六韬》试图通过战场上的律音分析得知敌军的盛衰消长，认为在攻城作战中借助望气可以把握胜败的先兆，这些显然是不足为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思想实际是先秦术数在兵学中的反映和运用，是深受战国时代盛行的五行理论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不独在《六韬》一书，而是形成了兵家的一个学派。这一派，汉代人称之为“兵阴阳”。对于用兵作战，兵阴阳讲究“顺时而发”，主张“随斗击”、“因五胜”。从积极的方面说，这一派兵家看到了打仗与天时地利的关系，注意到了制约战争的诸因素中的生克关系；从消极的方面说，这种思想终于流入了荒诞怪异，“假鬼神而为助”，从而陷入了迷信占验的唯心主义泥坑。在后来的兵书中，这些糟粕并没能杜绝和消除，甚至在传统兵学中继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书中就有大量这方面的借鬼神言吉凶的神秘诡异的内容。我们在研究传统兵学时，这些糟粕无疑是应当抛弃的。



《吕氏春秋》军事情报思想

如同《孙子兵法》一样，《吕氏春秋》中并无情报字眼，也未见关于军政情报的界说，但它有着广泛涉及军事情报思想的内容。当然，作为一部“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并非兵书，但其中多处论述了军事和战争问题，也有不少论述军事情报的文字。当然，这些论述是为阐述全书系统的哲学思想服务的，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吕氏春秋》的情报思想与《孙子兵法》比较而言，更具有认识论的色彩，更富于哲学意蕴。如果我们摆脱传统诸子哲学研究的路子，另以情报理论的眼光来看《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乃至全部认识论，可以发现这部古籍论述了相当系统的“情报哲学”，无愧是我国传统情报学术思想的宝贵财富。笔者认为，尽管当前学术界在军事情报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毋庸讳言，在一些军事情报学概论性的著述中，“情报哲学”还是一片空白，而这却又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吕氏春秋》的情报思想，对于开拓军事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健全现代军事情报学的基础理论体系，无疑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一、关于情报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

《吕氏春秋》通常用“智”或“知”作为军事情报或军事情报工作的术语。《仲秋纪·决胜》中说：

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

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乱内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陨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殄，中木则碎，此以智得也。

这段话是《吕氏春秋》关于军事斗争思想的纲领性表述，也是对情报工作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的纲领性表述。它把义、智、勇列为军事斗争的“本干”，视之为赢得战争胜利的三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即战争性质、情报工作和战斗力三要素，可见情报工作在其军事思想中的地位。作者对于“智”所作的诠释，实际是对情报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概括。如同西方情报界视情报工作为“斗智”一样，它用“智”揭示了情报工作的本质特征。它规定“智”的基本任务是“知时化”，主要作用是知化，知变，知数，即洞察形势变化，了解敌情变动，掌握敌我双方先敌后敌、远敌近敌、追击舍敌之类战略战术的运用。对于“智”与“勇”的关系，它认为勇“以智得”。对于知化、知变、知数三者的关系，它认为前者是后二者的前提，这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军事行动中的谋略运用须以情报的获取和认知为前提这一论域。

二、关于情报工作作用的哲学解释

《吕氏春秋》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哲学概念，叫做“因”，意为凭借、借助。在它看来，一切有效而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利用“因”。作者认为，利用车船，人们可以坐着不动而到达遥远的秦国或越国。禹因水之力而治水，汤、武因民心而推翻夏、商。凡事善于利用“因”便能达到目的，不借“因”便只能失败。为此，它主张“贵因”，并在《慎大览·贵因》

中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命题，叫做“因则无敌”，又叫“因者无敌”。

对于军事斗争，《仲秋纪·决胜》说：“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除去这些广泛的军事作用之外，它还专门提到利用情报也是战略决战的“因”。《贵因》中记载了武王灭商时的一件情报案例：

武王使人候（侦察）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也。”武王曰：“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

这是一个密切关注敌情、实施连续侦察的著名案例，反映了商周之际情报实践与战机捕捉的史实。这一历史经验说明了战争对情报的需求和利用。用《吕氏春秋》的语言来说，情报获取也是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必须凭借的“因”，“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这里不仅又一次说明了情报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而且赋予“因”以唯物主义的解释，用以指与一切实践活动有关的工具、条件等客观情况，而不是天命鬼神或主观玄想之类的东西。这是应当肯定的。更有意义的是，它是从哲学层面来看待军事行动与侦察情报的相互关系的，并以“贵因”说作为重视情报活动的理论基础，这就比就事论事高出了许多。

三、关于情报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要求

《贵直论·知化》中说：

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轻，国恶得不危？身恶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也！吴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祸及阖庐。

在《仲冬纪·长见》中，作者更以若干历史事实指出：

智所以相过者，以其长见与短见也。

如果把《吕氏春秋》的上述观点和《孙子兵法》加以比较，将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孙子兵法》强调“知”，全书“知”字计79处，为高频率字；《吕氏春秋》也强调“知”，但它对于形势的分析判断，通观全书，重在“知化”、“先知”、“先识”。二书相较，前者侧重“准确”，后者强调“长见”，注重对情势演变和未来趋势的高度洞察力。在《吕氏春秋》看来，敌我双方斗智水平的高下或者君臣之间对形势认识的差异（如吴王夫差和伍子胥），某种意义上不在于知与不知，而在于先知与后知，关键是“长见”和“短见”的不同，而这恰恰又是致命的，因为“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由此可见，《吕氏春秋》实际上是把高度的预见性视为情报工作和战略形势分析判断的根本任务和要求来看待的，并以是否具有远见和预警能力作为“贤主”和“惑主”的分水岭。对于军事情报的基本要求，当今学术界普

遍认为是准确、及时、连续。对于情报工作的根本任务，当今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保障军事斗争，然而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似乎就不太同意这种观点了，否则《知化》篇何以会说出“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这番反驳意味很浓的话来呢？

四、关于情报工作的规律——“知道”

《吕氏春秋》认为“智”的根本任务是“先知”，但它并不满足于提出要求，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把问题引向深入，着手研究“先知之道”。

《仲夏纪·侈乐》中说：

人莫不以其知（知觉，认识能力）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遭）其咎。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知道”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所谓“知道”，即“知之道”，其内涵为“知其所以知”，指的是认识规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认为“知”是有规律的，并把这种对情况进行分析和预测的基本规律称之为“知道”，而且还要求人们掌握这一规律。

从军事情报学的角度解读《吕氏春秋》的“知道”，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首先，它提出情报侦察和情报分析存在客观规律，并将其视为“宝”，这在军事情报理论史上是了不起的贡献。其次，它警告人们要“知其所以知”，否则便是“弃宝”，而弃宝者必遭殃。再次，它启示我们，今天的情报学基础理论应当有一个揭示“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知道”，既是情报理论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情报实践工作者必备的素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通观《吕氏春秋》，全书不仅提出了“知道”这一思想，

而且联系战争和军事情报工作实际，多角度地探讨了其中的规律，具体地分析了实践中经常影响“先知”的若干方面。虽然这些探讨和具体分析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印记，但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可以说，时至今日，研究“知其所以知”依然是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尚未充分展开而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五、关于“先识”之道——察微

为了探求情报工作的“先识”之道，《吕氏春秋》援引了春秋后期吴楚两国之间的鸡父之战。《先识览·察微》写道：

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责）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

对于此次由边民事件引发的大战，《吕氏春秋》总结说：“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终（结局），其次知中。”并从认识论的原理进一步申说了“察微”这一“先识”之道：

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垂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见，如不可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

春秋后期，吴楚两国为争夺淮河流域大片土地，曾屡动干戈，

战事不休前后达60年。因久战疲劳，双方便偃旗息鼓，其后相对休战状态持续五年之久。然而，公元前519年，吴楚之战再起，这便是著名的鸡父之战。鸡父（今湖北固始）一战，吴军以弱胜强，大败楚军，台湾《中国历代战争史》称之“为古代情报与谋略配合作战之典型范例”。但《吕氏春秋》并未论及战争进程中的情报工作，而是着眼于战前数年之间休战状态下两国边境地区发生的一场民事纠纷，在《吕氏春秋》看来，鸡父之战是由吴楚边境地区的两个采桑姑娘因嬉闹误伤的民事纠纷这一导火线而逐步升级演变成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并由此总结了情报工作的“先识之道”之一——“察微”，这是颇具见地的。在战争和国家存亡问题上，它认为“太上知始”，而要“知始”，必先察其“秋毫”，如能察其秋毫，则大事就不会犯错误，这些认识无疑也是正确的。边民事件可以导致战争，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察微”论实际上提出了情报工作对偶然因素的及时掌握和正确认识的问题。引申开来，对于导火线以及某些萌芽状态的动向情况，既要敏感又不能“过敏”，这是“察微”论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

六、关于“先知”之道——审征表

在《恃君览·观表》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外交活动中的情报故事。鲁国的一位大夫在出访晋国经过卫国时，受到友人卫大夫的盛情款待，但宴会中卫大夫却显得闷闷不乐，酒酣分别之际，又交给鲁大夫一块玉璧。其后鲁大夫自晋返国，依照外交礼节应辞别卫大夫，但他却不告而别，匆匆赶路。手下问其原因，他说，卫大夫款待我，是出于私交；热情之余却显得闷闷不乐，是暗示我心中有忧愁；交给我玉璧，是让我保管。由此看来，卫国大概要发生内乱。就在鲁大夫离开卫国30里地之后，卫国果然发生了内乱，那位卫大夫也在内乱中死去。针对鲁大夫的情报意识和对卫国政局的敏感性，作者总结说：

凡论人心，观事传，不可不熟，不可不深。事随心，心随欲。人之心隐匿难见，渊深难测，故圣人于事志（由事观其心志）焉。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

鲁大夫不仅具有强烈的情报意识，而且具有过人的分析能力。如果空有意识而无能力，依然难以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这一能力就是作者所总结的情报预测的基本方法之一——“审征表”。卫国将有内乱，这是卫大夫内心不安的原因，卫大夫内心不安，又是他在鲁大夫面前种种异常表现的原因。鲁大夫则反过来由卫大夫的行迹（《观表》称之为“事”）推知其心，再由其心推知更深层的可能性。就方法论而言，这就是“审征表”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过程。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对“人心”、“事传”（谓已发生之事，已有之行迹）的深思熟虑。作者认为“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可谓抓住了情报预测的特点，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真理性。

七、关于“知化”之道——明倒顺

在《似顺论·似顺》中，作者又转而论述了情报分析判断中的“知化”之道。文中叙述了这样一个简明而饶有意味的战例：

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城郭高，沟洫深，积蓄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疲）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这一案例，前半部分讲情报侦察，后半部分讲情报分析，叙述

简洁，事例典型，富于启示，如同前文所述的鸡父之战案例一样，是可以写进军事情报学教材的。依据同样的情报，使者和宁国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根据所获取的情况，敌方的城墙修筑得很高，护城河挖得很深，城中的战备物资又很充足，通常导出的结论是“不可伐”。但是宁国却从城高河深看到了劳役的沉重和民力疲惫，从“积蓄多”看到了赋税的烦苛和民众的厌战情绪，从而认为可以一战。楚庄王之所以定下灭陈的决心，根本原因就在于宁国所作的由现象到本质的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推论。这一案例在军事情报思想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两千多年前就鲜明地指出了优秀的情报工作者必须善于对情况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由此可见，毛泽东情报思想中的十六字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是对祖国传统情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并没有把认识停留在既往事实的经验上，而是把经验上升到了认识论上来，并由此进一步申说了情报评估必须遵循的辩证法：

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

这里，作者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论述，其“倒顺观”已经猜测到事物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绝非简单的联系及其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其“长短观”也已涉及在一定条件下强势因素和弱势因素的转化规律。联系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出，这些有理有据的论述，可谓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是扣住情报的分析判断来谈论客观事物的“倒顺”与“长短”关系的，并认为只有真正明白“倒顺”与“长短”，能够由此及彼，借规律促转化，懂得这些“天之道”的情报分析评估人员，才“可与言化”，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而是情报哲学了。

“倒顺”、“长短”，可视为情报哲学研究中的两对范畴。引而申之，《吕氏春秋》中似乎还有一些今天的情报理论研究可以借鉴的范畴，例如虚实、真伪、表里、事心、贤愚、先后、强弱、君臣之类。不过，笔者丝毫没有把这些都纳入现代情报哲学研究范围的意思。因为时代不同，古人和今人不可能面对完全相同的问题。当然，有些也可能有类似之处，比如对于情报部门经过分析得出的却与最高统帅的既定思想向左的情报评估，古今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或许便是古人常常要讨论君臣这一对矛盾的缘故。

八、关于情报听取之道

1. 主观方面——去囿、防壅塞

《贵直论·壅塞》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齐国攻打宋国，侦察员报告说：“齐寇近矣，国人恐矣。”但宋王的臣子都认为宋强齐弱，从而否定了这份情报。宋王听信臣子的话，一怒之下，连续三次处死了先后如实报告敌情的情报人员，并再次派人前往侦察。为了活命，这次情报人员只得迎合宋王的心意，谎称“殊不知齐寇之所在，国人甚安”，并因此获得重赏。结果齐军攻至，宋王只得弃城而逃。对此，作者评论说：“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应当说，这是一句非常富于警示意义的忠告。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君主，如果有了既定的思维和主观之见，或者身边被一班臣子树立了一道封闭信息的隔离墙，那么，对于外界的真实情况，他是很难听进去的。

为此，《有始览·去尤》中说：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囿）。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向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

《壅塞》所讲的故事属于情报史上的反面教训，客观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管最高统帅的主观意愿如何，都必须听取来自情报部门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当情报部门反映的情况与上层集团乃至最高统帅本人的判断发生冲突时。这一问题是尖锐的，需要研究的，但似乎也非情报部门能够单独解决的。对此，《吕氏春秋》从听取情报的一方分析了信息接受者犯错误的主观方面的原因，认为国君不相信真实情况，拒绝第一手情报乃至惩罚情报提供者，原因有二：一是“多有所尤”，即思想认识受到多种局限，受到不同意见的重重干扰和包围；二是“意有所在”，即思维定式，在听取情报之前就已有了既定的不同观点。作者说“所以尤者多故”，意即造成认识局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观《吕氏春秋》，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上文提到的“喜恶”，作者认为这是根本原因，即听不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二是“骄恣”，即自以为强大，尤其是在敌强我弱时易犯夜郎自大的毛病；三是“自智”，即自以为聪明，过高估计自己的智慧，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在情报部门的分析结果与自己形势的看法不一致时易犯此病；四是“奸臣蒙蔽”，又叫做“所染不当”，即受到左右亲信或奸臣有意或无意施加的坏影响。鉴于这些原因，在《吕氏春秋》看来，信息接受者要想掌握情况反映者所提供的真实情报，主观方面必须“去囿”，防止“壅塞”。

2. 客观方面——察疑、察传

《慎行论·疑似》中说：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于其人也。舜为御，尧为左，禹为右，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奚故也？其

知之审也。夫李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识之，知之审也。

《慎行论·察传》又说：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不闻矣。

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这里所谈的虽然是认识出现偏差的原因以及怎样取得正确认识，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但我们不妨从情报学基础理论上加以理解，因为在原始情报从情报源经过逐级分析整理并上达的过程中，难免被某些“博闻辩言而似通者”剔除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或搀进一些杂质。上文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存在质的差异的不同事物往往具有相似的表象，原始真相经过媒体（包括各级情报部门）的逐级传递、取舍甚至炒作，往往会变得面目全非，而这恰恰是妨碍情报分析人员获取完整、准确情况的客观原因；第二，为了获取准确的情报，情报分析人员必须审慎地对待那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和道听途说的消息，要通过知情者加以核实，要从物理和人情两方面加以验证，简言之，即察传、察疑；第三，能否真正做好察传、察疑的工作，主观方面的原因在于情报工作者的自身素质有贤愚之分。

九、关于防奸保密之道——重言

为了国家安全和遂行作战计划，《审应览·重言》指出：“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重言”的道理虽然简单，但它所举的两个例证却十分新颖，发人深省。

其一是东郭牙窃密事件。一次，齐桓公和管仲密谋攻打莒国，计划尚未宣布，消息却扩散开来。经查，原来是宫中的仆役东郭牙散布的。但东郭牙并没有窃听桓公和管仲的谈话，而是凭眼睛远远“看出”谈话内容的。他说，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表情，如钟鼓之色，居丧之色，兵革之色。那天我望见国君和管仲在高台上，一脸怒容，手足奋动，这是要打仗的表情。桓公嘴巴张着，是个“莒”的口形。手臂抬着，正好指向莒国那边。我私下分析，现在诸侯中不听从齐国的，不正是莒国吗？所以我把自己的分析结果说了出去。

对于这件泄露核心机密事件，《重言》认为：

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

其二是《审应览·精谕》记载的一件事。齐桓公邀集诸侯会盟，因为卫国迟到，事后桓公便在朝廷上与管仲商量攻打卫国。待到退朝进入后宫时，夫人卫姬望了望他，便连忙跪了下来，替卫国请罪。桓公说：“无缘无故的，你请什么罪？”卫姬说：“你进来时，足高气强，说明有对外用兵之心。当你看见我的时候，脸色突然一动，可见要打的是我娘家卫国。”第二天桓公上朝，见了管仲，向他拜了一拜，管仲便说：“你放弃攻打卫国的主张了吗？”桓公说：“你怎么知道的？”管仲说：“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对此，《精谕》评论说：

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桓公虽不言，若暗夜而烛燎也。

保密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但上述历史事件所揭示的情形却别

开生面，颇有教育意义，时至今日，犹不失为安全保密教育的生动材料。作者对于上述案例的评论，拓宽了泄密的可能性和窃密的手段，深化了“重言”的内涵。明末清初，揭暄在《兵经·秘》中写道：“谋成于密，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一人之事，不泄于二人；明日之事，不泄于今日。细而推之，慎不间发。秘于事会，恐泄于语言；秘于语言，恐泄于容貌；秘于容貌，恐泄于神情；秘于神情，恐泄于梦寐。”这段话可以看作《吕氏春秋》关于防奸保密之道的注脚。“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并不神秘，而是有科学道理的。现代语言研究表明，除了有声语言之外，“形体语言”也可以传达信息。经过训练的聋哑人可以仅凭口型判读出他们听不见的有声语言的内容。国外有所谓“唇读间谍”，可以判读无声画面中人物所说的话，他们实际上是现代的东郭牙。东郭牙获取重大军事秘密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综合分析法，笔者曾著拙文加以具体分析。^①其核心方法是“唇语判读”，重要的辅助方面是对形体语言、环境，特别是人物思想和事件背景的分析。

当然，《吕氏春秋》在这方面也有唯心主义的糟粕。《季秋纪·精通》说：“今夫攻者，砥砺五兵，侈衣美食，发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乐，非或闻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亲爱在于齐，死而志气不安，精或往来也。”这种用“神”和“精”来解释所谓的异地感应现象，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① 详见储道立：《唇语判读》，载《南外学报》，1985年第2期。



《吕氏春秋》情报思想的产生

一

《吕氏春秋》是一部二十余万言的大书，是秦相国吕不韦召集门客所编。这部书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成书于战国末期、秦统一中国前夕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人把它视为先秦诸子之后的集大成的理论著作，有人则认为它是开启秦汉哲学史的发端之作。汉代以降，评说《吕氏春秋》者代有其人，但迄今未见言及其中情报理论的文字。

以情报理论为题研究这部古书，似乎难免有猎奇之嫌，但是绝非凿空之谈。如果我们抛开传统国学研究的模式和思路而另具一种眼光，从军事思想尤其是军事情报理论的角度深入研究这部典籍，将会发现情报思想本是其固有的理论组成部分。挖掘并整理其中的军事情报思想遗产，不仅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和纵横家，对于了解那个时代军事思想的全貌具有意义，而且对于建设现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情报科学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自古及今，虽则人们也曾论及《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却从未认识到它的情报理论及其价值，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从研究者而言，历代治《吕氏春秋》者可谓清一色的文人。封建时代的儒生大抵像他们的祖师爷孔子所谦称的那样，“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现代的文人学者，则致力于哲学思想的探讨，即便论及军事，也仅着眼于“战争观”的层面，难具专业的眼光，或无暇从事具体而微的军事学术研究。二是从《吕氏春秋》本身而言，它

的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军事、教育乃至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养生之道等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而且在思想发展史上与战国时代的诸子学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致使论者多注意其思想理论与儒、墨、名、法、道、阴阳诸家的内在逻辑联系和自身的思想归宗，而鲜有从实用的角度探讨其包括军事情报理论在内的具体军事学术理论。

二

《吕氏春秋》何以具有情报思想？这是时代使然。

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战争规模日益扩大，作战方式不断变化，伴随着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外交路线方面出现了合纵连横两大战略。政治家运筹于帷幄之中，外交家奔走于各国之间，军事家在战场上兵戈相见，其间充满了生动活泼的情报实践。秦本处西戎之地，由列国一变而为春秋五霸之一，再由霸主进而统一中国，说到底凭借的是内政外交和战场上的胜利。这些都是《吕氏春秋》得以具有情报思想的现实基础。

仅以吕不韦直接参与或主持的军事行动看，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主编的这部大书中会关注军事及情报问题。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任丞相，“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吞并了东周，并且铲除了周王朝的最后一棵根苗。接着秦又利用燕、赵互攻的机会，派蒙骜攻韩，迫使韩国献出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和巩（今河南荥阳东北）。于是秦国在这些夺取的地盘设置了三川郡，秦在东南的边界也就和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接界了。庄襄王二年，又派蒙骜攻赵，拿下了太原郡（郡治洛阳）。庄襄王三年，攻魏，夺取高都（今山西晋城）、汲（今河南汲县西）；攻赵，夺取榆次（今山西榆次）、新城（今山西朔县南）、狼孟（今山西曲阳）等37城；攻韩，夺取上党郡；继又将魏、赵、韩、

楚、燕五国攻秦之联军抵御于黄河以东。

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继承王位，吕不韦任相国，尊号为“仲父”，至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7年）被免除相国之职为止，不到十年之间，又有一笔可观的战绩表。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平定晋阳反秦的赵人，重建太原郡。秦王政二年，攻魏国的卷（今河南原阳西）。秦王政三至六年，连续攻打魏国，捷报频传，先后占领二十余城，直至攻取朝歌（魏都，今河南淇县），并使卫国成为秦的附庸。秦王政七年，攻取赵国的龙（今河北行唐附近）、孤（今河北唐县北）和庆都（今河北唐县附近），复攻取魏国的汲。秦王政八年，攻赵，因率兵者长安君降赵未果。秦王政九年，攻取魏国的首垣（今河南长垣北）、蒲（长垣东北）和衍氏（今河南郑州东北）。

这些战绩不仅反映了秦国在统一六国的兼并事业中节节胜利的情景，而且也间接说明了身为大臣的吕不韦的军政才干。战争的实践必然带来军事理论的发展，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伐谋用智，各种料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层出不穷，同样必然要反映到那个时代的著作中来。《吕氏春秋》既然是这一时期作为治国大臣的吕不韦主持编写的著作，其书总结包括情报工作在内的军事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上升到理论上，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

《吕氏春秋》包含情报理论方面的内容，是哲学思想和社会科学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大解放的历史时期。及至战国后期，诸子的学说已经逐渐变得杂而不纯，学派之间相互渗透，开始吸收他人的思想精华。随着军事政治上的统一之势日趋加强，思想文化融合的趋势也渐趋明显。人们开始希望摆脱门户之见，兼采众之所长，这样，便出现了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汉书·艺文志》中说杂家在思想

内容上的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这话在《吕氏春秋》中也可以找到直接的明证。《审分览·不二》篇说：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臆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孟夏纪·用众》篇又说：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这表明作者已经没有排除异己、厚此薄彼的狭窄胸怀，为了服务于即将出现的封建大一统帝国，需要构建一个庞大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以达到“遂有天下”、“大立功名”的政治目的。而在这个也许尚有庞杂之嫌的体系中，自然少不了原先纵横家和兵家的思想内容。况且，《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门客所写，《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其“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这实在是一支令人惊讶不已的庞大的写作队伍，三千人之中必有崇尚情报侦察与谋略用兵者，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为了实现各有差异的社会理想或出于挽救时弊的目的，在战国时代林立的学派之中，出现了源于外交官的纵横家和专事军事理论研究的兵家。前者服从军政外交的实际需要，致力于国际形势、战略决策、外交斗争和谋略用智的研究，围绕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张的中心，形成合纵和连横两个派别。其中大名鼎鼎的苏秦，身披外交家的外衣，游说于齐、赵、魏等诸侯之间。最新的史料表明，他实

实际上是燕昭王打入齐国的战略间谍。至于兵家，继春秋晚期孙武的兵法之后，军事学著作已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家。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182家，其中大多数是战国时代的兵家著述。可见军事学是战国时代最鼎盛学问之一。所有这些，如果不反映到兼采众家之长的《吕氏春秋》中来，反倒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吕不韦是《吕氏春秋》的策划人和主编者，从《序意》中可知，该书的主旨是他一手制订的。吕不韦是个神奇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独特经历颇能告诉我们何以《吕氏春秋》中具有情报理论方面的内容。

吕不韦跃入政界之前，本是往来各地的商人。在我国，商人参与军情政情活动可谓由来已久。商贾出身的管仲被齐桓公任为相国之后，为建立齐国的霸业，曾奖励商人通行各国之间，探知军政社情。魏文侯时的白圭（周人）被尊为商贾的祖师爷，其致富秘诀是“观时变”三个字，其经商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其实践经验是“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商人与观时变、知政情自古就接下了解不开的情结。《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者，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对于此时的吕不韦，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写道：

本是濮阳（今河南濮阳）人而成为家累千金的这位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复经纪商业于赵国的都城邯郸，奔走于秦国的都城咸阳，可知他在当时是新兴的富人阶层，而他的经济活动的范围是跨有现今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省的。他在当时是真实的一位国际贸易商人。在交通梗阻的当时，在商业上能有这样大范围的活动，可知他绝不是一位寻常的材料。

这里的“不寻常”，具体来说，至少是指他对各地物产分布、

年成丰歉、市场行情等情况的分析和判断及时而且准确。况且，那是一个战事频仍的年代，他的商业活动离不开对战争与市场关系的把握，至少也不免时时伴随着旅途安全状况的收集与分析，不如此，他便不能“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我们不妨这样说，吕不韦的商务实践，既成功地锻炼了他的商业情报才干，也培养了他的军事情报意识。

这至少可以使我们联想起在吕不韦之前的两个人，一位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一位是郑国的商人弦高。一般人只知道子贡是孔子的弟子，实际上他又是一个很了得的商贾兼游说之士。子贡是司马迁列入《史记·货殖列传》的富豪之一，说他“废著（买卖）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经常“接駟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孔子虽然对他的经商行为比较反感（实际上正是子贡的富有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孔子的名声），却又不得不承认他“货殖焉，亿则屡中”。我们千万不可小看了这句话，这等于说子贡在从事以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中，能够囤积投机，预测行情，屡屡得手。于此可以想见子贡预见经济行情和驾驭商业市场的能力。果然，这种能力运用于军政外交，便使他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成为杰出的外交家，并导演了一出改变五国命运的历史剧，而他自己也成了纵横家的先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一次齐将伐鲁，孔子与门生弟子寻求救鲁之策，弟子们纷纷请缨，独子贡得到孔子的许可。他凭借对各国内部形势以及国际关系的深刻了解出使国际社会，在齐、吴、越、晋四国之间开展连锁外交，力说各国国君，居然使原想灭鲁的齐国改变了矛头所向，转而移兵与吴国交战。结果不仅挽救了鲁国，使齐国战败，而且整个国际关系的态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史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虽则现在的历史学家对这段史料有不同看法，但是由此可见，这位经商有道的子贡在形势分析与谋略外交方面同样也是很出色的。至于弦高，他的买卖从郑国直

做到周王朝的都城，是一位极具情报意识的国际商人。他在长途贩运的途中，与从西方千里迢迢赶来的秦军在滑国（今河南偃师南）不期而遇，立刻就能判明这是秦军企图偷袭自己的祖国。这是何等的敌情观念！不仅如此，他又当机立断，拿出4张牛皮和12头牛假借郑国国君的名义犒赏秦师，以示郑国已经有所准备，一面又迅速派人回去报信。这又是何等的情报意识和富于创意的情报工作！弦高的明智和果断，终于迫使秦军误认为郑国已经做好了迎战准备而不得不半路折回。他的机敏、无私和主动精神，不仅真正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挽救了郑国的灭亡，而且也是我国军事情报史上有关人民群众侦察情报工作的绝好的材料。

吕不韦如何呢？他由经商转而从政，由商场进入政界，如同所有的策士一样，是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周密的策划的。他在赵国的都城邯郸做生意时，结交了在赵国充当人质的秦昭王的孙子异人，并与之密谈了一次。这位见多识广的商人便赶回家去，同父亲研究起利润增值的基本理论来。且看《战国策·秦策》中的一段父子对话：

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曰：“十倍。”

“珠玉之赢（指经商）几倍？”

曰：“百倍。”

“立国家之主几倍？”

曰：“无数。”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从这段有趣的对话可以看出，吕不韦抱着牟利的根本目的，打算改做“人货”生意，而且是针对政治人物的大买卖了。

接下来便是富于戏剧性的“奇货可居”的故事了。异人是秦

昭王之孙，安国君之子。作为秦的诸公子，异人的兄弟有二十几个，虽说当时安国君已立为太子，但是异人并不是他的长子，居长的是子奚，异人的母亲又非安国君宠爱的正夫人（华阳夫人），而是失宠的夏姬。而且，秦国屡屡加兵于赵国，身为人质的异人又得不到应有的礼遇，连必要的活动经费都很拮据，一旦两国反目，赵国随时有撕票的可能。异人可谓落难公子，但又不能说毫无希望，因为华阳夫人无子嗣，未来的秦国鹿死谁手，殊难料定，而这不能不说是一线希望。于是吕不韦依据“人弃我取”的原则，决心把赌注压在异人身上，进行一次政治投机。吕不韦决心使异人获得王位继承权，手中的筹码有二：一是对异人、华阳夫人乃至赵国的心理状态的洞察，二是手中有钱。条件则只有一个：将来异人立为太子再继而登上君位，二人共有秦国。其后的情形，《史记》和《战国策》所述有所不同，总之是吕不韦经过一番秘密运作，先打通华阳夫人的姊弟，继而说动华阳夫人，再由华阳夫人说服安国君立异人为嫡子，最后通过外交途径使赵国归还人质（另一说是买通守关者逃离）。幸运的是，数年之后，异人即位，吕不韦自然而然地成了丞相。

吕不韦的这番成功运作，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始终抱定牟利的目的；二是虽具投机的性质，却又以对宫廷及军政形势的敏锐观察和准确把握为基础；三是目标坚定，策划周密，隐蔽进行，独立操作，不惜金钱，具有间谍活动的某些特征；四是从异人为质于赵至即位为庄襄王，历时14年，反映了长期经营、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有这些，或许是吕不韦在他主编的《吕氏春秋》中不免要注入情报方面的思想内容的潜在因素吧。



《李卫公问对》在军事情报思想史上的意义

《李卫公问对》（下简称《问对》）曾被北宋政府钦定为《武经七书》之一，立于官学。全书采用唐太宗和李靖君臣对话的形式论述军事思想。虽然该书的著作者至今仍充满争议^①，但其在我国军事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和影响仍获得公认。对于该书的情报思想，虽然学术界已有专门著作作了探讨，却未能把握其在中国古典军事情报思想史上的意义，若干论述似亦有缺漏甚至不当之处。为此，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稍作探讨。

一、对孙子“彼与己”、“天与地”大情报观的继承和认识缺失

《问对》下卷记载了唐太宗和李靖这样一段对话：

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仅攻

① 关于《李卫公问对》的作者大体有如下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唐朝的李靖；一种看法是宋代的阮逸；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既不是李靖也不是阮逸，而是另有其人。至于这个人是谁，目前还不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个人应该生于北宋时期。原因在于，《问对》在1080年北宋政府下诏刊行《武经七书》之前，并不见流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曾这样说到：“按《四朝国史·兵志》，神宗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名、物名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从“世无全书”到“立于官学”，《问对》的出现多少令人感到蹊跷，只能将它认定是北宋时期产物。

其城、击其陈（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朕常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诚。

这一节由攻守之道论及知彼知己问题，实质是在论述孙子所建立的一对最基本的情报范畴（彼情和我情），以及情报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战争胜负的保障作用）。

“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是孙子情报理论的集中概括。与今人把情报简单理解为“对方情况”的习惯思维所不同的是，孙子的情报观是涵盖彼与己、天与地的大情报观。唐李二人的讨论实际上是对孙子“知彼知己”情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问对》指出，“知彼知己”的关键是详审“敌之心、敌之气”与“己之心、己之气”。这里的“心”，实则指敌我双方的战略意图、作战决心等，而“气”则是指敌我双方的斗志、力量对比等。作者认为，即使是“知彼”，也必须要将“敌之心”与“己之心”对应起来详加审视；即使是“知己”，也必须将“敌之气”与“己之气”认真加以比照。不难看出，作者不是分别孤立地看待敌情或我情，而是把“知彼”与“知己”，“料敌”与“察己”视为紧密联系的整体。如果仅仅打量一方，便无法得出关于双方实力对比的准确结论乃至在战前作出关于战争胜负的预见。只有将敌我双方联系起来考察，在对双方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实力对比等有了

清醒的认识之后，才能获得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才能决定战或不战，才能找到正确的决战方向。

从上述节选中还可以看出，同孙子一样，《问对》也认为攻与守是最基本的作战样式，情报工作既要知彼也要知己。但是较之孙子，在攻守之间，作者更看重守；在“知彼知己”之间，作者更看重“知己”。作者认为，如果做到了“知己”，虽未“知彼”，则“安有失利者”？只要把自己的情况搞清楚了，怎么还会轻易失利呢？因为按照作者所继承的孙子的观点，知己可以使自己不败，知彼则能胜敌^①，况且比较而言，敌方的情况毕竟是相对难以掌握的。所以作者这才更强调知己，主张先把容易做到的事情做好，即“先为不可胜”，因为“不可胜在己”。

“知己”的功夫看起来似乎容易做到，其实也容易被忽视。对于一些妄自尊大的将领来说，尤其如此。战国时期，赵括四十万兵众全部被活埋，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秦军强大，但更惨重的教训还是因为“知己”的功夫做得不好。对于“知彼知己，兵家大要”，《问对》借李世民之口，强调首先要“知己”，看似卑之无甚高论，实则是最朴实最切实的经验之谈，究其原因，在于作者更注重“知己”对于战争胜负的作用，同时也是希望为将为君者能围绕战争胜负，多做一些“知彼知己之切实工夫”。^②

故此，从以上君臣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问对》作者一方面对于孙子“知彼知己”情报观的熟悉和坚持，一面又能翻出己意，能在深刻理解孙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

不过，《问对》对于孙子情报思想的把握也有不足之处。孙子曾指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不仅强调对敌我双方力量需要充分了解，而且强调对敌我双方共享或互相

① 《孙子·形》：“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② 《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二十四日与沅弟书。

争夺的战场环境及自然条件（亦即“天”与“地”这一对情报范畴）也要掌握并给予充分考虑，以判断和细数对于己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但在《问对》中，作者更看重的是“知彼知己”，而对“知天知地”却鲜有论及。这相对于孙子是一大退步。因为包括战场环境在内的天时地利等自然因素无疑也是必须满足的情报需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成语出自三国故事，说的正是既不属于敌情又不属于我情的第三类情报范畴对于战略决战的影响。可知，看不见“天与地”这一情报范畴，可算作《问对》作者解读孙子情报思想的一个缺失。

二、对孙子“庙算”思想的逻辑推进

孙子提出了著名的“庙算”理论，这是古代战略情报分析的经典论述，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问对》对孙子的“庙算”思想能结合战例研究加以理解，有着较为忠实的继承。

孙子的“庙算”思想认为，对于军事问题，君臣当集体研究关系到战事的种种事项，通过对敌我双方“五事”、“七计”的分析比较与综合考察，根据己方胜算的把握进行战略决策，以追求“全胜”。在《问对》上卷中，作者以淝水之战为例，集中论述了“庙算”的作用，或者说表达了作者对孙子“庙算”思想的进一步理解。

淝水之战发生在公元383年，即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当时，前秦君主苻坚无视域内各民族分割而治、各自为政的现实，不顾文武大臣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动大军南下伐晋。晋军在谢玄、谢石等将领的带领下进行抗击，与秦军相隔淝水对峙。针对秦军民疲兵弱而苻坚又急于决战的心理，谢玄对苻坚说：“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若移阵少却，使晋军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①苻

^① 《晋书·苻坚载记》。

坚正想等晋军半渡而以铁骑击之，遂轻率同意了谢玄的要求。谢玄立即引军渡河，并令曾被秦军俘获且表面投敌的原晋军将领朱序在秦军阵后大呼：“秦军败矣！”结果秦军一退不可复止，人马相踏，终于大溃。淝水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苻坚的失败源于战略决策的失算。一方面，苻坚看不到各部族豪强均与他同床异梦的实际，貌合神离的统一局面使他误以为自己很强大；另一方面，又低估了东晋政权的韧劲和战斗力。这种建立在不知己不知彼之上而又企图一举成功的错误的战略决策，再加上用人不当、战术失误，遂导致秦军在接战之后便立即溃败。

《问对》中君臣二人在论述这段历史时，看法稍有不同。李靖说：“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唐太宗却认为苻坚的失败在于没有做好“庙算”。他说：“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① 仅就《问对》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同样的战例，李靖看到的是苻坚的“无术”——缺乏作战指挥能力，而太宗看到的却是苻坚的“无算”——缺乏战略分析和决策能力。相比之下，唐太宗不仅认识水平较李靖为高，^② 而且在情报理论上也显得更有来历和深刻。

在《问对》中，唐李君臣经常引用《孙子》和《司马法》等兵书。正是对于传统兵法有着精深的研究，并能在实际战争中随机运用，唐太宗才能在群雄并起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最终主宰政权。单就情报思想来说，从《问对》中也可见其对于孙子情报理论的熟悉和深刻理解。孙子的“庙算”理论认为：“多算胜，少算不胜。”^③ 但在战争的常理上，任何战争，交战双方战前实际都有一个或多或少、或精或粗的战略分析过程，“无算”的情形很少见，唐太宗针对孙子的“多算胜，少算不胜”，进一步提出“少算胜无

① 《李卫公问对》卷上。

② 这似乎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好为唐太宗脸上贴金。这种阿谀手法在《问对》中不时见到。

③ 见《孙子兵法·计篇》。

算”，并认为“凡事皆然”，不仅认识水平较李靖高得多，更切合战争史的实际情形，而且可以说将孙子的“庙算”思想合乎逻辑的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对于用间得失的辩证阐述

《问对》下卷中记载了一个李靖以唐俭为“死间”的著名案例，很能说明谍报理论上的一些问题。

唐俭事件发生在公元630年，即贞观四年正月。当时，李靖率大军攻打东突厥颉利可汗，并使其败走铁山（今内蒙古大青山北）。颉利收拾数万残众伺机逃往漠北，一面又遣使向唐太宗谢罪，欲施缓兵之计。唐太宗于是派鸿胪卿唐俭前往颉利可汗营中安抚。李靖认为唐俭在敌营慰问，颉利必定非常松懈，正是一举破敌的良机，于是亲率精骑万人直扑敌营，大败颉利。而唐俭则侥幸脱逃，安全返回。

李靖这样做显然是置外交使节唐俭的个人安危于度外的。此举不仅招致朝臣非议，太宗质疑，后世兵家也称李靖此举是以唐俭为“死间”。^①

面对太宗的疑问，李靖认为，“去大恶不顾小义”，为了战争的胜利，便顾不得唐俭个人的安危。接着，他又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用间思想：

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②

孙子在《用间》篇专论了谍报工作。《用间》篇不仅论述了间

① 如《草庐经略·间谍》：“汉之郾食奇，唐之唐俭，人皆以为死间。”

② 见《李卫公问对》卷中。

谍的分类，谍报术的运用原则，情报工作的政策、纪律，情报人员的素质要求，以及历史经验等，而且强调了谍报工作的地位作用，阐述了既坚持唯物主义又反对形而上学的情报哲学，确实是中外古典兵学中创建谍报学理论框架的发凡起例之作。后世兵家大都对孙子的用间思想倍加推崇，但是，在《问对》中，我们却看到作者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而在一片叫好声中显出独立思考的精神。

需要说明的是，李靖绝非全盘否定用间。在杜佑编著的《通典》中，保存有已经亡佚的《李卫公兵法》的若干片段，其中也有上引的文字，但却不见“用间最为下策”这句话。在《通典》保存的材料中，我们看到李靖不仅不轻视用间，还对谍报经营对象做出了有别于孙子的分类，比如“间其君、间其亲、间其贤、间其能、间其助、间其邻好、间其左右、间其纵横者”等，并认为子贡、苏秦、张仪等人，“皆凭此术而成功”。^①能对用间作如此归纳分类，这无疑是对孙子用间理论的发展，也表明李靖对于用间颇有自己独到的心得。

不过，《问对》在用间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在于卓越的辩证认识。翻开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史，对于孙子的用间思想，至少从《问对》开始，便有了严重的分歧意见。一派是发展派，一派是质疑派。发展派极力推崇孙子的用间思想，比如《六韬》，它在孙子的基础上论述了“文伐十二法”，设想了司令部中情报参谋的类别和执掌^②。其后，历代众多的兵书在谍报问题上差不多都祖述孙子，沿着《孙子兵法·用间》的思想轨迹前进。到了清末，朱逢甲著《间书》，更将用间视为可以挽救战场颓势，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灵丹妙药，^③从而将《孙子》的用间思想推向了极端。

① 《李卫公兵法》，见《通典》卷151。

② 参见《六韬·王翼》。

③ 参见朱逢甲：《间书·自序》。

孙子视用间为“神纪”，乃“人君之宝”，主张“三军之所恃而动”。^①而以《问对》为起始标志的质疑派则开始对孙子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质疑派看来，孙子的用间思想存在一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亦即只知用间之利而不知用间之害。例如同时代的苏洵，便在《用间论》中写道：

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谋，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

又如明代的《投笔肤谈》，作者指出，在间谍战中，己方的间谍不仅可能“传伪于我”，而且可能“泄情于彼”。在战争中，“间能成事，亦能败事”。因此，作者认为：“间谍可用而不可恃。用之者智也，恃之者愚也。”对这些论述，明代的何守法称之为“说透玄关”。^②再如明代的《草庐经略·间谍》也说：“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敌，间可常恃焉？”也指出了用间可能产生的弊端。

今人多推崇孙子，而罕言孙子之失。当然，《孙子兵法》确是一部充满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著作，孙子对于战争中的诸多问题，例如虚实、众寡、奇正之用等等，每每能持辩证观点，但是就其情报思想而言，尤其在用间问题上，平心而论，确实存在上述质疑派所说的不足，他只看到了战争需要情报保障，掌握敌情必须用间，即《问对》所说的“或用间以成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也没有论及《问对》所说的“或凭间以倾败”的一面，而“或用间以倾败”在战争史上却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问对》关于“孙子

① 俱见《孙子兵法·用间》。

② 见《投笔肤谈·谍间》及何守法注。

用间最为下策”的评语虽然有点偏激，看似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性，但是，联系它紧接着的关于载舟覆舟、成功倾败的具体说明，应该说并不片面，反而很有辩证思想的观点。这种观点很发人深省，绝不是危言耸听。它把军事斗争中的用间问题提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高度来认识，批评了孙子一味强调用间的重要性而看不见用间的负面作用。这一点，确实是对孙子谍报思想的了不起的修正，也是对古典情报思想的杰出贡献，不仅给后代的兵家以启示，而且对于今天的谍报实践和情报理论建设都有一定警示意义。

此外，孙子在《用间》篇强调，用间是关乎“先知”的重要工作，“不可取于鬼神”。对此，《问对》作者似乎也别有见地。在《问对》中，作者主张不废阴阳术数，而是要加以合理的利用：“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①既看到了鬼神和阴阳术数的荒谬不足信，又看到其中也有欺骗敌人，值得利用的地方，这种识见其实也是充满唯物精神的，也是因事制敌的策略之一。

① 《李卫公问对》卷下。



戚继光的军事情报思想

戚继光（1528年～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今山东蓬莱）人。他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军事家，伟大的民族英雄，曾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显示出超强的治军和指挥作战能力。从他所留下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大军事家具有系统而深刻的军事情报思想，为他在战争中屡屡获胜提供了保证。

一、“算定战”思想

戚继光在给部下讲授军事理论课时鲜明地提出了“算定战”思想。他说：

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朝廷，敌来只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①

这里，戚继光针对将士的特点，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按照战争的有无精心筹划和准备，将作战类型分为“算定战”、“舍命战”和“糊涂战”三种。三者比较，他不仅反对仅凭热情和勇

^① 详见《练兵实纪·登坛口授》。

敢与敌人作硬拼式作战，更反对“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而只提倡在占据充分的情报资料之后，经过周密分析和筹划的“算定战”。

戚继光说：“须是未战已前，件件算个全胜。”^① 可知他所主张的“算定战”，要求战略决策部门在未战之前，将敌我双方重要情报都要摸清楚，利于己方进行周密准备，知道己方“得算多少”，是否可以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主动，是否能力争达到“全胜”的战略目标，然后再论战与不战。“算定战”要求战前对敌我双方实力进行综合比较，第一步要做的便是对敌情的充分把握。戚继光说：“先知彼而后可以谋算。”^② 又说：“此需到彼，方得其情。”^③ 这些均是强调对敌情的有效把握。第二步便是“谋算”，即分析彼此实力，计算出“得算多少”，从而判断能否作战。

戚继光的“算定战”思想，实质是一种战略情报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诠释，其要点有三：一是战略情报分析有赖于情报资源的充分占有；二是战略决策有赖于情报分析的准确乃至精确；三是胜利的取得首先取决于战前的计算多少。这种战略情报理论，同时也反映了戚继光的重战、慎战思想。

纵观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史，不难看出，戚继光的“算定战”是对孙子战略情报分析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不仅强调对敌我双方力量须有充分了解，而且强调对敌我双方共享或争夺的战场环境及自然条件也要给予充分考虑，从而判断己方的有利因素。孙子所提出的“庙算”主张，认为凡遇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设于明堂，君臣集体充分分析形势，根据己方所得筹算的多少进行战略决策，以追求“全胜”。经与孙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戚继光

① 《练兵实纪·登坛口授》。
② 《类辑练兵诸书》卷一。
③ 《类辑练兵诸书》卷三。

“算定战”的战略情报思想源于孙子的“庙算”理论，其所谓“得算”、“知彼知己”等，均本于孙子；另一方面，戚继光以“算定”二字替换孙子的“庙算”，不仅是因为礼制的变迁，也不仅是语言表达较为明确，能使部下明白，更是借以概括自己的情报思想，可谓既得孙子之灵魂，又显自家情报观之精髓。

二、情报报告制度

戚继光的“算定战”要求情报部门必须准确及时地将所获取的情报报告给战略本部，以供战略决策之用。为此，戚继光从侦察情报人员的选拔到情报的报告和处理，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戚继光认为，若想准确及时地获得情报，第一步是要确立人员选拔标准，把优等士兵选拔出来作为“尖哨”。戚继光说：

选尖哨，必其惯习虏情，能夷言而熟识夷人者。^①

他认为招募和选拔的情报人员必须具备很强的综合素质，尤其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熟悉敌情，二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三是熟识敌方人员，即广交朋友，有“内线”。在他看来，只有具备了上述条件，能和敌人混迹在一起，才有机会在第一时间获得对手的战场情报和核心机密。

为保证上报情报的严肃性，戚继光非常强调情报的报告程序，要求一切情报均要由抚臣上报，然后由兵部形成决议。他说：

一切军情，悉由抚臣建白，而后折中于兵部，决议于庙谟……必俟论定而后从事。^②

① 《类辑练兵诸书》卷四。

② 《类辑练兵诸书》卷一。

所谓“抚臣”，就是“巡抚”，亦名“镇守”，初设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之用，后来渐发展为凌驾地方“三司”之上的一级衙门。^① 戚继光强调情报由巡抚出，有两重目的：一方面可以迫使巡抚切实担负起情报资料的甄别责任，保证了所上报情报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则是建立起了有效的问责制，一旦发生责任事故，好在日后有据可查。

戚继光非常看重情报的传递速度，他在《条陈尖哨事宜》开篇即写道：

尖哨深入虏营，无非欲得虏之消息。而时日久近，以虏情为迟速，务在预侦的当，驰报须先虏数日入口。后期以军法重究。

他还指出，不论我情或敌情，凡是动向情况，一定要及时迅速地完成传递，不得有丝毫迟滞，更不得因此惊慌失措或借此蛊惑人心：

士众有闻自家变动，闻贼情消息，来报主将，不拘昼夜，即时引报，不得时刻迟滞，亦不许高声大叫，以惑人心。违者，治以军法。^②

戚继光的主要交战对手是沿海侵犯、骚扰抢劫的倭寇。他们占有明显的海上优势，且具有高度机动灵活的作战特点，掳掠财货及人口是他们的基本战争目标，一旦战争目的达到，他们就会迅速撤

① 据《明史·职官志》：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遣尚书蹇义等26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初名巡抚，或名镇守……比如整饬、抚治、巡治、总理等项，皆因事特设。

② 详见《练兵实纪》，中华书局，2001年6月第1版，第136页。

出战斗，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上，无迹可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情报稍有迟滞，则会直接延误战机，再找不到作战对手，抗击倭寇更无从谈起，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格外看重情报传递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海上战场监视

除了“算定战”之外，戚继光的边防情报思想主要集中在疆防和海防两方面，而海防情报研究则是伴随战争样式的历史性变化而出现的新课题，也是戚继光的情报思想的亮点。

在《纪效新书·治水兵篇》中，戚继光提出了新颖的“海战相敌 20 法”：

小舟数往来者，谋议也。迟而审顾者，疑我也。欲进而复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进者，袭我也。鼓噪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顾者，欲复来也，先急而后缓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战者，惧我也。泊而扬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谋也。火夜明而呼噪者，恐我袭彼也。掷缆而即起者，欲择其利也。火数明而无声者，备器也。夜泊而趋于涯涘者，乡道欲往也。促缆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缆及流悬灯于途者，夜逸而溃也。久而不动者，偶人也。鼓而无韵者，伪向也。近岸连村而不登者，怯也。不久困请和投降者，诈也。

这是我国情报史上著名的“海战相敌 20 法”，是戚继光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海上敌情研判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侦察情报人员根据所观察的情况，对比戚继光的经验总结可迅速进行分析判断，进而为决策部门提供及时有效的情报资料。敌人在何种情况下是对我发动袭击，作战规模如何，在哪里

发动袭击，以及在何种情形下是准备撤退，在何种情形下是表现出求和迹象等等，戚继光都为侦察情报人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判断模式。

《孙子兵法》中有著名的“相敌 32 法”^①。这是孙子在进行陆地战场监视时为部队侦察人员搜集研判敌情所提供的 32 种典型征兆。孙子的这种归纳法对戚继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启迪。极具务实精神的戚继光从战争尤其是海上作战的实践需要出发，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多次实战经验的总结，提炼出了舟船近海作战的“海战相敌 20 法”。这 20 法，绝非是对孙子的简单继承和模拟，而是根据作战样式的历史性变化对战场监视作出的新的富有创新意义的发展：第一，这些相敌之法反映了倭寇海上战斗的行动规律，是我国古典情报理论中关于海防情报和海战情报的宝贵遗产；第二，这些相敌之法的背后，蕴涵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情报逻辑和辩证思维；第三，如同孙子一样，有关战场监视和战场情报的分析判断，同样是戚继光整体情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戚继光的“海战相敌 20 法”和孙子的陆战“相敌 32 法”，都是传统兵学中情报理论的历史遗产，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自古至今，海上流寇和海盗问题始终是一个影响海防和海上交通安全的客观存在。时至今日，海盗依然不时地严重影响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安全和我国的战略资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制止和打击海盗行径，有别于一般的战争行为，其情报保障工作也与传统战争状态下的情报工作有所区别，因此，这方面的情报工作，既同样需要有效及时的展开，又需要根据海上流寇的活动规律和特点，尤其是根据打击海盗的特点加强情报预警和情报保障的针对性，需要即时补充搜集手段和总结新鲜经验。戚继光的海上相敌之法，从侦察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看，是与时俱进的。或许，随

^① 详见《孙子·行军》。

着海盗行径的变化和军事科技的发展，他的具体的经验之谈在今天已经有过时之处，但是，他的与时俱进的情报思想却是值得深思和继承的。

四、海防情报思想

戚继光战略情报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来自海上的“海防情报”的重视。虽则中华民族很早就已活跃海上，但海权意识的真正觉醒则晚至明代，乃至晚至戚继光和郑若曾。这与有明一代中国人一直受到来自东部海域倭寇袭扰的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也与戚继光等思想开明、见识超人直接相关。

戚继光是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戚继光说：

躬案海上形势，缮亭邮，谨烽埃，稽尺籍，除戎器，具舟师，置间谍，严号令，广询谋。^①

通过这寥寥数语，我们可以看出，戚继光于“海防”不仅有思想，更有实践。在同倭寇的多次作战中，戚继光逐渐意识到，要想及早掌握敌人动向，必须高度重视海防情报，关注海上形势。戚继光在海岸多建有瞭望台，于近海则设立海军巡逻。这样，如果海上一旦有风吹草动，戚继光就能很快掌握，迅速反应并作出部署。可以说，对海防情报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收集，是戚家军能多次击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之一。

戚继光对海防情报的关注相比于前人，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开拓，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戚继光海防情报思想和战争实践直接启发了比他稍晚的著名海洋战略家郑若曾。郑若曾说：“哨贼

^① 《戚少保年谱书编》卷一。

于远洋，击贼于近洋。”^①把远海的侦察和近海的作战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郑若曾的识见，当得益于戚继光的海防情报观念。

五、防奸保密

反情报是戚继光情报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防奸保密工作，戚继光曾亲自制定《伏路条约》，号令三军共同遵守。所谓“条约”，相当于今天的“条令”。制定《伏路条约》意在增加各作战部队（卫所）伏路军官数量，并制定严格的陆路哨守、号令和军法，为三军共同遵守，以利于及时发现奸情并迅速处置情况。

《伏路条约》中规定：

如有警，不分昼夜，责其依照举号，走报贼情。务使表里兼制，内外咸备，令贼无懈可乘。自是以保消奸之念而保金汤之固。^②

戚继光意识到，如果想使己方的防线固若金汤，必须做到“内外咸备”，令贼无懈可击。并且，当发现敌情时，伏路军官必须火速报告，迅速处置，只有如此，方能打消奸细搞阴谋破坏的念头。

戚继光为严明纪律，称：“漏泄军事及夜号者，斩。”^③斩首令是非常严厉的酷刑。在戚继光眼里，泄漏军情，夜间无端暴露我方动静的，无论情节轻重，都应一律斩首，反映出戚继光对于防奸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视。

戚继光在率明军作战初期，曾屡遭不顺。他在意识到明军的腐

① 《筹海图编·御海洋》。

② 《类辑练兵诸书》卷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③ 详见《练兵实纪》，中华书局，2001年6月第1版，第136页。

朽和军心的涣散后，便自力更生，在义乌等地大量招募矿工和农民，充实到队伍中来，使军队的战斗力获得了极大提升。虽然带兵作战一直得益于募兵，但是戚继光对募兵队伍可能造成泄漏军机的危害仍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募兵皆出乌合，贼之间谍，参半其间。”^① 告诫军中上下在做好招募兵员工作的同时，要充分做好防奸保密工作，避免敌特分子乘机混进来。

六、情报人员赏罚制度

戚继光曾多次上书朝廷，在许多奏议条陈中呼吁在加强前线侦察力量的同时，加大对尖哨的奖惩力度。这不仅因为“赏罚明而人心思奋”，还因为做好赏罚工作可以对情报的上报质量和传递速度产生积极影响，所谓“传报真而分布适宜”，^② 对本方战略决策可以提供及时有效的情报保障。

明军一度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赏罚制度，情报人员工作好坏并无相应的奖惩，这种情况甚至酿成消极怠工乃至叛敌卖国现象的产生。针对情报战线的种种弊端，戚继光曾忧心忡忡地写道：

各役中间，有等拚命舍生，用计用财探得真情者，每每无复分别给予赏劝；有等望风捕影，虚得谎报，警劝内地，劳扰兵马，事后又无分别究治；更有等索虏之财，与虏同心，却将我消息透漏，而不复得虏情者，每每失于查究。^③

如果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泄漏军情、出卖己方情报都不能及时得到惩处，这对情报人员的忠诚效命、部队建设、战斗意志、乃

① 《类辑练兵诸书》卷一。

② 《类辑练兵诸书》卷三。

③ 《类辑练兵诸书》卷四。

至战争胜负，都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戚继光对于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一直努力寻求解决办法，所以他才会三番五次上书朝廷，呼吁加大对有功人员的奖励力度，并严肃惩治那些“望风捕影、虚得谎报”的情报人员。

戚继光的赏罚制度也多少受到孙子影响。孙子曾主张“赏莫厚于间”^①，认为对于情报人员要给予特别的重赏，除了泄密之外，对于情报人员可能发生的种种延误缓报军情以及其他违纪现象缺少相应的有力措施。而戚继光对孙子的不足可谓进行了非常必要的补充，不仅主张对出色完成任务的情报人员给予奖励，也提醒人们对于怠工和违纪现象给予及时的惩处，无疑较孙子更加全面。

七、结语

戚继光的军事情报思想受孙子影响很大，“算定战”、“海战相敌 20 法”等，都能立即在孙子的著作中找到影子。但他并未止步于孙子，沦为孙子的注释家，而是在孙子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了一大步。情报报告、情报研判及防奸保密等思想的提出，使戚继光的情报思想相比于孙子而言，更趋于完整。戚继光海防情报的提出尤其具有新意，也是据于时局的新发展，掀开了情报思想史新的一页，尤其值得关注。此外，把情报理论坐实于部队建设和军事管理之中，是戚继光的治军特色之一。如果说孙子的情报思想闪耀的是理论光辉的话，那么，戚继光的情报思想则毫无空谈之弊，而是化为具体切实的条令和规章，融于部队建设、军事管理、演兵训练和实战要求之中，具有密切联系实际，操作性强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戚继光作为一位具有相当科学精神的军事家，本应在日常生活和人事见解上也能一如既往地坚持唯物主义，

^① 《孙子·用间》。

然而，戚继光晚年在认识论上却一度产生倒退现象，未能摆脱历史上流行的阴阳术数的干扰，从而耽于神鬼之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止止堂集》曾这样评说晚年的戚继光：“（戚继光）杂说中乃多及阴鹭果报神怪之事，不免偏驳。”翻看戚继光的《止止堂集》，上述评论是符合实际的。解读和思考这位著名将领的思想历程，不免令人颇有一番感慨，一番叹息。



曾国藩的军事情报思想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曾在清廷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前半生毁誉之所由来。他由此成为晚清政坛重量级人物，但在外交上偏于软弱，这使得他至今充满争议，褒者谓之“中兴名臣”，贬者谓之“汉奸”、“卖国贼”。例如章太炎曾这样评价他：“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① 虽然身后褒贬不一，曾国藩出色的用兵韬略和对晚清政治社会所构成的巨大影响，多为世人公认。作为其用兵韬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的情报思想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一、论敌情——接仗前夕的必备工作

同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一样，曾国藩高度重视战前情报工作，把情报分析工作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曾国藩要求部下：“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② 可知在曾国藩看来，指挥官在战前召集部属共同讨论敌情，是战争开始之前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此即所谓讨论“战守”之法。

传统的战争都是地面战争，地形地貌，山川城池，对于攻守胜负的影响不言而喻。故而曾国藩的情报研判是“敌情”结合“地势”。曾国藩告诫部下说：“凡为统领者，以亲看地势、亲探贼情

①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0页。

② 《曾胡治兵语录·战守》。

为第一要义。”^① 并曾十分赞赏王鑫在即将作战之前召集部下研究敌情的做法：“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② 既了解“敌情”，又知晓“地势”，这和孙子所谓“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的大情报观颇有些渊源。由此可见，自孙子之后，彼、己、天、地一体化的大情报观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曾国藩注意到，相同的敌情和地势面前，不同的军事将领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为了便于集中统一认识，准确进行研判，统一思想认识，曾国藩于战前“令诸将各抒所见”，即“畅论敌情地势”。这一个“畅”字，可以见出曾国藩在分析敌情时能充分听取和尊重每一名部属的意见。当然，为了防止个别将领和谋士妄发议论和哗众取宠，曾国藩建立了相应的奖惩制度，“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于此可见他对各位将领部属的分析意见的态度。有了这种制度，部属在畅谈之余便不敢轻率发表意见，必定会深思熟虑，周密推敲，以便有效地借助敌情和地势制定作战方案。只有经过这样慎重而缜密的分析和决策，“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后专派追剿”等战守之法，才能大体安排妥当。

曾国藩“畅论敌情地势”的战前情报分析和决策思想，多少是受到了孙子的“庙算”的启发和影响。孙子的“庙算”主张，对古代情报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识见超人的将领，如戚继光、曾国藩等，则每每会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曾国藩的“庙算”，既要解决在统帅部一起讨论得胜的算筹多少，即“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③，又要研究解决“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后专派追剿”等具体的“战守之法”。^④ 对于孙子的“庙算”理论，曾国藩在军事实践中的发展在

① 《曾胡治兵语录·战守》。

② 王定安：《曾文正公水陆军练兵志·论近时名将》。

③ 《笔记二十七则·克勤小物》。

④ 《曾胡治兵语录·战守》。

于充分重视部属的不同意见，能“多问多思”。他曾经说过：“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① 并且，与此相应的是，曾国藩建立起一套奖惩制度，要求将领们切实担负起责任。

二、贵审力——知彼知己的切实功夫

曾国藩认为，战前情报分析既要全面细致，更要有所侧重，尤其要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作认真审视，这就是在充分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做好做足“审力”的功夫。

“审力”的主张是1862年（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书信中提出来的。^② 在书信中，他对同样善于领兵作战的弟弟这样告诫：

审机审势，犹在其后，第一先贵审力。审力者，知彼知己之切实工夫。古人云兵骄必败，老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不审力，则所谓骄也；审力而不自足，即老子之所谓衰也。^③

曾国藩将孙子的“知彼知己”解读为“审力”，并认为是一种“切实功夫”，很有创见。所谓“审力”，就是战争前夕在做好“知彼知己”的基础上，着重认真做好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曾国藩认为，这“审力”是“知彼知己”的切实功夫，要比“审机”、“审势”的功夫花得更足。在曾国藩看来，“审机审势”诚然也是进行军事决策的重要判断依据，但仍然不如“审力”来得重要。因为古往今来的战争表明，军事实力一直是战争获胜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故所谓“审力”，实际上也就是为战略决策提供“战

① 《曾胡治兵语录·战守》。

② 曾国藩凡数百封书信是研究曾国藩思想和晚清政治的重要资料。本文以下均简称《家书》。

③ 《家书》：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二十四日与沅弟书。

与不战”的判断依据。

毫无疑问，曾国藩的“审力”对情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情报人员一定不能满足或止步于一般的“断烂朝报”，而是要花足功夫做好诸如“战与不战”、“如何作战”等的战略调研工作，从而给己方战略决策提供依据、给予参考。如果“审力”功夫花得不够，就不“审力”一样，会给己方带来重要危害。

我们都知道，《孙子兵法》13篇是充满“谋略”和“诡道”的兵书。郑友贤说：“谋者见之为谋，巧者见之为巧。”^①这对中国古典兵学造成了重要影响。一般人眼中的古典兵学都是充满谋略的诡诈之学，这与孙子有着直接关系。而曾国藩一言道明“知彼知己的切实功夫”即是“审力”，将战前探明和分析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并作认真对比研究，作为决定战与不战的基础，这既是他个人的用兵心得，又可以说是一种真理性的识见。这种识见既是唯物的，简明确切的，也超越了前人。似乎可以认为，曾国藩把“知彼知己的切实功夫”解读为“审力”，或可谓是对孙子的发展，或可谓已与孙子分道扬镳。

三、不妄奏——察报军情存敬慎之怀

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向同治皇帝上奏折，议全国战事。奏折中这样写道：

臣处向不凭报入奏，不欲以谣传之辞，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则不轻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贼之来，其始常危险万状，能坚忍支持，而后能渐臻安稳。如去岁黄文金之内犯，攻陷七县，坚持三月，而臣仅汇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围，苦战九次，坚守弥月完善，而臣仅汇作两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

^① 见《诸子集成·孙子十家注·孙子叙录》，中华书局。

状，增朝廷之忧虑也。一则不轻奏预计之说。兵事成败，难以逆料。咸丰八、九年间，江南屡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间，屡奏嘉兴指日可克，厥后皆不能践言，臣初督两江之时，奏称由宁国进兵，可达苏境，厥后宁国失守，至今不能践言，臣深以为耻。至近日内臣章奏蒙抄示从臣处者，或称援浙之师，可由嘉兴直捣苏州；或称扬州之师，可由常熟进攻苏州。皆不量兵饷两穷之苦，而拟万不可成之计。臣不欲以预计之说入奏，非特大言之难践，亦恐乱朝廷之规画也。因此三者，每存敬慎之怀，转蹈迟延之咎。^①

曾国藩是晚清政府最后的倚仗。正是凭借着他的努力，满清统治才得以苟延残喘。曾国藩对清廷的忠心，于这份奏折一览无遗。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却是其中所体现的独特的情报思想。

这份奏折堪称中国军事情报史上的一份重要档案资料，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作为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从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上报军情所秉持的原则和所认定的要诀。概而言之，他所秉持的原则就是“不凭报入奏，不欲以谣传之辞，淆朝廷之耳目”。与此相应的两条要诀则是：不轻奏未定之事，不轻奏预计之说。所谓“不凭报入奏”，就是对于下级军官上报的军情和战局预测，不可转手直接呈达中央，而要审慎加以甄别、验证和分析。因为下级所报，其中有些可能是局部的战况，有些可能是谣传而非事实，有些可能是未必准确或难以实现的推测。此外，上文所说“黄文金内犯”，三月之内他“仅汇作四次入奏”；“徽州之被围，苦战九次”，而他“仅汇作两次入奏”，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上报中央军情所持的态度是宁少勿滥。曾国藩作为直接对朝廷负责的大臣，可谓深知出自己手送达朝廷的军情报告的利害关系十分重大。他的“不凭报入奏”的情报思想，包括他的军情报告宁少勿滥的思想，除

^① 《奏折》：遵旨统筹全局折。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去忧虑满族朝廷猜忌自己之外，确实是他的甘苦之谈。

这份奏折反映了曾国藩对重大军事情报分析整理所持的慎重态度。曾国藩认为，上报军情一定要“存敬慎之怀”。在奏折中，他举出自己亲身经历的正反例证各一个，对此予以论证。他先举出的是成功的例证：在与起义军首领黄文金的作战中，湘军开始处于非常危险被动的境地，但曾国藩“坚忍支持”，最终转危为安，很好地做到了不“以未定之状，增朝廷之忧虑”。这就是“不轻奏未定之事”。接下来，曾国藩再举出三次战局预测报告的重大失误，作为反面的教训。一是攻克金陵的预测失误；二是“指日可克”嘉兴的判断失误；三是自己在指挥作战过程中“深以为耻”的一次败笔：他曾在江浙一带指挥作战，当战事顺利之时，曾“屡奏嘉兴指日可克”，但之后“皆不能践言”，一直无法实现当初的作战预想。对于这三次战局预测的重大失误，曾国藩得出的教训是，“兵事成败，难以逆料”，故而在上报朝廷的情报预测文件时，一定要“存敬慎之怀”，不能轻奏“预计之说”，“乱朝廷之规画”。

曾国藩曾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这样提出告诫：“人人料必胜者，中即伏败机；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机。”^① 这进一步说明了战争中的“未定之状”。如果盲目自信，被战局进展的表象迷惑，或按照“预计之说”、“未定之事”上报军情，一定会延误军机甚至带来严重后果。曾国藩尤其反对仅凭“心所急揣”上报军情。在一则笔记中，他这样写道：“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急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② 这其实也是要求对所上报军情“存敬慎之怀”，不轻奏，不妄奏。

四、戒欺饰——力求严谨的情报整编

曾国藩对上报军情存“敬慎之怀”，不仅仅体现在情报资料的

① 《家书》：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十二日与沅弟书。

② 《笔记二十七则·克勤小物》。

取舍上，也体现在对情报整编的严格要求方面。在一封给曾国荃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稟覆各情，是前次风闻之事，非尽无因。该营务处营官等所稟，尚无欺饰，便是好处。凡人不患有过，但患文过。不贵无过，但贵改过。”^① 曾国藩指出，营官在上报军情时，没有欺饰行为，没有文过饰非，就是好处，因为“凡人不患有过，但患文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与曾国藩对晚清军队颓败和不振状况的洞悉不无关系。在当时，各营官或情报官上报军情时，为了邀功自赏或者达到其他目的，往往会有欺饰行为。这种欺饰行为和隐情不报一样，都会给统帅部的指挥带来致命影响。清军一度被太平军如落叶般横扫，除了自身战斗力下降的因素之外，也与此直接相连。面对这样的现状，曾国藩感叹“营官等所稟，尚无欺饰，便是好处”，多少见出几分无奈。

今天看来，出色的情报整编应该是这样的：它是在获取大量情报资料的基础之上，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进而能为己方的指挥作战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决策依据，能对己方的战略决策提供直接帮助。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那就必须起码做到如实稟报军情，不文过，不欺饰，不谎报，不无中生有。显然，面对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军队，曾国藩纵是天生英才，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所以只好很现实地感叹“所稟尚无欺饰，便是好处”了。

在另一封给曾国荃的书信中，曾国藩对爱弟提出的要求显得近乎苛刻。曾国藩告诫弟弟：一字一言“攸关生死荣辱”，一定要对上报的奏折做细致推敲，力求严谨。曾氏兄弟俱是晚清风云人物。曾国藩对于曾国荃而言，是兄长，似严父，更是官大一级的上级领导。他们之间有很多书信来往。除了家长里短、兄弟情谊和学术交流之外，有很多书信是互通军情、处置战事。在书信中，曾国藩这样劝勉弟弟：“奏折一事，弟须用一番工夫……每折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为说

^① 《家书》：不患有过，但患文过。

服弟弟，曾国藩接着写道：“权位所在，一言之是非，即他人之荣辱予夺系之焉。弟性爽快，不宜发之太骤。”^①

曾国藩熟知弟弟的性情，所以告诫他在处置军机、上报军情前要慎之又慎，不能“发之太骤”，而必须要在每字每句上仔细推敲，用番功夫。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是行军作战所必须具备的，对情报人员来说，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也是今天从事情报整编工作所必须要树立的工作作风。

五、防奸细——情报传递务求保密

曾国藩所组建领导的湘军，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今天看来，这支军队可说是一个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武装集团。曾国藩学习管仲“什伍之法”和王安石的“保甲连坐之法”，并将其成功地运用到部队构建中，“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如此治军如治家，上下团结如一人，战斗力得到极大提升。这样的编成，还可带来另外一个直接的利好：由于各队成员之间非常熟悉，偶有陌生面孔出现，便可以立即识别出来，敌方的奸细再难以安插进来，可以很好地保证部队行动的安全保密。

曾国藩非常重视战争期间的防奸保密工作。在给弟弟的书信中，曾国藩一再嘱咐他“扎营不宜离城太近”，“宜了解地势，处处严防”。他告诫弟弟：“地太逼，则贼匪偷营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于查察。”^② 在另外一封书信中，曾国藩与他们严格约束情报传递的渠道和方式：“弟以后要事，项专勇送来，三日可到，或逢三八专人来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紧者，仍由驿发来，则兄弟之消息常通矣。”^③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和部属的情报传递

① 《家书》：七月初一日与沅弟书。

② 《家书》：扎营不宜离城太近。

③ 《家书》：致沅弟季弟，嘱文辅卿二语。

是按密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密级高的情报会以另外一种隐秘方式传递，禁止混同于一般情报。在古代社会，保证情报安全秘密地畅通传递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曾国藩的这种努力，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今天仍不乏启示意义。

六、取于数——封建将领的难除习气

早在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子就明确反对过情报工作中的封建迷信活动。《孙子·用间》中即明确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与孙子差距很远，明显表现出“今不如古”。在一次给弟弟的书信中，曾国藩这样感叹：“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①与孙子“必取于人”相比，曾国藩在这里明显表现出对于“天意”的屈服。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提示属下：“惟风水之说，余平日不信，于鄂抚一署却为惴惴，将来仍以改驻襄阳等处为是。”^②曾国藩明说不信风水，于“鄂抚一署却为惴惴”，一不小心透露出真实心迹。其于行军作战，此时已无法以军情实际为依据，而是以过往战事为参考，以是否合于风水作为出发点，这正是孙子所批判的“取于鬼神”、“象于事”和“验于度”，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出批判的糟粕。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传统的继承是泥沙俱下，精华和糟粕集于一身。这是我们研究曾国藩的军事情报思想时要注意区别的地方。

① 《家书》：致九弟·只问积劳不问成名。

② 《家书》：论擒匪战术。



《间书》述评

一、改革开放之后《间书》的影响及其地位

1942年，日伪时期的《中和杂志》刊载了一部“杂采古今史事”而又专述中国历代侦察情报和间谍活动的兵书^①，这就是清人朱逢甲编著的《间书》。从此，这部著作渐为世人所知。但是，建国以后，该书知之者甚少。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由《解放军报》“学军事”专栏刊登简短的文字予以介绍，到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的专家在《军事学术》上誉之为“兵家的珍贵读物”^②，《间书》方才日益为我国军事情报学术界所推崇。今天，《间书》中的某些重要结论已为我军一般情报研究工作者所公认，《间书》作者的某些考据成果，也被涉及到有关问题的论述普遍采纳。至于《间书》中收录的大量古代侦察情报和间谍活动的史料，更被研究历代兵家权谋或间谍史的专门之作所参考。《间书》作为一部采集排比中国古代情报间谍活动的兵书，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探讨。尽管它的范围大体以军事领域为限，议论的也只限于与战争有关的侦察情报工作及其方法，但是今天它的研究者以及有兴趣的读者已经从军事学术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部门。

《间书》渐为人知之后，人们自然联想到《孙子·用间》。中国数千年的阶级斗争史，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是一部战争史。有战争，就必然产生军事情报工作，并从而在理论和史实两个方面引

① 《间书·朱启铃序》。

② 参见高凤楼：《试论孙子的知识结构》，载《军事学术》，1981年第9期。

出总结性的著述。《孙子·用间》是我国古代军事著作中关于军事情报工作的首次理论总结，是一篇“战争与情报”的开山之作，而《间书》则是中国数千年军事情报活动的实践总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专述战争与情报间谍活动的殿后之作。二者遥相呼应：《孙子·用间》篇发凡起例，重于理论的创新和分析归纳，闪耀着古代军事哲人对于“用兵之诡道”进行理性思维的智慧而冷峻的光芒；《间书》总结历史实践，重于经验的条分缕析，表现了军事史家宏观统照的气魄和“古为今用”的精神。如果说，《孙子·用间》是一块巨大的中国特有的军事情报理论的奠基石，那么，《间书》则是从历代无数次战争实践中选出典型的各类侦察情报和间谍活动的积木并在这块巨大的理论基石上构建而成的殿堂。

二、《间书》的发现及整理经过

20世纪40年代初，曾任北洋军阀内务总长的朱启铃曾致力于清代贵州等地区历史文献的搜集工作，为了搜寻“赠太常寺卿贵州候补道”于钟岳的家史资料，无意中在一卷《间书》手稿本。于钟岳，字伯英，汉军镶红旗人，系清代襄勤公于成龙的后裔。道光、咸丰年间，于钟岳随父亲于崇璟任职贵州，自咸丰四年（1854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于氏父子先后转战贵州、普安、遵义、贵定、龙里等地，镇压苗族人民起义及各地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而效忠清廷的于氏一家也终于先后死于起义军之手。其后，于钟岳家藏书籍故纸落入书坊老板之手。1942年，朱启铃从书肆捆载的于家史科及有关贵州的历史资料中，偶然发现了这部一卷本的兵书——《间书》。

朱启铃是贵州人，为了保存这部与贵州省史料有关的文献，1942年冬，将《间书》发表于日伪时期的《中和杂志》。至此，世人才渐知这部专论情报间谍活动的兵书。解放后，群众出版社据

《中和杂志》所载，编发了排印本。1979年，黄肃秋、黄岳二人又依群众出版社的排印本作了校注和翻译，并出版发行，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见的《间书》。

从文献的角度看，《间书》的版本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间书》成书之后并无刻本流行。无论是朱逢甲自己，还是他的好友于钟岳，均没有将手稿付诸梨枣。其次，朱逢甲自撰的手稿，今天尚未发现。朱启钤所见的本子，只是于钟岳的移录本。朱启钤在述及发现《间书》的情况时写道：“此书册面题有‘莲生撰赠伯英宝之’八字，知为钟岳手迹。”“今伯英遗书中手录经史，袞然成帙，蝇头细书，与此册相类，盖即其手自移录之本。”^①再次，今天通行的《间书》版本，虽经黄肃秋、黄岳二人校注，但与朱逢甲原作比较，文字想必有较大出入。其根据有二：一是当年朱启钤所见《间书》很可能有残破。朱启钤将《间书》发表于《中和杂志》时即明确写道：“近岁余搜求黔南文献，书肆乃捆载其家藏故纸，并残蚀不堪触手者，悉归之余。”^②于此可以想见《间书》于钟岳手录本的损坏情况。二是黄氏二人在《间书》校后记中称：“我们所据以整理的底本，是群众出版社据《中和杂志》转载的排印本，当时未能据该杂志的载文校注，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又说：“在整理时发现错字、年代不相符合处较多，工作无法进行，于是就据引文原书作了初步校核，并作了校记。”^③

由此可见，今天通行的《间书》由于辗转为据，与朱逢甲当时所著的原貌，讹错必定甚多。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不可逃脱的厄运。好在全貌尚存，借今之《间书》，尚无妨我们对《间书》从军事情报学术方面进行研究。至于文字校勘和寻找于钟岳抄录本乃至朱逢甲手稿方面的工作，可暂存而不论。

① 《间书·朱启钤序》。

② 《间书·朱启钤序》。

③ 《间书》，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

三、《间书》产生的背景和编撰目的

首先，有必要先介绍一点《间书》作者朱逢甲的情况。

朱逢甲，字莲生，华亭（今属上海）人，生卒年月尚不可考。从朱启铃的考索中可以看出，朱逢甲颇有才学，很受同时代人的赏识。他在书画方面精于白描并工铁笔，经学方面“群经能折圣贤衷”，被人目为奇才。^① 他的著述，除《间书》之外，还有《平黔策》二卷（今未见）。咸丰四年，曾在贵州兴义参与《兴义府志》的撰修工作。大约在青壮年时期，朱逢甲远赴贵州，在贵州学政鲍源深门下为客。这一时期的经历与他编撰《间书》有密切的关系。

1854年，正当《兴义府志》完成之际，贵州大规模苗民起义爆发。朱逢甲参与了清朝政府军对苗民起义的军事镇压，他在率兵与起义军作战过程中，曾活捉起义军军师刘九纶。然而，他的“战功”并未受到被各地起义军打得焦头烂额的清廷赏识。“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② 朱逢甲本想回江苏家乡，但因为当时太平军已经占领南京一带，归途受阻，只得闲居贵州。这段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杞忧徒抱，为撰《间书》一卷”^③，时在咸丰五年（1855年）冬。

产生于咸丰年间的《间书》与清代乾嘉时代的许多著述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它是企图直接为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服务的。如果说清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为逃避现实，为逃避严酷的政治高压而埋头书斋，走向纯学术的领域，那么，《间书》与那一时代许多津津于考据的著作根本不同的一点，就在于它是企图直接用于颠覆农民

① 《间书·朱启铃序》。

② 《间书·自序》。

③ 《间书·自序》。

起义的，是为挽救被农民起义队伍打得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清朝政府军而开出的一剂于事无补的药方。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来，地主阶级拼命盘剥农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整个统治阶级奢侈腐化成风，官吏贪污，政府横征暴敛。湖南贵州等地苗民“往往收获毕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①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导致了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1796年，白莲教起义，地跨五省，历时九年。而湖南贵州地区的苗民起义则自1795年起历时12年之久。1813年，北方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1826年，新疆地区中则有维吾尔人起义。及至鸦片战争之后，阶级矛盾更迅速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终于在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太平天国初期几年胜利发展的同时，各地人民起义如火如荼，迅猛发展。其中贵州地区苗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奴隶式的残酷统治，不堪忍受土司、通事，以及苗汉地主和高利贷的压榨，反抗暴动也接连不断发生。1855年，苗族雇农张秀眉举行起义，成为贵州苗民起义的杰出首领，苗民群起响应，参加者达数万人。起义军同时又受到白莲教起义军的响应和配合，不断击败毫无战斗力的清朝军队。直至1872年，这支起义军才被镇压下去。

朱逢甲撰写《间书》，恰好是在贵州苗民大规模起义的1855年。这段时间贵州地区的形势，用朱逢甲自己的话说，一方面是“黔苗变起，土寇应之，寇多如毛，号称数万”^②，起义军初起，声势极为浩大。另一方面是“城屡陷，官屡徇，饷则匱矣，兵则悞矣，练则不教之民矣”。^③腐败的清朝政府已不堪一击。

应该说朱逢甲还是很有眼力的，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苗民起义节节胜利和官兵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但是，他毕竟抓住了

① 宣统《永绥厅志》卷三十引《陈宏谋奏疏》。

② 《间书·自序》。

③ 《间书·自序》。

清军在军事作战方面失利的三个重要原因。其一是清朝政府财政日益枯竭，已经无法支付战争的需要：“夫贼众以数万计，调兵练万，势犹不敌。然万人之费，人日予银四分，月费已万有二千，而赏、恤、器械之费，犹不与焉。计须倍之。方今饷匱，其何以支？”^① 一笔账，算出了朝廷捉襟见肘之窘状。其二是官军惧战，与起义军一触即逃，毫无战斗力：“夫黔省军政之弊，按籍有兵，调战无兵，及其檄调也，募乌合之人，被之兵衣，予之兵械，曰：是即兵也。然则此其胜兵乎？无怪其遇贼而恒且走也。”^② 此论活画出政府军腐朽无能的实情。其三是清朝政府花钱招募的乡勇团练从未受过作战训练，驱之镇压苗民起义，如同以卵击石：“今之所谓练，实皆不教之民。以战，是弃也。今练则穷民，兵燹艰食乃应募，日得银四分可糊口……民虽愚，其可为四分银死邪？”^③ 朱逢甲明白，穷苦百姓是不会为官府卖命的。

朱逢甲一方面指出了清朝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的三大弊病，另一方面，作为效忠朝廷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又企图寻求一个不诉诸武力而能扑灭农民起义的办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求助于间谍手段。他在《间书·自序》中写道：“当斯时而欲建一策，使饷不糜、兵不败、练不伤，安坐而擒逆首以勘平，有是策乎？曰：有，莫如用间。”在朱逢甲看来，只要间谍手段运用得法，打入起义军上层领导，擒贼先擒王，既可以减省军费开支，又可以避免惧战的官兵和不善战的练勇与起义军直接交锋，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在《间书》中，朱逢甲多次以古代间谍活动为鉴，“古为今用”地谈到破坏“苗匪”与“土寇”的具体方法。这些，就是作者撰写《间书》的根本目的，也是他为清朝统治者开出的自以为可以“勘平”起义的药方。

① 《间书·自序》。

② 《间书·自序》。

③ 《间书·自序》。

四、《间书》在情报学术上的价值

虽然《间书》的编著目的在于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但书中涉及了古代侦察情报实践和间谍活动的大量实例，探索了千变万化的兵家权谋和用间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情报史，探讨军事情报学理论，仍有一定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1. 赋予“用间”以特定的含义

“用间”一词是古代情报斗争的专门术语，语出《孙子·用间》，含义是“使用间谍”。曹操注《孙子·用间》说：“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也。”历代兵书称“用间”，也都是在“使用间谍”这一意义上运用的。

《间书》并没有对“用间”作专门的概念解释，除了考订历代典籍中“间”的名称沿革之外，作者并没有用自己的话对“用间”下定义。但是通观全书，可以看出，“用间”在《间书》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除了通行的使用间谍这一基本意思之外，还兼有其他方面的含义。

首先，《间书》把侦察敌情的活动也称之为“用间”。试看下列：

《礼·檀弓》云：晋人之觐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悦。殆未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觐国乎！”

强大的晋国为了攻伐弱小的宋国，先派侦察人员往宋了解情况。侦察员回来说，宋国城门的一名普通的卫士死了，身为国卿的子罕前去哭泣致哀，宋国的老百姓为此大受感动。如果攻打宋国，宋国必然上下同心同德。孔子听说后，高度称赞这位侦察敌情的人，认为他很善于侦察并从中得出正确的判断。显然，晋国的这一

行动，是一种侦察和分析判断情报从而得出结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般的间谍活动。

其次，《间书》把军事外交活动也称之为“用间”。试看下列：

《战国策》云：智伯、韩、魏三国之兵乘赵之晋阳城。赵王之臣张孟谈阴见韩、魏之君，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则二君为之次矣。”二君曰：“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谋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与张孟谈阴约三军为之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擒智伯。

面对三国之兵压境，赵臣张孟谈秘密会见韩魏二君，分析赵亡之后的利害关系，分化瓦解了三国联军，并使韩、魏倒戈伐智伯，从而避免了赵国的灭亡。这里，张孟谈的身份是公开的，作为赵臣，他也不回避赵国的利益，而“阴见韩、魏之君”则是一次典型的军事外交方面的秘密会谈，张孟谈显然也不是间谍。

再次，《间书》把军事斗争中的谋略运用也归之为“用间”。试看下列：

《隋书》云：贺若弼谋攻京口，多买阵船匿之，买敝船五六十艘置于渚中。陈人觐之，以为无船。又令缘江防人交代之际，必集广陵，大列旗帜，营帜被野。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既而知之，不复戒严。及后济江，陈人遂不知觉。

贺若弼一方面以破船作为假象欺骗敌人，另一方面又利用部队换防之际虚张声势，使敌军逐渐麻痹，从而为后来的大举过江创造条件。这里丝毫没有间谍活动，而只是一种战争中的谋略运用。

由上各例可见，《间书》所谓的用间，并非单一的间谍活动，而是兼包了侦察敌情、分析判断、军事外交、谋略运用等多种手

段。朱逢甲在《自序》中说：“夫主战，斗力也；用间，斗智也。”朱逢甲的眼光颇不狭窄，他把不用兵力、不借刀枪的斗智行为都纳入用间的范围，从而扩大了传统意义上的用间领域。

2. 以儒驳儒，强调了用间的重要

侦察情报工作是军事斗争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两军交战必须侦察先行，探明敌情，做好情报保障工作。谋略的运用，谍报与反谍报的斗争，自然也贯穿其中。但是，在一些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用间被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一种不正大光明的手段。如果有谁认为儒家所推崇的圣贤也曾经从事过间谍活动，那就是对圣人的污蔑。例如，《六韬》因为历代相传为周代太公望所著，便曾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清代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太公为王者佐，不宜有此权谋术数之言。”焦竑则在《焦氏笔乘》卷六中认为：“《六韬》中其言多诬圣贤之甚……而谓太公为之乎？”又如《孙子·用间》，因为有伊挚、吕牙为间的说法，就遭到后世儒家学者的竭力诋毁。宋朝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伊、吕圣人之耦，此战国辩士之诬圣贤。”至于其他像《鬼谷子》讲阴谋权术、揣摩捭阖的著述，更是一一直被人们目之为“小人之书”。^①

对此，朱逢甲针锋相对作了反驳。他写道：“殷之伊尹，圣之任者，拯民水火，即身为间，何伤？伯厚（按，王应麟之字）拘儒，识隘未化。孙子之言，当自有据，未可臆驳。”在经历了战火的朱逢甲看来，那些为了捍卫“圣贤”的形象而否定“用间”的儒者都是顽固不化的迂腐之徒。

为了强调“用间”，《间书》采取了以儒驳儒的手法，历述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及其经典著作的有关事迹和言论。

“圣门高弟如子贡，尝用间以成功矣……子贡用间事见

^① 卢文弨：《鬼谷子·跋》。

《家语》。”（按，即《孔子家语》）

“《太公六韬》亦重用间……云：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周公撰《周礼》，所言之‘邦沟’。即间也。”

除此之外，又引上文提到的孔子盛赞晋国侦察活动的故事，证明圣人不废用间。

除了以儒驳儒之外，朱逢甲更进一步援引古代兵书的有关论述和大量的用间史实，论说了用间的重要。他写道：“古兵书若《孙子》、《吴子》皆重用间。必用间，乃能先知敌情；必用间，乃能离散敌众也。”“古名将若李牧、信陵、韩信、李光弼之伦，亦皆重用间。”“古名将之遇名将也，用间者胜。若秦白起之与赵廉颇遇，皆名将也，秦用间，则秦胜矣。秦王翦之与李牧遇，亦皆名将也，秦又用间，则秦又胜矣。”这些历史教训，今天读来，依然可以引起军事家的深思。

《间书》非常强调军事斗争中的侦察情报工作。“用兵贵知彼知己。而欲知彼，则必用间乃能知。且知，贵知之于事先。敌将至得为备，敌非至得毋恐。”“进退之当，全在使间一视。今之军行进止，可不间视哉？”“欲知虚实，在先用间。”这些论述，无疑都是正确的。

但是，朱逢甲也有强调过了头的地方。他在《自序》中认为，当财政不足以支付战争的需要，军队惧战，士兵没有战斗力的时候，“用间可以擒贼王”，从而“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看法，应该指出是不现实的。

3. 溯源辨流，考订间名的历史沿革

军事侦察情报工作在我国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历史。有关侦察和间谍的名称说法很多，散布在古代的文献典籍之中。对此，《间书》作了一番溯源辨流、搜集考证工作。

首先，朱逢甲考证了我国古代用间之始。据《左传·哀公元

年》记载，夏代少康时期，曾派臣子女艾到过国从事侦察间谍活动，又派少康的儿子到戈国诱杀其国君，从而消灭了过、戈二国，恢复了夏代的统治。夏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少康为夏代的第六代帝王，距今大约有将近四千年的历史。据此，《间书》开篇就指出：“用间始于夏之少康，使女艾间浇。”

其次，朱逢甲考订了侦察、间谍术语在中国历史上的沿革和变化。例如，《六韬》中的有一种参谋叫“游士”，实际就是间谍。《周礼》中设置的一种官员叫“邦沟”，其任务是“斟酌盗取密事”。此外，他还从《尔雅》和史书中搜罗出“细作”、“游侦”等名词。朱逢甲的这些考证绝不是无意义之举。第一，从中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上侦察情报工作由来已久，情报史在整个军事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侦察情报活动既是伴随历代战争史的客观存在，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第二，他追溯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古代用间活动以及名称沿革，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军事情报史提供了有一定价值的资料，其研究工作具有开创性。第三，他的这些结论，已经被现代的有关情报间谍史的论述所采纳，得到公认。

4. 有述有作，强调巧于用间

自《孙子》问世之后，中国历代兵书大抵沿着“祖述孙子”的道路前进，《间书》也不例外。朱逢甲在引用史料，概略地评述历代侦察情报和间谍活动的实践时，其理论基础和结构框架基本上依据《孙子·用间》的有关论述。首先，《间书》节录了孙子有关用间的重要性的论述，强调军事斗争必须用间。其次，《间书》对大量史实资料的分类，所遵循的依然是孙子的“五间”说，即把各种谍报活动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类，并认为《李卫公兵法》所说的五间，与孙子所说相表里。“邑人”即乡间，“仕子”即内间，“敌使”即反间，“贤能”即生间，“罪戾”即死间。再次，又以具体事例进一步论证了情报工作中的“保密”和“厚赏”两条重要的政策。

《间书》祖述《孙子·用间》与历代兵书祖述《孙子》，其原

因有共同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从客观方面看，“祖述孙子”是战争实践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基本处于冷兵器时代所决定的。从理论自身的演绎发展看，中国古代兵学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孔子本人是“述而不作”的，而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又占据统治地位，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思想界包括军事理论界一直保持这一祖述前人的传统。这些都是共同的原因。从特殊的一面看，间谍手段以及秘密工作是军事领域中保留古老的传统方式最多的一个领域，即便是在科技已经十分发达，侦察情报工作已经广泛使用高技术的今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设备也并没有能够完全取代古老的用间手段和早期侦察、间谍活动方式。正因为如此，《间书》与《孙子》这两本著作虽然在时间上相距两千五百年之遥，但并不妨碍朱逢甲在孙子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上选编自己的历代情报史话这一著作。

然而，朱逢甲毕竟没有停在《孙子·用间》或《李卫公兵法》的基础上原地踏步，他是有述有作的，他有自己的发展。他的发展，不仅在于以儒驳儒，捍卫了《孙子》的用间思想，也不仅在于考订源流方面所做出的成就，甚至也不在于拓宽了用间的内涵及其范围。他的发展，在于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巧于用间。朱逢甲特别注重巧于用间，他的书中，并没有多少书卷气，他并不津津乐道于情报理论的分析 and 探讨。他强调的是实践，讲究的是“经世致用”，赢得战事，欣赏的是用间方法的灵活性，推崇的是各种用间方法的“神明变化而用之”，反对的是读古人兵书而“刻舟求剑”。他在《自序》中写道：“良医不执古方，断无不悟古方之妙。国手不拘弈谱之奇，而实能参弈谱之奇。儒将不泥兵书，为能深解兵书之奥。”他提倡创造性的运用各种间法，即便是《李卫公兵法》中论述的一些重金收买、拉拢利诱、曲情尊奉、观言察色、暗中潜听等手段，也认为“非用间之深”者。作为一部情报史话式的兵书，朱逢甲没有把笔墨花费在情报史的历史分期、阶段特点或者历代的情报组织机构等上面，也没有通史式的叙述历代重大的侦察情报事

件（这不是《间书》的任务），而是以巧于用间为标准，把全书的大部分篇幅用在列举各种“千变万化、微乎其微”的情报案例方面。总之，《间书》的灵魂是巧于用间。这是《间书》对前人用间思想的发展，也是对后人的最大启发。

5. 广征博引，备集用间之秘策

为了具体说明巧于用间，朱逢甲爬梳史料，广征博引，详列用间之秘策，力图实现自己写作这部独特兵书的目的：“用间之法，略备于斯。”^①

首先，朱逢甲援引《孙子·用间》及后人的注释，对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分条作了说明，并认为孙子的“五间”说最为精微详尽。然后，又列举了《李卫公兵法》提出的用间之道。一是因邑人，即派遣在敌方有同乡的谍员深入敌方了解情况；二是因仕子，即利用对方的官僚弟子，故意泄露假情报给他，让他传给敌人；三是因敌使，即向敌方的使节暴露假情况，让他带回去；四是择贤能，即选择可靠而有能耐的人前往敌方了解情况；五是缓罪戾，即故意释放犯人，向他泄露我方的虚假意图，让他逃往敌方报告敌人。《间书》认为这五种用间的方法与孙子的五间互为表里，因邑人即乡间，因仕子即内间，因敌使即反间，择贤能即生间，缓罪庆即死间。这种看法大体是正确的。

此外，《间书》还举例说明了《李卫公兵法》提出的间君、间亲、间能、间助、间邻、间左右、间纵横等用间方法，从而集中了《孙子》和《李卫公兵法》论述的种种用间之道。《孙子》的五间是从派出执行侦察和谍报任务的人来分类的，这些人都是侦察员或谍员，而《李卫公兵法》中的间君、间亲、间能等等则是从情报间谍人员所策反的敌国敌军的对象来分类的。这就更全面地说明了用间的方法。对这些方法，《间书》主张“神明变化而用之”。

然而，《间书》对用间方法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停在汇集前人的

^① 《间书·自序》。

分类上，而是有自己进一步的发现和体会。《间书》搜集了大量的侦察情报斗争和用间案例，但是它并不像《册府元龟》等书那样，只是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以孙子的五间为纲，精选富有新意、具有独创性的案例分别排列在各种用间方法之下。这些案例，形形色色，生动活泼，新颖独到，而且富于谋略及创造性。

《间书》搜集了大量的用间案例。这些案例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为后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情报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而且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例如作者引用了《韩非子》中的郑武公诛杀大臣关其思而伐胡成功的案例来说明死间之法，就是一个在情报学理论上值得研究的课题。^① 关其思是郑武公的忠实大臣，他在对谁用兵的战略方针上和郑武公是完全一致的，在郑武公召集群臣讨论攻打哪个国家的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可以攻打胡国。然而，郑武公为了麻痹胡国，不惜采取处死关其思的做法，以做出坚决反对攻伐“兄弟邻邦”的姿态，从而达成了突袭灭胡的企图。对于这个以诛杀大臣使之为死间的做法，朱逢甲认为，方法虽巧，但关其思何罪？君子不应这么做。这就提出了一个在谋略学方面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而且，在国际斗争错综复杂的今天，郑武公杀关其思以伐胡的案例，对于我们警惕未来战争中敌人的阴谋伎俩，也依然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① 参见《韩非子·说难》。



日本对《孙子·用间》的研究和运用

《孙子》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学界有不同认识，主要分两种观点：其一是“唐朝初期说”；^① 其二是“5~6世纪说”。^② 这本兵书传入日本后，一度经历了很长的家传秘藏时期，直到江户时代（1604年~1868年）才出现研究高峰期。不到300年的时间，日本共刊印相关研究著述140余种。其中若干重要著作均表现出对《用间》篇的强烈兴趣，并进而引领趋势，注重运用。日本军事学术尤其重视用间，与他们这种对《孙子》的情报思想尤其是谍报理论的独特研究视角不无关系。



日本最早重视《用间》篇的《孙子》研究学者该数江户初期

-
- ① 日本著名兵学史专家佐藤坚司认为《孙子》很可能是在唐朝初期传入日本，或许是公元663年左右经由朝鲜（当时称百济）传入日本，更大可能则是由吉备真备（693年~775年）在留学中国期间带回日本。详见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2页。是书为佐藤坚司《孙子思想史的研究》第三篇《日本历代对孙子思想的研究》的中译本，高殿芳等编译，郭化若题写书名。他的这一观点得到我国学者于汝波等人的支持。参见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13页。
- ② 美国的《孙子》研究专家缪尔·B·格里菲斯认为，《孙子》传入日本要远比吉备真备时代为早，甚至要早出几个世纪。这个观点得到长期关注日本《孙子》研究的另一位中国学者苏桂亮的赞同。参见苏桂亮：《孙子兵法在日本的研究》，载《滨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的林罗山。其著作为《孙子抄》，1651年面世。此书立说多本我国明代学者赵本学，但也能偶尔道出己意。比如他在论述《用间》篇时，认为孙子将该篇放置全书末尾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这似乎直接启发了其后的山鹿素行等人。应该说，日本《孙子》研究重视《用间》篇，林罗山实肇其始。

江户时代另一位《孙子》研究专家北条氏长同样对《用间》篇非常重视。其著作《孙子外传》，1846年面世，凡6900字。北条氏长因感叹古今注释《孙子》的学者“其趣大同小异”，因而另辟蹊径，申述己说，以表明自己对于《孙子》的不同见解。不过，该书之所以能另辟蹊径，其实也是出于对《用间》篇的格外重视。该书引用《孙子》字句最多的就是《用间》篇。北条氏长由《用间》篇出发，进而形成他自己的“知外论”，实则乃着意阐发《孙子》的用间思想。为此，他受到日本著名孙子史研究专家佐藤坚司的好评。佐藤认为，日本《孙子》研究自北条氏长以来，“才算是真正步入正轨”。^①

当然，对《用间》篇阐发最力的当数山鹿素行。其著述为《孙子谚义》，1673年面世，后来又分别于1912年和1939年再版。山鹿素行指出《孙子》13篇贯穿始终的是“知彼知己”的情报思想。^②他认为，《孙子》从首篇《计》开始就大谈“知彼知己”，最终又以《用间》篇收束全书，可知用间思想当是贯穿13篇的一根红线。他的这一观点立论新颖，得到不少日本学者的追随，乃至很多中国学者的认同。

当然，山鹿素行进一步认为《孙子》13篇都是在讲用间，这就很值得商榷了。据佐藤坚司介绍，山鹿素行对13篇曾经做出如下分析：《始计》讲的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作战》、《谋

① 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22页。

② 苏桂亮，阿竹仙之助：《日本孙子书知见录》，齐鲁书社，2009年第1月版，第14页。

攻》讲的也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军形》、《兵势》、《虚实》讲的是知己，《军争》、《九变》、《行军》讲的是知彼，《九地》、《地形》讲的是知地，《火攻》讲的是知天，《用间》再次回到知己、知彼、知天、知地。^① 这种意见，虽然有不无道理的一面，却是借《孙子》之瓶装自己的酒，而把《孙子》具体论述用兵作战的内容清空了。《孙子》固然重视用间和情报战，但13篇兵法本是一部战争之法，是集中论述如何用兵作战，而不是自始至终讨论“用间”和“知彼知己”的情报战。可以说，山鹿素行的这种分析方法既发现了《孙子》13篇的某种内在联系，但同时也是对《孙子》的误读。

尽管如此，佐藤坚司对山鹿素行的这种分析还是称许有加，赞扬他“把握住了《孙子》的真谛”，乃至把他说成是“日本的孙子”。^② 这倒是从侧面反映出佐藤坚司自己对《孙子》用间思想的重视，并由此进一步扩大了《用间》篇在日本的影响力。

从佐藤坚司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江户时代后期《孙子》研究专家松宫观山和德田邕兴等人对于《孙子》用间思想的重视和研究力度。松宫观山在“治内论”（知己）和“知外论”（知彼）的基础上，强调《孙子》的“应变论”。毫无疑问，这已将《孙子》用间思想提高到战略层面。而德田邕兴则几乎完全沿袭山鹿素行的观点，指出：“十三篇以用间而终，结其要，意在用兵之时，察敌情为第一要务，是始计也。”德田邕兴进一步认为，《孙子》是以《始计》、《用间》首尾一贯，其余11篇都是由此二篇所衍生。^③ 这种解读当是受到山鹿素行的启发，但同样也是可算

① 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31页。

② 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31页。

③ 德田邕兴：《孙子事活钞》，1776年面世，1936年再版。转引自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07页。

作是对《孙子》13篇的误读。《孙子》其余11篇都是衍生物之立论尤其怪诞。

正是由于德田邕兴也强调了《孙子》用间思想的重要性，故此同样获得佐藤坚司的好评。佐藤坚司称赞他是可以与山鹿素行相提并论的《孙子》研究专家。如前所述，这种论调该是从侧面反映出佐藤本人对于《孙子》用间思想的偏爱。通读佐藤坚司所著《孙子思想史的研究》，就会更容易得出这种判断。我们只能认为他对从山鹿素行到德田邕兴这一路过分夸大《用间》篇作用的学者赞赏有加，是由来有自。佐藤的著作《孙子思想史的研究》号称是对日本《孙子》研究史首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被认为是日本《孙子》研究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历来受到重视，经他提倡，日本对《孙子》用间思想遂更加重视。

二

日本《孙子》研究专家相关《用间》篇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对《孙子》用间思想的这种高度重视，都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军事学术。重视用间和收集情报成为日本的传统。英国学者理查德·迪肯说：“日本人搜集情报的灵感，是受到两千四百五十年前中国的战略家孙子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说法。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实现统一大业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丰臣秀吉，就是出色地运用了孙子用间术而取得成功的。他在与明智光秀、柴田胜家及德川家康的作战中，多次运用《孙子》的作战方法和原理，尤其是用间术，成功挫败对手，赢得最后的胜利。理查德·迪肯总结说道：“丰臣秀吉在军事上的胜利，应归功于为他提供各种敌情的情报工作网，归功于他的陆地战略。”^①

^① 理查德·迪肯：《间谍秘史——日本间谍惊人成功的奥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显然，丰臣秀吉将孙子用间术引入军事实践并取得空前成功，实有赖于此前日本《孙子》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他在战争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很自然地反过来更进一步推动军界对《孙子》用间思想及情报战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使得日本的情报工作在世界范围内一直以高效而著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就曾这样评价日本的情报工作：“日本的情报工作已成为严重的威胁，它在世界的情报系统中是非常有效率的。”^①

小幡景宪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著名的《孙子》研究专家，曾担任武学教师，专门研习和教授《孙子》。他在讲授《孙子》时，对其用间思想非常重视。在后来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一边受命扮作武士修行，一边亲自担任间谍，潜入大阪城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间谍活动，被认为是大阪夏季之战中关键人物。

据日本学者介绍，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的武士从小开始就要学习《孙子》，并称这与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②

20世纪初期，日俄两国为了争夺东北亚地区的统治地位，遂爆发大规模海战。日本海军虽然在实力上处于劣势，但在战争中，他们善于运用《孙子》的诡道之法，对正要行驶进入海参崴基地的俄军舰队实施突袭，令其几乎全部覆灭。战后，东乡平八郎在总结获胜原因时说，他主要是运用了《孙子·军争》中“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这两句话。^③

然而，据佐藤坚司介绍，帮助日本取得日俄争斗最后胜利的其实还要归功于日方的成功用间。在一部迟迟才获得公开的《明石元二郎日记》中，记载有明石当年在日内瓦的一段行间的史实。

① 理查德·迪肯：《间谍秘史——日本间谍惊人成功的奥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② 宇佐见哲也：《日本军内外对孙子研究的发展状况》，载《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③ 参见黄朴民：《大话孙子兵法》，齐鲁书社，2003年9月第1版，第34页。

明石花费了100万美元成功地收买了俄方人员，成功扰乱了俄方的内政，也获得重要的情报资料。正是这次不惜代价的行间，帮助日方成功地达成己愿。是故，佐藤坚司称赞明石是“出色地完成了上智之间的任务”。^①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日本则“乘其弊而起”^②，对我国秘密派遣间谍，大肆进行渗透，可谓将《孙子》的“五间俱起”^③之术发挥到淋漓尽致。仅在1882年，他们便向我国派遣了约100名间谍，搜集了大量的重要情报，为其后的侵华战争做着各种准备工作。^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中国潜伏最深获得情报最多的间谍莫过于土肥原贤二。他在中国大肆收买汉奸，安插间谍，甚至将有关中国的最高军事机密成功窃走。日本在中国嚣张地进行间谍活动，所学习的正是我国传统兵法中的用间术，这不能不让我们慨叹。

三

日本的《孙子》研究历史虽然不长，却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专家和研究论著。他们重视《用间》所得到的一些研究心得，堪称奇特，也格外引人注目。据介绍，日本落合丰三郎所著的《孙子例解》于1917年出版后曾发放至日本海军驱逐舰以上的全部海军部队、机关以及各镇守府等所有陆上机关和部队。^⑤日本对《孙子》其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日本由重视研究《孙子》，

-
- ① 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63页。
- ② 《孙子·作战》。
- ③ 《孙子·用间》。
- ④ 穆志超：《日本在谍报活动中是怎样运用孙子兵法的》，《人民警察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 ⑤ 参见苏桂亮，阿竹仙之助《日本孙子书知见录》，齐鲁书社，2009年1月版，第67页。

尤其是《用间》篇，逐渐形成极具特色的情报战略和情报文化，进而对日本的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学术建设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同样值得引发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意外地取得了经济上的迅猛发展。日本式的经营管理模式艳绝一时。据大田研一介绍，帮助日本找到这条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教科书就是《孙子》^①。日本商人从《孙子》中学习管理艺术和领导艺术，尤其是重视“知彼知己”情报理念，并将其连同《孙子》的一系列诡道之法引入商战，取得了极大成功。除此之外，值得世人警觉的是，在商战和科技情报领域，日本对于孙子用间思想的运用也可说有“出色的成绩”。日本人的重视《孙子》和《用间》篇是渗入血液和骨髓的。当无法再操刀兵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地找到另外一个战场并举一反三。毫无疑问，这既反映出日本人善于运用《孙子》的特点，也可从中看出其对于《孙子》用间思想的重视和研究心得。日本在经济、商业，乃至科技领域里对情报和用间的重视，今天来看，无疑是具有警示意义的。

① 大田研一：《孙子：日本企业经营的教科书》，载《世界科学》，2001年第4期。



《三十六计》发微

《三十六计》的最大特色在于以《易》论兵，援《易》析谋。作者运用传统易学的认识论和思辨方式对军事谋略的历史实践作了分类总结，对谋略运用从做法、条件、要求、原理诸方面作了考察分析，并道出了谋略推演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诡道逻辑。全书具有注重人为、强调辩证施谋的思想特点，闪耀着民族传统兵学的独特光辉，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军事辩证法和军事谋略，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一、小引

古老的历史经常给人以意外的惊喜。20世纪40年代初，人们偶然发现了两部论谋用间的兵书：一部是清代朱逢甲所著专论情报间谍工作的《间书》，另一部是佚名者专论军事谋略而又独具特色的《三十六计》。这两部兵书的相继发现和先后整理出版，无疑为浩瀚的中国兵书又增添了一份珍贵遗产。

如果用今人的眼光看，《三十六计》与《间书》在内容上是不同的，前者大体不超出军事谋略学的领域，而后者基本归属于军事情报学的范围。然而，如果按照《汉书·艺文志》中的书目分类法，那么这两部兵书显然同属于兵家中的“兵权谋”一类，其性质又是相同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军事理论界对中国传统兵学的研究表现了日益高涨的热情。在经过对中西方军事思想的初步对

比之后，大约是出于对“西方重实力、东方重谋略”的断定，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兵书中有关兵权谋的内容显示出日益浓厚的兴趣。然而，古籍研究毕竟是一项专门之学，军事谋略作为军事学的一个分支，自身性质又决定了它最富于辩证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兵权谋一类的古代兵学，既打上了深刻的汉民族文化烙印，又铺垫了包括先秦诸子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底蕴，这就为我们认识并批判继承传统谋略思想带来了较大困难。尤其是《三十六计》，作者采取了运用《周易》语言论列奇谋巧计的说理方式，显示了传统军事谋略与《周易》哲学的奇妙结合，给今天普通的读者带来了语言文字上的障碍，而且也向普通的研究者提出了熟悉《周易》这一先决条件，致使一些热衷此道的人略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三十六计》的发现、流传及研究现状

1941年，有人偶然在今陕西彬州的书摊上慧眼识得《三十六计》。同年，成都兴华印刷所出版了土纸翻印本，但这一版本流传不广。1962年，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室加以译注，出版了内部铅印本，译注者署名无谷。其后，炮兵学院训练部、济南军区政治部、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俱先后推出了或翻印或抄印的铅字本。至于原本今天收藏何处，其后正式出版的多种注释本均未述及，笔者囿于见闻，也未知其详。所幸的是《三十六计》终于渐渐流传开来，并为今天的军事理论界所重视。

《三十六计》原本不分卷，发现时已有残缺，跋语不完。作者不详，亦无年代可考，有人疑为晚明或清初人。但是从书中若干所用的计目名称看，不能完全排除清代后期的可能。从全书内容看，作者详熟《周易》，崇尚谋略，喜读兵书，了解古战例，这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三十六计》文字不多。“解语”一般十余字，少者如“抛砖

引玉”，仅有七字；多者如“借尸还魂”，也仅29字。“按语”略长，大体也只在百字上下。少者如“顺手牵羊”，仅25字，多者如“釜底抽薪”、“假痴不癫”，均不过280余字。全书字数当在5000左右，篇幅约与一部《老子》相当。

从版本源流看，各种版本大约可分三类。一是1941年的土纸本。二是1962年至1978年军队系统内部或抄印或翻印的各种注释本。这些版本最初在军队系统内部散发，供关心谋略之道的军官研读，文字大体相同，间或有经整理者校改之处。据笔者所见，这类铅印本多为16开，简化字，3号楷体，竖排，深绿色封皮，名之为《三十六计今译》，均未经出版社正式出版。为叙述简便，这类版本不妨称之为“军内本”。三是1979年以后经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的各种版本。这类版本除注释翻译之外，作者多致力于援引古今中外的著名战例，以再现《三十六计》一书的谋略用兵之道。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于普及军事谋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成为深入研究《三十六计》的军事哲学和谋略思想的先导。这类后起的新编注释本，不妨称之为“研究本”。

从文献学的角度说，军内本颇值得引起注意。这是因为：这类版本被认为是直接移录自底本的最初印发供研读的版本，给人以可信度较高的感觉；它是后来一些正式新版《三十六计》的直接依据。由于1941年的土纸本很难见到，加之研究者又多系军队系统人员，因而军内本客观上成了研究者的源头。然而，军内本存在不少令人遗憾之处。从文字上说，一是印刷错误不止一二处；二是有因误识繁体字而简化错误之处；三是校勘失误，文字衍夺，句读失当，时有可见。因此，军内本大多恐非出自专业古籍整理者之手。从版本上说，军内本既有辗转抄录翻印的一面，又有因校改而彼此出入的一面，难免令人莫衷一是。再从整理情况看，以1973年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本子为例，其《序言》称，对于《三十六计》的原文，整理者“作了一些删补、校正和译注”。对于严谨的治学者，这话是很令人惶恐不安的，因为在未能一一对照原本的情

况下（武汉本没有校后记），后人无由判断哪些地方经整理者动了手术。这些“校正”是否确属校正，抑或可能有“校误”之嫌？笔者限于主观精力和客观条件，多年来未能寻访原本及土纸本一睹原貌，手头原有的一种最早的军内本也已丢失，转思现今各种版本的《三十六计》，很可能有以讹传讹、毫厘千里的情况。例如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兵书集成》，其中编印的《三十六计》与更早的军内本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没见土纸影印本，未知孰是。这是研究《三十六计》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二十多年来，大陆和台湾都陆续有人研究《三十六计》，并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虽然这些成果在普及军事谋略和战争艺术上赢得了相当的读者群，并启迪人们进而在市场经济等非军事领域开拓心智，谋取成就，但是，除了极少数论著能力求深入且有一定新意之外，总体水平仍有待提高。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人们对《三十六计》的研究和认识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这部兵书的估价，二十多年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某些“左”的思想影响仍未能予以彻底清除。最初，研究者对《三十六计》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虽则他们也承认其中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用兵要诀，但又认为它“集中了封建割据中的尔虞我诈、掠夺兼并一类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对于军事斗争，“它不能正确的阐明战争的实质问题，只局限于计谋的推演与施用上”（均见军内本）。实际上，阐明战争的实质并不是《三十六计》的任务，而这种在军事问题上对待谋略斗争所采取的“道德立场”，只能令人想起春秋时代“蠢猪式”的宋襄公。当然，这种观点是“文化大革命”时代思维官能症的必然产物，今人不必苛责。所幸的是，物换星移，随着《三十六计新编》等书的推出，广大研究工作者开始充分肯定并推崇这部兵书。在军事学术研究日趋活跃的良好氛围中，少数先驱者对这部具有强烈民族兵学风格的兵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进而致力于研究其中的“诡道逻辑”，力图将其中

“燮理阴阳”的辩证思维模式纳入谋略学的架构之中。但是，一些研究者在潜心书中谋略思想的同时，仍不忘抄录文革时期军内本中为配合当时所谓的儒法斗争而写出的批判文字，把军事斗争中的谋略同社会生活中尔虞我诈等不良道德混为一谈，这不能不说是遗憾之处。

二是对一部古典要籍，态度的变化并不能直接换来研究的深入。应当承认，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除个别已进入前沿之外，多数尚停留在浅层次上。在研究方法上，几乎都清一色地滞留在举例说明阶段。面对三十六种计谋名称，研究者首先能做到的便是搜寻古今中外的战争故事，然后一一对应各计名目，以图诠释何为某计，何为某策。诚然，以战例诠释某种奇谋巧计，可使人对军事谋略及其思维方法获得感性认识，对于普及兵权谋知识自属不可少，但是，如果仅此而已，便难免产生望文生义、浅尝辄止的弊端。这种研究方法妨碍了认识的深入，几乎无一能真正把触角深入到《三十六计》的军事哲学义蕴。

《三十六计》的精华和特色，在于它运用《周易》哲学思想推演军事谋略，在于它把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斗争艺术及军事谋略思维放在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古朴的辩证法方法论上进行思考、解剖和提炼，从而使自己放射出民族传统兵学的独特光辉。《三十六计》的行文很简洁，而其军事哲学的“内核”却较艰深。也许正是由于它的内核过于坚硬难啃的缘故，在一般的注译本中，除了援引战例再现计谋的具体运用之外（引例失当、乱贴标签者亦时有可见），我们还很少发现有人能对书中处处存在的谋略推演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

三是文字的校订和语言的理解，是一切古籍研究的基础。《三十六计》问世以来，至今尚无一部经过认真校勘、适合研究者使用的版本。原件的影印单行本似亦不曾刊出。校订古籍是我国文史工作的传统，《武经七书》之类的兵书，前人已做了大量的文字校勘工作，相比之下，《三十六计》的这项基础性工作，也应有专人

去做。此外，文字的注释也是一个薄弱环节。虽然目前一些新版的《三十六计》都对原文做了注释，但仍有不少可商之处。例如，《三十六计》的计名是注释者首先应解决的问题，各计名称除了语文意义上的普通意思之外，许多还具有谋略上的特定内涵，但大多注释者似未留意于此，一般均不作说明；即便有所注释，望文生义者有之，流于皮相者亦有之。至于书中大量出现的卦辞、爻辞、象辞，则避而不谈者有之，仅注出处、形同不注者有之，勉强牵合某计、强行索解者亦有之。

三、《三十六计》的结构体例

《三十六计》的主体部分论列 36 条“诡谋权术”，作者又泛称之为“对战之策”。全书前有总说，后附跋语。主体部分不分卷、不分篇，将 36 条计谋分为 6 套，每套下辖 6 条计谋，并冠以大类名，依次为“胜战计”、“攻战计”、“并战计”、“敌战计”、“混敌计”、“败战计”。

这种结构安排有无什么寓意？这个问题至今无人提及，但颇值得注意。全书开头第一句话即说“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可谓开宗明义，介绍了全书的结构安排。然而，许多注释者却仅仅把“六六三十六”解释为“六乘六等于三十六”，这种注犹不注的诠释只能令人忍俊不禁。显然，“六六三十六”不是一句简单的乘法口诀，它至少反映了全书这样的体例：本书按大类分为 6 套，每套下辖 6 计，总共包括 36 计。

《三十六计》的结构体例还有更深一层的寓意。即其中蕴含了作者的军事哲学思想。作者说，前 3 套，“优势之计也”；后 3 套，“劣势之计也”。“每套之中，皆有首尾次第，六套之中，亦可演以阴……”（均见《跋》，原文有缺）。据此可以看出，这种“六六三十六式”的体例，虽然不免有沿袭传统文化中举数喜用 36、49、81 之类的习惯，但是它更反映了作者推演谋略的基本着眼点和方

法。这一结构，笔者以为体现了原作者以下两条构思原则。

一方面考虑到计谋运用与对敌斗争情势的关系，以敌我关系的优劣程度为第一层次的分类标准；然后再以战斗的性质或类型为第二层次的分类标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每条计目的先后次序，都充分注意到了“阴”、“阳”两种基本对立面的变化，换言之，是从阴阳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来推演和归纳各种诡谋奇计并以此排列 36 计的。这反映了作者研究军事谋略所依据的基本哲学范畴和所运用的基本方法论。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作者从“阴阳燮理”的角度来安排 36 计的“首尾次第”，不仅在思想方法上，而且在结构形式上，也受到《易经》的影响。首先，这种每套 6 计、共分六套的格局，令人联想到易数中的用六和用九，以及 64 卦的每卦六爻。实际上，也正是作者“重数”的具体表现。其次，《易经》中 64 卦的排列顺序，历来是易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三十六计》既然处处借周易哲学推演对敌之策，那么在编排各计顺序时因受其影响而试图以阴阳的推演变化来排比组合 36 计，不仅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也进一步说明了这部兵书在论列兵家权谋时所受到的民族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如果这一理解不谬的话，那么就连带地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全书各计之间在阴阳燮理方面的内在具体联系究竟是怎样的？抑或作者是否真正在全书中坚持并贯穿了这一结构线索？各套之中所属之计是否与套类真正对应吻合？有无疏漏或牵强之嫌？笔者以为这几个问题都尚待继续深入研究。例如，第五套“并战计”说的是战局中存在敌、我、友三方或某种三角关系时对付非敌一方所施用的一些谋略方法，但“假痴不癫”（第 27 计）归之于此，似属勉强；而原属第一套“胜战计”的“借刀杀人”（第三计）论述的是如何“引友杀敌”，显然又可以归之于“并战计”。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详论了。总之，我们既不能因为这部兵书在传统谋略用兵之道方面的价值而看不到它的不足，也不能因作者的自我标榜而忽略了它的粗陋。

四、关于《三十六计》的计名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本为古代习用语。语本《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计，走是上计。”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九》始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续传灯录》、《水浒》等亦作“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所谓“三十六计”，本来并没有具体的36个计策，如同常言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样，并不能一一落实，仅仅是个虚数，只表示多的意思。36计由虚变实，是《三十六计》作者附会古习语，一一落实，凑足其数，并选用词语确立名称的结果。至此，“三十六计”一词始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独立出来，有了具体名称，并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成了今人研究奇谋诡计的特定对象。不过，战争史上有关军事谋略的运用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各种奇谋诡计，可说千奇百怪，举不胜举。所涉及的领域，诸如政治外交、战略战术、侦察情报、思维方式、社会心理、逻辑判断、文化传统，也是多方面的。在历代兵书中，也有这方面的大量经验总结和理论归纳。因此，应该看到，所谓36计，只是对军事历史中丰富的谋略实践的部分钩稽和总结。

《三十六计》中所定的36个计目名称，并非作者杜撰，均各有来源。有的源自古代战例，如“围魏救赵”；有的语本古代兵法，如“以逸待劳”；有的出自历史故事，如“上屋抽梯”；有的则是古诗文或成语，如“擒贼擒王”、“抛砖引玉”。

研究《三十六计》，切忌从计名字面上去理解其谋略内容，因为作者只是借用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来为某种特定的谋略命名而已，他已经赋予每个计目名称以新的用兵之道。如果有意无意地仍从语文意义上循名责实，则必然走入歧途。

下面试举四例略作说明。

围魏救赵（第二计）：本计以古战例定名，很容易使人局限于

战例本身来理解本计的谋略原理。其实，此计的实质内容在于论述谋略推演方面的“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的基本原则。阴与阳，是《周易》中的一对最基本的概念，二者不仅既相互对立又密切联系，而且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即使在军事领域，也具有多方面的所指，可以表现为丰富的战略战术内容。围魏救赵之战，自然可以视作“敌阳不如敌阴”的运用之一，但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如果拘泥于本计的名称，把本计的谋略原理与围魏救赵的战例等同起来，必然导致胶柱鼓瑟式的理解。例如，把此计解释为围攻敌人后方据点，迫其撤回主力或撤出主战场，便是一种狭隘而片面的理解。

以逸待劳（第四计）：本计以古兵法定名，更易使人在理解上局限于“以逸待劳”自身的用兵内容而忽略作者所论述的谋略内容。实际上，按照《三十六计》所述，二者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以逸待劳”源于《孙子》的致敌之法，也是兵家历来恪守的战术原则之一，但是，《三十六计》的作者对于此计并没有停留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术运用上。作者在按语中说“兵书论敌，此为论势”，可见其论题已发生转变。针对《孙子·虚实篇》的“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这一论述，作者又说：“其旨非择地以待敌，而在以简执繁，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变，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可见此计的谋略应用已经大大拓展，不再局限于选择战地而以逸待劳的原意。用作者的话说，其目的是“困敌之势，不以战”，即采用非战斗手段，达成使敌困顿之势。这种非战斗手段，其谋略原理则是作者所揭示的《周易·损卦》的“损刚益柔”。因此，只有从“损刚益柔”去把握本计的谋略思想，才能把我们的认识从原先属于具体战术原则的层次跃升到谋略哲学的高度。

笑里藏刀（第十计）：此计的精髓，作者用《周易》哲学的语言表述为“刚中柔外”。“刚中柔外”是《坎》卦的基本属性。一切基于刚中柔外原理加以推演的用兵之策，都属于此计的谋略运用

范围。具体做法方面，比如外交上的守约重信，军事上的结盟请和，战场上的相安无事，均为“柔外”；而秘密准备，暗中策划，强化武备，则属“刚中”。命名为“笑里藏刀”，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如果仅仅理解为表面友好而内心狠毒，则流于皮相。

指桑骂槐（第26计）：此计论述统兵遣将之法，属军事指挥学的内容，与字面意义可谓相去千里，毫不相关。在谋略的运用上，作者以《周易·师卦》的彖辞述其军事哲学原理：“刚中而应，行险而顺”。如果误解为明指此而暗骂彼，是永远也不能入门的。

五、《三十六计》的解语和按语

《三十六计》归纳了36条谋略用兵之道。每条之下，先列计序（第X计）和计名作标题，正文包括“解语”和“按”两部分。解语论述谋略原理，较为难懂；按语或引孙吴等兵法，或举古代战例，作进一步补充说明。

从内容看，解语和按语不完全限于战场上的调兵布阵之法，而是涉及诸多军事斗争领域乃至非军事领域，甚至有改朝换代之际如何打出政治旗号以为号召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部兵书并不完全是单纯论述用兵作战的著作。因为在作者看来：“夫战争之事，其道多端。强国练兵、选将择敌、战前战后，一切施为，皆兵道也。”（《跋》）其中，运用“阴阳燮理”的法则推演谋略，则是解语的核心思想。这个方面，我们将在下节作专门探讨，这里先从谋略运用的角度对解语和按语的主要类型作些讨论，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各种谋略的运用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

1. 揭示某一谋略的基本做法及条件

以“上屋抽梯”（第28计）为例，此计研究的是如何诱使敌人进入我方为其设计的“死地”。作者在解语中用16字概括了施用此计的基本做法和必要条件。从方法步骤说，第一步是置“梯”

或示敌以“梯”，这叫做“假之以便”，即给敌人以方便。第二步是“唆之使前”，即诱敌登“梯”。第三步是“断其援应”，即抽“梯”。第四步是歼灭陷于死地之敌，这叫做“陷之死地”。从施行此计需要满足的条件说，必备者有二：一是利，二是“梯”。我不舍小利则敌无利可图，敌无利可取则不能诱其前往死地，故我须为大利而舍小利。敌见利而不便获取，亦难唆使其前往我方所设计的圈套之中，故还须借之以“梯”。若原有“梯”，须善“示之”；若本无“梯”，需通过创造性思维为敌“设梯”。所谓“梯”，必须能生能灭，能置能抽，且操作之权在我之手，否则便不能使敌陷于死地。

2. 揭示某一谋略的基本要求

以“金蝉脱壳”（第21计）为例，此计论分身之法，目的在于解决两面应敌时如何抽出精锐兵力去支援另一战场作战。其谋略运用的基本要求是：“存其形，完其势；友不疑，敌不动。”这就是说，分身之术有两项要求：首先，要做到保持己方阵地原有阵形不变，保持部队仍在原地防守的完整态势不变（但均徒有其形）；其次，使与己并肩作战的友军毫不怀疑，使与我对峙的敌军计划、阵势不变，不敢贸然进攻。待到我军袭击他处之敌归来，友军和敌军才明白过来，甚至仍然不知道。这就是外存金蝉之形、精锐脱而走之的基本要求。

3. 揭示某一谋略得逞的原因

以“苦肉计”（第34计）为例，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这种计谋施用得以成功的原因：“人不自害，受害必真。”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无端地自己伤害自己，因此，当某种借自残以示遭到迫害的行为出现时，必定会使常人误信其确属受害。“人不自害”反映了社会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受害必真”道出了人们在伤害问题上自觉或不自觉的思维定式。例如郑武公灭胡，就是苦肉计的运用之一。春秋初期，郑武公准备攻打胡国。事先，他把女儿嫁给胡君，然后在朝廷军事会议上又怒斩了主张伐胡的大夫关其思，以

示对“兄弟之国”绝无企图，从而导致胡国放松戒备，一举袭而灭之。关其思之死可谓亦真亦假。就郑武公而言，这是杀大夫以“自害”；就胡国君主而言，这是持不同政见者“受害”；就“用间”之道而言，作者称之为“自间以间人”，这是对孙子用间之法的拓展和创新。此计的成功，正是巧妙利用“人不自害，受害必真”这一社会普遍心理的必然结果。

4. 揭示与谋略运用有关的客观情况

谋略运用不是孤立的，因此，《三十六计》在论述军事斗争之策时，充分注意了与施谋用计有关的时机、场合、态势、敌友关系等因素。例如“借刀杀人”（第三计），此计论述在多种武装力量并存的格局中应致力于“引友杀敌”，这样可以一举而收打击敌人、削弱友邻、保存自己实力之效。其时机的选择，应在敌我友三者关系呈现出一种“敌已明，友未定”的态势之时。又如“声东击西”（第六计），作者认为这是险策：“须视敌志乱否为定。乱，则胜；不乱，将自取败亡。”又如“远交近攻”（第23计），作者认为这是“地理之定则”决定的，今天看来，已经具有地缘战略思想的意味。再如最后一计“走为上”，绝不是说撤退是最好的办法，而是说当己方面临“敌势全胜，我不能战”的劣势时，才应主动果断地避开敌人。敌军占绝对优势时，我方只有三条出路：或投降、或请和、或撤退。投降是彻底失败，请和是半败，退却则并不意味失败，而可能是争取胜利的转机。这就是所以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的道理所在。（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善走”的问题。而且，走为上也不是逃跑主义。）

六、《三十六计》的以易论谋

《三十六计》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兵书。它的特色，不仅在于专论古代军事谋略，也不仅在于总结了我国军事史上的一些具体的谋略用兵的方法，并归纳出了36条奇谋诡计，而在于揭示了这些具

体方法背后的谋略原理，在于它把军事谋略与《周易》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传统易学的认识论和思辨方式来考察和分析前人的谋略实践，并进而从军事哲学的高度透视了谋略推演中的某些规律，道出了其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诡道逻辑”。

为什么《三十六计》会有这种特色？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问题。首先，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看，由于历代科举制度的影响，读书人终生所学的都是传统“国学”，包括《周易》在内的四书五经，是他们必须熟知的东西。不仅一般的文人，即使是军事将领，也大多熟悉古代典籍和用兵韬略。例如三国时的关羽，便“好《左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裴松之注），又如唐代将领张巡，背诵《汉书》等可以做到“尽卷不错一字”^①。其次，《周易》不仅历代被奉为经书之一，而且向来被认为是一部探求天地万事万物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在古人的眼中，“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②，这就在客观上为封建社会的学人研究包括谋略用兵在内的军事斗争艺术提供了时代所能提供的思想工具。再次，传统兵学中本来就存在着《周易》思想的影响。例如《周易·坤卦》说“履霜坚冰至”，《孙子·行军篇》则有“鸟起者，伏也”等32个“相敌之法”。前者是说，当人们踏着秋霜时，应当认识到结上坚冰的寒冬即将来临；后者是说，当众鸟从战场上的丛林中飞起时，应当判断出丛林中有敌人的伏兵。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在见微知著、由此及彼这一点上，《周易》的认识论与《孙子》的侦察情报工作经验总结是有相通之处的。因此，正像人们曾从军事的角度研究《周易》和《老子》这类哲学著作一样，从易学的角度研究军事谋略也是并不奇怪而且可能的。

《三十六计》的最大特色可说是以《易》论兵、援《易》析

①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② 《四库提要》。

谋。在用语上，“解语”中出现了许多易学术语，如：阴、阳、刚、柔等；在行文上，引用了大量《周易》经传的原文；所用之卦，有坤、屯、需、师、比、履、豫、随、蛊、噬嗑、剥、坎、睽、蹇、解、损、益、萃、困、渐、既济，凡21卦。

对此，似乎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作者“借用”《易》语以谈兵。应该指出，这一观点是不对的，因为至少在“借刀杀人”这一计中，作者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计是根据《损》卦推演的。诚然，《三十六计》中容或有用《周易》中的句子勉强附会某一谋略或仅限于形象说明的地方，但是，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种“借用”并不能简单认为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它实际上反映了作者认识和分析问题所“运用”的哲学武器。《三十六计》开卷即说“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这里的“六”除了指本文前面所说的套、计之数外，还兼指“太阴之数”。这里的“数”指的是“易数”、“象数”之数，“术”指的是具体的方法和策略。所谓“数中有术，术中有数”，是说《周易》的象数之中就蕴含着计谋，而具体的计谋中也反映了象数的道理。所谓“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是说阴阳的调理和运用，是推演和施用谋略的关键。这段话，可说是全书的总纲，也是今天研究《三十六计》，认识其谋略思想的一把钥匙。

大体说来，《三十六计》以《易》论兵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联系《周易》卦爻辞中直接谈论军事斗争的内容论述有关谋略；二是“以象生义”，通过卦象和爻象所反映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论述谋略的推演和运用；三是通过阴阳的矛盾和运动变化来论述有关谋略的推演和运用。

关于第一个特点，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指桑骂槐”（第26计）、“连环计”（第35计）和“走为上”（第36计），因为这3条计均从“师”卦论谋，而“师”卦本身又是《周易》64卦中论述军事问题的专卦。“师”卦中，九二为阳爻，其余五爻均为阴爻，全卦一阳统五阴，象征统帅率众用兵。从初爻的出征直到上爻

的战后总结，其中涉及到战争性质、寓兵于农、军权授受、部队纪律、指挥作战、伤亡损失、刚柔用兵、救过补失、论功行赏诸方面的军事思想。

为了理解的方便，这里不妨仍就第26计和第36计来看看《三十六计》以《易》论谋的这一特点。

“指桑骂槐”说的是统帅为树立权威，对部属采用“警以诱之”的训导方法，目的在于使之服从自己。军队需要纪律，军令必须畅通，所以“师”卦初六说“师出以律”；如果军队纪律不良，就“凶”。因此，当部属不服从统帅时，《三十六计》认为统帅可以故意制造错误（此属糟粕，暂且不论），借此训责他人的失误，从而暗中警告不听从指挥的部队，以达到部队令行禁止的目的。这种“警以诱之”的策略，作者认为应符合“师”卦“刚中而应，行险而顺”的原则。“刚中而应，行险而顺”是“师”卦“象传”对用兵原则所作的论述。就爻位说，九二阳爻居阴位，又在下体中位。阳为刚，阴为柔，居中则不过刚而能用柔，这叫“刚中”。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是有勇有谋的统帅。九二一阳统五阴，五阴皆柔，能拥戴应和九二之统帅；而六五之君主又居上体中位，虽处尊位而能柔顺中正，并与九二相应，这说明九二又能得到六五的信任。统帅身处军旅，近有拥戴应和的众兵，远有用人不疑的君主，这就叫“刚中而应”。就卦象说“师”卦下坎上坤，坎为险，坤为顺。用兵作战，本是凶险之事，这叫“行险”。但是统帅如果能顺应人心民意、客观形势、治军之道，便能赢得战争胜利，这就叫“行险而顺”。由此可见，所谓“指桑骂槐”之计的施用，在作者看来，须按照“师”卦所说的“刚中而应，行险而顺”的原理进行推演。大而言之，采用“警以诱之”的方法训导部属，须视统帅是否刚柔适中，恩威并用，能否得到君主的信任和广大士卒的拥护，以及能否顺乎客观形势及用兵之道。小而言之，“警以诱之”对于一向不听话的部队，也是一种“行险”之策，施用时应把握“刚中而应”的尺度，做到刚柔适中，官兵拥护。这样，

才能慑服部队，驾驭下属，收“行险而顺”之效。

再看最后一计“走为上”。作者说：“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本计也是根据“师”卦推演的。“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语出“师”卦“象传”。意思是说：部队从战场上退却而不与敌人作战，这不会带来灾祸，也没有违背正常的用兵之道。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联系六三来看。六三为阴爻，却居阳位，又处于下卦坎险之极地，质弱而用刚，轻率而用兵，冒险以进，结果“师或舆尸”，只见用大车载着战死的尸体而败回。从敌我双方的情势看，这已是己方处于绝对劣势之时。及至六四，变为阴爻居阴位，仍是柔弱而难有作为，情势已不利再战，否则难逃覆灭之灾。但是，面对此种局势，如能知难而退，坚决撤走，避免与敌交锋，从而保全实力，这并不是懦弱怯敌的表现，而属正常用兵法则。由此可见，《周易》是在全面衡量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及战局演变情况，权衡了战与退的利弊之后，才提出了暂时退却避敌这一挽救彻底失败命运的办法。明白了《周易》的这些道理，就不难看出，《三十六计》的“走为上”注入了《周易》“师”卦论兵的军事思想，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引入了《周易》对客观情况的分析和判断。如果我们硬把《周易》与《三十六计》分割开来，那么“走为上”就必然变成了畏敌惧战，变成了绝对的上策，而作者所说的“全师避敌”也就成了逃跑主义，从而失去了谋略意义。

借助卦象和爻象来表达思想，是《周易》与其他古典哲学的不同之处。就组成64卦的符号而言，它是抽象的线条，但《易传》的作者认为，64卦和384爻可以象征天地万事万物，“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因此，卦象和爻象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概括性和灵活性。在表现客观事物的功能上，古人认为卦象和爻象不是封闭式的，而具有开放式的特点，这就为《三十六计》以卦象和爻象推演军事谋略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下面再以“上屋抽梯”（第28计）为例，对《三十六计》以卦爻象论谋的特点作些具体的分析。

如前所述，“上屋抽梯”研究的是如何陷敌于死地，并论述了施用此计的做法。但是这些做法毕竟还是具体的“术”，从谋略推演的角度说，作者则认为施用此计应从《周易·噬嗑》卦所示的原理去思考，就是说，“上屋抽梯”之计，其谋略原理在于构思出一种使敌“遇毒，位不当”的格局。“遇毒，位不当也”，是“噬嗑”卦六三“象传”对卦象的分析。从卦象说，“噬嗑”卦与“颐”卦有密切联系。“颐”卦极像人的嘴巴。全卦上艮下雷，艮为止，雷为动。人在说话或吃食时，上部的腭骨静止不动，只有下巴骨作上下运动。“颐”卦初、上二爻为阳，中间四爻为阴。人的嘴巴，上下有刚齿，中间为柔舌。这就是“颐”卦取象嘴巴，命名为“颐”（兼有养生和面颊之义）的原因。“噬嗑”卦与“颐”卦的不同，仅在于后者的第四爻由阴爻变为阳爻，这表示此时口中已含有食物，要通过咬嚼（即“噬”），嘴巴才能合拢（即“嗑”）。然而，食物有不同情形，比如六二，阴爻而处阴位，表示嫩肉，自然易嚼可吃；可是世上也有难啃而有毒的食物，这就是六三爻辞说的“噬腊肉遇毒”。腊肉系风干而成，性坚韧而难咬。陈久而过肥的腊肉，不仅变味伤口，而且有毒。一个人为什么会“遇毒”？《象传》说：“遇毒，位不当也。”从爻位的角度作了诠释。六三处于下卦震体之极地，距离下齿初九本来就稍远，下卦为动，为进。这比喻一个人贪财爱利，因心存非分之念而行为举止失当，结果使自己身处不利的地位，遭到打击或制裁。

明白了这些卦象和爻象，就不难看出《三十六计》的作者是怎样从易象的角度推演“上屋抽梯”的。由人的贪吃，推演到诱敌取利；由“腊肉”推演到看似是利，实则是毒；由“毒”推演出我方须舍弃小利，以便供敌以“腊肉”；由不当之位推演出“置毒”之地应稍远于敌并能断其后援。所有这些，都是作者运用“噬嗑”卦的卦象和爻象构思“上屋抽梯”这一谋略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对前人略谋实践的总结）。从诡道逻辑说，诱敌于死地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敌“遇毒”，而制毒、置毒、诱敌、断援这些具体

构思和运用则是作者运用《周易》卦爻象所蕴含的辩证思想进行逻辑推导的结果。

《三十六计》的以易论谋并不完全局限于以卦爻辞论谋和以卦爻象论谋两方面，在许多计谋中，它往往更直接从《周易》哲学的基本思想入手，看待并分析具体谋略的运用法则，从而把军事谋略与《周易》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揭示出其中的“诡道逻辑”。这里我们仅就军事欺骗问题，对作者运用《周易》阴阳对立变化思想揭示“诡道逻辑”的情形稍稍作些说明。

以“瞒天过海”（第一计）为例，本计并没有论列某种具体的方法和要点，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军事欺骗中的秘密企图与公开做法之间的关系。对于军事欺骗，人们历来强调它的秘密性和隐蔽性。秘密与公开是相互对立的，秘密行动只能在暗中进行，谋略施用决不能暴露出来，这些几乎都成了军事常识。诚然，军事斗争需要隐蔽企图，但是这并不等于秘密与公开二者绝对相互排斥而不能统一，也不完全等于用相反的公开行为去遮掩秘密企图。《易传》认为，阴与阳是最基本的一对范畴。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都是阴阳的对立和变化在起作用。所谓“易道”，就是阴阳的对立、交感、往来和变化。阴与阳既对立，又统一。阴极而阳生，阳极而阴生，万物负阴而抱阳。因此，在“瞒天过海”中，对于军事欺骗，作者鲜明而深刻地指出：“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前句是说，谋略欺骗就存在于公开做法之中，而不是在它的对立面。后句的“太阳”和“太阴”，本是传统易学中的术语。《系辞上》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指阴阳，四象为少阳、太阳（亦称老阳）、少阴、太阴（亦称老阴）。太阳、太阴指纯阳、纯阴，后来的术数家又把太阴用来代表隐匿、阴私、暗昧之事。如同四季递变，寒来暑往，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的道理一样，太阴、太阳也将向对立面转化。

《三十六计》说“太阳、太阴”，大意乃谓十分公开显露的行为本身就包藏着极为隐秘的企图。这就把秘密与公开统一了起来，

而不再视为截然对立、互不相涉的两面。为了证明这点，作者在按语中又举例作了说明。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将贺若弼准备攻打陈国。战前，贺若弼下令所有沿江守卫部队每次换防都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集中，同时遍插旗帜，广设帐幕，大张旗鼓的进行。陈国以为隋军将至，悉集国中兵力防御，既而方知是部队常规换防，于是撤走迎战部队。数次之后，陈国对隋军调防习以为常，遂不再防备。等到贺军大举由历阳渡江，陈国尚未觉察。从这一战例中可以看出，隋军的一次次公开换防，实际上也是为调集兵力渡江作战所作的一次次公开演练，作为谋略企图的“太阴”与公开示敌的军事行动的“太阳”已经完全合二为一。有感于此，作者又就秘密与公开的关系问题进一步申说道：“阴谋作为，不能于背时秘处行之。夜半行窃，僻巷杀人，愚俗之行，非谋士所为也。”由此可见，作者认为，秘密就在公开之中，谋略欺骗应有公开的一面，或者说是一种公开欺骗。贺若弼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妙用了“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这一诡道逻辑。这一诡道逻辑既概括了军事斗争中显与隐、真与假、虚与实、攻与防等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是《三十六计》运用《周易》哲学思考传统谋略所揭示的谋略之道之一。

七、《三十六计》的思想特点

1. 崇尚谋略，是《三十六计》这部兵书的基本思想特点

作者认为，战争虽然包括许多方面的事情，但像强国练兵、选将择敌这些方面的问题，“大都有一定之规”，唯有对敌之策，“变化万端、诙诡奇譎、光怪陆离，不可捉摸”。为此，作者归纳了36条奇谋诡计，并认为这是“大将之要略”。（均见《跋》）由此可见作者对军事谋略的重视和推崇。

2. 注重人为，是《三十六计》的又一思想特点

全书所列36计，既有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所施用的谋略，也

有双方势均力敌或处于混战状态下的谋略，更有处于劣势条件甚至战败状态下的一方所施用的谋略。作者不仅关心战役和战斗必将胜利时如何通过谋略获得胜利，而且重视战败或情势紧迫时如何凭借谋略转危为安乃至败中求胜。在胜与负、得与失、损与益、利与弊，以及主动与被动，有用与无用等一系列问题上，全书力求通过斗智来争取主动，壮大自己，赢得战争，其间贯穿着“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第12计“顺手牵羊”）的思想，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战争胜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一般地说，施谋用计总离不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二者在本质上是密切联系的。不过，《三十六计》重视人为的特点，既是军事谋略的本质决定的，也与《周易》哲学有相当的联系。《周易》讲吉凶休咎，关心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前景。其中既有求占问卦的唯心主义一面，也有教人如何趋吉避凶、救过补失的一面。就后者而言，《周易》可谓是一部寡过之书。在得失成败之间，它要求君子“自强不息”，并试图引导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见机而作，通过主观努力，避免失败，争取成功。《三十六计》在以《易》论谋时，既没有谈卜筮占验，也没有说鬼神怪异。尽管作者自称重“象数”而轻“义理”，但所涉及的象数均切切实实与军事斗争中的种种客观现象有关，都是与谋略推演密切相连的客观条件。作者并没有陷入天命鬼神的唯心主义泥坑，而是继承了《周易》思想中重视人谋的一面。可以说，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通过人的智慧和努力，使战争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这是《三十六计》在军事思想上与《周易》哲学的相通之处。

3. 辩证施谋，是《三十六计》最重要的思想特点

这一特点首先表现在运用“阴阳燮理”原则分析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种种因素上。阴与阳，本是《周易》哲学的基本范畴。在《周易》哲学看来，阴阳是事物内部存在的两种相反的力量或趋势；阴阳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一切事物的矛盾对立和运动变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三十六计》的作者吸取了《周

易》哲学这一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并沿用了阴阳这一对基本概念来分析军事斗争中的各种现象。通观全书，人们不难发现，作者根据《周易》的阴阳理论，演绎出了刚柔、虚实、强弱、多寡、损益、动静、利害、顺逆、内外、信疑、形势、真伪、智情这些各具特定内容的具体矛盾。正是在对这些矛盾双方的辩证分析基础上，作者才推演出一个个看似神奇实则合于事理的具体谋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促进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使谋略起到蒙蔽敌人、打击敌人的效果，从而推动了形势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例如上文所说的“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这一谋略命题的提出，就是作者对显与隐这对矛盾进行辩证分析的结果。

《三十六计》的辩证施谋还表现在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者认为，谋略的施用不能生搬硬套，必须合乎客观事理，否则将不能奏效，甚至会败露机谋。这反映了作者在谋略运用上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视。例如第3、第4和第11计，都是从《损》卦推演的，谈的也都是损与益的关系。《周易》哲学认为，有损必有益，损彼必益此，损益有“时”（指变化条件）；明乎此，君子须当损则损。据此，《三十六计》的作者从不同情况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做法：当三种力量并存而“敌已定、友未明”之时，应当引友杀敌，从而损友以益己。当敌我双方需要交战之时，应在战前营造困敌之势，从而损敌以益己。当我方势必有害之时，当损则损，应当损己之局部而益己之整体。

又如虚与实的关系问题，在“空城计”（第32计）中，作者的对策是“虚而示虚”。而在“无中生有”（第七计）中，作者则认为：“无而示有，诳也。诳不可久而易觉，故无不可以终无；无中生有，则由诳而真，由虚而实矣。”并据此提出了“少阴，太阴，太阳”这一谋略原理。乍看之下，这二计似乎自相矛盾，其实，这两种对策是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运用，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空城计”属第六套败战计，这是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我本无兵可以迎敌的条件下施用的谋略，目的在于使敌不敢贸然进

犯，因而在策略上采用了能够使敌“疑中生疑”的“空城”之法。“无中生有”则属第二套敌战计，这是我本有兵，为诱敌上钩，以求一战而施用的谋略。所以作者又说：“无，不可以败敌，生有，则败敌矣。”由此可见，同一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的策略，这是作者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

《三十六计》的辩证施谋，还体现在求异思维上。比如，对于有用和无用，通常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客观事物和条件，而无用的东西也就谈不上去利用它。但是，“借尸还魂”（第14计）恰恰认为“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又一个诡道逻辑：“借不能用者而用之。”比如，毫无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的前朝帝王的后代，可谓是一具无用的“尸”。然而，如果借之以为号召，打着他的旗号用兵，有时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便是“借不能用者而用之”的典型例证。反之，如果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借有用者而用之，则很可能带来如“反客为主”（第30计）所说的后果：被人取而代之，自己最终失去兵权。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借尸还魂”不仅仅说的是军事斗争，而且已经道出了入侵者在战后如何扶植伪政权的客观规律。外族入侵并占领一个国家，通常不会自任君主，而是选择本土人组成傀儡政府，借此推行自己的战略和政治意图。什么样的本土人合适？《三十六计》的作者运用《周易·蒙卦》思想说，那种不能自立、只能依附他人的“童蒙”最合适。作者说：“换代之际，纷立亡国之后者，固借尸还魂之意也。”由此可见，“借尸还魂”又是一个论述战后如何建立新政权以巩固战果的政治计谋。

综上所述，《三十六计》不仅总结了我国历史上谋略用兵的一些实践经验，而且运用时代所能赋予的认识工具对军事谋略进行了一些富于哲理性的辩证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诡道逻辑。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普及谋略知识、增长军事智慧有帮助，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军事辩证法，联系当代的军事斗争实践探讨军事谋略理论并建立科学的军事谋略学，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当然，《三十六计》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除了内容上的糟粕以及本文叙述中随带指出的一些问题之外，它的以《易》论谋，固然显示出哲理性，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光辉，但它的“重数不重理”也使全书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而且，由于“解语”的行文过简，加之作者又自云“数，则在言外”，每使人读来有说理苟简、象数不明之感。所举例证，也偶有不尽贴切之处。诸如此类的问题，这里就不细说了。



唇语判读

—

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可以体会到这样一种情况：两人在交谈，其中一个有意识地压低嗓音，声音轻得无法听清，这时对方会集中全力紧盯说话人的嘴巴，通过观察说话人的口部动作了解他在说什么。英语里把“注意倾听”叫做 hang on sb.'s lips，有“注视嘴唇”的意思。有时，甚至在不闻说话声，但见嘴巴动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不用听觉而单凭视觉，通过观察口唇动作的变化，直接感知话语。

我们把用口唇动作进行交谈的话语称之为唇语 (lip language)。唇语具有无声性。有声语言有时也会转变为唇语，比如因距离稍远，噪音过大，电影偶尔有图像无伴音，聋哑人“看”话等。把唇语转化为有声语言或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过程就是唇语判读 (lip reading)，简称唇读。

唇语和唇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国，最早的唇读实例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下文将专门讨论）。在西方，19世纪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英国的贝尔（1819年~1905年）曾撇开听觉，在视觉的基础上进行“可见语言”（visible speech）的研究，并创制了一套系统的符号来表示人类发音的口腔形状。他们的研究成果最早是用来对聋哑人进行“听说”训练。贝尔祖孙三代长期从事聋哑人的语言教育，在西方聋哑人教育史及语音研究史上均有一定地位。20世纪后期，美国为聋哑人服务的训练中心已达五十多个。

在许多国家的聋哑学校中，专门教师可以训练只聋不哑的儿童发出有声语言。现在，聋哑人的交际除了运用书面语、手势语、指语之外，唇语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唇语在电影译制工作中也相当重要。配音演员不仅要关心台词本身，更要注意口形。兼顾两种语言口形的翻译和配音，经过努力，可以使人产生影片中的角色不是在用原语言而是用译语说话的感觉。

唇读在外语或语音教学中也有一定的地位。语言训练不仅是口耳之学，也与口形的观察分析密切相关。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

当今世界，唇读又成为一种获取和传递情报的手段。通讯联络的双方在面对面的情况下，运用简短的唇语交谈，既能实施情报传递，又能有效地防止仪器窃听。对于一些无声的影视资料，唇读专家经过同心合作，可以判读出人物说了些什么。据说，曾经发生过某个秘密会议内容被泄露出去的事件。原因是间谍在会议大厦对面的房间里用带望远镜头的摄影机拍下了会议的场面，然后叫聋哑学校中的唇读教师把画面的唇语讲了出来。前苏联克格勃中有一些人专司此职，美国人称之为唇读间谍。唇读间谍实际上是语言学家，他们的工作是唇语和唇读在情报战线的具体运用。

二

唇语不同于有声语言，唇读也不同于听话。纯粹的唇语，即从口语中滤去全部语音的唇语，是口形和意义的结合；有声语言则是语音和意义的结合。这决定了唇读是一种在无法听到语音这一特定的物质外壳的条件下必须由观察口唇动作形状从而了解话语内容的方法。听话用耳闻，唇读靠目睹。二者是相去甚远的交流思想的方法。

但是，唇读仍然和听话有密切的联系。唇语和与之相应的有声

语言都是同一种语言而绝非两种语言，它们的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完全一样。唇语的口形即有声语言的发音动作，并不是人们脱离与之相应的有声语言另外制订的一套动作系统。

由有声语言到唇语的转化过程，实质上是语言的语音平面和意义平面的相结合向该语言的口形平面和意义平面相结合的转化过程。因此，唇读首先要按照语音系统建立口形与语音的对应关系。我们把建立和掌握口形与语音的对应关系并通过口形判断出语音叫做唇读的口形分析法。口形分析法是唇读的基本和首要的方法。

口形分析除了运用语音学（包括音位学）的全部基本原理并掌握具体语言的语音系统之外，还有自身独特的地方。比如英语的 *sixty* (60) 与 *sixteen* (16)，听感上差别十分明显，但唇读时却不易区别，这是因为在唇语中二者口形近似的缘故。以下从几个方面对口形分析作些说明。

口形是连贯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口形分析法要对一连串的口形进行切分，找出并区别表示不同语音的不同口形。比如日语的あ、い、う、え、お这五个元音单念时口腔的开合、嘴唇的圆展呈现互不相同的口形，掌握了这种口腔形状并和相应的语音建立起对应关系，就做到了“据形知音”。

不过，口形切分与语音切分的不同，后者是为了研究语言的语音和音位系统，前者则是为了判读语义内容。因此，口形切分除了音素之外，也可以按音节、词、短语甚至简单的句子为单位。比如日语的ま、み、む、め、も五个音节，五种口形，可以直接判读。又如英语的 *hello*, *good bye*, *how do you do*, 唇读人员能够从连续的唇语中一次判读出来，无须再作过细的切分。

口形和语音的关系可以是一对一的。如英语的 [a:]、[ə:]、[u:]，一个语音对一个口形。据此，可以分别读出唇语 *part* (部分)、*bird* (鸟)、*boot* (长靴)，不致弄错。

但是，一个口形与几个语音对应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比如双唇

音汉语拼音的 b、p、m 这三个辅音，在正常速度的唇语中，视觉无法感知它们之间清与浊、送气与否的区别。鼻音 [m] 在后面跟上元音的条件下，也将产生类似双唇塞音的除阻动作。这就使得这几个辅音同与一个口形对应。这种“一形数音”的现象，在汉语中表现为“爸”、“怕”、“骂”同口形；英语里表现为 pat（拍打）、bat（蝙蝠）、mat（草席）、bad（坏的）、mad（疯狂）同口形。此外，因重音变化而意义不同的词语，口形也并无区别。如，instinct（本能）与 ins'tinct（充满的）。在有调位的语言中，同一音节的不同调位，也同属一个口形，如汉语的“妈”、“麻”、“马”、“骂”。

口形分析还必须注意音变规律。语流音变中发音部位的增减改变必然使唇语口形相应改变。如英语 give me，其中 [v] 的口形变为 [m] 的口形。汉语“棉袍”mianpao，其中 [n] 的口形也变为 [m] 的口形，且整个单词的口形与“棉毛”、“面貌”、“面包”等的口形相同。这种现象，判读必须注意。

此外，口形分析还应考虑方言和个人的语言特点。如果在一段汉语唇语中没有一个唇齿音的口形，除了恰好没有使用带 [f] 的词之外，是否说唇语人“飞、灰”不分？又如，[f]、[v] 的口形较多而半元音 [w] 却甚少，是否由于习惯把“吴、王”等词的 [w] 多发在唇齿部位的缘故？

笔者曾做过一个简单的试验。一次吃饭的时候，要求一个女孩判读唇语“真的还是假的”。用慢速说了三遍之后，女孩边思索边说：

“好像有一个 zh，还有一个 sh……什么‘还是淡的’，前边还有两个字……是说‘咸的还是淡的’。”

从翻译的角度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判读。但是从唇语判读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成功的部分。女孩毫无语音学知识，也从未受过唇读训练，但她准确切分了六个音节，正确判读出四个字。至于把“真”、“假”错译成“咸”、“淡”，意义上自然大错特错，但对一个从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女孩来说，能把 zhen、jia 的

口形判读成 xian、dan，恰好反映了一个人具有的判读潜力。这个例子可以证明口形分析法对于唇读的有效程度。

三

语境分析法是唇读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口形分析是把唇语“直译”为有声语言，由于形音关系的复杂性，在判读正常速度的唇语时，仅靠“由形推音”或“据形知意”，困难较大。如果辅助以语境分析，将能大大减少判读的困难。

语境分析的第一个方面是分析上下文语境（verbal context）。上下文语境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某一口形所表示的词语。前面说过，英语 mat、bat、pat、mad、bad 同口形，但在 as blind as... 这一特定上下文中，该口形显然指 bat，其他同口形词可以排除。而在 as... as a march hare 这一上下文中，该口形显然指 mad，其他可以排除。这是语境分析在选择同口形词方面的作用。

在某段唇语中，即便无法看清某些口形，通过上下文语境，有时可以补出相应的话语内容。例如：

At the close of the party they came out, stepping... tobacco and bright lights into the fresh night air. （晚会结束之后，他们走了出来……烟草和刺眼的亮光走进夜晚的新鲜空气之中。）

根据上下文语境，大致可以推出其中无法看清口形的部分（但时间长度可以知道）是说 from the fogginess（从难闻的烟草味）。这是语境分析在语义补充方面的作用。

语境分析的第二个方面是分析伴随言语行为同时发生的现场的自然现象，即唇语的自然语境（physical context）。说话的时间、地点、对象、现场的活动，听者的反应等构成了这一语境。自然语境可以提供唇语的某些意思。

鲁迅小说《肥皂》里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自然语境提供话语某些意思的能力。小说中四铭上街买肥皂的时候挑挑拣拣，不是嫌

贵就是嫌不香，又坚持先打开洋包装看看再付钱。店里有几个说英语的洋学生，挤眉弄眼地瞧不起他。其中一个朝四铭说了一句英语，学生们便都笑了起来。四铭不懂英语，但即刻知道，这“一定是一句坏话”，“骂人的话，骂我这样的人的”。原来学生们在骂他老笨蛋（old fool）。

这个例子中的英语虽然是有声的，但对四铭来说，他感受到的话语的意思完全来自当时自然环境的提示。唇读的道理也一样。假设我们在无声电影中看到一个孩子拉着一个妇女，一手指着商店橱窗里的玩具，嘴里嚷了一句话。开始的口形象“买、卖、埋”，后来的口形象“妈妈、爸爸”，那么我们根据现场的自然环境，人物的手势动作，就可以肯定他是在说“买，妈妈”，而不是说“买妈妈”，更不会是说“卖，爸爸”或“埋爸妈”等等。

语境分析的第三个方面是根据心理语境（psychological context）推测唇语。言语行为的一切背景，交流者双方的思想感情等构成了理解唇语的心理语境。假定我们在判读一段唇语演说，如果有关部门能预先提供演讲者的思想观点、身份地位、方言和个人语音特点，演讲的时间、地点、对象和主题，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新闻界的零星的透露等等，那么所有这一切就形成了我们在判读之前的心理语境。有了这些预先了解的与演说内容和演讲人有关的情况，无疑将有助于唇读，而且预先提供的信息越多、越充分，判读也就越准确、越完全。

四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载体。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唇读是为了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但是要从一段唇语中获取需要的信息，并不一定非得把它全部判读出来不可。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每个词所具备的信息量并不相等。一般认为，一个词出现的可能性愈大，由它传递的信息量也就愈小。比如在 We are going away（我们正在

离去)中, are 这个词在它所在的位置上是最可预测到的, 因此它的信息内容很少。假如未能判读出这个词, 结果未必会使我们少接受信息。

又如, 对“你在哪里吃饭”这个问题, 可以有三种回答:

1. 我在食堂吃饭。
2. 在食堂吃。
3. 食堂。

显然, 这三种回答都能完全满足问者对信息的需要, 这里, “食堂”具有较多的信息内容。如果判读出“食堂”而其余的部分不能判读, 依然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量。

唇读是口语的无声形式, 而口语是有比较啰嗦的, 内容往往重复, 包含很多次要信息, 以至冗余信息。比如我们说: “这就来, 请等等。我马上就来, 稍候一下吧。”作为唇语, 大约能判读出“这就来”也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主要信息。“请等等”是次要信息。再后面的话已经是冗余信息, 即便判读出来, 也增加不了什么内容。

由此可见, 一句话中不是每个词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信息, 一段话中, 既有主要信息, 也有次要信息以至冗余信息; 因此唇读的关键在于能否判读出负载所需信息的语句。在下面一节的例证中,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对于一个机密会议, 唇读者只要判断出一个具有最大信息量的字, 就可以对全部机密了如指掌, 而会议中其它的所有谈话, 竟然都无须一一加以判读。

五

口形分析和唇语判读是近现代以来随着聋哑人的语言教育而产生的一门应用语言学, 并日益得到广泛的运用。然而它最初的实践却远在中国春秋时代, 距今已有二千六百余年历史的齐桓公时期。现将这段珍贵资料抄录如下: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

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经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君呿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闻而听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

这段史料见于《吕氏春秋·重言》，《管子·小问》也有记载。齐桓公与管仲二人独自在高台上密谋攻打莒国，这是核心军事机密。周围没有能够听到他们说话声音的人。然而事情尚未公开，消息已经满城风雨。泄密者系东郭牙。但是他怎么知道的呢？原来，他窃密的手段就是唇读。从东郭牙的现身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进行唇读的全部过程实际上是唇语判读方法的综合运用。

首先，他从远方望见齐桓公说话时的一个口形——嘴巴开而不闭，看出这是发“莒”音的口形。这是运用的口形分析法。其次，他望见齐桓公说话时的表情动作，精神旺盛饱满，挥手踏步，手臂指向莒国的方向。这是唇语发生的自然语境。再次，东郭牙对一般君主的喜怒哀乐有过研究，现在齐桓公的表情属于“兵革之色”。而且，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齐国要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另一方面莒国又恰恰不肯臣服于齐。这些背景材料都与桓公与管仲君臣二人的

密谋密切相关，构成了东郭牙判读唇语内容的心理语境（或者说背景材料）。综合以上种种情况，东郭牙准确无误地掌握了这次谈话的最主要也是最机密的内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东郭牙判读的口形还较简单，但是他已经把“莒”这一最重要的信息从连续的唇语中切分了出来。东郭牙虽然还不能算得上是今天意义上的唇读专家，但是他的成功表明了他是世界情报史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唇读间谍。东郭牙事件，既是军事情报史上出色的窃密佳话，又是综合运用唇读方法的最早的典型范例。



女艾行间考

清代朱逢甲在《间书》开篇即云：“用间始于夏之少康，使女艾间浇。”^①在朱逢甲眼里，最早运用间谍战的是夏代成功实现“中兴”的国王——少康，而女艾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名间谍。那么，历史是否果真如此？这名叫女艾的间谍到底是男？是女？他又是如何行间的？围绕这位间谍我们还可以知道哪些其他故事？本篇试图穿越数千年的时光隧道，去迷雾深处进行一番探访。

一

“女艾间浇”发生在遥远的夏代。一般认为善治洪水的禹和富有勇气的启是夏最先的两个国王。之所以说启富有勇气，是因为他是那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启希望王位自此归于他们一家，一直三世、四世乃至万万世地流传，而不再像他的父辈祖辈那样“禅让”（时下人们喜欢称之为“公选”）。于是，他改“公天下”为“家天下”，不可谓不勇敢。当然，愿望固然美好，但不一定能完全实现。果然，等到启的儿子太康继位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太康在继承王位后不久，便由于“盘游无度”^②丢了王位。

据说太康耽于田猎。田猎本是生活所迫，为获得食物的一个正当途径，渐渐地也发展成为那时候男人们展示力量和勇气的一个游

① 女艾，据《左传》杜预注：少康之臣。女，音汝。浇，音傲，寒浞之子。

②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路史·后纪十三上》谓太康：“叶比于淫声”、“般游亡度”，从而失国，与《尚书》记载仿佛。

戏。正因为这种野外打猎活动能很好地吸引男人，并同时娱乐中实现“野蛮其筋骨，强健其体魄”的目的，统治者遂将田猎和军事训练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一套严格的“蒐礼”，^①并渐渐具有了军事部署、力量检阅和军事演习等多重性质。^②太康作为一国之君，喜欢这个项目似乎无可厚非，但是沉湎于当中不能自拔，当然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据说他为了打猎，有时甚至十个月还不知道回家。^③当国王当成这般光景，丢失王位是迟早的事情。东夷的有穷国^④后羿^⑤乘太康不备，起兵颠覆了夏朝，史称“太康失国”。^⑥

一般认为，“太康失国”是因为太康不能自律，失去了民心所致——至少儒家经典是这样说教的。不过，儒生们怎么说教是一回事，历史真相是否果如他们所说，毕竟难以确认。有学者指出，太康的失位可能和启当初破坏了“部族公选”的既定规矩有着某种联系。按照常理，新旧势力的交锋，往往并不能立即和简单地就定出胜负，其中不免要有多个回合的交锋。太康不小心失国，少康再励精图治夺回来，也许正是这新旧势力反复拉锯的结果。太康之失

① 详见《周礼·大司马》。

② 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693~715页。

③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太康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月弗归。”《路史·后纪十三上》谓太康：“叶比于淫声”、“般游亡度”，从而失国，与《尚书》记载相彷彿。

④ 钱穆《国史大纲》：《史记正义》引《晋地记》：“河南有穷谷，本有穷氏所迁。”《左传·定公七年》：“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文选·洛神赋注》引《华延洛阳记》：“城南五十里有通谷。”即其地。后人因“穷”名不美而易之。详见钱穆：《国史大纲》，1996年6月修订第3版，第19页。

⑤ 古史神话中有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但这个偷袭太康王位的后羿另有其人。杨伯峻指出，古史传说中有三个羿，都是射箭能手。一为帝喾的射师，见于《说文》；二为唐尧时人，传说当时十个太阳同时出现，羿射落了九个，见于《淮南子·本经训》；三为夏代有穷国的君主，见于《左传·襄公四年》，也即本文所说的羿。详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第2版，第146页。也有说，古时射官俱称羿。

⑥ 《史记·夏本纪》。

位，“在外看是失国，在内而言是断送了维系王室的血亲纽带”^①。

暂不管这些分歧，但说这后羿，他在得到王位后也一直耽于田猎，因“淫于原兽”^②而疏于朝政，又被他的谋臣寒浞把持了政权。有意思的是，同太康一样，后羿丢失王位也是因为外出打猎，可知在远古时期，能充分展示男人阳刚之气和雄强体魄的田猎，当是能够吸引男人兴趣的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只是这野外打猎占用日子不在少数——即便后来成为政府有组织的行为时仍能多达二、三十天，遂成为政敌们发动政变的良机。太康和后羿的丢失王位，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人由此称述他们“盘游无度”、“十月弗归”多少有点夸张，盖为说教之用。

太康失国之后，他的儿子相迁到了帝丘（今河南濮阳）^③。后羿对于相在外组建流亡政权并没有在意，任由其发生和发展。但寒浞似乎非常精明，他即位后非常重视对太康余绪的清剿。寒浞在得知相的下落后，立即派儿子浇（同冢，或傲）将其杀害。这个时候，相的妻子缙氏正在怀孕期间。她有幸从墙洞逃回娘家有仍国（今河北任县）^④，几个月后生下了少康。缙氏在寒浞的魔爪下惊险逃脱，一直念念不忘复仇。她含辛茹苦地在娘家把少康拉扯成人。夏朝有幸，这少康天生聪慧，而且非常懂事，少长之后还做成了牧正这样的官员，负责管理畜牧。他自打年幼就一直牢牢地记住母亲的训导，牢牢地记住太康失国的教训，也牢牢地记住寒浞所带给他们家的刻骨仇恨。他发誓要励精图治，报仇雪耻，努力恢复祖辈所创下的基业。“女艾间浇”便是发生在少康复国中兴过程中的一件事情。

①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页。

② 详见《左传·哀公元年》。

③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第1版，第31页。

④ 参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47页。

二

“女艾”这个名字《史记》中不见记载，但是《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了他的事迹。此外，《楚辞》中《离骚》和《天问》诸篇及前贤注释都对相关事件有所描述。“女艾间浇”的故事，我们只能依从《左传》、《史记》和《楚辞》等典籍及其相关注释描述如下。

寒浞在夺得君位之后，也担心太康的残余势力会卷土重来，不得不担着些小心。他本以为相被除掉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听说相有一个遗腹子在有仍国渐长渐大，且做成牧正之类的官员，立刻感觉大事不妙。为了斩草除根，寒浞即刻派手下一位名叫椒的杀手潜伏在有仍国，寻找机会加害少康。少康得到消息之后，赶紧逃到有虞国（今河南虞县）^① 避难。有虞国国王伯思看到这个逃难来的少康年少有志而且知书达理，非常喜爱，就把两个女儿许配给少康，并分给他一些土地和士兵，即“有田一成，有众一旅”，^② 大约是十里土地及五百余人——这些就是少康得以立足的基本力量。少康由此开始了他复国中兴的宏伟计划。

“利用婚姻方式团结诸侯，是夏代立国之本，国家的兴衰存灭每每与这方面的成功与否紧相交织。”^③ 太康耽于享乐而丧失王位，与被血亲抛弃也有一定关系。而少康则由于奋发向上而获得血亲的支持，矢志重新夺回王位。

少康的战略矛头直指寒浞。但是，寒浞因为已经占据了夏的先祖所创下的所有基业，力量已经非常雄厚，人口、土地、武器装备

① 参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47页。

② 《左传·哀公元年》。据《春秋左传注疏》，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

③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40页。

等等，均大优于少康。少康经过周密分析，发现还是不能鲁莽行事。如果准备不周，轻率地挑起和寒浞的战争，只能招致失败。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选派得力的间谍，先寻机铲除寒浞的羽翼，逐渐削弱对手的力量，进而寻找胜机，一举击破强敌。

少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制定的这个计划是非常合理的，也非常具有可行性，只是在选派何人担当间谍以及先除掉谁的问题上，又费了一番脑筋。想来想去，他决定先除掉寒浞那个名叫浇的儿子。寒浞的这个儿子力大无穷，是寒浞的得力助手。在确定行间对象之后，他又经过反复比较，选定女艾冒险前去敌营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他找来女艾，问他有没有勇气去敌营冒这危险，女艾点头答应。于是，少康又向他仔细交代了行间的对象和任务，给了他一些必要的盘缠，女艾就出发了。

女艾秘密潜入有穷国。经过一番努力，他成功找到了浇的住所。他事先就被告知这浇是寒浞的左膀右臂，力大无穷^①，据说他能把舟船在陆地上推着行走，^②但女艾并不惧怕，只是默默寻找着行间的机会。他通过私下悄悄打探，得知这浇爱好打猎，也有好色的毛病，并经常在一个名叫女歧的寡妇家过夜。这女歧是浇同父异母的兄长的妻子，二人的媾和似乎是古时兄弟共妻的遗风。兄长去世之后，弟弟取而代之，是当时常见的现象。女歧替浇缝补衣裳，而浇则耽于女色，经常在女歧家中留宿。女艾得知这一情况，心中大喜，觉得这正是他可以利用的机会。

一天晚上，女艾乘着夜黑，悄悄地潜伏到女歧家里，找到一个下手机会。他手持利刃，扑向卧室，照着床上酣睡之人猛力刺去。等到得手，仔细察看，才知道他的这次行刺只是误杀了女歧，而他所想行刺的浇，当晚根本没有出现，正好侥幸躲过了这次刺杀。

① 《楚辞·离骚》：浇身披强圉。据王逸《楚辞章句》：强圉，多力也。

② 《论语·宪问》：“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奭即浇，但“奭盪舟”是什么意思，一直众说纷纭。唐代孔颖达注为“陆上行舟”，即能把舟船在陆地上推着行走。

浇当晚躲到哪里，女艾不得而知。这次行刺失败之后，他更加努力地寻找浇的下落，并没有因为这次行刺的失败而一时气馁。他同时也担心浇在得知女艾被刺杀的消息之后，会更加小心翼翼地躲避自己的刺杀，这将会给自己的行刺带来很多不便，于是他决定及时调整行间策略。

女艾继续暗中悄悄打探浇的信息，后来，他得知浇对手下比较粗暴，不得人心，便决定从收买他的侍从入手，寻找更好的行间机会。此后，他不惜重金积极发展内线，争取引以为内援。不久，他就成功地收买了浇的一名侍从。可见，通过收买侍从行间的手段，其源头非常久远，而且是一个经过很多谍战检验的屡试不爽的一条行间方法。从浇的这名侍从口中，女艾得知浇不久之后就要去一个名叫尚干的地方打猎。于是女艾乔装打扮，扮作猎人模样，带着几名得力的随从和几只凶猛的猎狗，在猎场埋伏下来，静静地等待浇的到来。

浇的侍从果然没说假话，浇准时出现在尚干猎场。这时候，女艾已经做好了伏击的一切准备工作，等到浇一出现在猎场，女艾立即放出猎狗，将浇扑倒在地，他则趁机砍下浇的首级，从而一举铲除了寒浞的这位得力帮凶。

又过了一段时间，少康的儿子桀又寻机除掉了寒浞的另外一个儿子豷。寒浞的身边少了两个重要助手，立即显得势单力薄。少康则抓住时机，积极拉拢和收买夏的旧臣，号召他们一起讨伐寒浞，不久就消灭了寒浞，重新夺回王位。少康即位后，通过积极有效的治理，使国力得到很大提升，史称“少康中兴”。

三

由于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艾只字未提，故而“女艾间浇”事件在历史上尚存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处。

1. 女艾是男是女，是美女还是力士

女艾如果是男，则女艾间浇可谓之“行动间谍”，正如荆轲之刺秦；如果是女，则少康施展的是美人计，可比西施之事吴。《左传》记载这段故事时说：“（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一个“谍”字，生动道明了女艾的身份：打入浇处行间，但女艾是男是女，这里并未说明。笔者翻看有关资料发现，历史上明确指称女艾为女性的并不多，元代的俞琰算是其中一位。他在一本名叫《席上腐谈》的书中曾这样写道：“《左氏传》所谓女艾、《庄子》所谓偶女高、《孟子》所谓冯妇，果皆妇人哉。”相较俞琰，其他典籍在记载其事时，或谓“女艾杀浇”，或谓“女艾伐浇”，或谓“女艾谍浇”，而对女艾是男是女，皆讳莫如深，不置一辞。^①

性别不明的女艾为什么会被人误认为是女性呢？笔者认为，这除了和女艾这个名字本身含有一个读作“汝”的“女”字有关系之外，还可能是缘于对《史记》等书的误读，主要是对“诱”字的误读。《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少康）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这个“诱”使人产生联想，开始怀疑女艾是女性，是以女色相诱，进而觅得行间的机会。虽然《左传》说的是“女艾谍浇，后杼诱豷”，但到司马迁时擦掉了这个“谍”字，而只用“诱”字概述这段故事，人们也容易据此发生联想。此外，汉代王符在叙述这段故事时也特意改“谍”字为“诱”字：“（少康）使女艾诱浇，使后杼诱豷。”^②由于王著《潜夫论》在古代颇有影响，王符的改字无疑也加重了人们的猜疑。

其实，“诱”不能特指女色相诱，用财货或其他东西相诱，也是间谍战中的常用手法。比如少康派儿子杼执行“诱”豷的任务，也是用了“诱”字：“后杼诱豷。”如果据一个“诱”字判断女艾

① 如《通志》中说：“少康使女艾灭浇于过。”《中庸衍义》也顺从其说。《尚史》曰：“少康使女艾伐浇。”明代陈士元《名疑》书中则说：“使女艾杀浇。”此外的一些书，如《经典释文》、《绎史》等，均从《左传》曰：“女艾谍浇。”

② 《潜夫论》卷八。

是女性，不一定正确。

当然，女艾是男是女也许并不重要。有的时候，让我们保留对于历史的一份遐思，也许比得到一个准确答案更为重要。可能正是因为远古历史的这种神秘和朦胧，才吸引了无数的人们去不断进行探索，去努力寻求发现。

2. “女艾间浇”的另外一位主角——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能“盪舟”的力大无穷的力士

浇，音傲，王逸《楚辞注》引“冓”作“浇”，以声近通用。刘宝楠《论语正义》曰：浇、冓、傲三字，古多通借。女艾的行间对象——浇，是豪夺了后羿王位的寒浞的儿子。《左传·襄公四年》说：“浞行媚于内”，又说“浞因羿室”，指出寒浞是和后羿的妻妾发生了暧昧关系，然后生下了浇和豷。

据说寒浞的这两个儿子都骁勇善战，力大无穷，所谓“身披强圉”。寒浞倚仗他们，灭了斟灌和斟寻氏^①。在战争获胜后，寒浞派浇驻扎在过地，豷驻扎在戈地，形成犄角之势，精心护卫着赚取的政权。故少康要想复国中兴，首先必须铲除浇和豷。

《论语·宪问》记载了一段师生问答：“羿善射，冓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一个叫南宫适的学生问孔子：羿那么善于射箭，冓能够盪舟，却都不得好死，而禹和稷自己下地耕作，却得到了天下，怎么解释呢？孔子没有回答。他或许是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一时无法说清，或许是觉得这个问题太容易，不值得费口舌，总之没有作答。显然，他们所讨论的正是“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这断历史。这里的“冓”就是女艾的行间对象——“浇”。但“冓盪舟”的含义一直众说纷纭。唐代

^① 地名，或者氏族名。斟灌氏，或谓斟氏、灌氏；斟寻氏或谓斟氏、寻氏。在今河南巩县西南一带。参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47页。钱穆曰：“斟灌”或作“斟戈”，则“戈”即“灌”也；则“过”或即是“郛”。参见钱穆：《国史大纲》，1996年6月修订第3版，第19页。

孔颖达注为“陆上行舟”，而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做了长篇考证，以为“盪舟”解为“罔水行舟”较为贴切。且不管这些分歧，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南宫适将“盪舟”和“善射”并举，是表达对一种超强的个人能力的赞叹，并以此进一步论证徒有个人能力，没有礼贤下士的德行，不能赢得民心，同样无法赢得天下的道理，所以“盪舟”一定是一种常人无法完成的技能。后人据此说尧力大无穷，应该有几分道理。

至此，我们可以勾画出尧的大致形象：他能征善战，是寒浞一直委以重任的将领，但他和亘古时期的很多男子一样，有着耽于打猎和好色的毛病，也因此给了女艾行间的机会。

3. 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女艾间尧”这件事

由于夏的立国相去神话传说年代不远，故有关这个时代的故事也容易被当成神话。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对“女艾间尧”很是怀疑甚至给予了全盘否定。在吕著《先秦史》中，吕思勉根据叙述女艾间尧的两个人——伍员、屈原都是楚国人，因而认定其属于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且“《左氏》之女艾即《楚辞》之女岐，同属神话中人物。”他进一步根据“羿、浞之事，《夏本纪》一语不及”推断：“夏史之传，盖本皆神话传说。魏绛、伍员隐括而为之辞，虽似雅驯，仍不掩其荒陋之迹。然则其所言者，又安能尽据为信史乎？”^①可知，在吕思勉看来，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女艾间尧”这回事，甚至“少康中兴”也很值得怀疑。

吕思勉认定《尚书·夏书》是伪古文，从而对它的史料价值给予否定，进而怀疑这段旧迹，似乎无可厚非。但“少康中兴”这段历史，曾有多部典籍有过记载，比如《尚书》和《左传》等。在《左传》中，“女艾间尧”是和少康忍辱负重完成中兴大业的事迹一起，被伍员引来做劝诫之用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史和世界上诸多的古史一样，都存在着一个口耳相传的时代。这些“口

^① 详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91~93页。

述历史”固然不能作为信史，但多少也具有一些史料价值。况且，“女艾间浇”同这些口耳传说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差别：它虽是在对话中出现，但它的载体毕竟是可以委以信任的《左传》。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史实，伍员和魏绛哪里有这个胆子在面对一国之君时信口雌黄。

除了《左传》、《尚书·夏书》等史书之外，屈原等也曾以诗歌的方式对这段故事进行过追溯。在《楚辞》的《离骚》和《天问》等篇章中，“浇”这个远古时期的力士，曾经被作者数次言及：

浇身披强圉兮，纵欲杀而不忍。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

《离骚》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战国晚期楚国的屈原，而《天问》的作者则很可能另有其人。顾颉刚、刘起釞等认为，这篇史诗（指《天问》）的写成时间当在战国初年，甚至是春秋之末。^①由此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绵延数百年之久的岁月中，少康和羿、浞之事曾广为人知，是人们口耳习传的故事之一，故此才被作者屡次引来作为歌赋。

如前所述，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师生也曾讨论过这段往事。虽然《史记》在《夏本纪》中未及一言，但在《吴太伯世家》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且与《左传》无多大出入。这些都可以进一步说明，发生在夏代的这段王朝更迭的故事，并非子虚乌有。借助《左传》、《尚书》等史书和屈原等人的歌赋，以及王逸、洪兴祖等学者的注释，“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包括“女艾间浇”这段历史，似乎可以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① 详见刘起釞：《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页。

我国上古历史虽辽远迢遥，但于立国、失国等重大事件，似乎都能有较详细记载。在文字没有诞生的时代里，先民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录历史。大概有一些被说得像故事，有一些则被说得像神话。所以，我国古代的很多故事或者神话，往往都能折射出一些史实出来。先民选择心口记载的事件显然是有所甄别的，只有那些特别重大的事件，才得以久远地流传，经得起时间的涤荡。盲人由于视力不好，记忆力往往胜过普通人一筹，所以这种口耳相传的历史，多由他们完成接力似的传递，因此便有以瞽为史的现象出现，即所谓“瞽史”。

从“女艾间浇”这一故事的流传也能或多或少看出这个特点。按照常理，我们很难断定有这么多异地相传的古书能够这样协同一致地作伪，而且设计得如此天衣无缝。所以，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在遥远的夏代，曾经确有这么一位间谍，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性别和年纪，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后来又到哪里去了，但我们知道，是他曾经为了少康的中兴大业，冒着生命危险做了一次超级间谍，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由此而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间谍。只此我们便应该记住他的名字——“女艾”。



伊尹行间考

《孙子·用间》中说：“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孙子所云“伊挚”即伊尹，是我国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名相。“伊尹在夏”说的是他深入敌国——夏，长期为商汤担任战略间谍，大量收集军政情报的经历。这些情报对商汤灭夏起到了重要作用，故曰：“殷之兴也，伊挚在夏。”

众所周知，“负鼎入殷”和“放太甲”是伊尹留给后人最著名的两件事情。前者说的是他起于厨官，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汤的重用；后者则是说他在任上不惧流言，敢把皇帝拉下马，将一国之君太甲罢免流放。^①而通过孙子的著作，我们可以得知，伊尹曾经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间谍。伊尹为获得关于夏桀的第一手情报资料，曾深入敌后，巧妙行间，立有大功。在返回商之后，伊尹又根据自己所探得的这些情报，同商汤一起研究制定灭夏的战略方针，并一举打败强敌，平定天下。由于时光久远，史料阙如，人们对于伊尹行间的认识尚嫌不足，甚至怀疑是否确有其事，本篇搜罗史料，对相关事件做一番探究，以供读者明辨。

—

伊尹，生卒年不详，传说为河南开封陈留人，本名挚。他曾在商汤时任官阿衡，太甲时任官保衡，故又有史书称之为阿衡或

^①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太甲杀伊尹，不见于正史。

保衡。^① 相传伊尹为奴隶出身，也说是在开封一带种庄稼的，后来才做成了厨吏之类的小官。^② 除《史记》之外，后代记载伊尹事迹较多的要数《吕氏春秋》。在这部由秦相吕不韦杂糅各家精义而成的著作中，“伊尹”这个名字出现60余次，数量之巨，为先秦其他典籍所不及。从中大概可以看出吕不韦对于一代名相伊尹的欣赏。

从《吕氏春秋》这部书中所描述的情形来看，伊尹的出生便颇具传奇色彩，由“其母有倪氏采桑得之”。伊尹的母亲在采桑过程中是否经过了什么样的艳遇，在采桑之后得到伊尹这个遗腹子是否为母系社会的遗风（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甚或伊尹是否为弃婴等等，今天看来都已经是谜团了。

伊尹的出身是个谜团，其前半生事迹也已失考，但他的后半生由于已经贵为一国之相，所以有一些史料肯于记载。通过《史记》、《孟子》、《吕氏春秋》等典籍，我们至少可以确信一点：伊尹是鸣条之战的指挥官，也是辅助商汤取得灭夏胜利的大功臣。正因为伊尹后半生的军政活动有迹可考，而且轰轰烈烈，所以一般视之为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

伊尹被商汤起用的过程，史籍说法不一。有人说伊尹是主动求用和毛遂自荐的，也有人说他是受到商汤高薪聘用或热忱相邀的。^③ 由此我们可以不难推想，伊尹的政治才干在当时应该已经小

① 据《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毛诗正义》孔颖达疏曰：“伊尹，名挚，汤以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则，伊尹、挚、阿衡、保衡一人也。”

② 第一种说法以《墨子》为代表。《墨子·尚贤中》：“伊挚，有莘氏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庄子》、《楚辞》、《韩非子》及《吕氏春秋》等书有类似记载。第二种说法以《孟子》为代表。《孟子·万章上》：“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司马迁在《史记》不能辨其真伪，二说并存。

③ 《史记·殷本纪》：“（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

有名气。但即便如此，他在夏朝还是郁郁不能得志。据说伊尹曾经失魂落魄地“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有明”^①，只此我们便可以想象他内心一度何等之失望。《册府元龟》等书俱说伊尹“黑而短”，其貌不扬，不知何据。如果此说是事实，伊尹一度不受重用也许有这方面因素。盖“以貌取人”是亘古便有的陋习，伊尹就已经深受其害。

在几番挣扎和反复比较之后，伊尹最终决定离开夏而投奔商。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打动商汤的竟然还是他的厨艺。大概商汤口中寡味已久，猛然间尝得新鲜美味，便很是赞叹。他吃了这顿还不忘下顿，便找手下打听厨师的姓名，手下人这才向他推荐了伊尹。伊尹见到商汤对他所做的饭菜产生兴趣，便以“知味”为喻，建议商汤要像“调和五味”一样来治理国家，再进一步求得天下的太平和国家的强盛。显然，商汤并没有以貌取人的恶习。他在听了伊尹的这番演讲之后大喜过望，深知伊尹的贤能正是他所一直期待，于是选择良辰吉日，在宗庙举行了隆重热烈的仪式，破格任命伊尹为相。^②伊尹总算遇到一位明主，而且感受到了恩宠。此后的日子里，他便一直为商汤效命，贡献了自己毕生的才学和富有成效的治国方略。

二

商为华夏族的一个分支，生活在黄河下游的河南、山东一带。在汤为王时，商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国力迅猛上升，甚至初步具备了与西方的夏王朝相抗衡的能力。夏其时由残暴无道的桀统治政权。赖有前朝基础，夏的实力一直大优于商。但夏桀的残暴远近闻名，一直不得人心。甚至连商汤本人也曾被桀无缘无故地囚禁过，并且受尽了凌辱。汤在被释放之后，决心振兴商朝国力，图谋报仇

① 《鬼谷子·忤合》。

② 参见《吕氏春秋·本味》。

雪恨的机会。汤求贤拜相，重用伊尹，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伊尹上任后，建议汤不要急于对夏用兵，而是要一面努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一面注意多方收集有关夏的各种军政情报，对夏王朝的发展动向和政治走势进行严密的跟踪，争取把握住最佳的用兵时机，实现一举破敌报仇雪耻的目的。

为了搞好敌情侦察，伊尹甚至亲赴险地，力求掌握敌国的第一手资料。伊尹在夏的行间经历可从《国语》、《竹书纪年》、《绎史》及《吕氏春秋》等书中见到事情的大概。而儒家经典则乐于述说他的政治实绩，尤其热衷于褒扬其“放太甲”的勇气，故而对其入夏行间的事迹则较少提及。

据《吕氏春秋·慎大》：“汤人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从中可以看出，为了不使夏桀起疑心，在伊尹赴夏行间之前，伊尹和汤就如何取得夏人的信任动了不少脑筋。伊尹故意犯下大罪，然后负罪逃跑，而汤则假装对伊尹的罪过和负罪出逃大感愤怒。盛怒之下，汤挽弓搭箭，对着出逃的伊尹直欲射之而后快。箭弦响处，伊尹则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匆匆地赶往夏朝。

伊尹在到达夏之后，很快设法获得夏人的信任。他依靠着以前学到的厨艺很快在夏站稳了脚跟。他并且以厨人的身份四处活动，多方刺探敌情。在前前后后共计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收集到大量关于夏的军政情报乃至桀本人的宫廷生活秘闻。伊尹的这次行间，显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对夏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之后，伊尹便找了个合适的时机，秘密地潜回商都，向汤作了一次详细的汇报。伊尹告诉汤，夏桀耽于女色，宠信小人，不顾民众死活，终使“上下相疾、民心积怨”^①，可以说，夏朝正处于大厦将倾，其命运该当结束了。

伊尹这次入夏总共三年时间。《竹书纪年》卷上记有：“十七

^① 详见《吕氏春秋·慎大》。

年，商使伊尹来朝……二十年，伊尹归于商。”三年应该是一个不短的数字，从中可知伊尹行间的艰辛。这三年当中，伊尹收集了多少有关夏朝和夏桀的情报，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伊尹对于夏朝的情况已经掌握得相当清楚。汤在听取了伊尹的汇报之后非常高兴，获得了更大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决心，与伊尹一起细致周密地筹划起灭夏大计。

在看到商汤有如此坚定的灭夏决心后，伊尹也非常高兴。他同时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再次潜入夏朝一次，主要目的是更多地掌握夏桀的兵力部署和防线调整情况，好为汤确定进攻路线做好情报保障。经过研究，伊尹此次赴夏之后，立刻选定夏桀所宠信的妃子末喜作为用间对象，力争对她进行策反和拉拢，再发展为内间，为自己所用。因为在此之前，伊尹已经通过行间了解到夏桀的脾性和爱好，知道末喜是个多少能左右夏桀言行的女人。

末喜（《国语》作妹喜），想必是一位超级美女。据《竹书纪年》，伊尹潜入夏之前，末喜已经在夏桀左右，可知末喜本不是伊尹所安插的间谍，而是后来经过收买或策反才成为其内间。那么，其貌不扬的伊尹是如何成功地收买了貌若天仙的末喜，则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据《竹书纪年》：“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而弃其妃于洛。”^①好色的夏桀因为得到了新宠，自此厌倦乃至抛弃了末喜。末喜则很自然地由此开始心生怨恨。这个时候应当是伊尹收买末喜的一个重要时机，以伊尹对夏的了解，他应该不会错失这个良机。所以，夏桀抛弃末喜的这个时间段很可能就是伊尹成功收买她的那个时间。

可以想见的是，为了策反妹喜，伊尹一定在她身上用尽了各种心思，使出了各种手段。如果是金钱收买，那么这笔钱的数目一定

^① 据《竹书纪年》卷上：“（桀）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吕氏春秋》也有类似记载。

不在少数；如果是投其所好，伊尹一定是对末喜做了精细的研究，乃至将国中的稀世珍宝奉上也属可能。而作为交换，末喜将夏朝的军力部署情况等悉数透露给了伊尹。由于此前夏桀“常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末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实则参与和影响了夏的国政建设，而且也对夏的军事力量和兵力部署等情况了如指掌，故此，她方能为伊尹提供很多富有价值而且非常准确的重大情报。

从未喜的被收买、策反，直至在夏桀身边作为卧底作内间，心甘情愿地为伊尹搜集军政情报的过程来看，伊尹在夏的这次行间，所实施的是一出成功的反间计。伊尹的这出反间计，很可能是我国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早的一出反间计。而末喜，则很可能是有明确史料证明的我国最早的一位女间谍，而且是一位内间。孙子曰：“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①按照孙子的说法，末喜这位女间谍应该是一位内间吧。

在古代典籍中，只有《吕氏春秋》详细记载了末喜将夏的军情和兵力部署情况透露给伊尹的经过。据《吕氏春秋·慎大》，末喜趁人不备时悄悄告诉伊尹：“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据说，末喜这里所说的东方与西方、胜与不胜等，都是极具情报价值的暗语。他们连在一起恰到好处地提示了夏朝防务的虚实之处，从而为伊尹后来选择进攻方向和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末喜是否就是这样与伊尹完成情报传递的，尚且不能确信，但我们可以相信伊尹一定是通过包括策反末喜在内的种种手段，在把夏的军情摸得清清楚楚之后，才有了对夏的总体作战思路，才有了汤后来对夏的大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考察到的多是社情和民情的话，那么这一次伊尹则成功地侦察到了夏朝的军情。夏的底细已被伊尹悉数掌握，其灭亡更指日可待。

^① 《孙子·用间》。

三

就在伊尹赴夏行间期间，汤也没有闲着。在他的领导之下，商继续扩充着经济和军事实力。数年之内，商先后灭掉葛、韦、顾等周边小国，疆土进一步扩大，军事实力也得到进一步的增强。^①而夏王朝则由于桀的暴虐和无道，已经日显颓势，行将分崩离析。此消彼长，此时双方实力已经非常接近。伊尹在和汤经过细致分析之后认为，偌大的夏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举进攻夏朝的时机即将到来。

伊尹非常清楚，这次商的进攻夏必然地牵扯多方面利益，尤其可能引发一些邻国的激烈反应。这些邻国中，有的曾经是夏的属国，有的则是刚刚投靠商的，有的至今尚处于观望和摇摆的态度。所以，为了慎重起见，伊尹觉得有必要考察一下夏周边小国的态度。

为此，他建议汤即刻停止向夏纳贡。^②夏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愤怒，立即号召周围众多的小国联合起兵攻打商汤。众多小国不敢怠慢，响应了夏桀的号召。看到夏桀尚有相当的号召力，伊尹认为，进攻夏的时机此时尚未完全成熟，于是立即向夏补缴贡品，将出兵之事暂且按下不提。第二年，伊尹如法炮制，目的还是为了察看那些邻国的态度。幸运的是，这一年的情形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当商汤再次停止向夏纳贡，夏桀再次号召周围小国联合起兵攻商时，遭到了其他周边小国的一致抵制，乃至根本无力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军队。^③据此可以看出夏桀和他的夏王朝溃败速度之快。伊尹和商汤判定，夏桀已经处于众叛亲离的状态，进攻夏的时机此时已经真正到来。

伊尹根据多年行间所收集到的有关夏的军政情报，制订了迂回

① 《孟子·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② 参见《说苑·权谋》。

③ 据《左传·昭公四年》，有缙氏首先叛夏；据《说苑·权谋》，九夷之师也不奉夏命。这些记录大体反映了夏桀失道寡助的一面。

进攻的战略方针。根据末喜所提供的情报，夏在与商接壤的边境集结了大量兵力，所以商汤的军队及时避开了这条防线，而选择了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进攻路线。他们的大队人马悄悄地一直往东进发，“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①。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伊尹和商汤选择的这条进攻路线，正是当初末喜通过隐秘渠道悄悄透露给伊尹的。这条进攻路线的选择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当然也同样大大地出乎夏桀的预料，让夏桀来不及做出反应和调整。

在成功铲除夏在东方的辅助势力之后，伊尹突然挥师西进，出敌不意，迂回至夏的首都。夏桀的军队来不及进行调整，即刻陷于混乱。双方的军队一直互相纠缠，虽然劳师远征，但商汤的军队并没有处于下风。两支军队在战至鸣条（今河南封丘东）附近时又进行了一次大决战。经过这次决战，夏桀的军队被最终摧毁。汤成功地覆灭了夏朝，自此开始建立了一个完整和强盛的商王朝。

孙子说“知迂直之计者胜”^②，伊尹和商汤所指挥的这次灭夏之战，显然也是“以迂为直”，依靠的是进攻路线的出人意料取胜。与此相比较，伊尹此前可靠的情报保障，应当是他们最后顺利取胜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显然，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可靠的情报保障，才可能进一步制定出“以迂为直”的作战路线，最终取得意想不到的作战效果。

古往今来，民心向背一直是一个关系到政权存亡的大问题。统治集团取民有道、顺应民意本是最好的治民之术，反之则是自取灭亡。商汤的兴盛和夏桀的覆灭，再次验证了这样一个真理。当然，如果深究商和夏此次政治军事角力过程，尤其是考察其间策略谋划和战略制定，则可以立即见出伊尹行间所起到的作用。伊尹亲为间谍，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情报资料，为商汤制定战略战术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在商兴夏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① 《吕氏春秋·慎大》。

② 《孙子·军争》。

四

伊尹在夏的行间经历可以找到多处史料证明。除了《吕氏春秋》有明确记载之外，《绎史》也有详细记述。《国语》记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伊尹利用末喜打探夏的情报的史实。《竹书纪年》中也与《国语》的记载大同小异。正是因为确有其事，大军事家孙子断定伊尹曾身为间谍，并在他的著名兵书——《孙子》13篇中明确说道，“殷之兴也，伊挚在夏”，从而把殷商的兴盛与伊尹的行间直接联系起来。这充分说明，在先秦时代，人们对伊尹在商灭夏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作用有足够的认识。

历史上对伊尹行间有模糊认识的，当首推宋末著名学者王应麟。王氏瞧不起间谍，故此他一面怀疑伊尹的间谍身份，一面认为把伊尹认作间谍是后人对伊尹的诬蔑。在《困学纪闻》中，王应麟这样写道：“（《孙子》所谓伊尹间谍云云）此战国辩士之诬圣贤也。”当然，持这种论调的还有明代著名学者茅坤和清代的汪绂。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茅坤这样说道：“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异于后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论伊尹、太公，多以阴谋、奇计归之。”^①而汪绂则认为，《孙子》中说伊尹反间是“重诬圣人”，主张将相关句子删除。^②

显然，阴谋奇计并非一无是处，间谍更不能随意褒贬。客观地说，长期在隐秘战线默默奉献、甘做无名英雄的间谍，其忠诚奉献精神，堪为其他行业模范。也许正是为了对王应麟进行纠正，清代学者朱逢甲在《间书》中称赞伊尹救民于水火，几可称为“圣人”，虽然做过间谍，又何损于他的形象呢？这该是对伊尹比较正

①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五。

② 详见《戊笈谈兵》。

面和客观的评价了。

伊尹在被汤任命为相之后，敢于冒险深赴敌国，这是极富勇气和冒险精神的。伊尹假装得罪商汤，以获罪的名义，避过射杀的劫难，逃离商，潜入敌国，可谓深谙谍报经营之术。此后历史上的种种间谍派遣之法，诸如政治避难、苦肉计、逃亡等等，莫不由此翻出。通过叩问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伊尹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起用美人计的用间大师，而末喜则是最早利用女色行间的内间。伊尹亲为间谍，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一方面，他与商汤之间的这种垂直领导，并无其他干系和中间环节，有利于战略情报的保密和传输；另一方面，伊尹对情报资料的取舍、研判能力，也使得他在获得大量社情、军情后，能及时合理地进行分析研究，并以此为出发点，立即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伊尹选择末喜作为行间方向，也被证明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末喜的暗语为伊尹和商汤选择战略进攻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伊尹在对敌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后，善于分析，周密筹划，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破敌路线，并制订了周密而富于奇效的进攻计划，可谓善于经营战略情报的大师。

伊尹的间谍活动非常成功，他对战略情报的分析判断能力也值得称道。然而，伊尹的才能不止于此。他的军事才能，使他能贵为一国军师，率领军队战强敌建大功。他的政治谋略高人一等，能悟得“调和五味”的治国安民之术，并以“知味”为喻打动商汤，赢得信任，并在政治活动中获得实效。他尤其富于眼光，能识得大体。“以臣放君，天下不为替；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①充分证明了他对于商王朝的忠诚。唯其如此，他方能和社会大变革时期，正确地把握住历史潮流，成为了推动历史前行的英雄。

① 苏轼：《伊尹论》，《东坡全集》卷四十二。



吕尚行间考

吕尚，生卒年不详。原姓姜，名望，又名子牙。吕尚的祖籍历来说法不一。一说他为东海上人。^① 一说其先祖起源于宝鸡一带，是姜姓血统的一个氏族，后来才居住在吕地（今河南南阳西），故此改姓吕。关于“吕尚”这名字的得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由于他在周初任太师之职，被习惯尊称为“师尚父”，所以就此被习惯称为吕尚。因为他同时又是齐国的始封君，故而又有“姜太公”、“太公望”等多种称谓。按照古史记载，吕尚应该是个长寿翁。因为他受到姬昌的重用已经是晚年的事情了，而他在辅助周文王姬昌之后又先后辅助过周武王姬发和周成王姬诵，不仅享有高寿，同时也堪称西周政坛的常青树，为西周王朝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贡献。

吕尚不仅具有丰富的政治才能，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堪称我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启蒙者，并在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军事才能出色，“多兵谋与奇计”，故此，“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谋略）皆宗太公为本”。吕尚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对于后世著名的军事家，如管仲、孙武、吴起等，莫不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或许也正是这个缘故，甚至历代都有不少军事著作托名于他，其中最著名的应该算是战国末期的《六韬》。

^① 《史记·齐太公世家》。

据说吕尚是贵族后裔，自小接受过比较严格和正规的教育。西周乃至更早的时期，我国已经具有较为完备的教育制度，但是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享受到高规格的教育。这些教育项目中，既有文化教育，又有军事理论教育和军事技能训练，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这些贵族子弟培养成为所谓国士，好为维护贵族们的既得利益及维持阶级统治服务。贵族吕尚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军事谋略，与这段时期的教育不无关系。

但是，吕尚在接受了这些高层次的教育之后并没有受到重用。在仕周之前，他的政治地位非常低下，身份非常卑微，一直胸怀丘壑却不能施展抱负。传说吕尚也曾经投靠过商，但在见过纣王的种种无道行径之后，只能一声叹息，遂游历天下。在长期的游历过程中，吕尚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和掌故。故此，他虽不能甘心满腹经纶终无所用，却也能平心静气地过着一种等待的日子。

吕尚的大半生似乎一直就是在这种等待中度过。他执着地等待着贤明之主，却在不知不觉中等来了满头白发。贤能若此，却被闲置若此，一般人多会因此而沦落，留着清醒和不泯雄心的，也大多只剩有郁郁寡欢。但吕尚的理想和抱负，才华和智慧，尤其是救济社会的热心肠，直到苍苍老矣时却依然如故——这大概才是他最终赢得机会，并能被姬昌委以重任的关键原因吧。

吕尚投靠姬昌的过程也说法不一。影响最大的说法见诸《史记》，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关于一根钓钩的故事。根据太史公司马迁的描述，这件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吕尚听说姬昌是个重视知识和人才的贤能，故而带着钓竿赶到渭水之滨。这是渭水河滨一处水草丰茂之地。吕尚貌似神闲气定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河面上水波不兴，吕尚的内心却是激流奔涌。听说他时常会来这里打猎一些野味呢，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来？吕尚

这样想着，便感觉到他手里这根鱼竿的分量了。这时候，有个闲人过来问，老人家，你钓鱼咋这个钓法啊，你这鱼钩直直的，根本钓不到鱼啊？吕尚听了之后，只微微一笑，随即置之不理。这样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姬昌总算带着一班随从出现了。看到吕尚，姬昌心生惊讶：好一个气宇非凡的老者啊！他随即恭恭敬敬地迎上前来给吕尚请安作揖。吕尚顿时明白，部族之中关于姬昌贤能通达的传言果不为虚，于是就和姬昌答话。交谈之中，吕尚更加感受到了姬昌的贤达和英明，便把胸中丘壑和盘托出。姬昌立即拜吕尚为师，都三军。^①

吕尚辅助姬昌，很得经国要领。周本偏处西隅，是个弹丸小国，但由于他们君臣协力，治术得当，不久便开始逐渐走向强盛。吕尚一生政治经历，可简单概括为四个阶段：遇到姬昌之前的失意阶段，姬昌（文王）时为灭商作准备的阶段，姬发（武王）时的辅助灭商的阶段，为维系西周统治服务的阶段。这四个阶段中，尤以第三个阶段，即辅助姬发灭商的阶段，倾注了其杰出的军事智慧和才能。他杰出的情报思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这期间，他还有一次冒险行间的经历，为姬发的伐商灭纣做好了充分的情报保障。

二

吕尚告诉姬昌，如果想谋得“大治”，必须要先把无道的殷商王朝政权推翻。而灭商大计，最要紧的不外乎四条：其一，发展壮大自己；其二，迷惑纣王，不能给他察觉出姬周的真正意图；其三，对殷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的全面深入掌握；其四，寻机策反商纣的羽翼，使纣王陷于孤立。

吕尚早年曾有过在殷商求职的经历。这使得他对商纣的军政概

^① 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并见于《吕氏春秋》和《说苑》。

况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但他认为仅仅有这些了解还远远不够用。一次战略决战的成功实施，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容忽视。如果想实现覆灭商纣的目的，必须对对手的动态、兵力部署及战略意图等进行紧密跟踪。于是，在吕尚的巧妙部署下，姬周的间谍不断地悄悄潜入殷商。通过这些间谍及时有效的侦察活动，吕尚得到商纣“欲杀文王而灭周”^①的情报。这可说是一件令吕尚和姬周上下都立即寝食难安的麻烦事。吕尚苦思对策，认为姬周眼下最好的办法便是制造大量的假象麻痹纣王，使之立即调整战略矛头，不与姬周为敌。

吕尚劝讽文王的主意，后人曾有托附：“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②这段话的实质，是主张韬光养晦，麻痹对方。吕尚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能及时打消商纣对姬周的征伐念头，以当时双方实力对比，很可能招致姬周的灭顶之灾。如果能很好地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战略意图，使商纣放弃对姬周的武力征伐，便可以最终实现“苟能因之，必能去之”^③，再进一步将殷商一举击溃的战略目的。

在吕尚的劝导下，文王立即在周原建立商的宗庙，大事祭祀商的先祖，以表示对殷商的顺从。姬周还答应商王到周的辖区进行狩猎活动，满足他的口舌之欲。除此之外，吕尚还在国都“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④，竭力给纣王造成文王耽于女色和沉湎享乐、不思进取的假象。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姬周联合起所有反对殷商的诸多小国，即“帅殷之叛国以事纣”^⑤，表面上臣服于

① 《吕氏春秋·行论》。

② 见《六韬·武韬·发启》。《六韬》虽托名之作，但此处意思与吕尚及姬周战略对策的深层指导思想大体不差，可资参考。

③ 《六韬·武韬·文伐》。

④ 《资治通鉴外纪》卷二。

⑤ 《左传·襄公四年》。

纣王，内地里却一直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扩大反殷反纣的同盟。

经过种种努力，纣王终被吕尚一系列的假象所迷惑。纣王认为姬昌并无与商争夺天下的实力与志向，大体属无能无用之人。纣王并且对姬昌的忠心表示欣赏，说：“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也。”^①他委以姬昌军事实权，“赐命西伯得专征伐”^②。纣王从此把战略矛头瞄准东方国家，而在西部防线上仅投掷少量兵力。这样，商不仅在与东方之敌的交战中不断地消耗实力，同时也在最重要的战略后方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三

殷商的所谓东方之敌主要是指东夷。吕尚经过细致分析后认为，曾是殷商属国的东夷，其实可以引以为西周之援，而发展为殷商之敌。故此，吕尚在仕周之后，又去殷商再作了一次间谍活动：策反东夷叛商。

古史专家王玉哲说：“周人大概为了牵制纣王在西方的兵力，派遣打入商内部的间谍吕尚，入东夷为之鼓动叛商。”^③吕尚行间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反东部诸侯，让他们不再与商纣为伍，而是成为周王的盟友，一起加入周王伐商的队伍中来。即便不能达成这个战略目的，也一定要争取让这些东方小国制造一些事端，从而牵扯商纣更多的注意力，打乱其兵力配置和战略部署，好为下一步周王的征伐战争做好准备。

按照王玉哲的说法，所谓东夷主要是指徐淮夷一带。这些东方诸侯方国既是商的重要属国，同时也是商最为重要得战略后方。故此，吕尚选择这里作为行间对象，在战略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① 《淮南子·道应训》。

② 《竹书纪年》。

③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4页。

有人说，所谓东夷，即指东海，也就是吕尚早年居住过的地方。既是早年的居住地，吕尚对此地风土人情等等应当不陌生，这应当便于其开展间谍工作。可见，吕尚选择东夷作为行间对象，是具有相当的可行性的。

吕尚选择了适当时机，成功越过商的边境，打入商的后方，从事策反东夷的工作。他来回穿梭于东夷各个方国之间，向东夷国王数落商纣的暴虐，并且详细介绍了姬周的贤明政治和逐步发展壮大以及受到越来越多拥护的基本情况。吕尚需要告诉他们的是，民心向背已经使得商纣王朝崩溃在即，姬周取代它是早晚之事。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东夷仍然继续拥戴这个堕落的王室，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和前途。可能东夷王起初也有一些犹豫不决，毕竟他们事商已经多年，一直屈服于纣王的淫威。吕尚则继续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终于说服了他们。东夷王决定举倾国之力，协助姬周，通过共同努力，使得商纣首尾不能相救，以尽早地摧毁和瓦解这个残暴的王朝。

由于历史久远，吕尚行间的具体情况，古籍中鲜有记载，故此其中的详细经过尚待继续考证。总之，吕尚一定是在东夷进行了一系列艰苦运作和一番煞费苦心的经营，才能成功地使得东夷背叛商纣，自此站在周的一边，成为周灭商的同盟军。东夷叛商之后，立刻一变而成为商纣的心腹大患。商纣得知这个消息，震怒之余，也不得不立即调整战略部署，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付东方之国，并从此陷入了一段耗时久远的消耗战争。

商纣倾全国之兵力和物力，在经过多年的征讨之后，终于使东夷再次臣服，但与此同时自己也元气大伤。在派兵攻打东夷的这些年，商纣的兵力和物资储备都遭到极大的消耗，国内的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民生渐渐成为大问题，国运开始日趋衰落，终于一蹶不振。这便是吕尚行间所能达到的最为理想的效果。正是乘着这个重要时机，姬昌和吕尚联合其他众多盟国共同举兵，遂能一举战胜强敌。

东夷叛商，《左传》中有明确记载。^① 古史专家丁山认为，“东夷叛商与吕尚有关”。^② 他认为，吕尚的行间是导致东夷叛商的直接原因。他进一步认为，“商纣为黎之蒐”与“西伯（周文王）勘黎”是同指一次战争，且是商和周在黎的一次有名的决战。^③ 在他看来，东夷的叛乱实与姬周的西线作战是遥相呼应的，这才使得商纣首尾不得兼顾，故而落得大败。

商、周在西线作战之时，东夷乘机起而叛之，则可知东夷与周的联盟行动，也可知其中必有细作来往，以作协调沟通之需。而且，东夷与姬周位置分处东西，其间正好隔着殷商。因为必经之地就是敌手，情报传递必然遭到严密盘查，这给他们之间的协调联络带来极大不便。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又是在东夷潜伏的吕尚所必须解决的。那么，吕尚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据说“阴符”和“阴书”这两种情报传递方式就是太公吕尚所发明，专为传递秘密情报和机密文件之用。所谓“阴符”，是用铜、木或竹板制成，以板之长短为秘密通信信号。而“阴书”则是将秘密文书一分为三，派三人分别传送，敌人如果不能将三部分内容全部截获则无法了解文书内容。^④ 正是这些有效的秘密传送，很好地保证了东西盟友之间的沟通协调和情报传递，以及联盟战略的贯彻实施。

在《孙子·用间》中有“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一句，这至少说明吕尚行间，包括吕尚对殷商的洞悉，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周兴商亡的关键原因。此正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⑤。考察《左传》和《孙子》等著作，吕尚的行间该同伊尹行间一样，当是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以后一度非常流行的观点。在《鬼谷子·忤合》

① 详见《左传·昭公四年》。

② 丁山遗著：《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版，第191页。

③ 丁山遗著：《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版，第189~191页。

④ 详见于汝波：《太公望秘密传信》，载《军事历史》，1985年第1期。

⑤ 《左传·昭公十一年》。

中，也有“吕望三就文王，三人殷”的说法，侧面揭示了吕尚多次来往商周的事实。这种多次往返，除了行间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意图呢？

四

《左传》所指出的商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充分说明了吕尚在东夷行间的成功。正是吕尚深入殷商属国的这段非常成功的行间经历，才使得纣王的战略部署发生重大失误，国力遭到极大损耗，故此才能成就姬周的灭商大业。在殷商行间期间，吕尚一直非常注意收集商纣的重要情报，对殷商的军情社情民情均能注意观察，这些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为他和姬昌商定灭商大计、制订作战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之相反的是，纣王在与姬周战略决战的前夜，败笔迭出，失误连连，如此荒唐的国君，岂有不亡之理。总体看来，纣王既不能识别姬周的情报示伪，又不能对己方的战略情报进行有效的保密；既不能及时削减姬周的实力，反倒授人以渔，可说是一直在被吕尚的行间和情报谋略牵着鼻子走。周的坐大，直至开掘殷商坟墓，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我们反观吕尚，通过在情报战线的一系列的成功运作，他既对殷商的国情军情有了充分的了解，又成功地赢得了发展实力的时间和空间，还意外地赢得了一些同盟力量，从而一举为灭商夯实了基础。吕尚的行间和战略情报运作的成功之处还在于，极大地迷惑了对手，使之错乱地调整了战略方向。而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姬周既达到了消耗对手的目的，也使之不能兼顾东西两线，直至最终留下极其虚弱的一道防线，等着自己的乘势一击。故此，《孙子·用间》曰：“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周武王即位后，周的大政方针并无重大调整，仍是在吕尚的指导下励精图治，蓄势待发。周不停地兼并周边小国，这倒是纣王当

初所赋予姬周的任务。吕尚和武王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从敌国传来的情报信息。间谍先期送回的情报显示殷商政治上一片混乱：邪恶之人受到重用，而贤良之才却被罢黜。武王和吕尚认为，只此还不到出兵的时候，便派间谍继续侦察。不久，他们又得知商朝的老百姓都因为畏惧纣王的刑罚，不敢开口评论政事了，便信心倍增，继续大量派出侦察人员进行打探。等获悉一千得力辅佐都灰心地要离开纣王这个无道昏君时，吕尚和武王认定伐纣的日子已经不远。

姬周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实力上的巨大跃升，而殷商却在茫无头绪中迎来了一次最致命的内乱。由于王子比干的被杀和重臣箕子的被囚，商的统治几近分崩离析。吕尚和武王认定时机已经到来，便立即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对敌寇的最后一战。约在公元前1046年，即武王即位后第四年的某一天深夜，吕尚率领着姬周的兵马，顶着暴风骤雨，悄悄地向殷商进发，最终完成了灭商的历史使命。



武官溯源

我国军事外交学界普遍认为，“武官制度产生于欧洲的拿破仑时代”^①，且断言中国的武官迟至 19 世纪洋务运动方具雏形。^② 这里，试将笔者的意见陈述如下，以求能对中国武官之源得出稍许正确的判断。

公元前 630 年（晋文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年，郑文公四十三年），晋国联合秦国出兵围攻郑国（今河南新郑等地）。大兵压境，晋军驻扎在函陵（郑地，今河南新郑之北），秦军驻扎在汜水南面（郑地，今河南中牟之南）。面对两个军事强国的联合出击，郑国危在旦夕。此时，郑国的老臣烛之武见危受命，连夜出城前往秦营，直接同秦穆公举行秘密会谈。烛之武利用秦晋之间的利益矛盾，从秦国的角度分析了“亡郑”之后的形势及其对秦国的得失，从而使秦穆公决定撤兵，瓦解了秦晋联军。晋国出于无奈，只好随之撤军，于是郑国避免了一场亡国之祸。

根据烛之武与秦穆公的谈判结果，秦国在撤兵之前与郑国订立了盟约。双方达成的共识有二：一是“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即今后秦国的外交使节因出使东方各国而途经郑国时，郑国须履行为其供应所需物资粮秣的义务；二是“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即秦国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名将领协助郑国的防务工作。于是，杞子等三人作为秦国派驻郑国的军事代

① 杨松河：《军事外交概论》，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224 页。

② 杨松河：《军事外交概论》，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27 ~ 31 页。

表便留在了郑国。^①

从《左传》和《史记》的有关记载看，杞子等人在郑国的约两年半的时间里，主要活动有二：一是掌握了郑国的“北门之管”；二是积极开展情报工作。《史记》在《郑世家》和《晋世家》中分别说：“郑司城缙贺以郑情卖之”，“郑人或卖其国于秦”。郑人出卖“郑情”也好，“卖其国”也好，其间的联络员自然是杞子等人。《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则记载，杞子从郑人手里获得了开启北门的掌控之权。由此可见，杞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通过交友工作，获得了郑国都城司城（即主管城防之官）缙贺的信任，不仅获取了“郑情”，甚至连郑国北门的钥匙都能加以控制。于是他立即派人向秦穆公送出了一份情报：“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与此同时，杞子等人则开始在馆舍中秘密筹备策应工作。时在公元前627年。

秦穆公接到这一情报后，不顾老臣蹇叔的坚决反对，决定出兵远征偷袭郑国。秦军匆匆行至滑国（今河南偃师之南），恰好遇到郑国极具情报意识的爱国商人弦高、蹇他等人。弦高原本要去成周（今河南洛阳）做买卖，发觉情势不妙，便立即机智地假借郑君的名义拿出四张熟牛皮，再送上12头牛来犒劳秦军，并假意说：“寡君听说你们行军要经过我国，让我先来犒劳大家。考虑到你们将在郑国宿营，我们已准备了一天的供应。当你们离开时，我们还将提供一夜的警卫。”这实际上是警告秦军：郑国已得知秦军将偷袭郑国且郑国已做好了战争准备。秦将孟明听了此话，便知郑国已有防备。偷袭既已无望，围攻又无后援，只好率军回国。

秦军将要偷袭郑国的情报，被弦高迅速传回国内。郑穆公（郑文公于上一年去世）便派人前往杞子等人的“客馆”侦察，发现他们已经“束载、厉兵、秣马矣”。于是，郑穆公派人揭穿他们试图里应外合的阴谋，并驱逐他们出境。受命前往馆舍的大夫皇武

^① 详见《左传·僖公三十年》。

子对他们说：“诸位久住在敝国，我们已经没有干肉、粮食、牲口可供应了。听说你们要走，那你们就自己去猎捕点野味带上吧。”阴谋既已被揭穿，杞子等三人便只好分别逃往邻近的齐国和宋国。^①

据上所述，笔者认为，杞子等人很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上最早的武官，至少是早期武官的雏形。

首先，根据秦、郑双方会谈，秦军撤兵回国，决定“舍郑以为东道主”，可见两国已结束敌对关系，并建立了邦交。杞子等人留在郑国，实质上已成为秦国派驻郑国的武装力量的外交代表。这与今天武官概念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其次，杞子等人是军人，且是将领。春秋时代，将相分职尚未完全形成，所谓出则为将、入则为相，便是这个意思。《周礼·夏官》中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杞子、逢孙、杨孙都是秦国的大夫，大约在秦军中相当于“师”、“旅”级的军阶。他们既然在秦国撤军时留在郑国协助其防务工作，可见他们当时的身份是一国派驻他国的军事代表，是军官而非文官。

再次，武官须征得驻在国的同意才能派遣，而杞子等人的留在郑国，不仅为郑国所同意，且有秦郑两国的正式缔约。又次，就杞子等人在郑国的活动情况看，一是联络司城缙贺，积极开展外交工作，乃至取得“掌其北门之管”的成绩，二是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不仅收到了“郑人卖情”的实效，而且因一份情报引发了一场秦国决定千里偷袭郑国的军事行动。这与今天武官所担负的开展军事外交和军事情报工作两大基本任务完全吻合。

第四，武官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郑国即使在查明杞子等人已经将器物捆束完毕装上了车，且磨好了兵器，喂饱了马，却仍不

^① 详见《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能将他们逮捕或绳之以法，而只能以类似照会似的外交辞令加以驱逐。这也是武官的外交豁免权在杞子等人身上的反映。

最后，武官应有自己的馆舍，馆舍中可有一些自用的车马装备和兵器，所在国应保障馆舍成员的生活物资供应，这些条件，从上述情况中，不难看出也是完全具备的。

其实，春秋时代，诸侯争霸，战乱不已，军政外交工作是大大小小诸侯国必须面对而又十分繁重艰难的任务，而承担这项任务的便是外交官，只是那时不叫外交官而叫“行人”罢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些行人，除了日常的聘问庆吊一类的外事活动之外，或为了挽救诸侯国的危亡，或为了土地争端，或为了战争与和平问题乃至军事结盟等等，不辞劳苦地奔走于各国之间。^①所谓“疲于奔命”，其源即出于此。翻开一部《左传》，到处可见行人的踪影，时时可见“盟会”、“馆舍”之类的字样。因此，杞子之类的驻外军事代表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战争与国际关系的必然产物。

也许有人认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与今天的国家在概念上有别。这话自然不错，不过，历史是发展的，事物也是在不断演进的，如果无视于此，怕是少了点治史的思想方法。即便是今天的“国家”这个概念，也许其内涵中最重要的无非是领土、主权、武装力量这几个要素，而这几条，春秋时代尤其是春秋后期的诸侯国已经完全具备。

至于以“武官”一词（militaryattaché）源于法语，便认为武官只能起源于法国，更是难以成立。譬如 paper（纸张）一词乃英语，岂能由此断言造纸始于英国而非始于中国？如果硬是以西方的标准断言武官起源于18世纪，世界上的第一位武官是西方的某个人，甚或认为中国的武官制度源自西方，始于清末，其思维方式恐亦难免胶柱鼓瑟之讥。

^① 参见储道立：《军事外交家子贡》，载《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笔者相信，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历代的军事外交家及军事外交活动，不仅对于准确了解军事外交史有意义，而且对于深入认识人类的军事外交实践也是甚有价值的。

向戌弭兵述评

公元前546年（晋平公十二年，楚康王十四年），经宋国执政大夫向戌的奔走努力，饱受战乱之苦的晋、楚、齐、秦、卫、鲁、曹、宋、郑、许、陈、蔡、滕、邾共十四个诸侯国在宋国都城商丘召开休战大会并订立盟约，史称“向戌弭兵”。^①此次弭兵是春秋时代一次极为成功的国际和平运动的结果，堪称古代社会和平运动的典范。弭兵的成功实现，借助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相对比较全面、多元的条件，是春秋之世各诸侯国诸多矛盾的积累、爆发和消融的产物。由于弭兵之盟的达成，中原与荆楚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和争夺终于告一段落，国际战略态势也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本文拟对这次国际和平盟会的前因后果作一番探寻。

—

春秋时代，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和晋文公曾先后称霸，在北方形成了一个华夏族诸侯的同盟，以共同抵御异族入侵。齐国也好，晋国也好，他们共同的大敌都是南方的楚国。楚多年致力于经营南方，在吞并了一系列小国并自觉实力不错了之后便试图向北方进军。然而，由于中原诸侯的一致对抗，楚国向北发展的步伐始终不很顺利。以晋国为首的北方诸国同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势力在宋国、郑国一线遂展开了长期拉锯。

^① 参加盟会国家数目用杜预《左传注》：会者十四国（齐、秦不交相见，邾、滕为私属）。

晋、楚争霸是春秋之世最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百余年间，两国之间大规模的会战就有四次：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和公元前557年的湛阪之战。由于争霸，为数众多的小国相继灭亡。晋、楚因此而成为吞并小国最多的两个国家。郑、宋、卫等处于两个大国夹缝中的二流国家虽然能一直生存下来，却不得不饱尝艰辛和屈辱。比如郑国，当楚国的势力压迫过来时，它只好倒向楚国，然后晋国便要兴师讨伐它，它只好再倒向晋国。郑国这种墙头草一样的无奈，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国小力弱，另一方面也是晋楚争霸的残酷和凶险所决定的。

百余年的时间里，利益的分割和得失使中原诸国内部渐渐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在北方联盟中，齐、秦两个重要的大国因受楚国的拉拢分化而逐渐同晋国貌合神离直至反目。在南方，由于吴国的崛起，晋国立即对其进行拉拢，使之成为交好，于是楚国的后院有了随时起火的危险。为此，晋楚在争霸时不得不更加小心。国际事务从此不再是这两家说了就算，这种情形套用今天的话来说，此时的国际社会已经由“两极对抗”转而趋向“多极化”了。

在北方联盟中，齐、秦所扮演的角色一度是晋国的稳固后方和比较坚定的同盟者，而郑、宋则往往不得不承担起抵御强楚北上第一道防线的任务。其中，齐、秦的情况有稍许差别。齐国自从齐桓公称霸后很长时间一直把自己当作中原老大，所以当北方团结在晋国周围一致抵抗楚国时，它不很服气不很积极，但也不反对，不搞破坏同盟的事情，直到后期受楚国拉拢并迫于形势变化，才由貌合神离到大打出手。晋、齐乃发生了公元前555年的平阴之战和公元前550年的太行之战。秦国曾经有恩于晋文公，但晋文公上台后并没有履行当初的诺言将土地送给秦国，虽然秦也与晋通婚而勉力维系着友好，但对于晋国已经不满，后来遂发生著名的崤之战，公元前578年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麻隧之战。

郑国和宋国的情形也有些不同。郑国早在庄公之世曾得意过一些日子，此后便沦为大国争霸的角斗场，处于夹缝之中惶惶而不可

终日。起初它还比较支持晋国，但随着晋楚争霸形势的日益紧迫和二者之间长期犬牙交错局面的出现，其立场便有些举棋不定了。在一次楚国提兵攻打之际，大臣子良进谏郑王曰：“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其无信，我焉得有信？”^① 郑国从此放弃了“信义”，而选择了一条“与其来者”即唯来犯者是从的外交方针。这确是无奈之举。宋国一直以殷商后裔自居，自感出身高贵的宋人不愿做出背信弃义的事情。比如，公元前594年，楚攻宋，宋于是立即向盟主晋国求救，哪知晋国使了个坏心眼，佯称救兵马上出发，让他们拼死抵抗，背地里却坐山观虎斗，想等楚国的实力消耗而至衰弱之后再动手。宋国在救兵一直没来的情况下，以“易子而食，析骸以爨”^②的气概让强楚望而却步，订立了城下之盟。

春秋时代的迂阔之事常出于宋，人们常以“宋为迂阔仁义之国”而对宋人心存偏见。^③ 愚见以为，由于古风犹存，宋人做事常透出一种可爱和可敬，而这或许不能完全讥之为“迂阔”。宋人不惜一切代价坚拒强楚的勇气，比之当时“朝盟夕叛”的中原诸国不知强多少倍，与一仆二主式的郑国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宋国在晋楚争霸的过程中受到的损失并不比郑国小，也同样是迭为战场，屡被兵甲。宋人很苦恼，也在不停想办法找出路。他们总设想着将交战双方拉到一张桌子旁坐下，通过签订停战条约的方式平息国际社会无休无止的战祸。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就通过积极斡旋，促成了晋楚的和解。这是晋楚第一次结盟，史称“华元弭兵”。然而，由于双方积怨太深，彼此不能十分信任，和约仅维持三年。公元前576年，楚国背盟，出兵攻打此时与晋结盟的郑国，郑随即与楚结盟转而攻宋，晋立即组织诸侯营救。于是中

① 《左传·宣公十一年》。

② 《左传·宣公十五年》。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65页。并见台湾：《中国历代战争史》，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63年版，第1册，第129页。

原再度狼烟四起，春秋史上第一次因华元发起而成的弭兵之盟遂宣告破裂。

二

晋楚重开战火后，晋国与东南新崛起的吴国联手，楚国则与西北的秦国合作，双方展开了新一轮长达近三十年的对抗。因为双方的战略后方均有对方得力的牵制力量，此次对抗变得更加凶险。30年间，大规模的会战就有晋楚鄢陵之战和湛阪之战，吴楚衡山之战及晋齐平阴之战。其他如齐鲁、郑宋之间的局部战争更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中原大地重新回到水深火热之中。

这种情形下，郑、宋等国又只能惶惶而不可终日了。公元前565年冬，楚伐郑，郑只好屈服于楚，晋随即攻郑，郑只好再次归依晋，然后楚再次出兵伐郑。由于劳民过度，公元前563年，郑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内乱。起事者杀死了执政大臣并劫持国君，强烈要求改变内外政策。这次叛乱直等到贤明的大夫子产出面才算平息。而到了公元前554年，郑国再次发生暴动，执政子孔被杀，子产被任用为卿。

郑国的内乱实际上是国际国内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国际因素，尤其是晋楚双方的连年征伐导致郑国不堪重负恐怕更直接更主要。郑国的内乱后来似传染病般在诸侯国间蔓延开来。公元前552年，晋国内乱，大臣范宣子杀死另一重臣栾盈，晋国的国政落入范宣子和赵武手中。公元前551年，楚国内乱，令尹子南专权，继而被楚王所杀。公元前550年，陈国内乱。公元前548年，齐国内乱。公元前545年，卫国内乱。一连串的内乱说明，各国，包括晋楚这样的第一等大国，对于战争的承受能力均已到达极限，仗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打下去的时候了。直到这时，晋楚的长期相持对抗才真正有了画上一个句号的历史机遇。由于难分胜负，加上都有后顾之忧和内政的危机，双方再次有了和解的意愿，弭兵也终于再度

被提到议事日程。

公元前548年，赵武执政晋国，和平运动正式开始启动。他在接见鲁国的叔孙豹时分析了齐、楚等国的形势，并预测：“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①他这番话既是对国际战略形势走向的判断，同时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中原地区军事集团盟主的和平意愿。郑国的子产因此断言：“晋楚将平，诸侯将和。”^②并对气势汹汹而来的楚军采取了忍让态度，以便为诸侯的媾和创造条件。宋国的执政向戌也察觉出晋楚媾和的意向。向戌一直对华元弭兵的功绩仰慕不已，很想借弭兵运动塑造国际名望，加上他恰与晋国执政赵武和楚国令尹屈建都很友善，所以便成了这次弭兵运动的发起人。

向戌首先赶到晋国与赵武会晤，会谈异常顺利。其中重臣韩起的话很能反映晋人的心态，他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昭诸侯，则我失盟主也。”^③可见，晋已深知各国期盼和平的愿望，休战已是大势所趋，如若让楚率先赞同弭兵之议，则晋将失去盟主地位。晋国既然同意弭兵，向戌便赶赴楚国，楚国果然不出韩起所料，应允弭兵。向戌于是再奔赴齐国。齐国大臣陈文子意识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④也答应弭兵。向戌于是再赶到秦国，秦也同意弭兵。几个大国一旦拿定主意弭兵，其他小国当然弹冠相庆，至此，和平运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召开弭兵大会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公元前546年夏，各诸侯国代表先后前往宋国赴会，磋商弭兵结盟有关事宜。从五月甲辰（二十七日）晋国的赵武第一个到达宋国算起，到七月乙酉（初九）于宋都的蒙门正式结盟为止，弭兵大会历时42天。会后，晋、楚又互派使节前往对方会盟以巩固双方友好关系，弭兵之盟到今年九月最终完成。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③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④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盟会期间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四。一是如何使“晋楚之从交相见”。晋与楚各有盟国，既然召开国际和平大会，两大集团麾下的随从国，理当互相朝见对方的盟主。小国好办，但齐、秦两国的地位与晋、楚相当，晋不能指挥齐，楚也不能指挥秦。经向戌斡旋，双方才一致同意除齐、秦之外，其他与会成员需朝见晋楚双方。二是会议必须“齐言”。所谓“齐言”，即统一盟辞，以确保结盟之时不再发生争讼。虽说是国际会议，各国均有可能发表不同意见，但只要晋、楚意见一致，便可确保大会达成协议。为此，向戌又连夜在晋楚之间的预备会议上使双方就盟辞达成“齐言”。三是楚人“衷甲”突发事件的处理。鉴于弭兵大会随时有破裂的可能，双方都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与会，并以篱笆为界，分驻南北两边。七月辛巳（初五），双方准备在宋都的西门之外结盟，不料楚人以“晋楚无信久矣”^①为由在外衣里穿上战甲赴会，气氛一时极度紧张。幸亏晋国以大局为重作出忍让，才使弭兵之会没有中途流产。四是“晋楚争先”的矛盾。按照礼仪，大会有个晋、楚两国谁先歃血的问题，先歃血者当然便是此次盟会的盟主。晋国再次作出让步，让楚人占了先。^②不过第二天宋王宴请诸国大夫时，推举晋国具有谦让之德的赵武为最尊的客人，因此晋楚在这次会盟时也算平手。不管如何，弭兵总算达成了。

三

向戌弭兵是当时纷繁的国际矛盾冲突和调和的产物，它的成功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② 晋国赵武作出让步与晋国另一个重臣叔向的劝说不无关系。赵武惧怕楚人“衷甲”，求教于叔向，叔向说道：“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也。”劝晋国做必要的忍让，来换取和平。对于“争先”，叔向也劝说赵武“务德，无争先”，力争以部分退让达成盟会。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实现，借助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和相对比较全面、多元的条件。

1. 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看，弭兵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诉求

战祸频仍必然增加各国的经济负担，导致民生凋敝。晋楚长期的争霸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损失非常巨大。不必说苦于晋楚为争夺中原地区控制权而迭为战场、屡遭兵祸的郑国和宋国，即使晋楚这样的大国在争霸后期也已出现疲态，不得不面对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生计的问题。至于其他各国，即便平时也要按例向所属的盟主交纳贡赋。弭兵大会期间，为了避免今后同时向晋楚两国纳贡，邾、滕两个小国分别以齐、宋附庸的地位与会。鲁国本是一个独立国，国际地位并不低，但在弭兵大会期间竟也曾一度考虑比照邾、滕的办法，甘愿成为他国附庸，其初衷即在试图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这件事很能从侧面反映晋楚争霸给各诸侯国带来的沉重负担。为此，各国普遍希望有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以便发展国内经济建设，这是弭兵运动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2. 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看，弭兵可说是诸侯争霸和各国内乱必然的逻辑结果

首先，华元弭兵破裂之后，晋国一直未能对楚构成压倒性优势。而楚也深感难以实现征服中原的“先君之业”，一度产生“收师而退”的念头。^① 晋楚长期争霸而又相持不下，便不得不转而寻求休战。

其次，楚国的拉拢分化使得齐、秦与晋由盟友变成敌手。而晋国的外交运作，则使吴成为楚的重要牵制。吴的崛起、秦的壮大、齐的不甘示弱，使得晋楚争霸的主旋律之外又出现了吴楚相争、秦楚联合抗晋、齐晋交战等一系列战事。至此，国际格局明显呈现出“多极化”特征。这多种力量的制衡使得和平的出现有了可能。

^① 《左传·襄公十八年》。

再次，自公元前563年郑国内乱之后，十余年间，包括晋、楚在内，各国普遍发生内乱。一个国家内政不稳时，会有外患乘虚而入，但当大家都面临内政不稳时，反倒可能会各自设法退出外战，以期致力于国内安定。在内部隐忧上，晋的压力更甚于楚。晋国因栾氏之乱，政权便掌握在韩、魏、赵、范氏等六大家族手中。他们皆势力强大而互相倾轧，渐渐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加之协同其争霸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发生内乱，弭兵之议便可谓恰逢其时。晋楚争霸时，晋在歃血争先和楚人衷甲问题上不得不作出让步，大抵也出于这些原因。

此次弭兵的成功并冠以向戌之名，也与宋国执政大夫向戌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大国争霸给小国带来了巨大灾难，由此也可能注定弭兵的斡旋任务要由一个小国来完成。史载向戌好名，“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①，向戌本人确也因此而名垂青史。公元前526年，诸侯合力拿下邻近宋国的逼阳后，准备将其封给向戌作为领地，向戌却以死请辞，说道：“若专赐臣，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矣。”^②向戌不愿以私利而引发诸侯兼并土地的战争，可见他顾大体识大局。正是他这种全局观使他做出大事业。公元前546年，向戌自觉以和平使者身份穿梭于各国之间。半年左右时间，他跑遍今天的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广大地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好名”而又坚韧不拔的向戌，弭兵随时可能胎死腹中。

向戌弭兵也是对33年前华元弭兵经验的总结。第一次弭兵带来的和平局面虽然只维持了三年时间，但无疑为向戌弭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比如，把主要的精力付诸晋楚这样的关键国家，无疑就是向戌从华元那里得到的启示之一。只要主宰国际社会的大国强国愿意弭兵，国际安全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时至今日，这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② 《左传·襄公十年》。

一点仍有启示意义。向戌弭兵与华元弭兵不同的一点是，向戌充分考虑到齐、秦二等大国对于弭兵的达成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因而没有忽略对他们的外交联络工作。相比之下，华元则忽视了这一点，第一次弭兵的破裂恰好就是由于晋攻秦，秦怂恿楚攻晋而告破裂。

3. 当时各主要国家执政大臣的善于审时度势也为向戌弭兵创造了条件

比如，晋国的赵武执政伊始就归还诸侯土地，且“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属国的经济负担，缓和了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当崔氏、庆氏刚刚执掌齐国政权的时候，赵武便敏锐地看出齐国将谋求与诸侯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于楚国的令尹屈建，他也洞察其内心世界，认为只要做好有礼有节的外交工作，加强联系，便“兵可以弭”。^② 晋国大夫叔向在楚国“衷甲”赴会和赵武非常不满的时候，及时劝导赵武从大局出发，从而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危局。郑国的子产在嗅出和平的气息后能对来犯的楚军作出忍让，以期用小我的牺牲换来国际和平。所有这些，都是实现国际和平不可缺少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屈建）”。^③ 向戌与他们所保持的私交，使得他能在整个弭兵运动中成功地扮演“国际联络大使”的角色并最终使弭兵大会得以在自己的祖国召开。

四

向戌弭兵是中国古代社会国际和平运动的成功范例，也是春秋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史划为前后两期的分野，春秋史的发展自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公元前 546 年实现弭兵之后，公元前 541 年诸侯又在虢“寻盟”（重温旧盟），巩固既得成果，和平的局面于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至于弭兵之盟的最终破裂，历史学界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公元前 497 年的齐攻晋标志着弭兵的完全破裂，这样弭兵共维持了半个世纪。^①也有人认为，弭兵之盟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春秋的结束，从而长达近一个半世纪。^②二者之所以存在较大的时间差，原因在于各自对于弭兵的性质认识。前者把弭兵之盟当成了中原之盟，故而齐晋两国甫一交手，便认为宣告盟约的破灭。后者则基于弭兵之盟是晋楚两大集团结盟的认识，认为晋楚此后一直相安无事，表明盟约仍在生效。

撇开这些分歧，向戌弭兵对于当时国际格局、政治、经济等产生的巨大影响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1. 向戌弭兵后，晋楚长期争霸的局面不复出现

向戌弭兵对于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影响深远，国际力量的重组使得晋楚长期争霸的局面不复出现。弭兵之前，国际形势是以晋楚争霸为主轴，而弭兵之后，国际形势则变为晋楚主导下的和平时代。虽然间或有战争发生，但总体规模已经不比从前，且以国内争权和国与国的局部冲突为主。从此，晋国的盟国要朝见楚国，楚国的盟国也要朝见晋国，楚国因而可以倾心对付东南方向的吴国，晋国也趁机加紧对北方长期袭扰自己的少数民族的清剿。晋楚两国虽偶有冲突发生，但总体上仍能保持克制，使得盟约得以继续生效，从而保证各自的长期战略计划得以贯彻。如公元前 533 年，楚灭蔡，其叛盟的做法让晋不得不作出反应，立即组织诸侯营救。但意外的是，楚国内部一次纷争导致楚王被杀，新就位的楚平王立即宣

①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49 页。

② 台湾：《中国历代战争史》第 1 册，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63 年版，第 316 页。

布从蔡撤兵，并向晋国表示仍遵守弭兵之盟。再如公元前 508 年，楚再次围攻蔡，晋只有再召集诸侯准备抵抗，不过楚国又一次由于吴国在其战略后方的袭扰而退兵。危机之中，晋国并没有乘机发动对楚的进攻，弭兵盟约也得以继续履行。楚国从此之后终于意识到，吴国才是自己身后最危险最紧迫的敌人，转而专心对付吴国，争霸的战场由此从中原转向南方，改晋、楚争霸为吴、楚、越争霸。

2. 向戌弭兵的实现对于各国政治面貌的改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范文澜总结弭兵给各国政治带来的变化时指出：“大会以前，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兼并，其次是大夫兼并；大会以后，形势变为主要是大夫兼并，其次是诸侯兼并”。^① 在弭兵之前，晋、楚都希望通过弭兵使得自己的内政改革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顺利展开。但弭兵之后，政治改革却沦为内部的争权夺利。在晋国，大族专权的局面渐渐无法收拾，国君的地位随之越发衰落，终于酿成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局面。齐国政权经过几番较量之后落入陈氏手里，后来演出“陈氏代齐”的一幕。鲁国则由“三桓”大夫争政，演变为三家分立，国君被渐渐架空。其他如宋、卫、郑等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在政权的面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只有南方的楚国忙于应付吴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不过，楚国令尹的权力也渐渐坐大，偶尔还在政坛上掀起如公元前 533 年的弑君自立的波浪。

3. 向戌弭兵为各国发展经济提供了契机

向戌弭兵所达成的和平局面，为当时各国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一直存在的经济与战争的矛盾。战争的发生和结束，使各国均意识到，发展经济生产自始至终应为举国头等大事。弭兵的实现无疑给各国发展经济提供了契机。这其中，值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 1 册，人民出版社，194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29 页。

得特别一提的是子产。他于公元前543年在郑国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极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废除西周以来一贯的公田制，使土地私有化，从而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地尽其力，受到拥护。其他如鲁、楚等国也伴随土地私有化而在赋税上做了一番改革。此外，和平的环境也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加之铁制农具等出现，春秋后期的生产力得到了较程度的发展。

4. 向戌弭兵所创造的和平局面为实现中原与南方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融创造了条件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从中不难看出，春秋时代，南方和北方在经济文化上是一直是处于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状态。而在弭兵之盟缔结之后，由于南北朝贡往来，华夏文化也随之对楚有了更大影响。公元前537年，晋楚之间成功实现了联姻。公元前516年，政变未遂的王子朝率领众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①，使得周文化对楚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列国之中，王子朝不选择他国而奔往楚国，可见楚已被中原列国视为华夏文化的一员。在弭兵之后，没有了战祸压迫的双方人民，从此才可以更宽松、更自由地从事贸易和文化往来。

^①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我国最早的特种作战部队

在我国，特种作战部队的雏形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现将这段历史简要介绍如下。

公元前488年（吴王夫差八年，鲁哀公七年），鲁国违背同吴国在缙（今山东枣庄市东，苍山县稍北）订立的盟约，举兵攻打邾国（都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25里），并俘虏了邾隐公。邾大夫茅夷鸿求救于吴。其时，吴国势力正日渐强大，北部的疆域已扩张至今天的徐州、新沂一线的北面。次年，吴王夫差遂借口举兵北上攻打鲁国。

为了出敌不意，吴军特地由沂蒙山区的崎岖险路行进，并利用当地一名曾因水源污染纠纷而被鲁人扣押过的老乡充当向导，迅速攻占了鲁国的武城（今费县西南约90里）和东阳（今费县西南80里之阳关镇，一说今平邑县南数里之东阳镇）。继而经五梧、蚕室，一路向西北挺进，直扑鲁国的都城（今曲阜）。东阳战斗的第三天，吴军与鲁军再战于夷（今泗水县东）。夷役一战，鲁军大败，三名将领阵亡。次日，吴军驻扎泗上（今泗水），夫差本人则住在略东的庚宗。

数天之内，吴军三战皆捷。泗上距离鲁都仅三十多里，可谓已经兵临城下，鲁国随时有可能亡国。

为了挽救危亡，就在吴军进驻泗上的当天夜晚，鲁国的大夫微虎决定组织一支精悍的战斗部队夜袭吴王的住地庚宗，企图通过绑架或捕杀夫差来避免鲁国的灭亡。

微虎连夜从自己统率的部队中召集了700名军士。由于时间紧

迫，为了选拔军事素质和体能状况都很优秀的人员，他在自己帐幕前的空地上临时架设起一种木格，犹如今天军事训练场上设置的障碍物，然后命令这700名军士奋力跳跃木格，每人限跳3次，以便测试各人的体能和技能状况。孔子有一名学生叫有若，当时24岁，正值少壮之时，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是一名“国士”。他也参加了这次选拔。经过测试，微虎最后从中挑选了包括有若在内的300人，并迅速组建好突袭部队，立即连夜向稷门（鲁都城的南门）出发，拟由稷门出城，奔袭庚宗，遂行特殊作战任务。

就在微虎率领的这支部队到达稷门即将出城的时候，有人要求鲁国的正卿季康子出面阻止这项行动。理由是这样做不足以给吴国带来伤害，而且只会白白牺牲鲁国的这批优秀人才。季康子于是下令制止了这次行动。

吴军的情报刺探工作相当灵敏及时。当微虎的这支由300人组成的特种作战部队连夜向稷门进发而尚未出城之时，夫差就已经掌握了鲁军的最新动向。尽管微虎的部队最终并没有出城，心有余悸的夫差仍然在一夜之间连续多次更换了住处，并且不得不在灭亡鲁国唾手可成的大好形势下主动向鲁国提出了停战求和的要求，然后撤兵返回。

今天来看，微虎的这支特种作战部队具有如下一些显著的特点：一是组建迅速，从定下决心到组织实施，均未过夜，可见鲁国的部队具有良好的快速反应能力。二是任务独特，旨在通过绑架或捕杀敌国君主同时也是最高军事统帅的夫差，迫使敌军就范，从而免除亡国危险。三是战士的选拔条件和选拔方法非常简要明确、切实可行。虽然时间仓促，仍旧不忘对应选人员进行必要的考核，并根据夜间奔袭的战斗要求，选择简单易行而又有效的测试项目。四是战斗员的素质水平高，其成员不是一般的“卒”，而是“国士”。

所谓国士，就是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大而言之，春秋后期，各诸侯国的卿大夫都有供养力士和勇士的风气，例如吴王阖闾在训练中要常备士兵带甲执兵一口气跑300里才能休息（见《墨子·

非攻中》），并曾选拔力气大的 500 人和跑得快的 3000 人在战斗中打前阵（见《吕氏春秋·简选》），此为佐证之一。小而言之，孔子的教学内容中，有射箭和架车两项技能训练（春秋时代主要为车战）。有若作为孔子的学生，更曾在孔门之中受到同辈的尊重，此为佐证之二。季康子之所以阻止微虎组建的这支部队出征，原因也在于担心失去这些杰出的战斗人员。这些都足以说明这支部队的高素质。

夫差之所以在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愿意同危在旦夕的鲁国签订城下之盟，主要原因当然是顾虑到灭鲁之后，晋、齐、楚等国很可能会联合起来以此为借口而共同伐吴。不过，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微虎临时组建的这支特种作战部队，尽管未能最终遂行战斗任务而“半途而废”，却依然对已经兵临城下且大功在望的吴王夫差发挥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外交家子贡

一、子贡概说

子贡，复姓端木（一作端木），名赐，又字子赣，春秋末期卫国人。司马迁说他比孔子小31岁，又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据此则子贡生于卫灵公十五年（公元前520年）。子贡大约是在孔子离开鲁国来到卫国时随孔子受业的，其时已二十多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尚见述及子贡，这时子贡52岁，其后事迹无可考。据《史记》所载，子贡卒于齐国。

子贡是孔子的及门弟子。《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之间的谈话，以子贡居多，给人很深的印象。孔子认为他的许多学生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人也”^①。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又列出了其中10位优等生的名字，这便是前人所谓的“孔门十哲”，而子贡则是十哲之一。孔门弟子之中，凭借外交活动而切切实实扩大孔子在当时国际社会影响的人也是子贡。孔子死后，子贡守墓六年。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子贡在孔门之中的重要地位。

子贡不仅是孔子的高足，而且是一个商人兼外交家。从孔子那里，他学到了不少外交方面的知识，培养了从事军政外交工作的实际本领，尤其是锻炼了外交语言方面的才干。从《左传》、《史记》

^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等史料中可以看出，子贡的基本行当是经商做买卖，他的政治生涯是毕生为鲁国、卫国效力，充当各国外交使节，奔走于当时战事频仍、外交斗争尖锐复杂的国际社会，处理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乃至国际军事争端方面的调停和斡旋。他不仅因经商而相当富有，而且与各国公卿大夫有着密切的政治交往。《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见子贡经常以“行人”亦即外交官的身份出访各国，并在政治地位上达到了可以同诸侯平起平坐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他时常奉命出使，游说于各国之间，确有临危受命的味道，而且又能自出机杼，善用谋略，扭转局势，在春秋末期军事外交史上具有一定的建树和相当的地位。

孔子的众多门徒，有的致力于发扬儒家学说，有的成为地方官员，有的甚至直接参加战斗，独有子贡是孔子所培养的独立奔走于外交战线的卓越人才。作为一名军政外交家，他的基本素质、成长过程，以及在外交实践中的表现，都是颇有典型意义的，因此，对他作些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先秦历史的一个侧面，而且对于当代军政外交学的理论研究，对于今天深入探讨军政外交人才的培养模式和训练方法，明确这类人才应当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和专业能力，也可以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

二、基本素质

从春秋时代的实际需要看，子贡可谓天生具备了当时军政外交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子贡受业于孔子之后，曾问老师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汝，器也。”^①将他比作器用之人。子贡又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器用之人，孔子则说：“瑚也。”所谓器用之人，

^① 《论语·公冶长》。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如同今天所说的应用型人才而非理论型人才，这种人长于务实，乐于从事具体工作，而不喜务虚空谈。琏瑚为宗庙之器，以玉为饰，比较贵重，是古代祭祀时盛放黍稷的器皿，其作用在于“荐鬼神，羞（馐）王公”。孔子认为子贡是琏瑚之器，意思是说他具有宗庙之才，是一块可以从事实政工作的料子。

这块可以从政的料子确实具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素质：一是能说善辩，富有口才；二是洞明事理，善观世情。

《荀子·子道》中有一段记载，可以表明子贡的语言素质。据说古代的丧礼规定，父母死后的27个月为服练期，练是一种白色的布帛，服练即身披一条白布，遭父母之丧的人在服练期内不得睡床。可是鲁国的大夫们却在遇丧13个月后的服练期间便睡床了。子路对此很不理解，便去问孔子：“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直率而又略微单纯的子路便去对子贡说：“吾以夫子为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问明情况后，便说我来替你去问。他去问孔子：“练而床，礼邪？”孔子这回却明白地告诉他：“非礼也。”子贡出来告诉子路：“女（汝）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对比子路和子贡的问语，可以看出，子路的“鲁大夫练而床”是一个有特定指向的陈述，需要孔子直接对鲁大夫的非礼行为作出评论，而如果孔子予以评论，则又将置自身于非礼的境地，因为按照礼的规定，一个人不能非议自己所住地区的大夫。深知孔子言行准则的子贡省去了子路问语中的“鲁大夫”三字，于是“练而床”一语变为无所确指的泛泛的行为，便免去了孔子的尴尬。

子贡机敏善言的素质是一般人比不上的，因此同辈中有了问题想对孔子发问而又不愿直接去问时，有时就叫子贡去打听。《论语·述而》中便记载了一件子贡帮助冉有打听孔子政治态度的事。卫灵公时，太子蒯聩因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而逃亡晋国。卫灵公死后，蒯聩之子辄被立为卫君，即卫出公。晋国的赵简子打算把

蒯聩送回卫国，使之成为亲附晋国的君主。卫人闻之，发兵抵抗，自然就抵制了蒯聩归国为君。如果着眼于蒯聩和辄的父子关系来看问题，便是父子二人争夺王位。那么孔子是如何看待这个敏感的事件的呢？对于已经当了国君的卫出公，他的派兵抵御父亲回国为君，孔子又持什么态度呢？冉有很好奇，却又难以启齿，便请子贡去问。子贡很干脆地答应了，但他见了孔子，却丝毫不提卫出公，只是问道：“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子贡又问，他们心里怨悔吗？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于是子贡出来对冉有说，老师不赞成卫出公的做法。子贡就这么简单地弄清了孔子的态度。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的两兄弟，当伯夷知道父亲要把王位传给弟弟叔齐时，便躲避让位，叔齐则因以弟代兄不义而逊让，结果两人互相逊让，都跑到了国外。伯夷、叔齐的行为同蒯聩父子争夺君位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子贡通过询问伯夷、叔齐二人后来是否心存怨悔来间接揣摩孔子对卫出公的态度，既然孔子称赞伯夷、叔齐，那么就是不赞成卫出公同父亲争夺王位了。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子贡的“利口巧辞”并非通常所谓的争吵狡辩，甚至也不是滔滔不绝的雄辩，而是一种讲究措辞、用语得体、曲径通幽式的“摸底”艺术，他的发于此而达于彼的谈话技巧，有时能够叫谈话对象都不知道发问者的真实意图。子贡的语言素质于此可见一斑，而这一素质无疑是优秀的外交家应当具备的。

洞明事理、善观世变同样是军政外交和情报分析所必备的能力素质，子贡的这一素质在孔门中也是名列前茅的。鲁哀公时，位至正卿的季康子大约是为了招聘家臣，曾向孔子了解他的三名学生子路、子贡、冉有能否治理政事。孔子告诉他，这三个人都没有什么困难，但他们各具特点：子路“果”（果敢决断），子贡“达”（通达事理），冉有“艺”（多才多艺）^①。在切磋学问

^① 《论语·雍也》。

方面，孔子认为子贡的特点是“告诸往而知来”^①。在知人论世方面，子贡自谦地认为自己能够“闻一以知二”^②，孔子对此则表示认可。这些评价可以说明，子贡在智能方面的素质是以“达”、“知”见长。

子贡的“智”突出表现在他的商业成就中。《荀子·大略》说他“故鄙人也”，就是说，他原本出身于比较低下的社会阶层，但后来却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富商。司马迁因他“家累千金”，在孔子的弟子之中“最为饶益”，而将他编入《货殖列传》，与汉代以前的工商巨贾们并列为传主之一，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子贡的经济地位。司马迁说，他的经营范围在曹、鲁两国，“好废举，与时转货货”^③。所谓“废举”，即买贱卖贵；所谓“与时转货货”，意即随着行情变动的时机及时进行交易以增值生财。由此可以想见子贡在市场预测、把握时机方面的能力。从《论语》中还可以看出，子贡在随孔子受业期间便边学习边经商了，可谓是半工半读，聚财与求学两不误。孔子虽然对他的经商聚财行为很不满，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超常的“亿则屡中”的本领^④。所谓“亿则屡中”，意即预测行情每每准确无误，这句话不仅道出了子贡在经济上发财致富的原因，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在政治军事领域把握形势、预见动向的能力素质。

子贡虽然很聪明，但他喜欢“多言”，为此“孔子常黜其辩”^⑤。据《论语·宪问》记载，子贡讥评他人，孔子批评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孔子之所以“常黜其辩”，是因为这种喜欢评头论足的缺陷在政治活动和外交事务中是要不得的。例如有一次子张向他请教谋求官职获取俸禄的方法，孔子便告诉他：

① 《论语·学而》。

② 《论语·公冶长》。

③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④ 见《论语·先进》。

⑤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① 孔子的这段话实际上也间接道出了子贡在政治素质上的不足之处。

三、孔门受教

子贡在孔子的门下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撇开其他方面不说，单就军政外交而言，也受到不少教益，这里不妨略举数端。

1. 闻政

所谓闻政，就是了解别国的政事乃至获取别国的军政情报。对于闻政之法，军事家的孙子力主采用谍报手段进行刺探，孔子则注重正当的外交途径。在这方面，子贡是很有收获的。据《论语·学而》记载，一个叫陈子禽的人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必然能了解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情况，那么，他是央求人家告诉他的呢，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回答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并且强调说，他老人家获取政情的方法“异乎人之求之”。前人对“温良恭俭让”的阐释，归纳起来，主要是外交与社交礼仪方面有关态度容貌、举止礼节一类的几项要求。外事工作何以要保持“温良恭俭让”的风度？前人曾说：“君所自擅者谓之政，常不欲使人与闻之。况远臣乎？温良恭俭让，是诚不干人之政也。诚于不干人之政，则人人之国，无有疑且忌焉者……安忍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闻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将不之保，韩非《说难》是已。”^② 这一分析是不无道理的，外交作风的失礼和冒昧，每有刺探、干预别国内政之嫌而不受欢迎，即使在今天，也值得引以为鉴。当然，孔子的闻政之法并不仅此，

① 《论语·为政》。

② 转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

例如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①也是一种逻辑分析的闻政之法。子贡独独挑出“温良恭俭让”这一条，一方面是由于这是孔子异乎他人的高明之处，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在外交场合每每好胜有余而恭谦不足的缘故，可说是子贡受教于孔子的独特的心得体会。

2. 观礼

所谓观礼，就是在外事活动中参观某些重大国事及邦交活动的礼仪礼节，学习其中的礼制礼法。礼是一种统治阶级等级秩序的规定，既是对普通人的行为规范，也适用于王公贵族。国务活动及国际关系往来中，举凡祭祀、庆典、丧葬、享宴、谒见、例会、谈判、结盟，无不存在礼，有一套礼仪程序；国君大臣以及外交使节的进退揖让，都必须符合礼的特定要求。外交场合的无礼，不但要招致非议，而且将影响本国的国际地位，恶化国际关系。翻开一部《左传》，叙及礼仪与国家安危的关系之处可谓比比皆是。例如郑国，地处晋楚两强之间，常常成为国际冲突的导火线而遭战争的蹂躏。但著名政治家子产执政后，为求国家的安定，一方面坚决地与晋国结盟，一方面又同样坚决地拒绝晋人对郑国内政的干涉，获得了他执政期间二十多年的国内安定，同时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子产相郑的成功因素之一是在外交战线重视礼仪和礼节。正如当时卫国的北宫文子对卫襄公所说的那样：“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②由此可见，礼仪在邦交活动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孔子的儒学实际就是礼学，他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往往要进行“实习”和“演习”。所谓观礼，就是一种实地见习。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邾隐

① 《论语·为政》。

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公朝见鲁定公，26岁的子贡前往观礼。其时邾隐公仰着脸，高高把玉举起，而鲁定公却俯着脸，低低地把玉受下。观礼之后，子贡评论说：“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病。君为主，其先亡乎！”这年的五月，鲁定公果然死了，而邾国也果然数次遭到鲁国侵伐。孔子叹息说：“赐不幸而言中。”子贡的这次外交观礼见习，由礼节而推知邾隐公之傲慢心态，由举止而判断鲁定公之健康状况，不仅说明了他对外交礼仪的熟悉，而且再次显示了他的“亿则屡中”的先见之明。

3. 为命

孔子讲授的功课中，有“为命”方面的内容。“命”的意思，既泛指政令，又特指外交文书尤其是外交辞令。如果把孔子向他的学生传授的具体内容和《左传》中的史实结合起来看，主要指后者。“为命”就是组织人力拟制外交文稿，确定外交辞令。

《论语·宪问》中记录了一段孔子的讲课内容。他说：“为命，裨谿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就是说，在郑国，拟制一份外交文件，首先由裨谿起草，接着世叔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然后转交外交官子羽加以修改，最后呈交子产润色定稿。

如前所述，郑国的相国子产在外交上是很有办法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从政之后，善于选择能人加以任用。大夫冯简子能决断大事，国卿子大叔（即孔子所说的世叔）文笔秀美富于文采，外交官子羽能了解四方诸侯的所作所为，而且了解各国大夫的家族关系、官职爵位、地位贵贱、能力强弱，并且擅长辞令，大夫裨谿能出谋划策。郑国如果有了外交上的事情，子产首先向子羽询问四方诸侯的行为动向，并且叫他多准备几份外交发言稿，再叫裨谿考虑是否可行，接着通报冯简子，让他拿出决定性意见。事情办妥之后，就把文件传达给子大叔，让他照此执行，与来

往的诸侯宾客交往对话，所以很少有把事情办坏的时候。

从孔子的讲授中可以看出，他是结合当时郑国的外交工作实践总结“为命”之法的。其中既有工作程序，又有人员的选择与班子的配备，既反映了“为命”应当注意的相关事项，又表现了高度重视的审慎态度。今天来看，依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孔子的这番话虽则并不是单单对子贡一人说的，但从《论语·子路》中可以看到他对子贡的单独教诲。子贡问孔子怎样才能算做“士”，他告戒说：“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是孔子对子贡的谆谆教导，于此可以想见他对子贡的厚望。

4. 言语

孔子向学生传授的功课计有“四科”，四科即四门学科专业，分别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献学）。孔子培养的“十哲”，就是四科的高材生。言语一科中，他认为学得最好的是宰我和子贡，但他似乎不喜欢宰我，常常把他骂得很厉害。对子贡虽有批评，却以教育居多。

言语的施用范围是很广的，诗经《定之方中·毛传》说“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这九个方面皆是言语。不过，言语最重要的方面是宾主相对之辞，即外交辞令。春秋时代，外交辞令显得格外重要，因为那是一个战乱不已的国际社会，邦交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那时的外交使节疲于奔命之际，只领受国君的意旨而很少有具体的措辞口径或现成的发言稿，外事工作中如何交涉应对，多半只能随机应变，独立行事，更无法事事请示或者一切都在国内预先准备好。他们必须在“吃透精神”的基础上“自说自话”，以实现君主的欲望或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正如《汉书·艺文志》所总结的那样，古代外交官是“受命不受辞”。再者，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外交语言，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战国时代的策士，语言夸张激烈，汪洋恣肆，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而没有多少清规戒律的限制；春秋

时代则必须谨守当时的礼法制度，不必说睦邻友好或结盟亲附，甚至在战场上俘虏敌军将领，也要顾及两国关系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而习惯于使用委婉含蓄的外交语言，否则不算得体。因此，那时的“宦学”极看重语言表达的训练，士人进入仕途必得培养一套善于辞令的本领。

正因为如此，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①子贡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他说：“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②在他看来，质地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假如把虎豹和犬羊两类野兽都拔去它们文采不同的皮毛，那么这两类兽皮就没有区别了。这里所说的质地和文采，除了指君子内在的品质和外在的仪节形式之外，自然也包包括言语的实质和表达形式。如前所述，子贡原本说话不够慎重，现在的认识提高，显然是在孔门受教的结果。

春秋时代的外交谈判以及外事酬酢等，多半需要诵《诗》以委婉曲折地表达己方的意图。因此，外交人员不仅必须熟读《诗经》，而且需要具有巧妙运用甚至断章取义的本领。此外，由于古代外交使节“受命不受辞”，春秋时代的外事工作又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专对”，意指独立地从事谈判或外交场合的酬酢等工作。这是春秋外交史的两个突出特点。孔子曾针对这些特点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

子贡则可谓做到了活学活用。例如《论语·学而》记载，子贡有次请教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进一步教导他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受到启发，便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 《论语·颜渊》。

③ 《论语·子路》。

听后大加称赞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由此可见孔子对子贡能恰当运用诗经作譬的赞赏。

四、不辱使命

据《左传》记载，子贡在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469年）之间，曾多次出使专对，不辱使命，面对大国，不卑不亢，在外交谈判上取得了相当的政绩。

1. 驳斥伯嚭

鲁哀公七年，哀公与吴人在缙（今山东枣庄附近）会盟，势力日渐强大的吴国索要牛羊猪各一百头作为享宴品。这一数额即使按照周朝先王规定的礼数也大大超过了标准，但是，鲁国又担心如果予以拒绝，吴国会加害于己，于是负责谈判的鲁大夫子服景伯迫于压力，只好照办。

接着，吴太宰伯嚭又要求召见季康子。其时季康子正准备同大夫们商量能否攻打更加弱小的邾国，便决定派子贡去应付。伯嚭见季康子没来，便质问子贡：“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①对于季康子等人没有前来参加会盟，子贡说：“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这话等于说，既然鲁君已远离国都（曲阜离缙四百余里）前来参加会盟，大夫们便不能虚国而出；既然你们可以不按礼数勒索礼品，那么也很可能做出难以预料的事来。季康子们当然要留守国内，以防不测。这话貌似谦卑实则隐含警告，不仅如此，还顺带严正地揭露了吴国强索牛羊猪各一百头的违礼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鲁国的面子。

针对伯嚭的礼仪借口，子贡进一步用吴国的史实驳斥说：你们吴国的祖先太伯是穿戴周朝的礼服礼帽来到东方蛮夷之地治理吴国

^① 《左传·哀公七年》，下同。

的，其弟仲雍继位以后，“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这话一方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方面又为仲雍的不合礼仪做了开脱（仲雍断发文身是为了入乡随俗），实际上也就开脱了季康子的违礼。作为小国的使节，子贡的应对可说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

2. 拒温旧盟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哀公又与吴人会于橐皋（吴地，今安徽巢县西北）。吴王希望巩固一下五年前两国在缙地建立的盟约关系，派遣太宰伯嚭与鲁哀公重温旧盟。其时吴国虽联合鲁国在艾陵之战打败了齐军，但战后即处死了当初力谏伐齐的大将伍子胥，而越国正窥伺其后。鉴于当时的形势，一向徘徊吴齐之间的鲁国决定暂不同吴国重温旧盟，会谈的任务又一次落到子贡头上。

会谈中，伯嚭代表吴国提出“必寻盟”（意即一定要重温旧盟）。对此，子贡首先申述了盟约的严肃性：“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接着又代表鲁哀公说：“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①

从子贡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既没有撕毁旧盟，也没有重申旧盟，而是紧扣中心，极有分寸，只强调不必重温，从而完成了拒温旧盟的使命。其说辞中的“可温可寒”，亦庄亦谐，也是极富语言艺术的。

3. 劝释卫侯

就在子贡代表鲁国拒绝与吴国重温旧盟之后，吴国又召集卫国参加诸侯会盟。卫出公十分恐惧，因为卫人曾经杀害过吴国的一名外交官，但是迫于大国的威势，又不得不去。到了郟（今江苏如皋东，一说山东莒县南）会见之后，卫出公又私下与鲁哀公、宋国的大夫皇瑗（代表宋国）结盟，而辞谢了同吴国的结盟，吴人

^① 《左传·哀公十二年》，下同。

于是在各国诸侯即将互相辞别之际，包围了卫出公的馆舍。

受鲁大夫子服景伯之命，子贡再次去拜见吴太宰伯嚭，目的是劝说吴人释放卫出公。临行，子贡向子服景伯要了五匹锦，作为赠别伯嚭的礼物。

这次子贡并没有单刀直入，作为第三国的使节，子贡仿佛是在告别的闲谈中偶尔提及卫国的事情。伯嚭诡辩说：“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便趁机说：“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讎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讎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讎，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

子贡着眼于伯嚭个人的国际声誉和吴国的称霸企图而分析得失利弊，全然以局外人的身份从中斡旋，终于使伯嚭心悦诚服地释放了卫出公。

4. 交涉成地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春，鲁国的成邑在邑宰公孙宿的带领下背叛鲁国投靠齐国，成邑遂为齐国占领。这年的冬天，齐国因内乱自顾不暇，与鲁国媾和。鲁国见时机已到，打算要回土地，于是子贡便作为副使，随同子服景伯前往齐国谈判。

成邑原是鲁大夫孟氏的地盘，公孙宿本是孟氏的家臣，因为不同意在成地养马而与孟氏发生冲突，才叛变鲁国投靠齐国。为了顺利收回成邑，必须做好公孙宿的工作，于是子贡便先去拜见他。交谈中，子贡并没有对公孙宿的叛鲁投齐加以谴责，而是首先晓以利害：“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①意思是说，你虽然背叛了鲁国，可是作为外国人的齐人更可能背叛你。说完这些，子贡又向他申明大义：“子，周公之孙也，多享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一

^① 《左传·哀公十五年》，下同。

番话，使得公孙宿很后悔没有早听到子贡的这番话。

子服景伯一行接下来便跟掌权的田常交涉。当时齐国的形势是，势力强大的田常刚在内乱中杀了齐简公，立简公之弟骜为王（齐平公），自己则为相国。田常一方面遭到国内不同势力的反对，一方面又害怕其他诸侯借机讨伐自己，正急于同诸侯搞好关系。会谈中，田常代表国君表示齐国愿意像同卫国一样保持同鲁国的友好关系。子服景伯见机会来了，立即示意子贡答话。子贡便抓住田常的话说：“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讙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

田常理屈词穷，便把成地归还了鲁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既弑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据此，则田常“尽归鲁地”，当在子服景伯一行出使齐国之后，由此更可以想见子贡此次谈判的大获成功。

5. 私论卫侯

春秋末期，卫国内乱不已，加之晋、齐、吴、越等国的干涉介入，国君时有废立更替。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卫出公的父亲在晋国和国内势力的扶持下，由戚（今河南濮阳）入卫为君（即卫庄公），卫出公遂逃亡鲁国。次年，卫庄公被国人攻杀，晋国先后扶植卫襄公之孙般师（一作班师）及卫灵公之子公子起为君。第三年，卫人又驱逐公子起，卫出公得以从齐国返回。至鲁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70年），卫人叛乱，卫出公再次逃亡，晋、齐、鲁三国都不敢去，结果避难宋国。

次年，卫出公希望知道自己能否再次回国，派使者带了一张弓作为礼物去向子贡咨询。子贡依照外交礼节接受了弓，却说：“臣不识也。”^①但在过后的私下交谈中，却对使者分析说：从前卫成公避难陈国，靠着手下的甯武子和孙庄子同卫国的官吏、大族在濮

^①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宛订立盟约，才得以回国重登君位。卫献公避难齐国12年，也是靠着随他流亡的子鲜、子展同国内的臣子在夷仪订立盟约，才回国重登君位。现在卫出公再次流亡在外，国内没有听说过有像卫献公时期的亲信可以依靠，身边也没有听说过有像卫成公时期的大臣，那么我就不了解卫出公能借什么力量回国了。

实际情形也正如子贡所料的那样。由于得不到国人的拥护，卫出公甚至在越、鲁、宋三国联军的护送之下也不敢进入国都，最后客死越国。子贡这次的政局咨询，不仅反映了他对卫国上层形势的深刻认识，而且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国古代外事活动的特点。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子贡对卫出公的使节所说的“臣不谏也”，实际是今天外交辞令“无可奉告”的早期形式；而他在正式外交会晤时不便表达的观点却又在私下交谈中表述出来，又足证我国古代外事活动中发表政见形式的灵活多样。

五、纵横先驱

子贡在军事外交史上最大的成就是穿梭于齐、吴、越、晋四国之间开展连锁外交，不仅挽救了鲁国的危亡，而且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的态势。

春秋末期，鲁国已经国力削弱，鉴于南有日见强大的吴越，北有曾为霸主的齐晋，唯有在诸强角逐之中依违于南北之间，苟安求生而已。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一次齐国将要伐鲁，孔子希望自己的弟子中能有人担负起挽救国运垂危的使命，子路等人纷纷请求出使，孔子均不同意，只有子贡得到许可。子贡前往齐国后，却对准备出兵伐鲁的田常首先说了这样一番不合逻辑的话：

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一作“浅”），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

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①

对于容易战胜的鲁国，子贡认为不可与战；对于难以攻坚的吴国，子贡却认为易于攻打。这种明显荒谬的建议当然会惹火田常，但是子贡自有他的道理。

原来，齐国自景公之后，公室逐渐衰微，政权渐渐落于陈氏（至陈恒改称田氏，陈恒即田常）等世卿贵族之手。田常欲专齐国之政，又害怕遭到高氏、国氏、鲍氏和晏氏等宗族大臣的抵制，因此企图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达到转移国内视线、壮大自己势力，以及提高在国内的地位等目的。田常伐鲁的目的，子贡是很清楚的，因此当田常对他的建议表示愤怒时，他便入木三分地说：

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隙，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

“孤主制齐”（孤立君主，控制齐国）是田常的根本目的，“忧在内”是田常的最大心病，洞察入微的子贡据此分析胜战与败战对田常实现根本目的的影响，动员他选择一场难以取胜的战争而移兵于吴，这就不能不打动田常。但是，田常虽已确定伐鲁，却又怕挥师向吴将遭到国内大臣怀疑。子贡便请田常暂时按兵不动，并进

^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下同。

一步表示自己可以叫吴王出兵救鲁，讨伐齐国，这样就可以使田常获得把矛头指向吴国的借口了。

吴王夫差在大败越国之后，正一心北上争霸。倘若齐胜鲁并使之成为属国，形势必将对吴的争霸事业大为不利。子贡于是抓住这一点，前往吴国对夫差说：

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

打着救亡的旗号而抑制齐国的扩张，自然是很对吴王胃口的，但他另一方面又对越国放心不下。因为其时勾践正卧薪尝胆，“苦身养士”，怀报仇之心，所以夫差表示要彻底征服越国后再北上伐齐。对此，子贡则认为：

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

在吴王看来，为了成就霸业，这种胁迫勾践派兵随从吴国出征的策略，不仅可以抽空越国的兵力，免除自己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增加讨伐齐国的军事力量，造成多国联合声讨的气势，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为使吴王出兵伐齐，子贡于是又前往越国游说越王出兵助吴伐齐。

正在忍辱负重的勾践用隆重的礼节接待子贡，并亲自到宾馆看望他。子贡毫无保留地道出了自己吴国之行的经过，并透露了吴王因担心越国有报仇之心而要先破越后伐齐的打算。他对勾践说：如

果你本没有复仇之心，却让人怀疑有此企图，这是很拙劣的；如果有复仇之心，尚未见诸行动，却叫人知道了，那是很危险的。鉴于勾践强烈的复仇愿望，子贡对他详细分析了吴国的形势：一是“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二是“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三是“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四是“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据此，子贡又向越王提出三条建议：一是派兵辅佐吴王出征，以满足其争霸野心；二是进献重宝，以取悦夫差；三是卑辞陈言，表明不二之心。如果勾践照此办理，夫差必定伐齐无疑。对于未来的国际局势，子贡断言：如果吴国战败，这是越国的福气；如果吴国取得胜利，则夫差必将乘胜加兵于晋，谋求霸主地位。到时我将北见晋君，请他同你共同攻打吴国。吴军腹背受敌，精锐部队又尽在晋地，越国就可以趁机灭亡吴国了。勾践高兴地接受了这些策略，并赠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一”。子贡谢绝了这些礼品，又赶回吴国。

子贡向吴王说了一大堆勾践因吴王保留越国而对吴王感恩戴德的话。五天之后，越国大夫文种又携带重礼宝器至吴拜见吴王，并恳切陈言勾践愿亲自率领士卒三千前来助战。夫差听从子贡的建议：接受参战的越兵，留下礼物，拒绝勾践亲自带兵作战的要求。

就在吴王着手举兵伐齐之际，子贡又赶往外交征途的最后一站——晋国。子贡告戒晋君：“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应付突发事件），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然后向晋君通报了“齐与吴将战”的最新情报，并预测了两种结果：如果吴军战败，越必乱吴；如果吴军胜齐，则必将进军晋国，希望晋国作好迎战准备。

为了挽救鲁国，子贡力说诸侯，至此走完了他的军事外交的全部旅程。

其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可说是完全在子贡铺设的轨道上运行的。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吴军果然出动水师自海上攻齐。鲁哀公十一年，吴人与齐人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一说莱芜），大破齐师，接着又为进军晋国、北上争霸做准备。鲁哀公十

三年，夫差率大军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会见有关诸侯，与晋国争做盟主。与此同时，越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兵分两路袭击吴国，一举攻入吴都。消息传至黄池，夫差恐惧不已，杀了七个前来报告战败消息的人，只得让晋国成为盟主，自己匆匆回国向越求和。至此，越国开始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司马迁高度评价了子贡的这一军事外交成就。他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这一辉煌成就，不仅奠定了子贡在春秋时代军事外交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使他成为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先驱之一。

六、几点申论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就外交而言，其间行人奔命，盟会频频。文臣时而应对酬唱于异国朝廷之上，时而折冲樽俎于兵戎相见之中。士人则研习外交礼仪，揣摩外交辞令，借辩才以求仕干禄，奔波于君主贵族之间。从军事外交史来看，春秋时期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生动的军事外交实践，而且也是我国军事外交学术发轫并迅速走向成熟的时期。子贡虽然算不得那个时期外交家中最突出最具影响的人物，但他的实践和成绩，已使人可见春秋战国军政外交之一斑，算得上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1. 子贡的外交实践反映了春秋末期国际社会外交斗争的若干特点

首先，是外交与军事的紧密相关和密切配合。从子贡的外交生涯可以看出，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已成为当时国际社会同等重要的双驾马车。为了配合军事斗争，各国纷纷在国际社会寻求盟友，谋求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外交斗争已成为壮大自己和改变国际战略格局的有效且有力的手段。

其次，谋略的运用已渗透于外交活动之中，同样成为争取与国、拯救危亡、调停争端，乃至重组国际关系的有效且有力的手段。正因为如此，子贡才被目为战国纵横家的先驱之一。司马迁所述的“子贡一出，五国各有变”，虽如前人所云有“小说家言”之嫌，但其时已进入战国初年，恐怕也不能完全不信。战国时代，纵横捭阖之风大盛，一事当前，策士百计千方施用谋略，实则春秋时代已有先声。子贡所为，即是一例。而稍早的孙子将“伐谋”、“伐交”纳入其所著兵法，稍后的《六韬》又专门论及“文伐”，不仅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军事与外交并重，亦可足证子贡时代外交之中施用谋略，实为《孙子兵法》等军事理论的时代渊源。

再次，外交斗争的成败与外交使节的才干有密切的关系。这虽然是一个自不待言的问题，但在子贡身上却有具体的内容，其中包括：外交官必备的特定的言语素质和智能素质；一定的谈判、酬酢和礼仪经验；独立工作，随机应变而又不辱使命的才干；熟悉历史、洞察局势、了解对手等方面的学识。

2. 子贡的外交生涯反映了当时外交活动的某些内容、方式和工作程序

子贡的外交生涯从内容看，既有礼节性的会见，更有国土问题的谈判和事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盟会；既有国际矛盾的斡旋和对异国政局的评论，更有挽救危亡的奔走筹划。从方式类型上看，既有正式的交涉谈判，也有一般的拜见会晤，还有私下非正式的交谈。至今国际社会的外交往来形式，有些仍在沿用或有所发展变化。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和形式，展现了春秋末期外交史的某些具体侧面，虽然时代久远，对于今人仍不能说毫无启示。至于子贡从孔子那里学习到的外事工作的根本要求和“为命”之法，以及他个人对外交辞令的心得体会和娴熟运用，对于今人或许更有借鉴意义。

3. 子贡由孔门高足而变为富商兼外交家，考其成长经历，对于今天军政外交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也有鉴古知今的作用

子贡在随孔子受业期间，就表现出良好的言语能力和洞悉商业

行情的先见之明及操作能力。如前所述，子贡的利口好辩，并非滔滔不绝的雄辩或蛮横无理的争吵，而是一种分寸适宜、措辞得体、易于达到目的的发问技巧和摸底艺术。他之所以成为“言语”一科的高才生，应该说是得益于这方面的良好素质。而这种言语能力恰恰又是春秋时代的外交官所必备的重要素质，他后来在外交活动中能够多次令人折服，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孔子对学生时期的子贡的评价是“器”，说明他的基本素质在于从事实际政务工作。子贡的又一过人之处是“达”，是“闻一以知二”、“告诸往而知来”。这一素质用于经商，使他家累千金；这一素质用于外交，使他能与诸侯分庭抗礼。可见无论是治理政务，经营商业，还是奔走于外交战线，其素质要求是有相通之处的。长于务实，具有敏感性、预见性和应变能力，又有实际操作的本领，是成功者的共同素质。在今天军政外交人才的选拔和培训工作中，这一条或许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基本素质是成材之路的起点，还需要经过积累知识、增长学识和锻炼才干的培养过程。子贡的优长离不开孔子的教育。从外交方面看，孔子的教学方法确有合理而科学的一面。他的“不辱君命”，撇开具体内容不说，可谓强调了外交工作根本的目的和要求；他的“专对”，可谓抓住了当时外交工作最重要的特点；他的“言语”一科，可谓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他的“为命”之法，可谓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了现实的新鲜经验；他的“闻政”，如果说已经涉及到了情报获取的领域，恐怕并不过分；他的“温良恭俭让”，体现了对外交作风的讲求和养成；他派子贡去“观礼”，不光说明他对外交社交礼仪礼节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在教学方法上对见习实践这一环节的贯彻。从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方法论来看，孔子确有他的高明之处，并且似乎可说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系统，其中颇有值得玩味和借鉴之处。这一方面，子贡的成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然，孔子的“习礼”，其中包含着维护宗法制度的社会政治思想；他在外交辞令的教学方面注重“诵诗三百”，

也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在今天国际社会的谈判会晤、联谊酬唱一类活动中，引经据典已有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即便是他结合郑国的外交实践所总结的“为命”之法，也只是我国外交学理论研究的早期萌芽。但是其中注重礼仪礼节，讲究多闻博识，对外交言辞采取慎重态度，却开创了我国外交史的优良传统。

子贡所处的时代，鲁国已经沦为弱国，为了生存，它不得不徘徊于强国之间，苟且求安。联系这一背景来看子贡的成就，可见人才和外交这两条对一个国家谋取安全的周边环境和一定国际地位的重要性。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越国派人以霸主的身份来到鲁国，为鲁国和邾国解决领土争端，划分交界处，然后订立盟约。会盟时，越国的代表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大夫，而鲁国出席的却是国君和季康子等三名公卿，双方的规格极不对等。然而鲁国既没有军事实力反抗，又没有擅长外交斗争的人拒绝盟约，季康子油然而思念起十多年前代表鲁国拒绝同吴国重温旧盟的子贡，后悔没有请子贡来参加会盟，叹息说：“假如子贡在这里，我就不会到这地步了。”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但是季康子的临难而思子贡，或许可以使我们想得更多。



勾践情报活动述略

勾践（约公元前520年～前465年），春秋末期越国国君。姒姓（据说是大禹的后代，故从姒姓），名勾践，又名菟执。公元前494年，勾践被吴王夫差击败，越国水军几乎全军覆灭，勾践只能屈辱地向夫差求和。但是勾践不甘心就此认输，而是经过卧薪尝胆，发愤图强，顽强地忍耐着夫差对他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最终成功地使得越国一变而成为强国。越国重新崛起之后，勾践成功组织了复仇之战，并于公元前473年成功灭吴。

长期以来，越王勾践的形象一直为著名的成语“卧薪尝胆”所定格。勾践忍辱负重、励精图治，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①，使越国由弱变强，最终覆灭吴国，成功复仇，堪称奇迹。除了勾践自身所具备坚韧不屈的性格、文种等一干贤臣的得力辅助，以及成功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富国强兵政策等因素之外，勾践一举灭吴的过程中起到重要和关键作用的，还应当列举出他所组织实施的一系列的情报战。在灭吴图霸的过程中，他甚至曾亲赴敌国，借“入臣”之名，行用间之实，大量收集吴国的军政情报，并用金钱美色成功策反了伯嚭，使其作为内间为我所用，再进而运用反间计除掉吴国重臣伍子胥，并选派美女作为夫差身边卧底，在迷惑吴王的同时，为自己收集情报。勾践的亲为间谍，潜伏敌营行间，以及他所组织实施的这些情报战，正像一套响亮的组合拳，一举击倒吴王夫差，也对后世情报战构成深远影响。

^① 《左传·哀公元年》。

如果说晋楚争霸是春秋争霸史的主旋律的话，吴越争霸则是春秋晚期争霸的主旋律。他们之间既有国恨，更带家仇，争霸战争尤显惨烈。吴越之间争霸的惨烈状况从《史记》、《国语》等多部史书中均可以窥见大致面貌。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虽有渲染之嫌疑，被讥为“小说家言”^①，但也部分反映了一个史实：吴越之间的争霸史，情节曲折跌宕，耗时蔚为久远，结果耐人寻味，诚可以作为家国复仇的典型案例载入史册。^②

越的始祖相传是夏少康之子无余。无余传 20 世至允常。允常与吴国打仗结下仇怨，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允常之子即勾践。吴王阖庐乘越国丧事发动攻击。勾践仓促间率军抗击，没想到取得了意外战果。在双方交战之前，勾践派三队罪犯在吴军阵前集体自杀。面对这种阵势，吴军上下大感意外。正当吴军受此场面震慑之时，勾践突然挥师前进，吴军还没来得及缓过神，就被越军冲杀得七零八落，由此招致大败。吴王阖庐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后来负伤死在回国的路上。

继而夫差即位，念念不忘父仇。夫差使人每天站在宫门前，每当看到他出入就大声喊道：“夫差，你忘了越国杀了你父亲吗？”夫差大声回答：“不敢忘，三年之后一定要报仇！”果然，刚到了第三个年头，夫差就举倾国之兵，大举进攻越国，并一举打败越军。^③

这次战争中，越国大败而归，勾践身边甚至只剩下五千甲士。为免于亡国，勾践采纳文种“卑辞厚礼”、向吴委屈求和的建议，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② 赵晔的描写固然有一些随意发挥之处，但若以《国语》等书所反映的情况推想，并不能说他的这些描写完全是无稽之谈。

③ 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派大夫到吴军中，低声下气地向吴王请罪：我勾践愿为吴王臣仆，夫人可为吴王奴妾，大夫、国士以及他们的妻女都心甘情愿地为吴王服役，越国的宝器珍藏也可以尽数献给吴王。正当夫差打算答应之际，伍子胥向他讲述夏少康怎样从危险中求生存，发展壮大终灭政敌寒浞、中兴夏朝的故事，劝谏吴王不能放过勾践。伍子胥指出，吴越两国同处三江之地，其势不能并存，必须将越国乘机彻底剿灭。

伍子胥的建议让夫差暂时缓下同越国讲和的念头。勾践看到吴国君臣议而未决，便精心挑选了一些美女宝物进献给吴太宰伯嚭，试图对他进行收买，发展为越国的内间。

勾践之所以选择伯嚭进行收买，是因为事先对伯嚭进行了细致研究。伯嚭是楚人，和伍子胥一样，属于背着深仇大恨远走他乡的亡臣。勾践分析认为，伯嚭在吴国属于寄居，对吴国并无深厚感情，且“嚭贪，可诱以利”^①，于是派重臣文种选数名美女，带上大量金玉作为厚礼，来到伯嚭府上对其进行策反。由于文种的出色运作，伯嚭果然被收买成功，并在此后每每帮助勾践说话，在关键时刻解救了他。

受到伯嚭引见，文种得以朝见吴王。在夫差面前一面极力说着好话，一面委婉地实施威胁，正所谓软硬兼施。文种对夫差声称，越军战斗力尚存，非得争斗下去，谁胜谁负尚未可知，即便吴军幸运获胜，最后也必然损失惨重得不偿失。伯嚭则乘机对吴王说：“越国已经慑服称臣，这个时候赦免勾践，可以尽得越国的珍宝和物产，这显然是对吴国非常有利的东西。”经过伯嚭的劝说，此前已经开始骄奢自满的夫差，终于首肯了和议，答应释放勾践。伍子胥得知后叹息道：“姬姓应该衰败了。这是养虎贻患。越国将会发展国力，训练军民，20年之后，吴国就变成池沼废墟了！”^②

①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② 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及《左传·哀公元年》。

二

勾践的初步目标得以实现，便着手实施展开下一步计划，即“与范蠡入宦于吴”^①。勾践此举固然是此前吴越双方和约的重要内容，但勾践君臣入吴可实现的战略企图有二：一是佯向夫差示弱，借以麻痹夫差——这或可称为“情报示伪”；二是借机打探吴国的军政情报，亲自深入吴国作间谍。

勾践派人对吴王说：“请委管龠属国家，以身随之，君王制之。”^②也就是说，要把越国的锁和钥匙都交付给吴国，意思是对吴国将毫无保留。在投降的这天，越王亲自出现在投降的队伍之中，故作卑微地请吴王对自己进行制裁。看到勾践在自己面前竟然如此卑贱，夫差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高兴之余，完全答应了勾践的请求。

勾践入吴作为奴隶总共有三年之久。^③相比《国语》，《吴越春秋》对勾践入吴这段历史，特辟《勾践入臣外传》一章，作了更加详细的描写。

伍子胥在得知勾践要入吴称臣后，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对吴王说：“夫飞鸟在青云之上，尚欲缴（音灼，生丝缕也。）微矢以射之，岂况近卧于华池，集于亭庑乎？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存之地，幸来涉我壤土，入吾桎梏，此乃厨宰之成事，食也岂可失之乎？”伍子胥显然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勾践的入吴称臣只是一个计谋，对于吴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会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勾践投降完全是假投降，他会利用在吴国的时机乘机大量收集吴国的军政情报，这对吴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故此，伍

① 《国语·越语下》。

② 《国语·越语下》。

③ 据《国语·越语下》：三年，而吴人遣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勾践之困会稽”，说的正是“勾践入吴”这段历史。

子胥极力劝说夫差抓紧时间趁机杀掉勾践，以绝后患。

就在伍子胥极力净谏夫差摇摆不定的关键时候，勾践所收买的内间伯嚭又起到了关键作用。伯嚭对夫差说：“子胥明于一时之计，不通安国之道。”夫差又一次听从了伯嚭的意见，不但没有杀掉勾践，反倒任由勾践带着范蠡等人一同入朝。这个夫差虽满足了一时的虚荣心，换来的却是无穷的后患。

而结果正如伍子胥所担心的那样，勾践入吴之后，“近卧于华池，集于亭庑”，收集情报非常容易，对吴国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自此之后，吴国君臣的活动被勾践和范蠡尽数掌握，从而为己方制定富有针对性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吴越春秋》中记载有勾践“饮溲食恶”的故事：勾践得知夫差生病了，就乘机献媚，亲自品尝夫差的大小便，以帮助夫差诊断病情，借机打动夫差，获得释放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今天，国君的身体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有关宣传报道需要遵守安全保密要求。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高度关注卡斯特罗的身体状况，不外乎这个原因。当然，《吴越春秋》类于小说，所载事迹有故意丑化勾践形象的嫌疑。但无可置疑的是，正是由于勾践身处吴国，从而可以很轻松地获得诸如吴国人文地理、大政方针、人事变动，乃至包括国君身体健康状况等这些重要的情报资料。所以，对于勾践处心积虑打探吴王身体健康状况之类的事情，我们不能断然否定。这些内容可能正应该是勾践所非常关心和极力收集的重要情报。

仅仅从常理推断，让敌人住在自己身边，并且一住就是三年之久，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夫差愚昧如此，怎么能不招致失败？勾践在吴国三年，获得多少相关吴国战略层面的情报，我们谁也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勾践对于吴国上下一定已经非常熟悉。或者说，吴国对于勾践和范蠡来说，已经毫无秘密可言。夫差的身体状况如何，在做些什么，吴国有什么重要举措等，勾践都能及时掌握。有时候，即便勾践君臣不能打探到，他们

收买的内间伯嚭也会及时将情报传递过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勾践君臣住在吴国虽然属于身处险境，但无疑为这种情报传递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

对吴国兴盛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伍子胥——这一点为史家所共识，勾践对此也洞若观火。熟悉春秋史的人都知道，伍子胥甚至是关系吴、楚、越争霸乃至三国兴废存亡的一个重要人物。当年，他由于父兄被楚王冤杀，一怒之下远走他乡，后来他引来吴军入郢，在鞭尸三百报了私仇之后，便在吴国安心辅佐阖庐、夫差，使吴国成为一时之霸主。《史记·伍子胥列传》说：“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伍子胥对吴国的影响和贡献可见一斑。勾践深知，伍子胥一日不除，其灭吴大业便无从实现，便同范蠡、文种密谋，计划用反间计除掉伍子胥。

公元前484年，吴王听说齐景公病死，国内动荡，便决定兴兵伐齐。伍子胥担心越国是后患，便劝阻夫差伐齐。不料，战争的结果是吴军大胜而回。正当夫差得意之际，伍子胥却给他泼来满盆的冷水，劝他不要高兴得太早。正在洋洋自得的夫差于是大怒，君臣一番争执之后，夫差对伍子胥失去了当初的信任，“益疏子胥之谋”^①。伍子胥非常失望，“欲自杀，王闻而止之”。^②

后来，夫差再次计划伐齐。勾践得知后，以子贡之谋，率越军相助。^③夫差由此对勾践更加信任。伍子胥再次劝阻，他对夫差说：“越国是吴国的心腹之患，现在他们用虚假的言辞、骗人的行动，醉心于攻打齐国所得到的利益。吴国即使打下了齐国，也像得

① 《史记·伍子胥列传》。

②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③ 子贡，孔子弟子，孔门“十哲”之一。齐当时正在攻鲁，子贡之意本在救鲁。相关经过可以参看本书《外交家子贡》篇。

到了一块不能耕种的石田，没有一点用处。”对于这些劝谏，吴王不但听不进去，还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非常失望，便借出使之机，将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①

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勾践再次重金贿赂伯嚭，并派大夫逢同到吴国进行协助。伯嚭“与逢同共谋”^②，终于找到了一条除掉伍子胥的计策。

伯嚭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在夫差面前极力诋毁伍子胥。当然，伯嚭对夫差究竟说了哪些话，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得知，因为即使在《史记》中就有两种版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又这样写道：“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司马迁看到了史书有不同的记载，不能详加分辨，便在《史记》中全部记载了下来。

虽然伯嚭对夫差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相信的是，他当时一定是向夫差说出了世界上最恶毒的句子。伯嚭和伍子胥同属楚人，对伍子胥非常了解。伍子胥当初不顾父兄性命出走吴国，本来就是为了复仇，“属其子于齐之鲍氏”也属于既成事实，而劝阻吴王不成反生怨望，甚至要由此自杀，也为吴王所察，故夫差听了伯嚭一番话之后，忙说道：“你所说到的这些情况，我也有所察觉。我已经不相信他了。”于是，夫差赐伍子胥属镂之剑，令其自杀。可怜伍子胥就这样屈死于勾践的反间计。临死前，伍子胥对家臣说：“你们一定要将我的眼睛挂在国都东门的城楼

① 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②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上，我要亲眼看到越寇从那里进来，灭掉吴国。”吴王听了这些话之后大怒，命人将他的尸体用皮革包裹起来，投入长江，只想将他葬身鱼腹。

纵观伍子胥一生，大概只做了两件事：覆楚复仇和兴吴灭越。复仇这件事，由于楚王及时脱逃，只以“鞭尸三百”告终，且给后世留下无穷非议。而他灭越也做得很不成功：由于中了勾践的反间计，“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扼腕。从复仇未果到灭越不成，伍子胥完成了一个从“匹夫”到“丈夫”的转变。^①伍子胥的冤死，或者说伍子胥这个悲剧形象的诞生，主要是由于勾践出色的反间计的获得成功。

在这出反间计中，勾践行间的最大资本就是吴太宰伯嚭。伯嚭经越国的多次贿赂，更加愿意为越国效力。故此，伯嚭和伍子胥之间常常因为对待越国的态度而发生争执，互相的矛盾也愈加突出。伯嚭便利用伍子胥失宠的机会，极力诋毁伍子胥，最终导致伍子胥被杀。

勾践在行反间计谋杀伍子胥的同时，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军政外交斗争。针对吴国其时正与齐、楚、越争锋的现状，勾践制定了结齐、联楚、附晋的外交策略，使吴国进一步陷于孤立状态。为了讨得夫差欢心，麻痹夫差，勾践经常以珍宝玉器相赠，并选送上好的木材，耸恿吴王大兴土木，以达到疲惫其人力物力的目的。勾践还假借饥荒的名义，向吴国借贷粮食，在次年偿还时，却将用作偿还的粮食悄悄地煮熟，并向吴国谎称这些粮食是优质种子，建议吴国来年耕种时使用。由于吴王过于相信勾践，便在吴国大量栽种勾践所提供的这些劣质种子，导致当年颗粒无收，粮食供应出现困难。这也为勾践成功灭吴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后世享有盛誉的著名美女西施，据说就是在这期间被勾践

① 《史记·楚世家》：“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史记·伍子胥列传》赞伍子胥“隐忍就功名”，堪称“烈丈夫”。

选派到吴国，潜伏在夫差身边作卧底的。“西施”这个名字自此在历史上传开，至今仍家喻户晓。考诸《史记》、《左传》、《国语》，均未提及西施的名字，但《国语·越语下》提到越国每岁向吴国选送美女之事，西施大概是这期间越向吴大量输送的众多美女中的一位。从《越绝书》、《吴越春秋》、《吴郡志》、《会稽志》等一些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当时连同西施一起到吴国作卧底的还有一名叫郑旦的美女，只是她的名声早被西施所掩。这些地方志还指称某地为勾践当年献美，某处为美女后来隐居，均言之凿凿，似乎确有其事。

笔者认为，西施可能确有其人，因为诸如《孟子》、《墨子》、《庄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中，西施曾被广泛提起。西施的故事在战国时期很可能曾经人口习传，是家喻户晓的著名故事，于是被汉代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吸收进来。应该相信的是，勾践曾先后选派多名美女送到吴国作为贿赂之用，这同时也是他灭吴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他选派的这些美女中，难免会有若干人行间谍之实，大量地为勾践收集和传递情报。而她的名字，我们不妨就推想为西施。

在这一系列的情报战之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二十载的勾践，于公元前473年对吴国发动大举进攻，并一举攻入吴都。夫差求和，遭到勾践断然决绝，被迫自杀。越王勾践于是继续挥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相会于徐州，做成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四

当然，对于勾践，历史上乃至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很不一致的。有人认为，勾践能够忍受那么多的屈辱，卧薪尝胆，并且知耻而后勇，堪称是一位大丈夫。包括勾践在灭吴过程中展示的过人的智慧和谋略等，都可以给人生以足够多的启示。但也

有人认为，勾践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放弃臣民放弃国家，甚至让全体国人跟着受辱。他这种举国投降的做法其实也是很仁义的。他们并且指出，勾践在成功复仇之后便大肆杀戮功臣，显示出极其刻薄寡恩的一面。尤其把他与夫差进行对比之时，勾践的猥琐退让与夫差的宁死不屈，立即形成很大的反差，故而勾践又很为一些人所不齿。总之，这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形象，如何认识倒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且不论其人品如何，我们如果细细考察勾践的行间经过，就会发现他出色的行间谍略颇有值得我们称道之处。作为一国之君，他在国破家亡之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冒着极大风险，忍受着空前的屈辱，以做奴隶为名，悄悄地行用间之实，借机大行间谍之计，从而为此后的复仇之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勾践经过打探，发现了伯嚭的贪婪，便大量地赠送珍宝美女，收买他作为内间，依靠他获得大量情报的同时，也为自己此后多次的化险为夷埋下了伏笔。试想，如果不是伯嚭在夫差面前的多次劝说，勾践可能早已经被随性随意的夫差杀死，也就没有了再次同夫差争霸的本钱。

勾践行间乃至对夫差最后一战的成功，说到底还是建立在对于吴王夫差性格缺陷的准确把握上。夫差此人虽然一度有着清晰的思路，但是在成功建立霸业之后，经常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且逐渐地狂妄自大起来，甚至连伍子胥等人的忠言都听不进去。而勾践则是准确地抓住了他的这个弱点，一面尽可能地满足夫差的虚荣心，让自大的夫差更加狂妄，一面暗中积蓄力量，终于靠着卧薪尝胆的勇气打败了强大的对手。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勾践对吴国的反击战和间谍战的获得成功，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用人得当。但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① 勾践在得势之后，对手下这

^①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些曾经衷心帮助过他的贤良大臣并不能善待，导致他们走的走，杀的杀，一个个都非常狼狈，非常令人寒心。这同时也是勾践非常惹人诟病的一件事情。可能正是因为这些贤能之士的不被善用，在勾践死后不久，越国的强盛便难以为继。过了些年，越国便为楚国所灭，狼狈的样子终于又一次出现，而且再没有了可以重新挽回的机会。



苏秦间谍案述评

苏秦在战国末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即便在民间，关于他的传说也非常多。苏秦本是燕国的一名间谍，一直帮助燕昭王从事颠覆齐国的活动。刘向在《说苑·君道》中称赞苏秦是“以弱燕并强齐”的功臣，表明他是知道苏秦的真实事迹的。1972年，山东出土的汉初竹简《孙子·用间》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衍文，更说明当时人们还能清楚地知道苏秦的间谍身份。司马迁称赞苏秦“连六国从亲，此其过人者”，又叹息苏秦后来“独蒙恶声”，并指出“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①这说明到了司马迁的时代，由于一些文献的散失，人们已经对苏秦的真面目不是很清楚了。所以，《史记》中就有一些关于苏秦的民间故事被收了进去，甚至苏代的一些事迹也被挂在了苏秦的名下。其后，有细心的学者不断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却因受着史料的限制而拿不出充分有力的证据来。钱穆在20世纪20年代曾著长文考辨其人其事，他不仅指出了《史记·苏秦张仪列传》中的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大胆地推断：“所谓苏秦张仪一纵一横，其说皆子虚，由后之好事者附会为之也。”^②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战国时的一批重要史料——“纵横家书”。这些保存了苏秦的真实言行的书信顿时澄清了关于苏秦及其有关历史的诸多根本性错误，向世人展示了“苏

① 《史记·苏秦列传》。

②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苏秦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第1版，第335页。

秦间谍案”的始末。1976年，文物出版社对这批书信进行了整理出版，书名定为《战国纵横家书》，凡三组27章。其中也收录了几位专家的考辨文章。^①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军事历史学界，其后竟仍有人撰文论述所谓的“苏秦的多极战略思想”。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推动中国古代军事情报史的深入研究，现将苏秦间谍案的始末梳理如下，并试作初步评析。

一

让我们先从燕国说起。战国时期，燕与齐是邻国，燕弱而齐强，长期以来，燕国深以齐将战略矛头对准自己为忧。公元前314年，燕王哙因为把王位让给其丞相子之而酿成一场内乱。这时候，齐宣王乘机大举进攻燕国，燕军几乎尽数覆灭，连燕王哙和子之都被杀死了。从此，两国的仇恨更深了。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后处心积虑地要报这深仇血恨，踌躇满志的苏秦也恰在此时来到了燕国。一个有国仇家恨，一个有宏图大志，两人便一拍即合。燕昭王赋予苏秦以极大的信任，而苏秦则不失时机的向昭王献上“谋齐”的策略。于是，一场天大阴谋就这样悄悄地策划于密室并付诸行动了。

这时候的齐国，宣王已死，继位的是湣王。湣王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重用孟尝君，并在他的辅佐下使两个大国——韩国和魏国臣服，同秦楚的多次交战也不落下风，只同赵国保持着密切的盟友关系。赵国也同燕国接壤，其实力已在赵武灵王的领导下大大增强，这对于燕国之谋齐当然非常不利。于是，燕王派苏秦前往齐国，意在破坏齐与赵的关系。不过，苏秦给燕王谋划的真正策略是使齐国

^① 这些文章包括杨宽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马雍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和唐兰的《司马迁所未见过的珍贵史料》。

“西劳于宋，南疲于楚”，使齐国在攻打楚国的过程中自我削弱，在攻宋时得罪其他大国，从而四面树敌。这是燕国的总战略和总方针，破坏齐赵关系只是这个总战略的一部分。

苏秦于公元前 300 年奉昭王之命第一次来到齐国。据唐兰推测，这次苏秦可能是以人质身份去的。^① 不过，苏秦此行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公元前 296 年，昭王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齐的战争并大败而归。在齐国已停留到第五个年头的苏秦未能劝阻燕昭王的这次莽撞行动，而只得匆匆回到燕国，等合适的时机再回齐国从事间谍活动。这一等就是八年。

二

孟尝君在齐国的地位越来越高，齐湣王终于怀疑其有二心而罢免了他。齐王亲自执政后，第一个大的政策变动就是和赵国断交，并和韩、魏关系恶化，因为这些政策都是当年孟尝君制定的。燕王见时机来到，立即派苏秦第二次到齐国去。这一年是公元前 289 年。燕王经过前 296 年军事上的大败后，吸取了教训，听从了苏秦等人的意见，而向齐国赔罪并同其维持着表面的友好。所以，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苏秦到齐国有了一个公开的身份，那就是联系两国的邦交。苏秦也因此有了直接面对齐王的机会。

苏秦首先告诉齐王一个谎言，他说，韩赵魏三国都希望同燕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齐国，而燕国拒绝了。齐王一听这话，十分高兴，马上对燕国派来的这位使者另眼相看。苏秦立即不失时机地向齐王献上 50 辆战车，齐王当然就更高兴了。高兴之余，齐王还就秦国邀其共同称帝的事向苏秦征询意见。当时诸国，以齐、秦两国实力最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秦国的意思是齐国称

^① 唐兰：《司马迁所未见过的珍贵史料》，载《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3月第1版，第131页。

“东帝”，而自己则称“西帝”。这当然是秦国的一个策略。秦的真实意图是，先不得罪这个强大的齐国，而把其余的小国抹平再说。对于齐国来说，这一策略当然也对自己的胃口。苏秦却不希望齐国的日子好过起来。他的任务是让齐国同韩赵魏三方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如能再同秦国交恶就更好不过了。所以，苏秦向齐王“揭露”了秦的阴谋，劝齐王别去理会他。苏秦告诉齐王，齐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自己的实力，而不是称帝。齐王一听，感觉很有道理，就问苏秦如何发展自己。苏秦于是把宋国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大大渲染了一番，并怂恿齐王立即攻打宋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苏秦终于说动了齐王，并让其感觉自己很贴心。

宋国处于大国夹缝之中，当然就牵动着各方的利益，但齐王这时已铁了心要拿下它。为了确保胜利，齐王甚至修复了与赵魏两国的关系。齐国要攻打宋国，秦国当然不答应，马上派人来劝阻。但此时的齐王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了。齐国在攻宋的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而在外交上则与秦、楚等国的关系越来越差。齐王只是被眼前的利益牵着鼻子，被苏秦的好话堵着耳朵，而在一条通往深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三

齐终于同秦全面交恶。苏秦告诉齐王应当乘胜拿下宋国，这时最好有支军队吓唬一下秦国，让他不敢出兵救宋，也许可以顺便教训一下秦国，如果把大家都发动起来，兴许就把秦国给干掉了呢。并且苏秦向齐王保证，燕国是绝对跟着齐国一起干的，只要把韩赵魏说通即可。见到齐王有心动的迹象，苏秦赶紧说，如果齐王相信，我苏秦就可充当这个使者。齐王立即派苏秦以齐使臣的身份前往燕国和三晋，说服他们组织一个五国联军共同伐秦。

苏秦首先赶到燕国，除了汇报在齐国的工作进展外，还同燕王密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期间，齐王杀掉了燕国派到齐国的一位将

军，而这件事足以让两国反目为仇，但燕昭王最终忍了下来。为了长远目的，昭王甚至主动向齐王道歉。苏秦也曾为此向燕王表示他不愿再回齐国了，因为齐王既然能杀这位将军，未尝不会杀苏秦。不过，苏秦最终还是决定把覆灭齐国这件事继续下去。

燕昭王对于五国联军当然极力支持，所以苏秦迅速赶往魏国。

这时我们又要提到孟尝君。在齐王手下死里逃生之后，他到了魏国。凭着名望、才能以及众多谋士之力，孟尝君在魏国很快立住脚，并取得了魏王的信任，左右着魏国的大政方针。但他对齐王怀恨在心，一直寻机报复。苏秦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明地里似乎在为五国谋秦作准备，暗地里又为联合赵魏反齐做着筹划。这一切，又哪里是齐王所能料到的？当然，齐国不止派了一个苏秦去联系这一事，还有其他使臣也做了大量工作。苏秦到了魏国时，五国联军计划甚至已执行了一部分。齐国首先派军进驻魏国，攻秦联军已初步成形。齐王于是乘机加紧了对宋的进攻。

不过，齐国的“明为攻秦、实为取宋”的计划终被赵魏等国也看出来了，再加上其他的恩怨和利害关系，联军的攻秦自然不力。这时，苏秦曾致信齐王，希望他能适当照顾兄弟们的的情绪，并把主要斗争对象放在秦国身上，而不要放过这联合的大好时机。苏秦此举当然是想把齐秦关系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去，倘能如此，燕国便能坐收渔利。

燕昭王以为等到了攻齐的时机，准备联合韩赵魏的力量，乘齐军主力攻宋时对齐来个突然袭击。想法虽然好，密谋的计划却不慎泄漏了出去。齐王闻讯大吃一惊，立即收回攻宋的兵马，并把情况通知了苏秦和孟尝君。苏秦随即向燕昭王作了汇报。由此可见，苏秦的真实身份这时还未被齐王察觉。

韩赵魏愿意同燕国联合的原因不外是，其身处齐秦两个大国之间的难受日子太久了。在他们看来，最好能适时的削弱其中一个。不过，他们能否真正走到一块，每每受到各自的对外政策乃至某些个人好恶的影响。比如，魏国的孟尝君是积极反齐的，赵国的奉阳

君则主张亲齐。当时赵国的力量比较强大，所以趁着五国联军名义上还在，孟尝君和苏秦都希望能把这一股力量真正用上，以借攻秦之名而达成弱齐之实。苏秦于是告诉齐王，说三晋在攻秦不成后势必会与秦讲和。齐王听到此话，立即抢先与秦国和好。齐王的出尔反尔当然更坚定了三晋联燕反齐的决心，甚而也会把秦国拉过来。

苏秦只为燕国计谋，为燕国的利益而不辞辛劳。他一再劝阻昭王推迟攻齐计划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却又担心会不幸招致燕王的误解，所以他曾致书昭王坦白心迹。他希望燕王“慎毋（非）令群臣众议攻齐”，即不要和有些大臣们公开讨论攻齐的事，他知道“言者以臣贱而邈于王矣”^①，怕燕王受臣下的影响从而动摇对自己的信任。由此可见，决策层对外派间谍的信任程度对于一个间谍来说有时也有着很致命的影响，至少苏秦就很忧虑这一点。在苏秦看来，最理想的效果是让三晋先动手，而燕王不必做反齐的急先锋。当他得知齐王已开始疑心三晋将联燕攻齐时，又致信齐王，请齐王对燕国放一颗宽心，为的当然是进一步蒙蔽齐王。在苏秦的周密筹划下，由三晋首先发动攻齐的计划差点就付诸实施了。公元前286年，赵国首先向齐发难。不过，战争结果未见记载，可能这次行动胎死腹中。不过，由此也可看出苏秦的一举手一投足，足以对当时诸国关系产生相当的影响。这在今天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苏秦的可疑形迹也终于到了该被发现的时候了。

四

首先怀疑苏秦身份的是同齐王有密切关系的奉阳君。这个赵国的宰相在为先前攻齐找借口的时候，立即想到了将苏秦作为替罪羊。他未必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却马上将一些甚至可能纯属猜想的

① 《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3月第1版，第25页。

东西报告了齐王，并立即限制了此时恰好在赵国的苏秦的活动。齐王不敢相信，所以派人来和苏秦对质。苏秦当然能够巧妙地进行应对，并向使者尽说其对于齐国的忠心。另一方面，苏秦马上向燕昭王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并请昭王设法帮助自己脱离赵国这个虎口。燕王立即派来两人同奉阳君暗中进行调解工作，但苏秦的处境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直到燕王对赵国发出严重的抗议，苏秦才最终得以被释放。这一年是公元前 286 年。

苏秦为了继续破坏齐赵的关系，直接由赵国赶赴齐国。苏秦显然太过自信了。他认为齐王并未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以为凭自己的口才能使齐王相信自己的一片“真心实意”。苏秦之所以大胆赴齐，更多恐怕是责任心使然。他为齐赵关系的改善而深深地忧虑，为燕国不能早日灭齐而殚精竭虑。而这一次，他竟然又成功了。

苏秦到齐国之后立即给赵王写信，希望他能同齐国联合。其目的是打消前此奉阳君给齐王带来的猜疑。苏秦更多的工作当然是要继续劝说齐王攻宋并帮助齐王出主意见办法。由于燕昭王交给苏秦的使命之一是要使齐“西劳于宋”，因此在攻宋的过程中，苏秦显得比谁都热心，比谁都关心齐王的利益。齐王当然也就不再怀疑苏秦了。宋国在齐国的第三次进攻中终于陷落。宋的灭亡引起诸国一片恐慌，大家一致认为齐国对各国已构成最大威胁。所以，齐国同秦国的友好也未能持续多久。在齐国攻下宋国后不久，三晋便说动秦国一起伐齐。燕国当然会积极参与其中。不过，这始终，燕国在苏秦的建议下都保持着表面的沉默。即使在五国联盟内部，昭王也要解释清楚：伐齐始终是有燕国一份的，但燕必须表面上维持对于齐的友好。燕对于齐的示好不仅对苏秦在齐国的生存有利，也给下一步攻打齐国留下了一个隐蔽的方向。

五国联军的正式成形是在公元前 284 年，其标志是燕昭王悄悄赶到赵国同赵王会晤。联军由著名将领乐毅率领。乐毅是燕将，但此时的身份也已变成赵国人。苏秦作为内应，当然会将齐国的

设防情况悉数向乐毅汇报。这也可能是乐毅能顺利拿下齐国的关键原因之一。并且苏秦劝说齐王在燕国方向可以不必设防，以集中力量对付西线之敌，因为燕国是决不会反齐的。齐王竟相信了他，并按照他的建议去进行布防。这样一来，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公元前 284 年，乐毅率五国联军从燕国方向对齐国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所到之处并无强力抵抗。乐毅在战事上的胜利，等于宣告苏秦身份的彻底暴露。齐王做梦也没想到，长期以来，一直在身边关心并帮助自己的人，竟是个最危险的敌人。苏秦并没有机会脱逃，齐王一直当他是左右手。或许，这时的苏秦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在他看来，为了他所忠于的燕昭王，齐国的覆灭是最重要的。气急败坏的齐王立即对苏秦施以车裂的重刑。积 16 年之心血，苏秦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终于盼来了齐国的灭亡，同时也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五

对于苏秦，历史上的评价不一。《荀子·臣道》斥之为“佞臣”，即“巧佞便说，善取宠乎上”之臣，这说明荀子要么是纯以一个儒家的狭隘眼光打量苏秦，要么是不知实情，仅能从皮相上把握国际社会中的一名战略间谍的行为表征。刘向所编的《说苑·君道》则把他同乐毅等并称“四子”，称赞他们是“以弱燕并强齐”的功臣。在刘向看来，燕国的复兴所依赖的不外乎是乐毅在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和苏秦在军事外交和隐蔽战线上的成功。山东出土的竹简《孙子·用间》中说“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这虽是衍文，也说明其著作者认识到了苏秦对于燕国复兴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后来，苏秦间谍活动渐为人们淡忘时，对其贬抑越来越多。司马迁希望“毋令独蒙恶声焉”，侧面反映了这个事实。

我们今天研究苏秦，必须要清楚这个 20 世纪 70 年代才廓清的史实。我们认为，苏秦间谍案的研究至少有着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 苏秦间谍案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不仅向世人展示了苏秦其人其事的历史原貌，填补了我国古代谍报史的一段空白，而且极有力地证明了一点，即一名战略间谍的重大价值。战国时代，七雄并起，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战火绵延不绝，国际战略格局也随之不断演变。以齐、燕两国关系而言，早在春秋时期，齐国便是第一个霸主，进入战国后，依然是实力雄厚的大国。燕国在北面而与齐国接壤，与齐国相比，是个弱国。公元前314年，齐大举攻燕，以致燕国几乎覆灭。然而由于燕昭王的成功运作和苏秦的苦心经营，终于使齐改变了对外战略方针，并使齐赵两国关系大大恶化，其间又利用齐国攻打宋国，从而削弱了齐的实力。齐与秦本可以并称东西二帝，几乎势均力敌，然而经过燕昭王与苏秦的努力，最后导致乐毅伐齐，齐国从此衰亡，各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的态势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而为秦国的统一天下创造了有利条件。促成战国后期齐国衰亡、燕国复兴乃至为秦统一天下铺平道路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有二：一是乐毅在正面战场上的胜利，一是苏秦在秘密战线上的成功。不过，如果没有苏秦“谋齐”的成功，恐怕也不会有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局面的出现。由此可见，远在战国时代，战略间谍的成功运作对于一国乃至多国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实施和实现，对于国际战略格局的筹划和形成，对于国际关系态势的演变乃至整个历史发展的走向，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 苏秦间谍案反映了中国古代用间的某些特征

燕昭王交给苏秦的任务十分明确，目标是使齐赵两国关系恶化，防止齐国进攻燕国，以成就振兴燕国的大业。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苏秦是一名战略间谍。这是特征之一。苏秦自公元前300年前往齐国，直至公元前284年因身份暴露而被车裂处死，历经16年左右时间。在此期间，虽则头绪纷繁，事件众多，但他的任务和目标始终是单一而且明确的。积16年之不懈努力，苏秦始终如一地为此奋斗，终于实现了使齐国同诸国交恶、从而振兴燕国的目标。

由此可见，苏秦间谍案具有任务明确、目标单一、隐蔽斗争、长期经营、一以贯之的鲜明特点。这是特征之二。今天的间谍都是隐藏身份、秘密派遣的。与之相较，苏秦的身份则具有半公开的性质，这与当时各诸侯国的“客卿制度”密不可分。在“客卿制度”的照顾下，人才的流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个国家的人才可以在另一个国家谋取官职甚至占据要位。苏秦也因此而能够借助掩护身份从事间谍活动。这是特征之三，也是先秦时代谍报工作的特点之一。苏秦在齐国的任务是改变齐对燕的敌对态度，并扭转其对外军事战略，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以刺探消息、窃取机密为主要使命的间谍。在获得齐王的信任之后，他更以齐国外交使节的身份出使韩、赵、魏、燕四国，以公开地开展军事外交工作，策动五国合纵伐秦之名，行密谋攻齐之实。集“伐交”与“用间”于一身，既是战略间谍，又奔走于军事外交战线。这是特征之四，也是先秦时代谍报工作的特点之一。另外，从苏秦间谍案还可以看出，间谍活动尤其是战略间谍的成功与否，一定程度上需要取决于外交的支持。苏秦在齐国的立足与获得信任，在赵国的被拘和被释都离不开燕王在外交活动中的支持，就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最后，我们认为，按《孙子·用间》一文对间谍的分类，苏秦似乎不是唐兰所谓的“反间”。孙子说：“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① 苏秦本是燕国派往齐国去的，不是所谓“敌间”，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反间”。我们认为，如果按照春秋晚期孙子所确立的标准，苏秦实际上是一名死间。关于死间，除了传世本的《孙子》之外，日本的樱田迪本是“死间者，委敌也”。委者，弃也。苏秦的被发现也就宣告着其使命的结束，必然面临被齐王处死的绝地。因此，苏秦应当被视为死间。

3. 苏秦间谍案对于恢复当时那段历史的原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今天的谍报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 《孙子·用间》。

其一是间谍自身的信念与忠诚问题。谍报人员的忠诚不贰对于间谍活动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苏秦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燕国。他一直牢记着燕王赋予他的颠覆齐国的使命，并为了这个使命而长期劳苦。虽然中途也发生过动摇，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变节。

其二是派遣方对一名间谍的信任与否问题。决策者对所用间谍的信任度往往极大地影响着谍报人员的心理，甚至直接影响到任务能否顺利完成。苏秦在前往齐国之前，曾向燕昭王讲述了尾生的故事，意在表明一个忠诚不贰的人也可能受到怀疑，并再三叮嘱燕王不可因听信其他大臣的谗言而出卖自己。这段故事从谍报心理学上说是很有意义的。它表明了谍报经营工作中，忠诚与信任这一对矛盾的客观存在和相互关系。可以说，燕王对于苏秦虽然有过怀疑，但就总体上来说还是给予了充分信任的。而这，也可以说是苏秦能够在齐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情报人员的忠贞和决策层的信任有时是互为因果的。

其三是间谍自身的素质和才干问题。作为一名战略间谍，苏秦个人的胆识、才干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头绪众多的事件中，苏秦不仅要抱定宗旨，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且还要具有临事处置、便宜行事的能力。他既要谨防暴露自己，又要有所作为，有时还需要当机立断、果敢决策。在那个通信联络极为不便的时代，他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向燕昭王请示汇报，一切只有靠自己深思熟虑，拿出办法。无论是对付齐王，还是与韩赵魏三国周旋，他都必须具有洞察国际形势、善于分析战略态势、巧妙应付、善于辞令的能力。他的这些素质和才干，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从事窃取军事机密工作的间谍的要求，而是集谍报经营、战略分析、谋略运用和军事外交于一身。《孙子·用间》认为，“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苏秦便是一个“上智”者。他的全面的综合素质，即便在今天，对于情报人才的考察、培养和选派，仍然富于启示意义。

4. 苏秦事件对于今天的纵横家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苏秦死后，大批士人研究苏秦、张仪之术，乃有“纵横之术”、“游说之术”和“长短之术”盛行，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并列于诸子百家的学派——纵横家。苏秦的书信本是绝密资料，“大概是保存在他的追随者手里的”，在苏秦死后，被“辗转传录”。^①后来汇编成书，供人学习之用，成为纵横家的重要教材之一。而纵横家直至汉代初年，还是一门“显学”。马王堆出土的这批帛书，就是“秦汉之际编辑的一种纵横家言的选本”。^②由此可见，苏秦对于那个时代，尤其对于其身后的纵横家们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

① 唐兰：《司马迁所未见过的珍贵史料》，载《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3月第1版，第128页。

② 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载《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3月第1版，第158页。



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间谍活动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动荡的时期。七国争雄使得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同时也给那些希望跻身政坛、实现个人抱负的纵横家们创造了绝好条件。他们活跃于庙堂之上，经常逞口舌之能，拨弄千军万马，使得国际局势旦夕变化，风云莫测。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巧妙用间，甚至经常亲为间谍，从而构成那个时期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本文分述其中几位代表人物的间谍活动，并对其活动特点作一简要评价。

一、张仪的间谍活动

张仪（？～约公元前310年），战国时期魏国人。张仪曾前往楚国谋取功名，在遭到失败之后又来到秦国寻找机会。在秦惠王面前，张仪终于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相。此后，他受秦惠王的派遣，进行了几次著名的间谍活动。

张仪自以为对魏国的情况了解多一些——他在这里出生和长大，便将他建功立业的第一站选定这里。公元前322年，张仪回到魏国。他以巧口利舌说动魏王，获得信任，直至被魏王任命为相。

张仪上任不久便试图说服魏王顺从秦国，从而实现他与秦王事先拟定的“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①的战略计划。魏王自恃国力雄厚，自然听不进他的这番鼓噪。张仪立即悄悄派人返回秦

^① 《史记·张仪列传》。

国，说服秦王发兵攻打魏国，以迫使魏国就范。秦大军迅疾出动，并根据张仪所提供的情报，尽攻魏军所不守，迅速将魏军击败。张仪乘机再游说魏王事秦。魏王正在犹豫之际，受其他诸侯的提醒，开始怀疑张仪的真实身份和真正企图。张仪害怕阴谋暴露，只得匆匆逃回秦国。

秦对魏的这次获胜，使得齐楚两国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他们于是转而试图通过结盟与强秦争雄。张仪回到秦国后，再度复任为相，但因为惧怕齐楚联盟会对秦国有所牵制，便又连忙赶赴楚国进行间谍活动，主要目的便是离间他们，便于实施各个击破。

张仪来到楚国后，重金收买了楚怀王的宠幸靳尚，使之作为内间，通过他得以接近楚王。张仪对楚王说，大王如果愿意与齐国断交，我们立即将商於一带六百里土地敬献大王。这样一来，楚国强了，齐国弱了，而你们也与秦国交好了，大王您则得到了六百里的土地！楚王立即被这“一计而三利俱至”^①的诱饵所迷惑，连大臣们的劝阻也置若罔闻，立即“闭关绝约于齐”^②。于是，刚刚启动的齐楚联盟战略宣告夭折。楚王对张仪的话信以为真，派一名将军跟随张仪前去秦国收取土地。没想到张仪一回到秦国便宣称自己骑马时受伤，整整三个月不出家门。楚怀王焦急万分，也一面在这种等待中与齐国交恶。终于，张仪答应交给楚国土地了，只是这块土地不是六百里，而是六里。楚怀王闻之大怒，立即派兵攻打秦国。但这时候，齐国已经与秦国结交，楚则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楚与秦的战争只能招致失败。

二、公孙衍的间谍活动

公孙衍，生卒年不详，魏国人。他曾在秦国为相，后来又被魏

① 《战国策·秦策二》。

② 《史记·张仪列传》。

王任命为相，是一位以合纵闻名的纵横家。

据《史记》等史书记载，虽同为魏国人，张仪主连横，公孙衍主合纵，恰成为一生之敌。战国时期一个名叫景春的人曾有这样一段议论：“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①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二人在当时的影响力。当然，儒家的大师孟子反对纵横家的学说及言行，故此他不仅反对景春的这番言论，还借题发挥，对所谓“大丈夫”做出了堪称经典的界说。^②

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也有过一段亲为间谍的经历。约在公元前322年，齐国与燕、赵、楚等国在魏国集结，商谈会盟之事。由于这次会盟没有邀请魏国参加，魏王觉得这很可能对己方形成不利，“恐其谋伐魏”，^③ 于是立即召见公孙衍商讨对策。

君臣二人经过一席商谈之后，公孙衍主动向魏王请命，决定亲为间谍，赶往卫国进行离间活动，主要行动目标便是破坏齐、赵等国的联盟。于是，公孙衍携带大量的珍贵财宝，所谓“约车载百金”^④，急忙上路了。赶到卫国之后，公孙衍马上呈上重礼，由此而获得齐王的召见。在与齐王对坐的时候，公孙衍向齐王“从容谈三国之相怨”^⑤，让齐王对结盟之事产生疑虑。

很显然，公孙衍的拜见齐王很快便引起了燕、赵等正要与齐国结盟的国君的怀疑。他们一起赶来质问齐王，魏国派公孙衍前来与您密谈这么久，是不是你们之间在密谋什么，将要损害到我们几个国家的利益？面对质问，齐王极力解释说，公孙衍只是受魏王的指派前来犒劳我们的，他给了我们一些财物，但我们并没有谈到其他事情。齐王越是这样解释，燕、赵、楚三国国君越发不能相信，这次会盟之事竟然就此宣告流产。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③ 《战国策·魏策一》。

④ 《战国策·魏策一》。

⑤ 《战国策·魏策一》。

三、范雎的间谍活动

范雎（？～公元前255年），战国时魏国人。他曾被人毒打之后，用草席包裹扔在厕所。在侥幸活命之后，范雎逃到秦国，靠着一份奏折打动秦昭王，受到秦王召见。

秦王与范雎的这次会见极不寻常。会见中，范雎再三地恳请秦王命令左右重臣回避。等秦王答应之后，范雎才将他深思熟虑的“远交近攻”^①等重要策略和盘托出。秦王闻之大悦，说道：“寡人敬闻命也。”^②由此拜范雎为相，委以重任。秦王听从范雎建议，在国内打击豪强，加强集权；对诸侯则实施“远交近攻”，在列国争雄的格局中迅速占据主动。

范雎的情报才能也非常出众。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范雎出色的反间计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军相距长平。秦军虽在军事实力上占优，却因为赵军由持重沉稳的廉颇统率，而一直不能取胜。廉颇所采用的是坚守不出的策略，秦军在赵军坚固的营垒之前茫然而不得战策。面对困局，秦昭王问计于范雎，很快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范雎主张，必须要实施反间计才能战胜赵军。在获得秦王首肯之后，范雎派心腹之人潜入赵国散布流言说，廉颇已经老而无用了，他惧怕秦军，一直不敢出战，只有落败的份儿，秦军惧怕的只是名将赵奢之子赵括。

赵王果然被这些流言所迷惑，此后便改拜赵括为将，替换了能征善战的廉颇。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在上任之后，便不自量力地对秦军轻率发动攻击，结果被名将白起所率领的秦军重重包围，手下的四十万大军中，只少数年幼获得释放，其余悉数遭到秦军坑杀。赵国的军事实力遭到重创，自此一蹶不振，再无与强秦一争高下的能力。

① 《战国策·秦策三》：“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②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范雎虽然才华出众，心胸却不够开阔，是所谓“睚眦之怨必报”之人。^① 范雎后来因为和白起争功而中了苏代的反间之计，在秦昭王面前诋毁白起，竟致使秦国一代名将冤死。

四、苏代的间谍活动

苏代，生卒年不详。最新出土资料表明，他很可能是苏秦之兄。^② 在苏秦死后，苏代一度受到燕王重用。作为一名纵横家，苏代用一次著名的间谍活动暂时挽救了赵国，也就此延缓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公元前259年，白起在长平大破赵军。四十万赵军中，除少数孩童被放生之外，其余尽遭秦军坑杀。秦军在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之后，在白起的率领下乘势进兵，直扑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惶恐之中。这时候，正在赵国的苏代受命携带重金悄悄赶到秦国，试图进行间谍活动，以延缓秦军的进兵步伐，挽救赵国的命运。

苏代深知范雎在秦国位高权重，对秦国的政坛很有影响力，便不惜重金获得了拜见范雎的机会。在呈上厚礼之后，苏代便开始在范雎面前极力诋毁白起。他对范雎说，白起马上就可以灭掉赵国了，他为秦国立下的功劳，虽圣人如周公、召公也不过如此吧，这样一来，就怕先生您的地位也要受到威胁。苏代的这番话一举击中要害。此前尚在帮助白起的范雎听了苏代这番话之后，果然嫉妒起白起的功高。他立即上书秦王，称秦军在长期征战之后已经疲惫不堪，该是收兵休养的时候了。秦王听从了范雎的建议，遂命令白起撤军。白起眼看着到手的胜利与自己失之交臂，难免会对范雎心生怨恨，将相之间因此失和。

①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② 据《史记·苏秦列传》，苏代是苏秦之弟，但根据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苏代似为苏秦之兄。详参《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3月第1版。

第二年，仍在负气之中的白起竟敢违抗秦王命令，仍不肯领兵出战。范雎则乘机在秦王面前继续竭尽诋毁之能事，终于使得本来就对白起心生愤恨的秦昭王动了杀心。白起在万分失望之下，最终“引剑而自刭”^①。

五、战国纵横家间谍活动的特点

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只是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一个侧面，但也充分展现了当时争霸各国对于情报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间谍活动对于争霸战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纵横家由于其活动特点的特殊性，具有在多国活动的经历和机会，从而始终是情报战线的活跃分子。

概括地说，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大都关注战略情报层面的内容，并据此试图扭转相关国家的对外军事战略。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② 此语鲜明地表达出纵横家的活动特点，即高度关注战略层面和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纵横家非常看重战略决策对国际局势演变的决定性作用，并试图以敌我关系的重新整合来改变各国的强弱态势乃至整个国际局势的走向。为此，他们的注意力便主要投放在各国的基本情况和战略态势层面，其中包括：各国的地缘政治概况，军事地理特点，军事和经济实力，统治集团的基本意向及民风民情，对外关系的现状及可供抉择的方针等。如果我们翻开《战国策》。便可以从纵横家们的大量论述中看到他们对各国上述情况的了如指掌。《史记·苏秦列传》中所记载的著名的“苏秦八论”，便是当时纵横家学派托名的模拟之作，被奉为战略情报分析的样品流传了下

^①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② 《韩非子·五蠹》。

来。今天看来，“苏秦八论”实则是当时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专家对各国基本情况所作的评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战略决策可行性方案所作的判断。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纵横家对战略情报的高度重视。

第二，纵横家从事间谍活动除迫不得已之外，其行事往往并不十分隐秘，身份甚至经常公开化。这尤其以张仪、苏秦为代表。他们以当时诸侯国盛行的客卿制度为依托，公开出使，悄悄行间。因为客卿制度的需要，人才的流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我们才能看到张仪和公孙衍等人在多国取得相印的传奇经历。纵横家也因此而能够借助掩护身份大肆从事间谍活动。

第三，纵横家的间谍活动往往集伐交与用间于一身，既是战略间谍，又奔走于军事外交战线。以苏秦为例，他在获得齐王的信任之后，便以齐国外交使节的身份出使韩、赵、魏、燕四国。他借助于这种公开的外交活动，以策动五国合纵伐秦为名义，暗中密谋攻齐之实。伐交与用间的合二为一，使得他们的间谍活动经常能够瞒天过海，取得惊人的成绩。张仪在魏国和楚国的间谍活动，公孙衍在卫国的间谍活动等，都显示出这个特点。

第四，纵横家们的家国观念往往不强。他们往往热衷于立功立名、追求富贵而无确定的是非之见。在政治立场上，表现为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在方针决策上，则表现为朝三暮四，惟利是图，甚至受一己利益之驱使，在为别国效命时，不惜损毁生养自己的祖国的利益。这其中尤以张仪、范雎为代表，只苏秦积16年之功忠贞不贰地为燕国效命，似属特例。纵横家的为人效命，偶或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更多的则是受到功名和私利的驱使。个人品节上的这种缺陷，发生所谓出尔反尔、尔虞我诈的情形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范雎和白起失和，便是由个人利益之争而导致最终牺牲国家利益。当时的大儒孟子曾极力讥讽公孙衍和张仪，《汉书·艺文志》总结出其“上诈谖而弃其信”的特点，都是这个原因。正是看到趋利之徒的这一本性，秦国以舍得投入和善于拉拢赢得了众多的效命者，从而最终在兼并战争中赢得胜利。



汉丞相陈平的情报活动

陈平（？~公元前178年），陈留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人。幼年时父母早亡，他只得寄居在兄长家中。秦汉乱世，陈平从军投奔项羽，很快便发现项羽是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之人，便转而投奔刘邦。在刘邦手下，足智多谋的陈平多次行间建功，辅佐刘邦夺得天下。汉初，他被封为曲逆侯，此后便成为西汉政坛的一棵常青树。吕后专权时，他一度心怀不满，所以便找了个借口赋闲在家。等吕后死后，他与周勃一起设计灭掉诸吕，迎立刘恒为汉文帝，此后被汉文帝任命为丞相。从刘邦称帝到吕后当政，再到刘氏复兴，陈平一直活跃于政坛，一生的传奇色彩由此可见一斑。在被司马迁列入世家的汉初谋臣中，陈平也赫然位列其中。^①

—

虽然少时家贫，陈平却有一位非常宠爱他的兄长。家里30亩田地全由兄长陈伯一人辛苦耕作，而陈平则打着“游学”的旗号四处交友闲逛。陈平是一个美男子，长得高高大大。有人因此故意问他：“你家里那么穷，吃什么才能长得这么白白胖胖呢？”陈平的嫂子一直看不惯这个整日浪荡的小叔子，便替他回答：“也不过是吃糠咽菜罢了，有这样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呢！”没想到她

^① 《史记·陈丞相世家》。《汉书·陈平列传》基本承袭《史记》。

的这句埋怨的话被疼爱陈平的兄长听到之后，竟然“逐其妇而弃之”^①。在陈伯眼中，他这个喜欢读书的弟弟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所以便辛苦劳作，勉力支撑着陈平的交游。

陈平虽满腹经纶，却一直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混不到一官半职，因而更为一般人所轻视。陈平长到成婚的年龄，兄长便张罗着为其娶妻。陈平在婚姻问题上虽也能从俗，却仍不顺利，“富者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高不成低不就”。当地有一个叫张负的富豪，他的孙女嫁人五次，可是丈夫都死了，所以当地的男人都不敢再与她接近，而陈平却不在乎这些，很想娶她为妻。张负在一次偶然之中见到陈平，很欣赏他的才学，便受陈平邀请到了他的家里。看到陈平家只是负郭穷巷，弊席为门，却仍有不少饱学之士肯与之结交，张负由此认定陈平的不俗，于是决定把孙女嫁给他。陈平得到了张负的资助，交游的圈子更广，认识的朋友也更多了。

这一年社祭，人们推举陈平为社宰，为乡亲们分肉。陈平把肉分得十分均匀，让大家都很满意。地方上的父老乡亲们纷纷赞扬他说：“陈平这孩子分祭肉，分得真好，太称职了！”陈平却感慨地说：“假使我陈平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称职。”

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元年，因为不能忍受暴秦的虐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率先在大泽乡起义，其部将周市平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陈平觉得这是自己施展身手的好机会，便辞别了兄长，来到魏王手下谋了一份差使。在魏王手下，陈平曾经几次就政事上书，虽然都是真知灼见却都未被魏王采纳，反而屡屡遭小人进献谗言。为了自保，陈平只好不辞而别。不久，他又投奔了楚王项

① 《史记·陈丞相世家》。据《史记·陈丞相世家》，曾有人在刘邦面前告发陈平行为无端，有盗嫂行为，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也不知道陈伯的这次逐妻是否与此事有关。

② 《史记·陈丞相世家》。

羽。没想到这项羽志大才疏，无道乏能，起初尚能重用陈平，但在陈平战败之后，便听信谗言想要加害于他。陈平一方面害怕受到迫害，另一方面也看到项羽不足与谋大事，便挂印封金，再次出逃。他想起汉王手下的魏无知是自己的老朋友，于是决定去投奔刘邦。

天快黑时，陈平逃到了黄河边，请船夫送他过河。陈平上船之后，船夫看到他将军一样的打扮，以为他身上带着珠宝，便想谋财害命。陈平反应很快，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马上脱了衣服扔在船上，光着上身来帮船夫划船。船夫看陈平身上并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也就打消了加害于他的念头。一场凶险就这样被陈平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经故友魏无知的引见，陈平得以见到刘邦。刘邦设宴招待他一番之后，便请他回馆舍休息。陈平却说：“我今天来找您是有事情的，而且我所想说的话不能超过今天。”刘邦只得留下陈平继续纵论天下大事，竟然谈得十分投机，于是就立即任命他为都尉。寸功未立居然就受到重用，汉营众将当然感到非常不服气，并立刻为之哗然，但刘邦力排众议，反倒对陈平更加信任，甚至让他做了“参乘”，主管护军事务。陈平自此开始效忠刘邦，听命麾下，屡出奇计，为汉王立下了赫赫战功。

二

公元前204年，在楚汉相争进入关键时期。刘邦在去年初攻占项羽的巢穴彭城后，一度轻敌，反被项羽困于荥阳长达一年之久，始终不能摆脱。刘邦请求项羽以荥阳为界，双方和解，遭到项羽断然拒绝。刘邦非常郁闷，他问陈平：“天下纷纷，何时定乎？”^①面对情绪低落的刘邦，陈平客观分析两军短长，为刘邦出谋划策。陈平曾在项羽手下呆过一阵子，对楚军的虚实相当了解。在陈平看

^① 《史记·陈丞相世家》。

来，项王为人缺少宽容之心，容易听信谗言，正是运用反间计的时机。项羽的得力之臣，不过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数人。如能舍得投入，以数万金为筹码去悄悄离间他们君臣，然后再举兵攻之，必定能够打败项羽。刘邦便拿出黄金四万斤交给陈平，让他作为行间的费用。

这时候，刘邦周围那些怀疑陈平人品的人，纷纷跑到汉王身边说陈平的坏话，并且对刘邦一掷千金的行为感到不解。绛侯、灌婴都以陈平“盗其嫂”而诽谤陈平，而且说陈平一贯聚敛财物，不知道去向，所以给他钱财恐怕只会被贪污。刘邦经不住众人的再三劝说，最终也心生疑团。他召来陈平质问：“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又离开魏王去帮助楚霸王项羽，现在你又来帮助我，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怎么能让别人怀疑你的信义呢？”陈平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我侍奉魏王的时候，魏王不能很好地用我，我的一些很好的计策他也听不进去，所以我只能失望地离开他。没想到那个西楚霸王也不信任我，所以我这才来归附大王。我久慕大王善于用人，所以才不远千里来投奔大王。我什么也没带就来到这儿，这才接受了人家的礼物。没有钱财，我就生活不了，更办不成什么事。如果大王听信谗言而不用我，那么我收下的那些礼物还没有动用，我可以全部交出来，请大王给我一条生路，让我辞职回家。”陈平的这一番话，道明了刘邦、项羽在用人上的高下之分，让刘邦对陈平增添了好感和信任。他重重地赏赐陈平，并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这让刘邦手下那些感到不服气的将领们顿时安静了下来，不敢再说陈平的坏话。

经过这次对话之后，此后再有类似的谗言，刘邦皆一笑置之，不予理睬，对陈平则是“恣所为，不问其出入”^①。得到刘邦如此信任，陈平这才能够安心为其效命，放手行使他的间谍术。他费尽心思在楚营收买奸细，令他们在楚军中散布流言说：钟离昧、范增

① 《史记·陈丞相世家》。

等因为功高而未能裂地封王，因此而心生不满，很想与汉王联合起来，一起灭掉项羽，瓜分楚王的土地。这些话传到项羽耳朵里后，他果然对钟离昧和范增等生了疑心。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决定派遣使者到刘邦大营打探虚实。

陈平先以高规格接待楚使，在见到楚使后又故作惊讶说道：“我以为你是亚父派来的使者，没想到是项王使者啊！”于是，陈平立即将接待楚使的规格一降再降，这种做法让项羽派来的使者暗暗感到吃惊，不免立即开始相信范增和刘邦暗中勾结的传言。

楚使愤愤不平地回到楚营，把陈平接待自己的前前后后经过向项羽做了详细的汇报。项羽因为早闻听军中流言，再加上这一番鼓噪，对钟离昧、范增等人终于产生了疑心。钟离昧、范增自此被项羽日渐疏远。随后，善战的钟离昧的兵权被项羽剥夺，汉军的压力顿时减小。范增知道项羽不再对他委以信任，大感失望。他愤怒地对项羽说：“天下大事已经定了，大王你自己处理决定吧，我只想告老还乡，过我的安稳日子了。”项羽听到他的这番话之后，并未做丝毫挽留。不久，曾经被楚王尊为亚父的范增在回老家的路上，背部生痈疽而死。项羽身边自此失掉了一个得力的谋士。

项羽怕日久生变，于是日夜急攻荥阳，这让刘邦非常焦急，只得苦思突围之计。这时候，陈平再献诈降计帮助刘邦成功突围。他让两千多妇女穿着武士的铠甲，乘着夜色从荥阳东门投降，再使汉将纪信扮作刘邦，乘天子辇，谎称城中粮草早已经断绝，不得不立刻出城投降。项羽信以为真，带领楚军大队人马都到城东接受刘邦投降。而刘邦则和陈平等人，率领着少数人马从西门出城，乘着这个间隙得以逃脱。

公元前203年10月，刘邦的重要辅佐韩信占据了齐地，自以为功高，于是遣使求封他为齐假王。刘邦气得大骂，陈平和张良则暗中踢刘邦的脚，他这才忽然领悟，立即改变了态度，隆重接待韩信的使者，改口骂道：这个韩信不求真王，反倒求个假的！刘邦立即拜韩信为齐王，从而避免了汉军的分裂。韩信后来协助刘邦行十

面埋伏之计将项羽一举击溃。西楚霸王项羽退至乌江，自感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遂引剑自刎。楚汉相争四年之后，终于以刘邦的获胜而告终。

三

公元前202年，刘邦登皇帝位，史称汉高祖。不久高祖就收到告发楚王韩信谋反的密信。刘邦向诸将征询对此事的意见，然后采纳陈平的计谋，装作出游云梦泽，乘着韩信出来迎接的时候，把韩信抓了起来。后来，刘邦把韩信贬为淮阴侯，留居京城，韩信也就不能再有所作为了。陈平的这一计谋，避免了一场战争，消除了再度分裂割据的祸根，维护了新王朝的统一与安定。

刘邦在夺取天下之后，一直忙于经营中原地带，无暇顾及塞外。这时候，长城北面的匈奴就乘机南下，大片占据汉人领土。公元前200年冬，刘邦统率大队人马御驾亲征。刘邦轻易相信匈奴可以击败的情报，率领军队一直向北开进，但没想到在行进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时，被匈奴单于冒顿率四十万精锐骑兵包围于白登山（今大同市东面）。冒顿命令军队分别把守住各个重要路口，挡住汉军的救援。

当时正值天气严寒，连日雨雪不断，刘邦和将士们都被冻得手脚僵硬。在被围困数日之后，军中的粮食也快要被吃完了，大队人马饥寒交迫，危在旦夕。这时候又是陈平以出色的行间术，帮助刘邦脱离了险境。

陈平得知冒顿对新得到的王后阏氏非常宠爱，于是就想从阏氏身上做文章。据裴骃《史记集解》，陈平亲自作为说客下山求见阏氏。阏氏听说汉军派来使者求见，便命令左右退下，马上召见陈平。陈平立刻向阏氏献上大量的金银珠宝，说是汉皇帝送给阏氏的，然后又另取出一幅图画，请阏氏转交给冒顿。

阏氏看到珠宝之后立刻爱不释手，便收下了这些礼物。她再打

开图画，只见画上绘着一个绝色美女，不禁起了妒意，便连忙询问陈平：“这幅美人图是干什么用的？”陈平回答说：“汉帝被单于包围，非常愿意罢兵言和。所以把金银珠宝送给您，再请您代他向单于求情，可又怕单于不答应，就准备把这位美人献给单于。因为美人现在不在军中，所以先把她的画像呈上。”

陈平接着说：“如果您能帮助我们解围，那我们当然不会再把美人献给单于了，而是情愿多给您送一些金银珠宝。”阙氏立刻明白了陈平的来意，便对他说：“那就请你回去告诉汉帝，尽管放心好了。”

待汉使走后，阙氏急忙找到冒顿，对他说：“汉匈两家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自然会拼命相救的。就算你打败了汉人，夺取了他们的城地，也可能会因水土不服，无法长住。况且汉王有神灵保佑，怕是不一定能立刻消灭得了，请大王明察。”冒顿看到刘邦大军多日不见动静，也怀疑他们有什么谋划，怕受到什么埋伏，便听从了阙氏的劝告，“引兵而去”^①。就这样，陈平通过巧妙的行间，使得刘邦成功地逃出匈奴的包围。^②

陈平以出色的军事谋略而始终受刘邦重用，而刘邦则依靠包括陈平在内众多智士的群策群力，终于夺取天下。当刘邦成功之后，对一班功臣均有赏赐。当他厚赏陈平时，陈平却辞谢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汉王还应当另封他人。如果没有魏无知举荐的功劳，我怎么能够有效命的机会呢？”刘邦非常高兴，对陈平更加另眼相看，同时马上厚赏了魏无知。陈平此举既使刘邦赏善无遗，又赚得不忘本的美名，更报答了魏无知的举荐之恩。

陈平在吕后专权时虽不能左右逢源，但仍然屹立不倒。他对吕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其事《史记·陈丞相世家》仅一带而过。据《史记集解》，桓谭《新论》及应劭《汉书音义》有一些记载。

后专权非常不满，但是为了使自己免遭不测，当吕后封诸位吕氏为王的时候，他还是假装同意，这使得吕后能一直对他委以信任。但在吕后去世之后不久，他便悄悄地联络周勃，密谋除掉了吕后所封的这些不恰当的王。他虽然位列右丞相，但在知道汉文帝有另立周勃为右丞相的打算后，便赶紧识趣的出让职位，自己退居左丞相。但是，陈平最终还是以他丰富的政治历练和出色的执政韬略令周勃叹服，也以明于职守受到汉文帝的称赞。周勃自愧才能远远不如陈平，于是谢病免相，让陈平专任唯一的丞相。

汉文帝二年，即公元前178年，陈平病死，朝野为之震动。汉文帝下诏追谥他为献侯，以示表彰。陈平为刘邦以及刘氏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曾以此为陈家的子孙带来福祉，获得世代封侯的特殊待遇，可惜他的曾孙一辈承祖荫而不知持重，因为犯了大错，使得陈家从此丢失了封侯的待遇。

四

据《史记》记载，陈平年少时就喜好黄老之术，所以即便处于多事之秋，他因富于谋略，能进能退，最终“定宗庙，以荣名终”，诚所谓“善始善终”。^①但在历史上，一部分人对其评价并不高。尤其当人们以儒家的一些义利观道德观评价他时，他自然地矮了一截。这个缘故，有人称其为机会主义者，有人称其为实用主义者。但是，假如我们稍微从容一些，暂时抛却这些道德是非之争，便会发现陈平的行间技巧确实很有他的过人之处，因此才能屡屡建功。

陈平在遇到刘邦之前曾经有过怀才不遇，正是这才使得他在遇到刘邦之后更加尽心尽力。而刘邦用人不疑，即便在周围人竞相诋毁和责难陈平之时，仍能对陈平委以高度信任。就离间项羽与范增

^① 《史记·陈丞相世家》。

的这次间谍行动来说，刘邦将四万金交付陈平之后，便听任其使用而不问去处，对陈平赋予了极大的信任。这一用间案例再次生动说明了，在间谍活动中上下级之间的互相信任问题非常重要，甚至能直接决定行间的成功与否。如果刘邦不能知人，或者知而不能信，用而不能信，那么陈平在汉营一定无法受到重用，他的那些行间计策即便再高明，也只能胎死腹中，满腹经纶都只能是桃花流水。孙子曾对用间过程中这种关系进行过探讨，他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①显然，刘邦很好地把握了这层关系。假如他在众议中失去主张，陈平的能否见用都是问题，更谈不上离间范项和挫败项羽了。

陈平运用假投降的计策和反间计，使刘邦两次摆脱险境，谓之行间高手毫不为过。可见，在局面打不开或者己方身处险境之时，用间不失为一个简单易行的计策。有时候，它甚至会成为某些谋略家们的首选，往往能取得一些意外的战果。

陈平运用美人计对匈奴行间的这一破敌之法，史官如司马迁都觉得鄙陋，有失汉朝君臣体面，故而闪烁其词地说“其计秘，世莫得闻”^②。幸好有《新论》等书如实做了记载，让我们得以窥见陈平的行间谍略。我们考察陈平一贯的实用主义行事之道，便大可确信其有，甚至还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只有陈平能够想出这个计策并付诸实施，为什么只有陈平能够每每在关键时刻解救刘邦。孟尝君曾以善于使用鸡鸣狗盗的实用之徒成功自救，而刘邦手下的这些商贩、屠夫、车夫乃至亡命之徒，就不只是行鸡鸣狗盗之实效了。他们或运筹帷幄，或拼杀疆场，均能建立赫赫战功。谋略出众如陈平的，也能高举实用主义旗帜，抓住稍纵即逝的制胜机会，汉王的挫败楚王和赚得天下便不足为奇了。

① 《孙子·用间》。

② 《史记·陈丞相世家》。



北齐名将韦孝宽的情报活动

韦孝宽（509年～580年），名叔裕，字孝宽，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南）人，我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由于韦孝宽“少以字行”^①，所以一般都习惯称其为韦孝宽，而很少有人称其为韦叔裕。

韦孝宽出生在官宦之家，自小便好读经史，性格温和，却在年纪轻轻之时就显示出非常出色的军事才能。西魏文帝年间，他一直率军在边境与东魏作战，而且“每战有功”。^②周武帝即位后，韦孝宽也是他手下戍边的重要将领。在善于指挥作战的同时，他还非常善于行间，他的几次著名的间谍活动一直是间谍史上非常典型的案例，被人们经常提起。

—

韦孝宽20岁的时候，正好遇到萧宝寅作乱。韦孝宽虽出身于官宦家庭，但是见到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便请求作为先锋前去征讨。他的这一请求幸而获得批准。朝廷任命他为统军，跟随长孙承业西征。在这次战斗中，韦孝宽立有战功，随后拜国子博士，“行华郡事”^③。不久之后，他又奉命跟随大都督杨侃“出镇潼关”^④。杨侃

① 《周书·韦孝宽列传》。

② 《周书·韦孝宽列传》。

③ 《周书·韦孝宽列传》。

④ 《周书·韦孝宽列传》。

见韦孝宽才能出众，非常喜爱，便将女儿嫁给他。北魏永安（528年~530年）年间，韦孝宽再次获得提升，官拜宣威将军、给事中，不久之后又被赐爵山北县男。北魏普泰（531年~532年）年间，韦孝宽作为都督，跟随荆州刺史源子恭镇守襄城，因为获得战功再次受到提拔，出任析阳郡守。这时候，独孤信正好是新野郡守，二人关系甚好，而且政绩都很出众，一时间被荆州人称为联璧，传为美谈。

公元538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四年，东魏和西魏因为边境争端爆发战争，一时间烽烟四起，战祸连连。当时担任南兖州刺史的韦孝宽受命奔赴边境，参加边境作战。此前，东魏大将段琛、尧杰已经占据宜阳（今河南西部、洛河中游地区），并且派扬州刺史牛道恒在西魏边境进行煽动策反活动。这一招果然很奏效，立即引发当地一些百姓闹事，“边境骚然”^①。这让西魏文帝和韦孝宽都大伤脑筋。韦孝宽一直苦思对策，但又一直找不到任何的头绪。

这一天，韦孝宽此前秘密派往东魏的间谍忽然送来了他们费尽周折搜集到的牛道恒亲笔书写的公文。看到这些公文，韦孝宽灵机一动，猛然想起来用伪造书信实施离间手段瓦解敌军的办法。

韦教宽连忙吩咐手下找军营里最擅长模仿别人字迹的先生，命他立即模仿牛道恒的笔迹写一封假信。书信的大意是说牛道恒心甘情愿马上归降韦孝宽。就在这封信刚刚写完，墨迹未干之际，韦孝宽突然取过信来，放在火上烧了一下，信纸的一角立即烧焦了。这让模仿笔迹写信的先生感到大惑不解。韦孝宽却笑了：“这么做，是为了让书信更有真实感。段琛会怀疑牛道恒写完信后害怕走漏风声，曾经想把书信烧毁。这样子他才会相信书信的内容。”

书信写好之后，韦孝宽再让间谍把这封残信送到段琛军营，然后故意丢失在段琛的大营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偶然间得到这书信

^① 《周书·韦孝宽列传》。

的士兵不敢怠慢，连忙把书信呈送段琛。昏黄的灯光下，段琛展读信件，不禁双眉紧锁，大吃一惊：“没想到这牛道恒竟敢变节投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找来牛道恒的笔迹进行对照，发现果然是牛道恒的笔迹，便对书信内容不再产生丝毫怀疑，也对牛道恒完全失去了信任。此后，牛道恒所提出的一切作战建议，不管合理不合理，段琛都冷笑置之，一直不予理睬。起初，这让牛道恒非常纳闷。时间一久，牛道恒不免对段琛心生怨恨，双方的裂痕开始越来越深。

东魏两位戍边将军闹出矛盾，正是韦孝宽设离间计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韦孝宽很快就得到了这一情报。他知道自己伪造的书信果然起到了作用，不禁大喜，于是决定抓紧时机，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分别袭击段琛和牛道恒大营。面对韦孝宽的“奇兵掩袭”^①，心怀异志的东魏将军果然互不援救，结果被韦孝宽一一击败，段琛、牛道恒也都先后被活捉。这样，韦孝宽所防守的边境线终于获得安定，“崱、滏遂清”^②。

公元539年，即西魏大统五年，韦孝宽因为戍边有功，再次受到朝廷的加封，“进爵为侯”。^③

二

公元542年，韦孝宽转任晋州刺史。公元546年，又被授予大都督的职务，率军镇守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不久，东魏丞相高欢倾山东之兵自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出发，向西魏大举进攻，把玉壁团团围困。由于韦孝宽足智多谋，指挥得当，因敌设防，使得高欢精疲力竭也未能攻克玉壁，创造出古代城邑保卫战中

① 《周书·韦孝宽列传》。

② 《周书·韦孝宽列传》。

③ 《周书·韦孝宽列传》。

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著名战例。

公元554年，即西魏恭帝元年九月，韦孝宽作为大将军与柱国大将军燕国公子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领兵5万进攻梁朝，由于战争获胜，因军功再被封为穰县公，拜尚书右仆射，赐姓宇文氏。公元557年，宇文觉取代西魏称帝，是为孝闵帝，定国号为周，史称北周，韦孝宽官拜小司徒。公元557年，宇文邕即帝位，是为周武帝，任命韦孝宽为勋州刺史，镇守玉璧。

北周的劲敌是北齐，两国之间多年交战，结下深仇大恨，北周的皇姑和皇世母“先没在彼”^①。没想到，北齐忽然派使者来到玉璧，希望两国之间能互相贸易加强往来。韦孝宽认为北齐忽然派人来求交易，正可以借此机会请皇姑和皇世母回来，于是在郊外设置供帐，热情款待北齐使者，并同意两国之间的交易，令北齐使者和颜悦色。使者回去禀报之后，北齐最终同意派人将皇姑和皇世母送回北周，作为双方修好的一个条件。

在和北齐多年对峙期间，韦孝宽非常善于运用间谍，多次使用间谍战获得奇功。他趁着和北齐关系的改善，秘密遣送间谍潜伏进去，多方打探北齐的情况。由于韦孝宽善于抚慰部下，深得人心，他所派往北齐的间谍，都心甘情愿为其效命。与此同时，他也通过收买的方式，拉拢了不少齐人作为内间，所以，北齐的一举一动都为韦孝宽所掌握。

当然，由于北周和北齐两国接壤且互为仇敌，互相派遣间谍，以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也是常理。当时，韦孝宽手下有一位名叫许盆的将领，非常骁勇善战，一直被韦孝宽视为心腹，却被北齐的间谍所收买。这一天，许盆奉韦孝宽之命前去镇守一座城池，没想到他在领命之后却迅速投降北齐。韦孝宽深知许盆此后必将成为北周的心腹大患，如果不能为己所用就必须及早除掉他。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再次设下行间的计策。于是，他委派手下一名

^① 《周书·韦孝宽列传》。

得力的间谍悄悄地潜伏到许盆身边，寻找机会刺杀许盆。不久之后，这名间谍便成功斩获许盆的首级回到大营。

三

韦孝宽经历战阵无数，经常获胜，但在与北齐名将斛律光的交战中，不幸落于下风。公元571年，他在汾北被斛律光所挫败。他苦思退敌之策，又一次想到了间谍战。他通过这次间谍活动，最终成功地除掉了北齐名将、左丞相斛律光，也成为间谍史上的著名案例。

斛律光，字明月，能征善战，英武雄杰，是一位能弯弓射雕的神射手。在与北周的对抗中，他立下赫赫战功，先后击败了宇文宪、宇文杰，给北周造成极大的威胁。可以说，正是靠着斛律光的努力，北齐政权才得以和北周对抗。

公元570年，北齐将斛律光自平阳进抵汾北，筑华谷、龙门（今山西河津西）二城，与韦孝宽所部形成对峙。到571年正月，斛律光已在汾北筑城13座，拓地500余里。韦孝宽自感不妙，遂主动出击，对其发动突然猛攻，没想到也被斛律光挫败。斛律光的善于用兵，令韦孝宽颇为忌惮。

自从在汾北被斛律光击败之后，韦孝宽一直想除掉这个敌手。他委派间谍不停地打探斛律光的情报。他通过间谍收集到的情报得知，斛律光虽然立有赫赫战功，但在北齐的朝廷中也有不少人很不喜欢他，甚至嫉恨于他。尤其是北齐后主高纬的宠臣祖珽，他在听到斛律光用“盲人用权，国必破矣”^①的话痛骂自己之后，更是无比憎恶斛律光，一直寻找机会加害于他。

韦孝宽知道这些情况之后，便想出来一出离间计，希望借助于祖珽的力量来除掉斛律光。他反复琢磨，终于编造出一首歌谣：“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溃，榭树不扶自竖。”

^① 《北史·列传第四十二》。

这里的升，原指旧时容量单位，10升等于一斗，10斗即100升，即百升等于一斛。歌谣中的百升，即影射斛律光的斛字。北齐王姓高，歌谣中的“高山”，即影射北齐王；“榭树”影射斛律光。这两句歌谣的意思是说，斛律光将要当皇帝，北齐王就要垮台了。

歌谣写好之后，韦孝宽命令间谍们把写有这些歌谣的传单，散发到北齐的京城邺（今河北临漳）。祖珽见到这些传单后，又添枝加叶，刻意加以渲染。他在韦孝宽编造的歌谣上又加上一句“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并让小孩子在大街小巷传唱，弄得满城风雨，然后再将这首歌谣的情况向后主乳母陆令萱做了汇报。祖珽提示陆令萱，歌谣中“盲老公”就是骂他祖珽的，而“饶舌老母”一句就是辱骂她陆令萱的，希望陆令萱立刻向后主汇报。陆令萱听了这些话之后，当然非常恼火。她立即找机会对后主说：“斛律一家世代都是大将，而且声震关西，斛律氏在朝中的地位确实很高。歌谣中的话实在是可怕啊。”北齐后主只是个十五岁的小孩，不谙世事，便询问身边大臣韩长鸾。韩长鸾认为歌谣中所说的不必当真，后主就相信了，这事情也就暂告一个段落。

但是，祖珽却不甘心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在他看来，这正是除掉斛律光的良机，一定要抓紧。于是他也找了个借口晋见后主，向后主提起这歌谣的事情。后主听了之后就说：“这只是歌谣而已，不会是真的吧？韩长鸾告诉我不要相信这些。”听到后主还是这个意见，祖珽岂肯罢休。他再次提醒后主必须要当心自己的皇位，如果歌谣所说的是事实，到时候后悔就迟了。就在这个时候，朝廷中另外一位对斛律也心怀嫉恨的大臣也上书进献谗言，说斛律西征回来后不仅不解散军队，而且一直率军直逼京城，这实际上就是图谋不轨的一个信号。后主听到这些话之后，猛然相信了解律光谋反的歌谣，也立刻担心起自己的皇位。他慨然叹道：“我前疑其欲反，果然。”^①于是匆忙和祖珽一起商量除掉斛律光的计策。

^① 《北史·列传第四十二》。

斛律光正在前线督战，这一天忽然受到后主召见，说是有宝马相赠。他不敢怠慢，连忙收拾行装回到京城，赶到皇宫拜见后主。看到斛律光入宫，后主安排埋伏在宫殿里的刀斧手一拥而上，立即将他抓捕，并随即处死。随后，斛律光满门都被抄斩。北齐一代名将斛律光就这样被韦孝宽用反间计除掉。

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接受韦孝宽的建议，一举成功地打败北齐，最终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公元580年，韦孝宽在平定了尉迟迥之乱后回到家中，一个月后去世，终年72岁。鉴于他一生的赫赫战功，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谥曰襄。

四

韦孝宽的几次间谍活动都卓有成效，行间成为帮助他获胜的一个重要法宝。他的几次间谍活动对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通过编造歌谣的方式行反间计成功除掉斛律光之后，使得北齐和北周之间的力量对比悄然发生了改变。这对于实现北周的安全稳定乃至北周此后逐步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这个缘故，北周武帝占据邺城之后还追赠斛律光为上柱国、崇国公。他还手指诏书说：“此人若在，朕岂得至邺？”^①这番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韦孝宽这次间谍活动所取得的成效。

韦孝宽使用伪造信件的方法行使反间计，堪称间谍史上的一个创举。客观地说，他的这次行间有几个值得称道之处：第一，不是直接去敌营散布假消息，而是借助伪造书信这种间接手段；第二，在找人模仿笔迹写好信之后，故意用火烧毁其中一角；第三，伪造的书信不是直接传递到段琛手里，而是让间谍放置在敌营，依靠对方的士兵完成传递。韦孝宽使用的这些手段，无疑都是为了使书信

^① 《北史·列传第四十二》。

更具真实性，让对手更容易中计。事实证明，他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

韦孝宽通过编造歌谣的方式，再借用祖珽之手杀掉斛律光，这种手段也非常高明，乃至现代的反间谍略仍然经常使用，也成为今天信息战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前，事先编造大量的谣言，声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也制造舆论，把萨达姆描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已对国际社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之后，美国就似乎拥有了攻打伊拉克的口实，而萨达姆在国内的反动派也公然地站了出来，堂而皇之地作为美军的内应，使得萨达姆政权迅速的土崩瓦解。

韦孝宽这种编造歌谣行间的方式，显然要远远胜过简单的制造谣言。歌谣利于传唱，朗朗上口。当它在民间反复传唱的时候，更容易动摇军心和民心，也更容易使人相信。古代社会的民间歌谣曾经演出过不少惊天动地的故事，韦孝宽的这次行间就是其中一例。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韦孝宽这些间谍术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还要感谢他派往北齐的间谍给他提供了非常可靠非常及时的情报，让他得知北齐上层之间难以调和的内部矛盾，然后有的放矢地紧紧抓住这些矛盾做文章，才最终实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

善于利用商贸获取情报的裴矩

裴矩（？~627年），原名世矩，因避唐太宗讳而去掉世字。字弘大，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我国隋唐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情报活动家，在隋朝任职期间，为隋朝政权平定边疆地区的动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裴矩幼年丧父，一直为其伯父所收养。长大成人后，他果然没有辜负伯父的期望，成了一名很有才干的政治家。博学多才的裴矩能积极留心世事，有着很强烈的济世情怀。他曾先后在多个朝代做官，均能获得很好的口碑，一生政治业绩颇丰。他在担任隋朝边疆官员的时候，对于处理隋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方面，也很有独到之处。这时候的裴矩，既是外交家，同时也是情报官。他千方百计所收集到的情报资料，对于隋朝稳定边疆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故此有人称他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广泛收集公开情报资料的间谍。

—

裴矩在北齐时，曾有过在高平王手下任职的经历。在北周杨坚出任定州总管时，即公元578年，裴矩开始在他门下听差，并深得杨坚欣赏。后来杨坚取代北周，成功建立了隋朝，裴矩也加封进爵，被任命为给事郎，后来又经累次升迁，一直做到黄门侍郎、民部尚书等要职。

隋朝初年，裴矩曾参加过平陈战争，后又统军平定广州叛乱，战功显赫。在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后，他又参与过营建东都。这些都

是裴矩不断获得提升的重要业绩。除了这些之外，在隋代，裴矩同时还以杰出的外交才能和边陲一带成功的情报活动而闻名于世。这个时期的裴矩其实也可说是一名战略间谍。他穿梭于隋朝北方地区，为边疆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

北周、北齐时代，北方草原的突厥族乘着中原地区的动荡迅速获得崛起之势。突厥势力极盛之时，控弦之士达数十万之众，直至“西破猓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①。周、齐长期对峙，故此都希望拉拢突厥，借以自重。他们都拿出珍宝奉献突厥，千方百计和突厥拉近关系。所以，突厥佗钵可汗曾骄横地对部下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② 突厥这时候的强盛与霸道，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这样骄横的对手，隋文帝采纳大臣长孙晟提出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战略，不断挑起突厥诸汗的内哄，让他们形成窝里斗，成功使得突厥势力有所削弱。但是，即便实力已经大不如前，突厥仍然屡屡南下，侵犯隋朝边疆地区，对隋朝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突厥堪称隋朝最大的边患，故此，经略突厥一直是隋朝外交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时候，裴矩这样的外交奇才似乎正可以一展身手。

裴矩在经略突厥方面所建的第一件奇功，就是和长孙晟、牛弘一起，成功除掉了反隋的北周公主——千金公主。

千金公主是北周宇文氏之女，字文芳，是北周宣帝的弟弟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她曾是北周宫廷内外一致公认的才女，才华出众，艳冠群芳。为了拉拢突厥，千金公主年少时就嫁给了突厥沙钵略可汗为“可贺敦”^③。隋灭周时，千金公主的父亲起兵抵抗杨坚，结果被杨坚打败并诛灭九族，故此千金公主一直对隋朝和杨坚怀恨在

① 《周书·突厥列传》。

② 《隋书·突厥列传》。

③ 亦可省称为“可敦”，是突厥、蒙古等民族对可汗妻的称呼。《旧唐书·突厥传上》：“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妻号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

心，屡次劝说沙钵略可汗进攻隋朝。

据《隋书》记载：“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①千金公主泪水婆娑地向沙钵略可汗诉说自己的冤仇，长跪不起地恳请他与隋朝绝交，然后派兵为自己复仇。看到千金公主这般模样，沙钵略可汗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立即宣布和隋绝交，进而发兵进攻隋朝边关。为了实现复国梦想，报得家仇国恨，千金公主亲自跨上战马随军出征，并谱写战歌以鼓舞士气。突厥军队为她的激情所感染，一鼓作气攻下了隋朝的边地重镇——王城。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千金公主，她又“纵兵自木峽、石门两道来寇”^②，武威、天水一带，或遭沦陷，或受威胁。千金公主的存在，对隋朝已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隋朝起初一直设想采取安抚策略稳住突厥和千金公主，但收效不大。隋文帝下诏赐千金公主姓杨氏，编入属籍，改封大义公主。公元589年，即隋文帝开皇九年，隋朝平定南方的陈，便将陈叔宝的屏风赐给千金公主，以示优宠。但是，无论隋朝怎么进行安抚，也是无法消弭千金公主的灭国之痛和家族仇恨。所以，千金公主不仅不动心，还暗地与西突厥泥利可汗联系，图谋共同出兵，大举进攻隋朝。这种情形之下，裴矩主张设计除掉千金公主。于是，他和长孙晟、牛弘一起密谋之后，决定由自己亲为使臣，前往突厥处劝说都蓝可汗，设法挑拨都蓝可汗与千金公主的关系。

这时候，隋朝继续加大对千金公主进行赏赐，以暗中配合裴矩的间谍活动。隋朝对千金公主的拉拢，加上裴矩的挑唆和游说，使都蓝可汗听信了千金公主通奸的谣言，对她失去了往日的信任。都蓝可汗遣使向隋朝求婚，隋文帝便顺势答应把安义公主嫁给他，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先除掉千金公主。显然，几经沧桑

① 《隋书·突厥列传》。

② 《隋书·突厥列传》。

的千金公主在都蓝可汗眼中已渐渐失去了昔日魅力，再加上背负通奸的罪名，蓝都可汗终于下决心除掉千金公主。公元596年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千金公主被蓝都可汗一剑刺死。

在除掉千金公主的间谍活动中，裴矩不仅是主要设计者之一，而且还两次亲为使臣，冒险奔赴敌营，以外交为名，行用间之实，成功除掉千金公主，从而消除了隋朝的一大隐患。

二

隋炀帝时期，西域问题再次成为皇帝和隋朝政府所要关注的头等问题，于是裴矩以其丰富的外交经历，再次被任命为使者，去完成隋炀帝所赋予的“通西域”的任务。

狭义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帕米尔高原和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广义西域则是以上地区的进一步延伸，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等地区。这一片广大的领土对于中原国度来说非常重要，不仅商业利益系之，边疆乃至内地安全都与之息息相关。众所周知的著名的古丝绸之路，西域是必经之处。如果西域失控，中原地区各民族则自然失掉这一条商业大动脉，损失不可不谓惨重。所以在汉代，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和占据这条交通要道。由他们所开创的这条中西交通要道，对实现民族繁荣，保持边陲稳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汉亡以后，中原地区战乱不息，故此一直无暇西顾。直到隋朝统一，天下重新归于太平，“通西域”才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该计划的决策人是隋炀帝，但具体的策划和执行者是裴矩。

公元607年，裴矩被委以重任，负责西域与张掖及中原地区的边关贸易。裴矩懂得，要想完成通西域的任务，实现隋炀帝“方勤远略”和“啖以厚利，导之使人朝”^①的战略目标，必须首先充

^① 《北史》卷三十八。

分了解西域的现状，掌握当地的风土人情，再进而了解西域诸国的历史风貌等等。而且，隋炀帝的通西域，并不是诉诸武力，而是尽可能地依靠外交手段。而做好这些工作，可靠的情报保障是必不可少的。裴矩在张掖期间，亲眼目睹西域诸国与张掖地区百姓交易的盛况，更加体会到经营好西域对于隋朝政权的重大意义，因此深感责任重大。为此，他经常穿梭于武威、张掖及敦煌一带，利用通商和出使等机会，大量收集西域诸国的情报资料，并尽可能迅速地向隋炀帝报告。

自西汉以来，西域地区变化非常之大：“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① 故此，依靠张骞等前人收集的资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需要。中原人士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了解非常不足。若想重新恢复与西域的联系，必须要费尽心思，重起炉灶。

裴矩一面多次前往张掖、敦煌一带，积极与高昌、伊吾等国进行接洽，一面积极利用现有资源广泛展开间谍活动。在监管边关贸易期间，裴矩知道西域诸国的富商巨贾经常出入张掖一带，同中原富商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活动。这些富商四处走动，周游西域诸国。每到一地，他们便仔细窥探商机，寻找生财之道，因此他们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政治面貌等，都非常熟悉，所谓“诸国之事罔（无）不徧（遍）知”^②。就这样，裴矩敏锐地想到通过这些富商来收集情报的办法。

于是，他通过管理关市的职务之便，积极同这些富商进行密切交往，大量收集那些实在无法立即获取的情报资料。在和这些商人的交谈中，裴矩或装作若无其事，或巧妙变更话题，努力地诱导这些商人说出相关国家的重要情报资料。显然，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国俗山川险易”等情报资料，毕竟不是第一手情报，而且有时裴矩

① 《隋书·裴矩列传》。

② 《隋书·裴矩列传》。

还会遇到众口不一的情况，这就需要他仔细进行核对，将商人提供的每一条信息仔细查证明白。为此，裴矩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裴矩通过大量的侦察和长期的收集，手中所获得的情报资料越来越多，于是他决定将这些情报资料进行系统的汇总和整理，然后撰成《西域图记》三卷。该书涉及西域共四十四国的各类情报，对西域情况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此外，他还“别造地图，穷其要害”^①，绘制出其中重要国家山川险要的详图，一并呈报隋炀帝。

隋炀帝收到裴矩的报告非常高兴。一段时间内，他几乎每天都召见裴矩，向他仔细询问西域的情况，与裴矩详细探讨经略西域的方案。裴矩告诉隋炀帝，中原与西域的隔绝主要是突厥和吐谷浑使然。而西域诸国中，有一些其实一直希望与隋朝结盟，甚至“引领翘首，愿为臣妾”^②，以期共同对付蛮横的突厥。如果派人联络这些国家，让他们一同出兵，夹击突厥，那么不仅突厥和吐谷浑可以被消灭，西域的稳定也一定不难实现。裴矩进一步报告隋炀帝，通往西域的道路主要有北、中、南三条，而这些道路中，伊吾、高昌、鄯善是通往西域的门户，敦煌则是最重要的“咽喉之地”^③。隋炀帝听了他的这些汇报之后，立即将经略西域的重任全权委托于裴矩。裴矩也因此获得了进一步施展才能的机会。

三

裴矩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其实与汉代对付匈奴的策略相差无几，都是要取得与西域诸国的联络，以期实现夹击对手的目的。这似乎既是裴矩长期酝酿思考的结晶，也部分得自历史经验。不管如何，

① 《隋书·裴矩列传》。

② 《隋书·裴矩列传》。

③ 《隋书·裴矩列传》。

裴矩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情报足以令隋朝“拓地数千里”^①，立即在经略西域方面显出巨大成效。

公元609年，即隋炀帝大业五年，根据裴矩所报告的情报，隋炀帝派柳武率领大军大举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国王仓促之间来不及应战，只得举国投降。这很好地证明了裴矩所获情报对于经略西域的重要性。此役过后，裴矩进一步受到重用。隋炀帝认为裴矩很有“绥怀之略”^②，立即提升他为银青光禄大夫。为了巩固前期成果，隋炀帝再对西域增兵，帮助裴矩守备，终于实现了“西域诸藩，往来相继”。^③

据《隋书》记载，就在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时，“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国”夹道迎接。经过裴矩努力，大业年间，西域的高昌、党项、康国、安国、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二十余国，先后“遣使贡方物”^④，与隋建立朝贡关系。这其中，裴矩功不可没。

当然，这种朝贡关系也有依靠和亲手段实现的，比如隋与高昌就是在大业八年建立了和亲关系，^⑤而且也会在某个时间段产生一定波折。

公元610年，西突厥可汗处罗就自恃兵强马壮，拒绝朝见隋炀帝。隋炀帝非常愤怒，他立即召见裴矩商量对策。裴矩在帮助隋炀帝仔细分析了西突厥的形势之后，决定通过西突厥另外一位部落首领射匮，牵制和瓦解处罗。裴矩得到的情报显示，自从处罗取得可汗的地位后，射匮一直很不服气，与处罗的关系也非常紧张。所以这射匮正是裴矩可以借助的力量。就在这个时候，射匮正好派来使者向隋朝求婚。裴矩建议隋炀帝抓住这个合作的机会，答应射匮的

① 《北史》卷三十八。

② 《隋书·裴矩列传》。

③ 《隋书·裴矩列传》。

④ 《隋书·南蛮列传》。

⑤ 《隋书·炀帝纪》。

请求，并通过射匱的使者行使离间之术。隋炀帝同意了裴矩的计划。他对射匱的使者说，我们和亲可以，而且也可以考虑重新立射匱为可汗，但射匱必须派兵诛杀处罗。使者回去之后立即向射匱进行了汇报。射匱看到重新获得可汗的机会，当然不愿意错过。他立即“兴兵袭处罗”^①，处罗大败。就这样，裴矩很好地利用了西突厥的内部矛盾，巧妙行间，一举降服了处罗。

其时，另外一位突厥首领始毕可汗势力越来越大，对隋朝构成一定威胁。裴矩经过研究，决定还是通过用间来瓦解对手。裴矩得知始毕身边有一位重要谋士叫胡悉，是帮助始毕出主意的人，必须先机除掉，便设下诱杀计策。他派间谍告诉胡悉，马邑新到许多稀世珍宝，其中不少都是隋帝的宠爱。胡悉贪财，立即冒险前往寻宝，结果很快被裴矩伏兵捕获。这时，裴矩派使者告诉始毕说，胡悉率部来投奔我，请我接纳。我考虑到两国关系，既然胡悉背叛您，我当立即诛杀之，帮助您清除叛徒。始毕知道其中有诈，但苦于找不到把柄，只得忍气吞声。裴矩高明的行间术再次奏效。

隋朝天下被李氏夺取之后，裴矩率部降唐，并且帮李世民提出过一些很好的建议，受到重视。但是毕竟年岁已高，贞观元年，这位政坛不倒翁在长安去世，受赐封为绛州刺史，谥号为“敬”。

四

裴矩非常重视用间，也深谙用间之道，堪称中国古代一位行间老手。在军事斗争中，他屡屡通过行间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很好地帮助隋朝实现经略西域的战略目标。孙子说：“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裴矩堪称一位善于用间的“贤将”。裴矩利用监管边境贸易的机会，大量接触富商借机收集情报资料的做法，也被证明是一条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如果说他是实施

^① 《隋书·西突厥列传》。

魏源《皇朝經世文編》記載，我國第一

次派員分領武職的情報機關就是晏壽務以重信

時史又：「以重信及又謀敵，情本將誇耀，錄

魏源《戈》。一但實際上，魏源始社會未辦開

始，洋務局為系統的出現，司諒察，氏除在相

望今對編程中，情報就了依屬了替分誰與味勝

辦的實與謀思味手實，經足以說國中國的情報

學業時是及，又文斤茶引上的應書。



中国近代 情报史

储道立 熊剑平 / 著

ISBN 978-7-227-04624-0



9 787227 046240 >

定价：28.00元